

江苏海安农村中小学教师研修活动调查*

罗琳

(江苏省海安县教育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室, 江苏海安 226600)

[摘要] 对江苏海安905名农村中小学教师研修活动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均有健全的教师研修制度,教师研修范围、方式的实际状况与效果评价基本一致,与“教学研训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吻合,教师对目前的研修比较满意,体现出高度务实的精神。但经费不足的“老大难”问题依然存在,各学段、各类教师发展不平衡,领导关注度也有差异,教师研修与领导关注存在相关性,研修中还有着一些“做得少、评价高”,或者“做得多、评价低”的现象,教师对镇教研员评价不高,也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 教师研修; 调查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10-04

一、调查方式

20世纪90年代末,方兴未艾的国际教师专业发展潮流受到了我国教育理论界的关注。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推进,把教师的日常教学与教师学习、研究和培训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使之紧密结合,实现“教学研训一体化”,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也日益成为教育界的共识。为了解现状,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教师研修,2007年11月,我们对江苏海安19所农村小学、初中的905名教师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中,初中、小学教师各占43.87%、56.13%,男女教师各占45.64%、53.70%,教龄25年以上、24-10年和9年以下的教师各占19.45%、46.63%和32.82%,主科(语文、数学、英语)、副科教师(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各占79.39%、20.61%,骨干、非骨干教师各占14.03%、84.20%。

调查采用的是封闭式问卷。问卷设计的基本依据,是海安县多年来形成的“教学研训一体化”^[1]的成功经验,内容涉及教师研修活动保障、范围、方式及成效等方面,活动保障又涉及活动制度、经费和时间,以及领导参与、教师知晓等。我们将调查表制作成了PPT,印制了答题卡,主试边放映调查表边读题,被试根据读题进度填写答题卡,读题结束即停止答题。这样,就防止了被试过多思考,或与他人讨论。最后,我们还依据一定标准,剔除了一些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占95.47%。

二、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意图和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我们从概况统

计、对照分析两方面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处理,对照分析涉及学段、性别、教龄、学科、骨干等各类教师的不同情况。

1. 有94.56%、91.90%的教师反映,近两年来,学校对教师撰写读书、教学反思笔记有明确要求,并将研修纳入教师考核。但只有32.29%的教师有机会外出参加学校组织或公费报销的研修活动,只有16.55%的教师反映,学校能聘请县外专家为教师讲学、辅导。在将研修纳入考核、公费外出研修、外请专家辅导等方面,小学较初中高6.93、5.08和3.25个百分点。

2. 以镇、学校、教研组或年级组、年级学科备课组为单位开展的研修,均以每周1次居首位。与初中相比,小学每周2次以上的学校、教研组或年级组、年级学科备课组、镇研修高11.91、10.28、4.27和4.22个百分点,每周1次的镇、学校研修也高6.11、4.36个百分点。但初中每周1次的教研组或年级组研修比小学高8.21个百分点。

3. 经常及有时听随堂课、参加教研活动的次数,校长比镇教研员高29.10、23.65个百分点,小学校长比初中校长高7.23个百分点,初中镇教研员比小学镇教研员高17.98个百分点。校长、镇教研员经常及有时听自己随堂课的次数,教龄25年以上教师高6.76、7.85个百分点,非骨干教师高9.95、5.12个百分点。主科教师感觉,经常及有时听随堂课、参加教研活动的次数,校长高9.07、17.79个百分点,镇教研员高1.27、5.73个百分点。

4. 集体研修范围与效果评价,均以“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学校学科教研组”“全镇同学科教

*[收稿日期] 2008-05-20

[作者简介] 罗琳(1961-),男,江苏海安人,江苏省海安县教育局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室专职研究人员,海安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挂职),中学高级教师。

师”居前3位,但“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由实际范围的第二位上升到了效果评价的首位。“全校教师”“全镇教师”的活动最少,评价也最低(见表1)。

表1 集体研修范围概况及效果评价

集体研修范围	概况	评价
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	(2) 23.38	(1) 24.66
学校学科教研组	(1) 26.79	(2) 23.87
全镇同学科教师	(3) 22.88	(3) 23.35
学校年级学科备课组	(4) 13.45	(4) 13.89
全校教师	(5) 9.08	(5) 9.52
全镇教师	(6) 4.42	(6) 4.70

5. 集体研修方式与效果评价,均以“同事间相互听课(说课)及评课”“集体备课(课堂教学设计)”“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居前3位,但“请专家听课、指导”由实际方式的第八位上升到了效果评价的第四位。“参加各种互联网远程培训”“承担省、市、县课题研究”的实际活动很少,评价也最低,均不足1%(见表2)。

表2 集体研修方式概况及效果评价

集体研修方式	概况	评价
同事间相互听课(说课)及评课	(1) 23.47	(1) 24.73
集体备课(课堂教学设计)	(2) 18.30	(2) 22.13
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	(3) 8.84	(3) 13.61
请专家听课、指导	(8) 4.24	(4) 7.57
解题、磨题,分析教材	(4) 8.48	(5) 6.75
学习课堂实录、教学案例	(7) 4.68	(6) 3.91
聆听专家或专业人员的专题报告	(13) 1.82	(6) 3.91
作业设计或命题	(9) 4.12	(8) 3.55
教学与学习心得交流(教学会诊、沙龙研讨)	(10) 3.07	(9) 3.08
学生练习、考试结果分析	(5) 7.27	(10) 2.96
撰写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	(6) 6.02	(11) 1.89
参加省、市、县各类研修活动	(16) 0.85	(12) 1.30
教师教学情况分析	(11) 3.03	(13) 1.18
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	(17) 0.40	(14) 1.07
开展微型课题研究	(12) 2.75	(15) 0.95
参加各种互联网远程培训	(18) 0.32	(16) 0.83
学习教研理论书籍、文章	(14) 1.41	(17) 0.47
承担省、市、县课题研究	(15) 0.93	(18) 0.12

6. 以能否做出效果评价为依据,80.56%的教师有一定的自发研修活动。自发研修方式与效果评价,均以“学习非单位规定的教研理论书籍、文章”“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居前列,但“自费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活动”由实际方式的首位下降到了效果评价的第四位;“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由实际方式的第四位上

升到了效果评价的第三位(见表3)。

表3 自发研修方式概况及效果评价

自发研修方式	概况	评价
学习非单位规定的教研理论书籍、文章	(2) 53.70	(1) 26.87
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	(3) 39.36	(2) 26.72
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	(4) 34.05	(3) 24.71
自费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活动	(1) 57.73	(4) 11.93
自费参加省、市、县各类教师研修活动	(5) 15.16	(5) 9.77

7. 对教师帮助最大的人依次为:同一学科教学平行班同事(38.00%),学校资深教师或教研(备课)组长(28.61%),分管校长或教导(教科)主任(10.05%),县教研员(7.80%),校长(5.85%),高校及科研部门专家(4.14%),镇教研员(3.55%),县教育局其他教研人员(2.01%)。

8. 我们列举了“校本研修”“每周半日研修”“海安县教师专业发展BBS”等3个问题,考察教师的知晓度。综合有效问卷、外出研修、自发研修和问题知晓等的对比结果,小学、女性、年轻、主科教师较高,非骨干教师的有效问卷、自发研修也高于骨干教师(见表4)。

表4 各类教师有效问卷、外出研修、自发研修与相关问题知晓对比

教师	有效问卷	外出研修	自发研修	问题知晓
初中—小学	-2.25	-5.08	-22.63	-10.14
男—女	-2.35	-3.14	-7.02	-3.88
教龄25年以上—9年以下	-5.83	-4.85	-7.54	-1.46
主科—副科	8.21	17.71	1.57	10.07
骨干—非骨干	-3.02	14.69	-6.82	0.27

9. 为深入了解各类教师的研修特点和需求,我们将各类教师对研修范围、集体与自发研修方式、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人的评价做了进一步对比。

(1)集体研修范围,初中教师对“全镇同学科教师”的评价高19.91个百分点,小学教师对“学校年级学科备课组”的评价高13.43个百分点。集体研修方式,初中教师对“解题、磨题,分析教材”“作业设计或命题”的评价高6.57、5.39个百分点,小学教师对“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的评价高12.21个百分点。自发研修方式,初中教师对“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的评价高5.08个百分点,小学教师对“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的评价高9.24个百分点。帮助最大的人,初中教师对县教研员的评价高7.94个百分点,小学教师对学校资深教师或教研(备课)组长的评价高5.77个百分点。

(2)男女教师差别不多。女教师对“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的范围、对“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的方式的评价高6.34、7.74个百分点。男教师对分管

校长或教导(教科)主任的评价高9.34个百分点,女教师对学校资深教师或教研(备课)组长、同一学科教学平行班同事的评价高7.99、6.87个百分点。

(3)教龄25年以上的教师对“学校年级学科备课组”的评价高5.73个百分点,教龄9年以下的教师对“学校学科教研组”的评价高5.42个百分点。老教师对“集体备课(课堂教学设计)”的评价高7.11个百分点,年轻教师对“同事间相互听课(说课)及评课”“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的评价高5.93、7.17个百分点。老教师与年轻教师对自发研修方式评价的差别很多,前者对“学习非单位规定的教科理论书籍、文章”“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的评价高6.73、7.98个百分点,后者对“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自费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活动”的评价高11.92、5.55个百分点。此外,年轻教师对学校资深教师或教研(备课)组长的评价高5.70个百分点。

(4)主科教师对“学校年级学科备课组”的范围,对“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方式的评价高15.02、11.31和7.00个百分点;副科教师对“全镇同学科教师”的范围,对“学生练习、考试结果分析”“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等方式的评价高10.62、7.33和5.55个百分点。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人,主科教师对学校资深教师或教研(备课)组长的评价高5.11个百分点。

(5)骨干教师对“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的评价高5.95、9.68个百分点,非骨干教师对“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的范围、对“自费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活动”的方式的评价高7.27、7.09个百分点。

三、讨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农村中小学教师研修整体态势良好,值得肯定。

首先,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均有健全的教师研修制度,对教师撰写读书笔记、教学反思笔记有明确要求,并将研修纳入教师考核。镇、学校、教研组或年级组、年级学科备课组等各种范围的教师研修均以每周1次居首位,都能正常开展。好学校当然应该培养好学生,但首先要培养好教师。作为教师研修的第一责任人,校长大多能坚持听课,参加教研活动。绝大多数教师对研修有较高认识,能自发开展研修。

其次,教师研修范围、方式的实际状况与效果评价基本一致,也与“教学研训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吻合,不仅说明教师对目前的研修比较满意,也体现出高度务实的精神。教师集体研修的主要范围是: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学校学科教研组,全镇同学科教师;主要方式是:同事间相互听课(说课)及评课,集体备课(课堂教学设计),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教师自发研修的主要方式是:自费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活动,学习非单位规定的教科理论书籍、文章,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

思笔记。教师研修中的关键人物是:同一学科教学平行班同事,学校资深教师或教研(备课)组长,分管校长或教导(教科)主任。“全校教师”“全镇教师”的活动最少、评价最低,应与难以组织、效果不佳有关;“参加各种互联网远程培训”“承担省、市、县课题研究”的活动很少、评价最低,应与参与者较少、受益面不大有关。

再次,各类教师对研修范围、方式和关键人物的评价不同,也体现了高度务实的精神。初中教师、副科教师更喜欢“全镇同学科教师”研修,小学教师、主科教师更喜欢“学校年级学科备课组”研修,应与同一学校同类教师人数多少有关。初中教师对“解题、磨题,分析教材”“作业设计或命题”评价较高,小学教师对“观摩名师、优课教学录像”评价较高,应与不同学段对教师学科与教学知识的不同要求有关。老教师、骨干教师更喜欢“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年轻、非骨干教师更喜欢“自费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活动”,应与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不同发展需求有关。女教师对分管校长或教导(教科)主任的评价较低,应与此类人员大多为男性,与之沟通不便、不多有关。

调查结果也提醒我们,农村中小学教师研修活动还有一些值得关注和改进的方面。

1. 研修经费不足的“老大难”问题依然存在。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办2003年的调查表明,“科研经费不足”位居影响学校教育科研发展主要因素的首位。中央教科所课题组2005年的调查表明,物质条件保障不足是制约校本教研开展的重要因素。^[2]我们的调查也发现,有机会外出参加学校组织或公费报销的研修活动的教师不足三成,能聘请县外专家为教师讲学、辅导的学校更少。虽然外出研修、内请专家未必最有效,但窥一见全,可想教师研修经费之捉襟见肘。而且,这也并不是领导、教师的“认识”或“态度”问题,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2. 各学段、各类教师发展不平衡,领导关注度也有差异。尽管初中教研组或年级组活动、镇教研员听课略多一些,但无论是制度建设、经费保障,还是各种范围研修、校长听课及参与教研活动次数,还是教师自发研修和问题知晓的比例,都是小学普遍优于初中。这与中央教科所对全国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综合各方面结果,还存在女性、年轻、主科、非骨干教师研修情况较好的现象。联系到校长、镇教研员听课对象多为老年、非骨干教师,参加教研活动的学科多为主科,我们有理由相信,教师研修与领导关注存在相关性。教师研修的领导与指导者更多关心非骨干教师、关注主科教师,也许正是体现了一种务实作风,无可厚非。小学、主科、非骨干教师得到较多关注,研修热情较高,这不难理解。但同样得到较多关注的老教师为什么不及年轻教师?年龄、教龄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性,一直是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研究的关键点,国内外研究者也一直认为两者呈显著正相关。而从实际情况看,领导与指导者对“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关注较多,对“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却关注较少,是不是出于对前者的“不放心”?而对后者的“放心”

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另外,是不是骨干教师外出研修机会较多,自发研修就“力不从心”了?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3. 教师研修中还存在一些“做得少、评价高”或者“做得多、评价低”的现象。首先,在集体研修范围方面,“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由第二位上升到了首位,尽管幅度有限,但这正是海安县目前大力推进的“每周半日研修”^①的主要范围。自我反思是教师发展的主要途径,同伴互助是自我反思的主要支撑,但并不是每所学校都有良好的教师合作氛围和传统,倡导“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共同研修,应该有利于改进和加强教师研修。其次,在集体研修方式方面,“请专家听课、指导”由第八位上升到了第四位,这充分体现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对于专业引领的期盼。专业引领也是教师自我反思的重要支撑,但从实际状况与效果评价的差异看,这项工作还有待加强。再者,在自发研修方式方面,“自费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活动”由首位下降到了第四位,“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由第四位上升到了第三位。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是欲得而不能,耐人寻味。教师的学科知识、学历程度与学生的学业水平之间有多大的相关性,本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强调教师的真功夫在课堂,强调让教师在“教学研训一体化”的机制中感受职业生涯的乐趣,但许多年轻、非骨干教师却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自费参加各种学历进修活动”中,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4. 各类教师对于一些自发研修方式的不同评价并无本质差异。各类教师对自发研修方式评价的不同,相对集中在对“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的看法中,初中、副科、老教师更喜欢前者,小学、主科、年轻教师更倾向后者。不过,“参加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研讨”其实也是在“撰写非单位规定的读书笔记或教学反思笔记”,两者并无本质差异。问题在于,目前各种网络教育论坛的初中、副科专栏很少,老教师又可能不熟悉网络研讨技术。但正如有专家强调、并经过我们的实践证明了的,网络论坛高度的言论自由、极强的交

互性,都可以使教师教育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难题得到化解。^[3]这提醒我们,对于教师们的看法还要有所辨析。联系到“参加各种互联网远程培训”在实际研修方式中居末位,效果评价中也居后3位,应该与其缺乏针对性和交互性有关。但互联网远程培训却应该是教师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我们应该竭力改进,使之臻于完善,而不能简单否定。

5. 教师对镇教研员评价不高,镇教研员负担过重。教师们对高校及科研部门专家、县教育局其他教科研人员在研修中的作用评价最低,应该与他们难以直接接触教师有关,并不奇怪。但是,理应成为农村中小学教师研修主要组织者、管理者的镇教研员听课、参加教研活动的次数远远低于校长,所获评价甚至低于同样难以直接与教师接触的县教研员,就值得我们关注了。我们对一些镇教研员进行了追踪访问,结果发现,沉湎事务、“不务正业”,是普遍现象。在海安县,大多数镇教研员都需要承担一定的日常教学任务,教研工作只是“兼职”。此外,他们还有可能是“兼职”的教科员、电教教研员、学籍管理员、继续教育联络员、电子公文收发员、职称材料员、办公室事务员、工会主席、监察员……个别地方还将镇教研员作为了安置老同志的“待遇”,也影响了镇教研员的整体素质。令人忧虑的是,“每周半日研修”倡导“全镇同年级(或相近年级)同学科教师”共同研修,镇教研员责无旁贷,甚至“非他莫属”。如何改善镇教研员生存状态,提高其整体素质,可能事关“每周半日研修”的成败,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参 考 文 献]

- [1]海安县教育局.探索教师群体专业成长的有效途径[J].人民教育,2006(15-16).
- [2]课题组.全国校本教研实施现状的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07(1).
- [3]包国庆.教师教育发展中的六大困境与网络化解[J].教育发展研究,2005(2).

(责任编辑 刘敏慧)

^① 每周半日研修,是海安县教育系统正在努力推进的一项教师研修管理机制。就是要求每周规定半天时间,组织同一年级学科备课组的教师开展以集体备课为主的研修活动。

学习共同体与和谐课堂的创建*

陈滔娜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 基于共同兴趣和共同需要以及共同目标的追求,学习共同体设置平等开放的学习环境,营造轻松的学习情境,使用沟通式的交互合作学习方法来达到预期目的。学习共同体的活动理念与和谐课堂建设的目标有内在的一致性,理解采用学习共同体理念、建构平等民主的学习平台是和谐课堂创建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学习共同体; 教师; 学生; 和谐课堂

[中图分类号] G64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14-03

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反复提到,共同体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形式。人们因为有共同的生活内容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内,共同体成员必须具备共同的目的、信仰、期望、知识等,沟通是共同体成员生活学习的主要方式。建立学习共同体是许多研究者和学习者的共同追求。本文试图从分析学习共同体的理念来思考和谐课堂的创建。

一、何为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兴趣和共同需要之上、为着共同目标的组织。学习共同体通过平等开放的学习环境、营造轻松的学习情境及使用沟通式的交互合作学习方法来达到预期目标。

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人类社会学范畴的概念。社会学者认为“共同体”概念进入学科领域应从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发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算起。滕尼斯使用“Gemeinschaft”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在书中划分了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类型:共同体与社会。他用共同体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的、联系紧密的、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1] (P.16)}“共同体”应用于教育领域最早见于博耶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基础学校:学习共同体》的报告,报告提出“学校是学习的共同体”,学校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共同体。^{[1] (P.3)}学习共同体就是指参与学习活动的学习者(包括专家、教师及学生),围绕共同的主题内容,在相同的学习环境中,通过参与、活动、反思、会话、协作、问题解决等形式建构的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氛围

的动态结构。^[2]人们普遍认为,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是指一个由学习者、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构成的团体,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因而在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3]

学习共同体的优点是进行合作化学习与对话交流式学习。学习共同体成员通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团体之间的互动而建构,个体思维在对话和合作交往中形成、发展,教师和学生得到共同的发展。倡导在学习共同体中彼此合作、对话交流是学习共同体的两大要求。

学习共同体是一个彼此协作的组织。在学习共同体中,每个学习者的学习并非单个的、孤立的,学习共同体要求学习者志趣相投、相互协作、合作。从学习学的角度来看,学习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在学习共同体的平台上,学习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共享经验,共同进步,也就是在协作的意义上进行知识的建构,符合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学习共同体是一个以对话和交流开展学习的组织。“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法。”^{[4] (P.9)}在个人经验成为共同财富以前,经验只是个别的,通过交流和对话,分享各成员的经验,经验就变成了共同财富。杜威认为,教育的过程就是经验的过程,经验的过程是交流的过程。只有通过交流,经验才可得到不断积累、改造和重组,个体在经验积累和改组过程中成长、成熟并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

*[收稿日期] 2008-10-20

[作者简介] 陈滔娜(1971-),女,广东湛江人,南京大学教育系博士研究生,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说, 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4〕(P.9)}通过充分的交往和沟通, 使得个体得到充分和全面的发展。实质上, 个体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与他者多方互动、交流的过程, 通过建立学习共同体能够形成动态的学习系统, 系统内成员由此建构起逐步完善的学习知识体系。

作为一个合作、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系统, 学习共同体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显得特别有意义。信息资源的不断涌现和更新, 视角的不断扩大, 学科的不断交叉, 单一个体已无法依靠自己的精力、能力来完成自己的发展历程, 只有创造共享的环境、共享的资源, 通过共同的学习才有可能达到自我和社会的预期目标。面对支持众多资源的互联网学习环境, 学习者通过建立学习共同体来共享集体智慧, 完善自己。

学习共同体这些特点不仅使学习者获得了知识上的互助, 而且获得了情感的沟通, 个体从封闭的学习状态中走出来, 在人与人多元交互的“对话”中增强学习者参与合作的意识。

二、基于学习共同体的和谐课堂

正如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合作一样, 教育与人的发展也离不开合作, 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合作的过程。这反映在教育的方方面面, 教师教学工作的开展、课题研究的进行、教师的作用、学生的成长、教学内容的不断丰富及教学方法的不断更新等都要涉及互相合作, 师生在合作中成长。学习共同体是一个合作学习的典范。

合作是和谐课堂的主要表达方式。在学校教育中, 人们获取知识有两种过程: 一种是人们自觉地学得的知识,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通过特殊的学习任务学会的, 另一种是他们不自觉地学得的知识, 因为他们通过和别人的交往, 吸取他们的知识, 养成自己的品性。^{〔4〕(P.14)}学习者的成长离不开这两种过程的结合, 在第一种过程的基础上, 学习者更多是依赖第二种过程获得个体的发展。学习者在交往中不自觉地学习, 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大量应用的今天, 学生的学习方式受到很大的影响: “现在的学生期望一种事实上的合作。他们认为学习是一种实用的经历, 他们不习惯也不愿意按部就班地连续学习。相反的, 这些学生愿意在参与和试验中学习。”^{〔5〕(P.52)}学习共同体为这种参与试验式的学习提供了可能, 学习共同体富有针对性的学习环境, 使每个学习者在合作氛围中交流、思考、探究, 形成个体的价值取向, 并通过参与、活动、会话、协作、反思、问题解决等形式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在学习共同体中, 教学过程就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 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 从而达成共识、共享、共进。这些内容与理念非常形象地阐释了和谐课堂的主要因素、教与学的平等关系、民主和谐的教学理念及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等。学习共同体的实践过程就是和谐课堂的创建过程, 它用共同体的理念解读并实践教育理念, 营造和谐的课堂文化。

对话是现代课程教学理念的重大转变。教师与学生之

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形成了“对话文化”, 其课程哲学是“合作、团结、组织和文化合成”^{〔6〕(P.449)}, 对话是知识建构的重要方式。现代课程理念注重每一个学习者最大潜能的发掘, 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课堂中引入学习共同体理念开展教学, 创设新的教学平台, 注重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和思想交流, 会使每一共同体成员从单独的学习者变成合作式的学习者。这种转变可以通过平等情境的创设以及成员间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行动等过程来展开, 如对当前热点的认识与评论、前沿问题的讨论、有争议观点的辩论、焦点的关注、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等。共同体成员在问题情境下讨论学习, 并在讨论学习中不断发现新问题, 在这种问题情境中不仅获得显性的知识和思维的训练, 也能获得更多的隐性知识与能力, 如交流能力、表达能力、情感能力、认知问题能力等。在课堂教学中创建学习共同体, 主动构建和谐课堂, 教师、学生和课堂将处于共赢状态。

由于教育的对象是人, 既有共性更有个性, 影响因素颇多, 教育过程复杂, 使得教学过程难以固守成规。传统的教学由于教师在知识经验上占有绝对的信息资源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采用单向的讲授灌输和大学生单向接受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但在电子媒体技术充斥着社会每个角落、人们每天都离不开互联网的今天, 人多势众的大学生已经形成了掌握信息资源的优势。课程教学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建立学习共同体、创建和谐课堂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建立学习共同体, 创建和谐课堂, 促使课堂教学转向对话、共享, 还课堂教学以民主、生命与活力, 促成共同进步。

三、学习共同体理念与和谐课堂的创建策略

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的和谐课堂的创建可以考虑以下策略:

第一, 构建学习共同体的目标。

在学习共同体形成之前, 必须考虑每一个学习者的学习背景、学习需要以及学习兴趣等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学习共同体的目标。这些目标要能激发成员去积极参与共同体的各种活动, 并去贡献自己的经验、体验与智慧, 赋予行动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 学习共同体有了生命力。

学习共同体的目标有助于成员一步一步地走近目标。在学生的学习动机上, 尽管我们大多认可求知是人的生存本能, 但对于学生来说, 求知本能促成的学习动机是远远不够的。在了解每一位成员的需要和兴趣基础上构建共同体的追求目标, 目标一旦建立, 每位成员必须“自愿地把这些目标接受下来。他们必须‘参与’, ‘承担义务’。”^{〔7〕(PP.114-115)}师生在这种共同目标指引下“共享有关目标、课程和程序方法方面的某些决策职责的话, 他们就更能赢得为取得教学成功所必须的学生的认可。”^{〔7〕(P.116)}建立共同体目标是和谐课堂创建的前提。

第二, 营造民主平等的和谐课堂文化。

尊重个人经验与个体差异是和谐课堂文化的主要表征

之一,也是民主平等内涵的一个方面。民主平等理念并非要求教师和学生拥有知识量上的平等。这里的意义是要求教师承认学生作为“人”的价值所在,承认学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享有作为一个人首要的权利和尊严,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需要、自己的个人经验与个体差异。为此,教师有责任创设一个平等、民主、共享的课堂。课堂环境的创造本身是一本无声的教材,潜移默化着学生,这种影响是隐性的、持久的,因而它是深入学生内心的。

同时必须注意到,这种平等并不排斥教师的知识地位。教师作为在某一知识领域的特长者,他应起到引领的作用。正如布鲁贝克所强调的一样:“明智地分享权力并不等于削弱权力,反而可以多出成果。如果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合作,也许我们就能够期望学生的学习更富有独立性,更少依赖教师的指导。”^[7 I.P.116]杜威特别强调,教师是学生“真正天国的引路人”^[8 I.P.14]。他同时认为,民主平等是指“有大量人人共享的利益……能够自由交往”,人们“不仅要缩短物质空间的距离,更要缩短彼此思想、理智和情感方面的距离”^[4 I.P.10]。这样,人们才有共同的话题交流的可能,只有交流,才有发展。否则,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人类文明甚至可能面临断层的危险,甚而逐渐退回到愚昧状态。

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文化使得师生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协作,学习共同体体现了知识共享的精髓。

第三,创建共享话语权的对话式教学平台。

学习共同体要求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共享话语权,共享话语权是一个共享精神、知识、智慧和意义的过程。如果不保持共识、容忍差异,就不可能产生平等对话平台,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追求和理性培养。

英国著名教育家怀特海在论述教育的目的时认为,大学存在的理由不在于传授给学生知识,也不在于提供给教师研究机会,而在于“富于想像”地探讨学问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联合起来,由积极的想像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为

知识。在这种气氛中,一件事就不再是一事实,而被赋予了不可言状的潜力。^[7 I.P.14]共享话语权的平等交流是如此富有魅力,由氛围到知识再到潜力,这真正体现了人类共享话语权的力量。共享话语权,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创造。当我们创建一个学习共同体时,当我们为此拥有一个共享话语权的环境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从中获得广泛的经验和重组的生长性知识,分享别人所想到的和所思考的内容,他们的态度也就或多或少有所改变。

在创建共享话语权的教学环境过程中要注意,教师是极力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情感需求,而不是迎合学生,也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道而弗牵”,彼此双方共享课堂,共同进步。

课程学习是生命的历程、发展的过程,是师生共同努力共同发展的过程。共同努力促成共同进步,这是学习共同体的最终追求,也是和谐课堂的理想。

[参 考 文 献]

- [1]赵健.学习共同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2]黄娟,徐晓东.校际主题综合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与实践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3(10).
- [3]张建伟.网络协作探究学习的设计[J].中国电化教育,2003(9).
- [4]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5]美]詹姆斯·杜德斯达,弗瑞斯·沃马克.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7]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8]美]约翰·杜威.我的教育信条[A].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光 翟)

浅析制度化教育对人的异化作用*

——以高考为例

陈庄瑜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 制度化教育使师生关系异化。借鉴存在主义哲学关注人的个性化存在,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生成长中的个人选择应被尊重,师生之间要建立信任感。

[关键词] 高考; 制度化教育; 异化; 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 G40-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17-03

近年来,寻求高考成功的方式层出不穷。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教育系统内部居然还有人参与高考舞弊。2007年的高考过后,立刻就有相关报道:安徽砀山出现了大面积的舞弊行为。

安徽省宿州市今年高考期间发生了一起性质严重的集体替考事件,该市砀山县部分中学老师和社会闲杂人员充当“中介”,为30多名来自省城合肥三所名牌大学的“高级枪手”提供证件办理和“考务”方面一条龙“组织服务”。现在当地一高中班主任已被警方拘捕。(2007年6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当时记者们分析这是由于追求利益钻高考监管的空档,笔者却认为我们需要另外反省教育本身的问题了。在目前的状况下,教育对人起什么作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很多人都把矛头直接对准高考,认为高考是“万恶之源”,取消高考,改革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当社会、学校、家庭把高考的结果过于放大的时候,它的确带来了教育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一、当前国内以高考为目的的教育带来的问题

事实上,高考只是一种评价方式,它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当家长将高考视为自己孩子今后发展的唯一途径时;当教师将高考看作使自己扬名于同行,获得各种社会资本的唯一途径时;当学校将高考看作安生立命之本时;当国家将高考看作选拔高素质人才唯一方法的时候,高考即成为了“千夫指”。高考从方式变成了目的。高考成为整个基础

教育的最终目的,成为整个教育的指挥棒。所以现在教育出现了如下特点:

首先,关注信息的掌握。教育的本质异化为一种教学的技术,以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有的甚至只是掌握一些信息为主要目的。其次,注重抽象观念。这是传统哲学追求永恒性、一般性的结果。再次,注重科学和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对象是没有主观性的物,它追求的是客观性和一般规律,如果把科学的方法和结论运用于有主观性的人的教育,就会把人解释为自然现象,成为没有内在生命的物体,这就势必抹煞人的主观性。^{[1] (P. 83)}

教育的这种特点必须导致“人”的变化,即教育过程中的教师、学生以及其关系的异化。

二、当前教育过程对人的异化

有人认为教育异化指“在教育领域中,教育本身失去了它在本义上作为人培养下一代使之更好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而反过来操纵了下一代人,使人的发展成为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人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被教育所操纵,教育把人异化了。教育异化具有如下几点突出特征:(1)教育异化的本质特征是对教育培养完整、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本质的偏离和背弃;(2)教育异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的发展的异化,它导致人的全面性、丰富性的丧失而仅仅片面发展了人的经济性、政治性等某一方面的才能;(3)教育异化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从历史进程来看,教育异化一旦产生,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只能对它加以限制和约束”。^[2]

由此我们发现,教育异化最根本的是对人的异化,主要

*[收稿日期] 2008-08-25

[作者简介] 陈庄瑜(1980-),女,江苏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6级硕士研究生。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 教师的自我意识发生变化,教师的行为方式发生扭曲。在此前,很多人认为教师是道德、知识的化身。在制度化教育的今天,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教师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但是外在的教育目标的强化,使绝大多数教师亦认为他们在教学中是课本的灌输者、“填鸭者”,是教学计划的实施者,或者仅仅只是国家和社会要求的代言人。教师的工作是“复制性”的,按照统一的标准复制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个别教师为了保持个人的尊严,采用种种外在的方法,故而体罚学生、挖苦学生等师源性校园伤害事件层出不穷。因为制度化教育中对于教育目标的整齐划一而对教师产生压力,教师为达到每个阶段既定的目标而采取一些违反师德、违反实际的方法来对待学生,致使学生身心遭受伤害。绝大多数教师不得不以高考标准作为唯一的指标训练学生。上述高考舞弊事件中,教师甚至为了这个外在的唯一目标竟然违反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做人道德。

2. 其次,主体性被忽略,学生就成为接受知识的“容器”,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人从未希望自己成为单纯的工具,但是成为完整的人不仅在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对自身的不断超越,而且还取决于日常生活的指向,甚至于来自生命的每一瞬间和来自灵魂的每一冲动。在制度化教育的影响下,学生选择学习什么知识的权利被剥夺,学习目标定位为成为社会的代言人——教师或家长所希望的那种人。学生的学习不是为了寻求自身的最佳发展,量化的学习成绩成为学生追求的唯一目标,在以追求学习成绩为主要目标的前提下,学生的道德发展要求被忽视,学生或者被一刀切地要求发展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自然也缺乏选择发展何种道德观的机会。在分数为上的高考中,人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学生会藐视道德,甚至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做出违反规定的不道德的行为。

3. 最后,制度化教育对师生关系的异化。师生关系变成了二元对立关系。教师将学生作为实现自己事业的工具,为此采取一些过激的措施对待学生,学生自然会产生一些逆反情绪和行为,二者的关系甚至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师生冲突事件经常发生,导致教师厌教、学生厌学。尤其是在高考中,教师将学生等同于实现学校发展目标和完成工作业绩的一个工具,不惜违反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道德帮助学生舞弊,甚至动员学生舞弊。这样的师生关系完全是功利性的。

以上是目前的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教育异化人的现状。为什么教育会从最初的培养完整人格的目的走到今天的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为,教育的制度化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

三、制度化教育对教育的影响

人类社会从早期直到工业革命前夕,教育都是处于较为自主、灵活的状态之中。教育者根据自身对知识的理解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受教育者也不受年龄、教育年限的

限制,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教学一般采取个别教学的形式,评价方式也基本上处于较为自主、灵活的状态。

工业社会对于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考虑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并且规定教学方法和教育过程以提高教育效率。在19世纪下半叶,一些国家出于政治原因,采用法律的形式将教育严格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制度化的教育,现在绝大多数的学校即为制度化教育的表现形式。

诚然,制度化教育的存在保证了更多的人受到教育,也使教育规范化,提高了教育的效率。但是,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制度化的教育被加上了其他社会因素的时候,副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学校,作为制度化教育主要的表现形式,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 划一性,整齐性。在制度化教育中,学校通过统一的课程、固定的教材、同步的进度、相同的评价等,对学生进行整齐划一的培养和评价,导致教育缺乏必要的生气。中考、高考这样的较为终极的评价模式便是制度化教育最典型的表现,这种评价形式使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为高考中考所累,学校生活成为被一致公认的最辛苦的生活。

2. 封闭性,机械性。制度化教育按其自身标准、依据自身的规范构筑起坚实壁垒,形成对其他系统的排他性,从而导致自身偏离应有的正常轨道,使教育脱离实际。制度化教育的这种封闭性使学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按照固定路径寻求发展,鲜有机会采用其他方式发展,所以也就形成了中国自恢复高考以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为此,在高中,有的甚至在初中,这样的情况就变成见怪不怪了,教师将学生看作是机械性的信息接受者,解题机器人,而学生无奈地、机械地一遍一遍地重复解释着雷同的题目,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目标单一的以高考为唯一目的的社会活动。

3. 选拔性,排斥性。制度化教育强调各级各类学校职能的分工和上下的衔接,而且具有精英化教育的价值取向,奉行层层筛选的原则,为少数人服务,对大多数人具有排斥性。在中国,制度化的这样的特征就通过中考、高考这样的选拔制度来体现。尽管目前中国已经面向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但是这个过程并非完全否定精英化教育,制度化教育对人的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制度化教育系统内对教育结果的评价仍然停留在量化的形式下,当人们将这种评价——高考的工具性作用极端化,成为目的性作用时,学生、家长,以及教师为此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事件也就发生了。

4. 功利性。^[314]制度化教育从产生之初就旨在通过规范化、科学化的教育及管理,以较高的效率将受教育者塑造成为社会所需之工人,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我们由以上几个特征不难想象出制度化教育功利性的特点。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为了高考这个目的而教与学。学生希望通过教师相关信息的教授而达到高考取得良好成绩的目的,教师也希望借助于学生在高考中取得成绩而获得名与利。

显然,在这种制度化教育的过程中,师生关系及教师、

学生作为人的作用被彻底地忽视了,人反而成了一种工具,而非目的。由以上对于制度化教育的特点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理解最近在高考过程中出现的那种极端的教师参与作弊的情况。虽然目前的选拔性制度不能取消,但是,高考对于人的异化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有必要而且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鉴于中国教育目前的发展状况,笔者比较推崇存在主义哲学的理念,为此,借鉴这个理念提出一些建议。

四、对“人”的观念认识

存在主义者认为,“教育纯粹是个人的事。教育对于公众、社会等不存在责任。”^{[5] P.128}显然,存在主义者是反对将教育制度化的。诚然,教育的制度化目前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可以改变内在的“人”的观念。存在主义者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形成一套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5] P.128}教育要使学生养成正确地对待生活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真诚、善于选择和决定,以及责任感。故而,如何理解教育过程中教师、学生以及师生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1. 教师。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应该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者,指教师不能作为学生知识和道德的源泉或输送者,也不能作为他们的监督者。换言之,教师既不传道、授业,也不解惑。有所为者,即教师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主观性,把学生当作一个人而不是物来对待,学生又要维护自己的主观性,使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来行动。

教师除了尊重学生的主观性之外,还必须尊重自身的主观性。教师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不屈服于外界以及上级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风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不能在知识上采取非人格化的知识专制,也不能采取道德上的强迫灌输与执行。教师应通过自身的学识与个人的道德引导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自身发展的独特性。教师也应该根据学生自己的发展特点来评价学生,而不应该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5] P.133-135}

2. 学生。由以上对教师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学生的地位。虽然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学生应该是自由的个体,应该自主地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知识,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被迫参加到各种评价之中,成为毫无自主权的非独立个人。很明显,这种理想状态在目前的制度化教育中很难做到。但是,存在主义者对待学生的根本态度是可以贯穿于其中的,即把学生当成自主的个人,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他们自己的个人选择应该被尊重,他们不应该成为被动的解题机器,也不应该是一味的道德行为方式的模仿者,他们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3. 师生关系。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到3种教育方法,其中“第三种教育方法(存在交往)中,人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连、处于一种身心敞放、相互完全平等的关系中”。“因此,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

递的活动。而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如果存在的交往成为现实的话,人就能通过教育既理解他人和历史,也理解自己和现实,就不会成为别人意志的工具。”^{[6] P.2-3}

上述教师与学生的地位决定了师生之间的对话具有与一般的人与人之间对话不同的特点,要使师生之间的对话关系不至于演变成“我与它”的关系,需要注意两方面。

首先,师生之间要有信任。相互之间的信任是师生之间对话的基础。布贝尔认为,那些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生不愿意听任自己被人教育,而且,如果有人告诉他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乃是早已确定的真理,他们也会对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就无法进行。信任不取决于教师的意图。取得学生的信任无需采用诡秘圆滑、玩弄手段的行为,需要的是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和真诚。布贝尔认为,只有坦率而真诚地参与自己学生的生活,并担负起因这样地参与生活所引起的责任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

其次,要妥善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冲突。信任意味着打破师生双方的限制,摧毁束缚学生心灵的枷锁,使对话在两个平等的人之间进行。然而,这不等于两个人无条件地协调一致。所以,要使师生间的对话进行下去,教师必须妥善处理好师生之间的冲突。面对冲突,老师必须专心一致地运用洞察力和见识;“切勿使他的知识锋芒失去冲刺作用”。教师既不能采用诡辩的技巧为真理进行辩护,也不能用强制手段迫使就范。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允许并鼓励学生坦诚地面对自己;“同时作好准备对于被他刺伤的心灵敷以刀伤药膏”。如果教师是冲突的胜利者;“他就必须帮助战败者忍受失败;由于征服人心的胜利不是容易取得的,如果他双脚征服他所面临的这个执拗的人心,他就必须寻求爱的言辞,只有这种爱的言辞才能有助于摆脱这种艰难的困境。”^{[5] P.136-138}

以上分析对于解决制度化教育中高考的负面影响的价

值只是起了观念性的指导作用,但是如何尽力地消除高考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每一个教育人士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石中英. 教育哲学导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2] 万作芳. 教育异化:概念及表现[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 [3] 陈桂生. “制度化教育”评议[J]. 上海教育科研 2000(2).
- [4] 向纯. 论制度化教育及其变革[J].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3).
- [5] 陆有铨. 躁动的百年[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 [6] 德·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责任编辑 刘敏慧)

浅析“高招诈骗”现象*

——一种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解释

苗培周 王晓燕 吕少博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91)

[摘要] 信息不对称理论为我们分析利用高校招生进行诈骗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加强和推进高校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监管和治理招生市场,调整家长和考生的心态,提高信息捕捉和有效利用的能力等等,是预防“高招诈骗”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高招诈骗; 信息不对称理论; 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20-02

近年来,不法分子打着“招生”的幌子进行诈骗的案件呈现猖獗之势,作案人员的行骗手法隐蔽;“批量作业”式的作案规模导致受害人数增多,涉案金额也加大。各地公安机关每年都不遗余力地查处和打击,并及时向社会通告案情,劝诫家长。然而,每年总会有一部分家长和考生上当受骗。我们不能单纯指责家长,而应该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家长甘冒风险。本文试图借助信息不对称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期望能够找到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其内涵

1.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提出。传统理论认为,市场上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拥有关于市场的全部信息,例如用户完全了解商品的质量、效用以及市场上全部相关商品的价格行情,而生产厂商则完全掌握市场动态以及用户的消费偏好和守信誉程度等。显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限于种种因素,人们对信息难以完全了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信息不完全对市场运行的干预作用。

1921年,弗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就提出了“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的观点,并对不确定性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西蒙、肯尼思·阿罗等一批经济学家率先对传统经济学的“充分(完全)信息假定”提出质疑。^[1]1970年乔治·阿克洛夫在研究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一文,正式开始了对不对称信息的系统研究,提出了“柠檬市场模型”及“逆向选择”理论。他还进一步论证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性。由此他

得出结论:信息是有价值的,市场是有缺陷的,开放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2]至此奠定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此后,斯彭斯、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在不同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新理论与乔治·阿克洛夫的理论共同构成了现代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2.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本内涵。信息不对称指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个体之间呈不均匀、不对称的分布状态。^[3]一般而言,信息不对称包括以下含义:一是双方拥有的信息质量的不对称;二是信息传输失真;三是信息动态的不对称。由于人们总是在各种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交易双方占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息占优势的一方为了自身利益就有可能凭借信息优势,隐瞒相关信息,选择对信息劣势一方不利的行为,从而发生“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4]

很明显,在“高招诈骗案”中,家长和考生与不法分子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家长和考生处于信息劣势一方,而不法分子则占优信息优势。正是两者拥有的信息差异,才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使家长和考生上当受骗。可以说,家长和考生的招生信息短缺是不法分子“高招诈骗”屡次得逞的深层次原因。由于家长关于高校招生信息不足才导致他们对不法分子和招生中介出现“逆向选择”,而那些不法分子和黑中介也正是因为家长拥有的招生信息短缺才会做出种种“败德行为”。

*[收稿日期] 2008-12-14

[作者简介] 苗培周(1981-),男,河北魏县人,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晓燕(1976-),女,河北滦南人,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吕少博(1983-),男,河北晋州人,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二、造成家长和考生招生信息短缺的因素分析

家长关于高校招生信息的短缺,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某些家长和考生的信息能力比较低。个体教育水平及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语言能力、专业知识水平等许多方面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信息的接受、理解和鉴别。^[5]在现代社会,人们不仅要面对传统意义上的纸质文献信息,还要面对无比丰富的数字信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娴熟的信息技能的人就能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快速捕捉和获取所需的有用信息,高效率、高水平地处理、吸收他人的成果。相反,那些信息素养差,获取和利用信息能力弱的群体就无法充分掌握和利用已有信息,逐渐成为信息的弱势群体。某些家长和考生正是由于受自身信息能力的限制,对当前国家和高校的某些招生政策信息把握不全面、不准确,存在信息理解问题,不能有效识别出不法分子的虚假信息,故而才会上当受骗。

2. 信息价值性制约着部分家长和考生。信息是有价值的,要获得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即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资源。一般而言,富有者往往有足够的实力获取自己所需的绝大多数信息,而贫困者则难以承担获取信息所必须的经济负担。搜寻招生信息的不菲成本可能会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的某些家长和考生。因此,当一些不法招生中介进入这些地区的时候,是可能受到家长和考生的欢迎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家长和考生对各种招生机构的合法性和招生信息的真实性的判断,进而加剧了考生家长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3. 我国高校招生信息制度建设滞后。由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使公立高等学校在招生市场上供不应求,形成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心理,高校的招生信息制度建设还比较滞后。近几年,随着高校生源竞争日益激烈,各高校也开始注意起了招生宣传工作,招生过程的信息也越来越公开,但信息的不对称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也给高招黑中介的“地下招生”带来了活动空间。正是由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不完善才出现了部分家长和学生会“对黑中介”“逆向选择”的现象。

4. 不法分子有意误导家长和考生,造成信息失真。招生诈骗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打着名校“自主招生”或者“学校内部指标”“计划外招生”的名义非法招生,谎称招收全日制本科生,实则是招收成教、自考生等;故意曲解招生照顾政策等等。不法分子和中介打出这些诱人的宣传,极大地迎合了家长想让孩子读大学、读名校的心理,造成了信息失真,从而使之上当受骗。

三、预防“高招诈骗”的对策和措施

1. 加强和推进高招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各高校要做好高招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发布工作,加大高招宣传工作力度,可以通过举办大型咨询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各大新闻媒体、咨询热线、招生专刊和网站等多种渠道向考生及家长宣传招生录取政策,发布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等方面的信息,尽最大努力确保每个考生家长

都能及时、准确了解到招生录取的政策和信息以增加考生和家长对高招的信息拥有量,降低家长和不法分子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例如最近几年不少地方实施了“阳光工程”,有效地降低了家长和考生上当受骗的风险。

2. 加强对招生市场的监管和治理。政府在继续加大对不法招生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的同时,要加强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和质量监管,从事招生工作必须具备政府认可的资格和条件,任何招生人员和招生中介机构都必须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市场准入虽然限制了竞争,但是它有利于对不法分子的监管和查处,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减少交易中出现的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可避免招生市场中鱼龙混杂的局面,改善高招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3. 家长和考生也要摆正心态,自觉提高自身的信息能力。信息不对称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自身的信息能力造成的,而人的信息能力又跟人的理性有密切联系。高校招生都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和规范的招生录取程序,而某些家长怀着“望子成龙”的急切心理,抱着“花钱上大学”的错误认识,结果掉进了不法分子设的陷阱。因此家长首先要摆正心态,理性看待招生宣传,不要怀侥幸心理,不要听信骗子对“招生漏洞”“招生黑幕”的过分渲染,而要通过正规的招生程序来报考。同时家长和学生也要注意搜集、整理有关高招信息,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鉴别力,有什么疑问要直接向高校招生部门咨询,以免上当受骗。

4. 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完善高招政策。自1999年实施“扩招”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阶段,但高等教育总供给量仍显不足,远远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失衡现象严重,公立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院校等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由于历史和现实等种种原因,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都比民办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享受更多的优惠待遇,所以这些学校在招生市场上供不应求。在一定意义上说,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是高校招生骗局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快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尽可能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另外,政策的不完善为少数不法分子提供了活动空间。为此,政府和高校必须不断完善高招政策,让高招信息更透明、更对称。

[参考文献]

- [1] 高红阳.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述评[J]. 当代经济研究, 2005(10).
- [2] 刘向荣. 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其意义——对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介[J]. 新疆社科论坛, 2002(1).
- [3] 辛琳. 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J]. 嘉兴学院学报, 2005(3).
- [4] 妥艳贞.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观点述评[J]. 兰州学刊, 2004(5).
- [5] 叶艳鸣. 信息不对称现象的成因分析[J]. 情报杂志, 2007(4).

(责任编辑 刘敏慧)

试论网络学习情境中的人文关怀*

纪 河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在网络学习情境中,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平等和自由成为网络道德的基石,也是加强对学习者的网络人文关怀的核心。在网络教学的组织过程中,我们必须时时反思教育工作的落脚点,注意处理好“自由与控制”以及“平等与权威”之间的关系,加强网络学习中人文因素的组织和设计,以实现对学习者的网络人文关怀。

[关键词] 网络学习; 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 G40-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22-04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教育发展的新变革,网络学习作为这种新技术的代表形式之一,给传统教育的价值观、组织形式以及教学评价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们需要理性地认识这些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教育技术的发展只是教育手段的进步,而教育问题的产生仍需要从教育本身入手,就网络学习而言,加强对学习者的网络人文关怀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网络学习情境下的人文因素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意识到网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概念,同样也是社会文化的范畴,目前网络中流行的以网络爱好者个人兴趣为背景组成的“虚拟社区”更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人们发现,在这些虚拟社区里,人群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沟通互动方式与现实社会有相似之处,却更具有吸引力。显然,网络给教育活动带来的不仅是教学手段的进步,对学习者的影响也极为重要,这种人文因素的核心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

1. 人的主体意识的自由发展。“开放”是网络学习的基本特征,任何人都可以借助网络开始学习。他(她)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学习的方式、内容以及寻求帮助的途径,同时,网络中成千上万个由不同兴趣爱好或主题形成的论坛和网站向所有网络人群开放。可以说,任何思想和观点都可以在网络环境下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出网络的自由、角色身份的自由、言论交往的自由等等权利的实现,使学习者的主体意识得到完全的展现。

2. 平等的人际交往。网络提供了一个比任何一种社会交往都要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网络。日常生活中的身份、等级和权利在网络社会中失去了它的效用,“平等”成为了

网络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即尊重自我与他人的平等价值和尊严、尊重自我和他人的自主选择权。当然,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平等,网络中同样存在着信息垄断以及电脑黑客等社会现象,但就整体而言,网络环境中仍流行这样的潜规则:网络赋予网络人以无限的使用权和资源获取权,同时要求网络人有义务遵守网络中的各种规范,对自己的网络行为及其社会效果负责。^[1]

3. 网络道德的信守。应该看到,平等和自由构成了网络道德的基石,因为自由,所以每个网络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而才是平等的交往关系,同样因为平等,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享受自由的乐趣。

在网络世界中,现实世界的等级、特权、金钱、地位等等都被鲜活的个体所替代,而由智慧、学识、热情构成的虚拟个体成为关注的主角。欧阳友权将网络的运行规则进行了总结:尊重个体自由——可以自由进入、自由访问网站,自由发表言论等;尊重个体的创造性——可以自由建立个人网页,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作品等;尊重个体对自我的选择——虚拟社区真实自我的表现和确认;尊重个人的尊严——不能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也不能强迫某人接受别人的观点。^[2]这些内容正是我们研究网络学习情境下人文关怀所必须依据的网络道德和潜规则。

正由于虚拟环境和现实社会双重因素的影响,网络人文环境无法脱离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的同时,又将焦点集中在了网络参与者的个性张扬层面。围绕个体的自由、群体的平等,在虚拟环境和现实社会的交集中,网络环境的人文色彩显得尤为夺目,而加强对网络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网络环境下成人的学习策略及课程设计研究”(项目编号: EKA060225)。

[收稿日期] 2008-08-10

[作者简介] 纪河(1971-),男,江苏淮安人,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副研究员。

二、网络学习情境下的人文缺失

网络把社会及其成员带入一个全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人类的社会关系。但同时,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了虚拟社会的交往,也引发了现实世界的孤寂,带来了内心自我的张扬,却隐匿着个体对虚无的依赖。我们看到网络给教育活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必须认识网络技术和环境可能给学习者造成的人文缺失。

1. 网络环境造成人对信息技术过分依赖。科技和人文的关系一直是众多思想家关注的问题。就网络学习而言,学习者应该是主体,而网络仅仅是学习工具,问题是当工具本身在学习过程中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时,这种假设就值得推敲了。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某些学习者已经出现了对于计算机和网络过分依赖以及由此造成的主体能力的退化和部分丧失。网络学习的空间是由计算机、网络以及虚拟技术构造出来的,没有现代科技,一切无从谈起。同样,在网络学习环境中,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学习的效果,成为制约学习过程的关键之一。此外,教学程序设计者的思路构想也左右着学习者的路径和成效,试想面对古板的程序教学软件,学习者究竟是学习的主体还是知识灌输的对象?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学习者可能成为网络的奴隶,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被打上网络的烙印,其结果是他们开始不适应现实的生活环境而沉浸在网络所构成的虚拟环境中。

我们的网络教育究竟应该怎样定位?是借助网络进行学习?是将网络作为学习的资源,还是在网络环境中学习?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这种思索将越来越有意义,但有一点,任何时候,必须强调学习者主体的地位,而不是相反的观点。

2. 网络交往造成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淡漠和孤寂。网络空间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和自由天地。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问题与志同道合者进行交流。与现实生活相比,这种交往范围更广,自主性更强,进而更富有吸引力,而一旦沉迷于此,“网络上瘾”这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就产生了:人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不再顾及他人的看法,丰富的社会生活被冰冷的虚拟交往所替代,网迷们沉浸在网络的空间而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的感悟力和参与热情。

这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病态,在网络学习的组织中,我们必须重视这些问题。当学习者满怀希冀地走进数字空间,却惊异地发现原本习惯的教学形式不见了:没有了充满人文气氛的校园,没有了鲜活、兴奋的同伴,没有了激情洋溢的教师,面对苍白的文字、表格,面对堆砌如山的资料信息,他们无所适从。“冰冷的数字逻辑语言冲淡了教师的情感交流,虚拟的课堂教学界面剥夺了现实课堂教学中学习者知识学习的种种兴趣,再加上学习过程中因为学习者缺少赖以模仿的知识榜样——教师人格风范的影响,结果造成他们学习行为的失衡和失范。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习者进行的是完全独立的‘个人自主学习模式’,所以

导致了他们与教师或其他学习者人际交流的疏远,强化了他们的学习孤独症心理倾向。^[3]

3. 网络环境造成学习者创新思维能力的弱化。网络只是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和交流平台。我们必须意识到,教育不是教学,教学也不简单表现为知识的传递。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个体能力或倾向方面的持久变化。因此,我们所期望的是学习者通过网络不仅掌握了学科知识,而且在专业判断、思维创新能力上得以提高。然而“信息迷航”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许多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中出现了理性思维能力弱化的问题。

首先网络环境是个多元化的信息世界,大量的知识信息使得学习者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判断,而大多凭借“直觉”等感性思维进行选择。“在网络实践中,网上主体不易直接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在多元价值的攻势下,主体往往会把感性需求当作理性的东西来加以追求并走向无批判性,从而表现得无所适从。”^[4]其次,由于教学成本以及教师课程设计能力的限制,目前的网络教学大多是“课堂搬家”或“电子教案”,要么枯燥无味,要么概念原理及分析一目了然。这种学习没有了知识的层层推进和学科要点的架构,难以激发学习者的探究欲望。而搜索引擎和关键字索引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课程的作业变成一个机械的“剪贴”过程。没有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又何来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和创新?第三,实用主义的学习动机在缺少有效教学监控的情形下,使学习者更趋于功利。有研究表明在既有的教育技术和支持服务水平下,网络教学并不是专业课程教学的最好选择,网络学习大多是围绕“问题解决”而展开的。^[5]由此,寻找答案成为学习者的唯一目的。至于答案是怎么来的,是否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些问题都被学习者忽略了。这种实用主义阻碍了学习者对问题的深入理解。更有学习者被感性的、动态的各种信息所吸引,沉浸在网络虚拟的世界中,最终连学习的目的都淡忘了。

我们曾经为信息的闭塞而苦恼,在网络环境下,我们又开始面对大量杂乱的信息轰炸,只有保持一份理性、勇于批判的人才能成为网络学习的成功者。

4. 网络教育引发的新的教育不平等。如果将“自由”和“平等”作为网络人文精神的核心,我们所看到的是每个人都以平等的身份扮演各自的角色,进行平等的交流。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就公民的受教育权而言,网络环境同样带来了教育的不平等。

首先,网络学习是以计算机作为基本媒体,受时间、金钱、文化、技术的影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网络学习的乐趣;“网络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个口号,而“网内”和“网外”不同的学习环境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新的因素,从而造成学习机会的不平等。其次,面对海量的信息,网络学习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成为决定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甚至最简单的汉字输入法也成为大量社会人群(如老年学习者)的学习障碍。一方面教学设计者使用大量的新技术开展教学,另一方面,许多学习者对这些新的软件技

术不知所云,这是学习过程的不平等。第三是学习效果的不平等。或许是因为发源于西方国家的原因,网络交往更注重个性张扬、勇于质疑、敢于提问和批判。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网络参与者的观点才可能在众多的发言记录中受到别人的关注。而大多数网络学习者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内敛含蓄,平和而羞于发言,很少主动寻求他人帮助。在网络环境强势文化的环境下,年龄、社会阅历、知识背景等外在因素成了影响学习效果的先决条件。

三、网络学习情境中的人文关怀

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跨进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我们看到了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重重人文忧患,也意识到高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进步同样为我们重塑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下,加强网络环境的人文建设,重视网络学习中的人文关怀就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一)人文关怀的起点——对网络教育目的的人文反思

知识经验和生产技能的传承是教育的基本功能,如果将网络作为信息传输的中介,网络教育显然是最合适的公用平台。然而若将教育的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完满人格的公民,就不仅仅是知识传承的问题,而涉及对学习者的量度的塑造,需要学习者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分析,对自我的认知和批判。哈佛大学校长罗登斯教授在《互联网和大学:珠联璧合》一文中指出,教育本质上是一个人文过程,除了传播知识信息,还要有人的人格、情感和价值观,这些功能是计算机所不能替代的,它需要的依然是人和人的交流。因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判断:网络技术的介入可以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益,但就教育的整体质量认定,仍然取决于教育活动自身规律。

对教育目的的人文反思使我们能更清醒地分析当前网络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从中寻找答案。例如当前某些教育技术方面的学者认为,网络教学的主体因素是学习者与教学资源,教师已退居幕后变得可有可无。殊不知,这种判断的延续就是将网络教育简单划规为“人”与“机器”的关系,是人向机器学习。这种教育方式如何能培养富有人文内涵的学习者呢?同样,对网络学习的评价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当前的网络教学出于标准化和量化的考虑,大量使用电脑从试题库中自动生成的试卷。这种做法在强调客观公正的同时,却将我们的学习者看作孤立的“被灌输者”,于是学习者(尤其是社会成人)丰富的个体经验在一张张试卷面前变得苍白。

对教育目的的反思是我们加强网络教育人文关怀的起点。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发掘网络人文环境的积极因素,将它与我们的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正确看待网络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地位 and 作用,将多种教育手法综合运用,以构建适合信息社会特征的现代教育形式。

(二)人文关怀的基石——处理好网络人文情境的两个核心问题

1. 自由与控制。作为网络学习的特色,自由选择权是学习者的基本权利。但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对学习者的施加影响的过程,因此,自由与控制就成为建立网络教学秩序的首要问题。

对此,我们不妨基于教育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必要的设定:

(1)学习者有权根据个人的经验选择受教育的方式,即教育机构不得限定受教育者必须通过网络才能获取教育信息,而必须提供多种学习工具和途径,以保证受教育者的学习机会均等。

(2)学习者一旦接受网络学习方式,即与教育机构建立契约关系,应根据校方要求按时完成作业、接受考核。而教育机构应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网络教育资源和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

(3)教育机构应根据成人网络学习特点进行教学组织和课程设计,在课程教学和评价等环节必须保证学术标准,以利于学习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

(4)针对网络学习中的障碍,教学双方应持宽容合作的态度,从社会人文、职业技能等多个角度综合考量学习目标。

2. 平等与权威。平等对话是网络环境信息交流的基本特征。在网络中,由于技术的保障,每个网络参与者都可通过自己的行为维护个人的尊严与平等,也由此形成了网络社会伦理关系的平等原则,即每个网络人都应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行为标准,尊重和维持他人的道德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网络中看似无领导管理机构,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特权,但在信息交互和人际交往过程中,同样存在“权威者”的角色。根据社会学原理,权威主要可以分为4类:基于制度的权威、基于传统的权威、基于专业的权威以及基于人格魅力的权威。在网络环境中可以看到这些人物角色,例如网络管理者借助制度的约定可以对许多网络参与者的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在某些论坛里,许多专业技术的精英被封为“大虾”,他们的观点和思路经常引领大众的思维趋向,还有的热心网络参与者通过无私的帮助使别人受益,进而具有了号召力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平等是网络学习者的基本权利,同时,由于“权威者”的存在,保证了网络信息交流的秩序和效能。

在网络教育的设计中,我们同样要考虑“平等”与“权威”的问题,如果出于解决问题的目的通过网络寻找答案,这只是个体的“学习”,而不是“教育”的过程。教育活动应该体现为教育者对学习者的施加影响并使之在思想意识、人文素质、知识技能方面产生变化和发展。教育者和学习者在个体意识上都是主体,但就整个教育过程,仍存在“主”“次”之分,也由此形成了教师是“教”的主体、学习者是“学”的主体的双主体学说。

笔者认为,网络教育应该是个有秩序、受控制的学习过程,我们在尊重学习者平等权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权威”来保证教学过程的完整和有效。具体地说,在网络教育环境中,教师和学习者地位是平等的,但拥有的权利不同。教

师的权利至少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权、教学过程的控制权以及学习成果的评价权,这是基于教育制度所赋予教师的基本权利。过多强调网络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只会淡化“教育”的效果,进而偏离了教育的本来方向。没有自由与平等,网络学习就没有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缺少了控制和权威的参与,我们的教育活动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所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网络教育人文关怀的基石。

(三)加强网络学习的组织和设计——人文关怀的途径

加强网络教育中的人文关怀需要集中社会不同群体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有学习者的,有教育组织机构的,还需要所有热心网络教育事业人们的参与和鼓励。其中,加强网络学习的组织和设计,是实现人文关怀的基本途径,也是教育机构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 网络学习的内容组织要注意发掘人文因素,遵循学习者的认知规律。人文精神是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它不仅体现在人文学科,也渗透在人与自然的每个角落,可以说我们学习的过程也应该是养成人文精神的过程。因此加强网络学习的组织和设计首先就要发掘教学内容中的人文因素。例如我们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运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或再现某段历史(某个实验),通过背景介绍或过程分析讲解,感受人类的发展历程,使学习者对勇敢、坚韧等人文精神产生积极的共鸣。除了内容的选择,我们还必须注意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在网络环境中,我们可以借助多种手段开展教学,视觉的、听觉的、动态的、静态的,其核心就是要遵循学习者的认知规律,要注意知识结构清楚、层次分明,知识的链接要合理。

2. 网络学习的教学设计要重视参与者的情感交流和知识互动。许多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学习者文化背景和学习习惯的限制,网络学习中出现了“情感孤独”的现象,因此,重视参与者的情感交流和知识互动是教育者进行网络课程设计的要点之一。首先,我们要在保证学科知识科学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多媒体网络教学资源的优势,在可视性、可听性和多元性上下工夫,强调课程教学的艺术性和情感交流。目前电视节目中出现的“名家讲坛”就给了我们课程设计的极大启示。其次是要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交流的功能,加强师生的交往互动,要在课程教学中设计出“愿意对话、渴望交流和乐于互动”的对话氛围,教师在其中要发挥更多的能动性,而不是满足于“对话管理者”的角色。第三,要注意激发网络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类似网络研究会、网上读书节、网页制作大赛等活动,不仅可以有效增进教师和学习者以及学习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且有利于创设积极友善的情感氛围,进而达到促进参与者的情感交流和知识互动的目的。

3. 网络学习的评价目标要重视学习的过程评价,以增强学习者的成就感和满意度。良好的评价对于网络学习者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除了对学习者的阶段性成果做出评价之外,更主要的是要不断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供指导性的、方向性的意见或建议。在评价内容上,要对学

者在自主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力、态度、信念等进行全面的考察,以便从整体上对学习者的综合评价。在评价方式上,要注重总结性评价,但更要重视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可阶段性地对学习者在多方面的努力、进步和成就做出详尽的描述,展示其生动的成长史,从而强化学习者的学习信心和热情。过程性评价可采用电子学档、个人作品集、总结讨论、学习日志、成果展示等活动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争取做到评价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在评价标准上,为促进学习者的持续发展,评价标准要随着自主学习的进展以及学习能力的提高而有所变化。由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较大,我们的评价标准应该考虑这种差异,运用多层次评价标准来衡量不同学习者,从而给自主学习者个性化的发展空间。

4. 要重视网络学习者学习策略的培养,尤其是提高元认知的能力。所谓网络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网络学习活动中有效学习的程序、规则、方法及调控方式。它包括外显和内隐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前者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采用的方法、技能和技巧,后者则表现为学习者对学习过程的把握和修正。就网络学习的基本形态来看,它是学习目标产生——确定路径——过程评估——行为调控4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学习者的网络学习策略是在学习过程中随经验的增长和积累逐步发展起来的,通过反思和经验学习,他们不断丰富自己的元认知以及计划、调节能力,并形成个性化的学习策略,其中学习者的专业背景和网络体验是主要因素。

“人文知识是人文文化的历史沉淀,是人文文化的基础,是人的精神世界升华的源泉,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灵魂。”^[6]作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部分,教育必须承载培养富有人文精神的社会劳动者的历史责任。在网络教育中,技术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失去人性的关怀,再高明的现代教育技术也是冷冰冰的。因此,在网络教育的环境中,我们呼吁建立的是将“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学习环境,我们在努力推进数字技术发展的同时,必须强调人文精神的引导,要不断规范和推进网络参与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形成符合时代特色的网络伦理道德理念。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起点就是给予网络学习者足够的爱心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 楚丽霞. 解读网络伦理的人文关怀意蕴[J]. 天津大学学报, 2005(9).
- [2] 欧阳友权. 网络技术的人文视野[J]. 中南大学学报, 2003(2).
- [3] 张亚斌. 远程学习者与终身的网络学习文化支援[J]. 中国电化教育, 2003(6).
- [4] 陈胜云. 网络社会的主体性危机[J]. 现代哲学, 2001(1).
- [5] 纪河. 成人的网络学习策略初探[J]. 中国远程教育, 2006(8).
- [6] 杨叔子. 绿色教育: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J]. 教育研究, 2002(11).

(责任编辑 刘敏慧)

论现今师生关系理论研究的思维困境*

汪晓敏

(池州学院基础部,安徽池州 247000)

[摘要] 目前在教育研究领域关于师生关系方面的理论研究比较多。在众多的研究中,不少研究在思维的路向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何走出师生关系研究的思维困境值得教育研究者反思和探索。

[关键词] 师生关系; 思维困境; 价值预设

[中图分类号] G4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26-02

现今关于我国师生关系理论研究依然是学者比较关注和感兴趣的领域之一。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不乏观点新颖和殊异者,一些研究理论也不能说完全脱离了实践,相关理论甚至还通过教育教学改革得以在实践中被强行推行。但现实的师生关系现状却严肃地提醒和告诉人们,师生关系并没有因为研究的“繁荣”而取得一种实质性的改进,在实践中被推行的相关的师生关系理论往往也流于形式。看来在构建更多新的相关理论之前,先反省一下我们的研究思维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或许是现今师生关系理论研究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所在。

一、师生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预设

现今我国师生关系理论研究的成果颇多,研究思路大致有两种取向:一是实证主义取向,主要以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实证学科为基础;二是思辨取向,主要以哲学等其他相应学科为基础。前者主要着眼于师生关系类型及其相应教育效果的研究,后者主要着眼于批判或论证某种或某几种师生关系能否有效地实现预期教育目标的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有着共同的旨趣,即在于为培养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人构建出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然而,这两类研究在思维路向上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

首先,在研究思维起点上存在教育独立的理论预设。在师生关系的理论探讨上,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教育学》为代表,阐明了教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从教育的构成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及其关系出发,揭示教育本质。提倡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是在对文革期间教育沦为政治工具的大反思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再度沦为政治的工具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沦为经济的工具。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教育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探讨师生关系的时候,教育俨然具有了

“绝对”的独立性。很多研究者将师生关系局限在课堂教学领域,从教师和学生的个体方面寻找师生关系构建的动力,没有从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寻求答案,造成了师生关系研究的片面化和简单化。一些师生关系理论研究即使采取了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视角,往往也只是从教育这个微观的领域介入,很少把师生关系放进更广阔的学科领域中进行探析。事实上,现实中的师生关系内容十分丰富,师生之间除了具有教和学的工作关系以外,还存在着受道德原则制约的伦理关系、受法律规范约束的法律关系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利益关系。此外多数情况下师生之间由于年龄的差异,代际文化决定了师生之间还存在着文化关系等等^[1]。有学者曾指出,师生关系问题研究将形成多学科共同攻关的态势,各学科从各自的理论视角研究师生关系的不同方面逐渐成为未来研究的基本走向。其次,在研究思路的追寻目标上存在乐观的精英倾向。认为只要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人格得以建立,教育质量就可以提高,学生就可以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幸福人,一些社会问题也相应得以解决,诸多理论都同样假设师生关系的冲突和不良现状都可以借助理性得以消解,师生关系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为寻找此类方案提供一套策略。再次,在思维进程上存在强烈的普适取向。我国现今师生关系理论研究的构建思路大同小异,常常流于公式化,把特殊的复杂的师生关系简单化。在批判或比较几种类型的师生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和构建一种自我认为非常优秀、并坚信能够普遍适用的师生关系类型。

上述有关师生关系理论研究思维路向的趋向,好像都是自明自足的,却忽略了这些假设或倾向本身存在的问题和难以克服的困境。

*[收稿日期] 2008-09-17

[作者简介] 汪晓敏(1974-),男,安徽池州人,池州学院基础部讲师,硕士。

二、师生关系理论研究的思维困境解析

1. 坚持教育独立性只是一个纯然的理论假设。

事实上,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教育独立性的诉求都是与教育场域的独立紧密相关的,而后者是一个历史与社会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教育独立性诉求的提出与相应程度的出现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它借助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运动,即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的相互支持关系。教育独立性诉求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工具论教育学,因而强调教育的独立性以及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就成为新一代领导人所确立的教育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教育文化政策本身又是当时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独立性的诉求具有远远超出教育本身的社会文化含义与政治含义。正是这种独立性诉求赋予了教育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以特殊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但是在我国,教育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我们在谈教育独立性的同时,不能脱离历史和地域来谈论教育的规律和师生关系,不能丧失对教育独立性本身的历史反思能力。在这里并非是要否定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划时代意义,只是强调只有对独立性的社会条件进行了历史的分析,才能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独立性的条件和前提,从而为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提供理论支撑。所以我们在构建师生关系理论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以“教育独立的理论假设”为其出发点,而应该从认真分析中国教育自主性所需的制度化背景入手,并致力于在教育场域的保证下真正摆脱政治和经济的过度干涉。

2. 乐观的精英倾向无视教育的事实。

真实的师生关系并不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对于每一种师生关系冲突的解决都只有一个正确方案,更何况有很多冲突根本就不可以消解。^{[2] P.6}此外,这种乐观的精英倾向遮蔽了实践中受难性等负面因素对人的影响。乐观倾向喻示着个体只要积极进取和乐观实现,就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以及人内在本性的圆满实现,却对实践体系中蕴涵着的令人惊异的摔打、挫折、恐怖、破坏、残酷等因素估计不足。提出和构建一种自我认为非常优秀,能够普遍适用的师生关系类型实质上也是一种应然的设想。一个人知道应该做什么,并非靠普遍原则,而是靠对特定情境的理解和判断。同时,就象帕尔默在《教学勇气》一书中反复论述的,没有一种方式方法或师生关系会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一种方式方法或师生关系绝对的不好,只能说某种方式方法或师生关系是否适合特定情境下的特定教师

和学生。

三、师生关系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综合分析可知,现今我国师生关系理论研究的开展,是以教育本身就应该具有独立性这一主观预设为出发点,这必然导致就教育论教育。因而思辨取向的师生关系研究,直接会对教育本身的理解中演绎出“师生关系”应该是什么的假设,这些假设由于忽视了真实的复杂情境,除了符合逻辑外,既无法在实践中断然地否決,也无法在实践中欣然地肯定,更多地只是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或命题。在一定抽象假设的前提下和既有的框架内,从逻辑上来说,由抽象概念或命题构建的理论自然具有一种普适取向。但由于各位学者的前提假设不一样,由逻辑推演而来的普适取向也肯定不一致。基本上每一位学者都在追寻一种普适取向的理论和策略,但是他们彼此的观点和倾向都各不相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普适取向的荒谬。同时实证取向的研究,也会就教育论教育,在某种认为控制的理想环境中(如刻意创造的实验环境中)比较几种师生关系后,基于某种师生关系(如主体间性的师生关系)能够带来“很好的教育效果”,进而提出该师生关系应该成为普适的师生关系。实证研究往往关照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效果,可是不能因此就忽视少数人的发展,同时“很好的教育效果”也并非只有一种评价的标准,更何况刻意制造的理想环境下的教育效果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情境下的教育效果,同样由于在抽象的逻辑层面,或刻意制造的情境下谈论师生关系,忽视了现实生活的困境、偶然性和苦难,自然会想简单地以为一切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这些理论自然具有一种积极的乐观倾向。但在实际的情况中并非如此。

师生关系问题是一个充满个体化,并且又极为具体和多变的现实问题。形而上学抽象思辨的理论研究无法揭示丰富多变的师生关系,所以要想使师生关系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应该走进教师和学生的真实心灵,考查复杂的社会制度和情境。目前有些学者开始把师生关系研究趋向“问题”研究,研究的内容也涵盖多学科,不同学科有所侧重,这或许是师生关系研究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1] 张健. 新时期师生关系研究述评[J]. 社会科学战线, 2003(3).

[2] 黄慧英. 儒家伦理·体与用[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5.

(责任编辑 陈晓姿)

隐性课程对小学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及改善对策*

贾文萍 丁 芳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隐性课程对小学儿童性别角色发展方面的影响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章从教师队伍结构及教师期望、教材及课外读物的内容、校园的精神环境三方面入手分析了隐性课程对小学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对策:优化小学教师队伍,改善教师观念,改革教材内容,淡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重视校园的精神文化建设,给儿童提供优质高效的生活环境。

[关键词] 隐性课程; 儿童; 性别角色; 对策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28-03

隐性课程又称“隐蔽课程”“潜在课程”“无形课程”“潜隐课程”“非正式课程”等,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课程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发展。1968年,美国学者菲利普·W·杰克逊在他的《教室生活》一书中首次提出“隐性课程”这一概念^[1]之后在课程领域掀起了一场有关隐性课程的研究热潮,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引进和研究隐性课程。

在儿童的性别角色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深刻影响着儿童社会化的发展及人生道路的选择。而隐性课程渗透于学校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这一方面来说,隐性课程是以间接的、内隐的方式影响着小学儿童性别角色的发展。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 隐性课程。何谓隐性课程,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目前尚无统一认识。笔者根据以往研究中对隐性课程所做的界定,结合新时期小学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小学教育中隐性课程的涵义界定如下:“隐性课程”是小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那些没有列入正规课程计划和学校政策中,但在教育实践情境中以隐蔽的、非预期的形式有意无意传递给小学生,对小学生的知识、情感、信念、意志、行为和价值观等方面起到潜移默化教育影响的一种课程形态,它包括渗透于小学正规课程或以其他形式存在的偶然的、无意的影响,如:学校的各种人际关系、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校园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环境以及教师的教育方式和人格特征、学习气氛和其他非正式团体的影响等等。

2. 性别角色。性别角色是指个体在自身解剖学、生理学特征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文化的两性规范影响下形成

的性格、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上的特征。^{[2] P.128}通俗一些说就是指被社会认可的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的一种地位,也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方式和态度上期望的总称。性别角色发展是儿童自我意识和社会化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一旦将性别角色规范化,就会自动按照适合自己性别的行为来认识、思考、行动,造成性别角色的心理差异,而这种心理差异对于儿童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3]儿童性别角色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多种认知成分(如感知、记忆、思维等)综合发展的过程。

二、隐性课程对小学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

1. 教师队伍结构及教师期望。(1)女教师比例逐步上升,小学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调。毋庸置疑,教师对小学儿童性别角色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教师性别构成、对学生的态度是影响儿童性别角色分化的重要因素。从全国师资整体来看,女教师比例逐步上升,尤其在小学,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目前教师队伍“阴盛阳衰”的现象,而且这种情况在城市表现尤为突出,甚至有的小学教师都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有研究者曾对上海市小学教师性别做过统计,结果显示女教师的比重非常大,占总数的82.47%,而男教师只占17.53%。^[4]儿童走进学校后,教师是他们除家庭成员之外的第一批经常接触的成年人,教师性别构成就成了影响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直接因素。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教师性别单一化的现象直接影

*[收稿日期] 2008-09-20

[作者简介] 贾文萍(1982-),女,山东青岛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丁 芳(1971-),女,山东泰安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响了儿童性别角色认知,在女教师偏重的学校中,女孩的行为举止等各方面更符合女教师的角色期望,更容易获得女教师的“认同”,这种阶段性优势往往会导致女孩认知模式的固定不变,限制她们的大胆创新,进而限制她们的逻辑和理性思维的发展,而男孩的性别角色学习意识处于模糊和迷茫状态,导致一部分男孩阳刚不足,失去了男子汉气概,出现了“男孩不男”的女性化现象。上海、北京等地的教育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小学男女生的性别差异有明显的缩小倾向,这一消极影响甚至延续到大学。有关心理咨询资料也表明,有性别角色心理障碍的男性大学生,其中将近40%的人曾在小学阶段受到女教师的特别关爱,该数据仅仅涉及前来咨询的人,实际的人数可能会更多。^[5]

(2)女性被隔离于管理职位之外,教育工作中出现性别隔离现象。尽管小学中女教师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男教师的数量,但在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男教师却占了主导地位。有研究者曾对昆明莲华小学和石屏中心小学的教师结构做过统计调查,女教师比例分别是83.6%和72.1%,但是女教师兼职行政比例分别是26.9%和36.3%,女校长比例分别是13.7%和12.3%。当教师工作成为女性集中职业的同时,却将女性隔离于管理职位之外,突显了教育工作中的一种性别隔离。这种现象往往给儿童灌输这样一种价值观,即男性是占据着重要的社会职位的,女性只能从事类似于母亲家务的直接工作,并将其内化成一种现存的社会性别结构和模式。^[6]

教师对男女学生的不同行为态度和方式也会影响儿童的性别角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有研究者发现,多数教师更倾向于请男生回答问题,并乐于给其更多的帮助。例如当女生回答错误时,教师常常会让她其他学生回答;当男生回答错误时,教师却乐于鼓励启发他找到正确答案,从这一行为方式可以看出,教师潜意识中认为女生是被动的学习者,而男生应该具备积极主动的学习精神,这种潜意识会不同程度影响儿童的自我评价,进而影响儿童的性别行为模式。教师在组织和分配工作时,一般也都会按照自己心目中“性别适合”的理解,可能叫男生去完成需要到教室外的任务,如给校长送信或到办公室帮老师拿仪器等,学生很看重这类任务,因为他们被认为需要更多的责任心,而女生则通常被安排做室内工作,如捡起纸张、分发试卷、整理图书馆的书籍等等。这种组织和分配工作的方式向学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男生扮演活跃、主动的角色,能够完成困难的任务,而女生却不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的期望效应实验虽然受到过不少人的批评,但无论如何,这一实验确切地反映出教师一旦对学生产生了某种期望,便会以不同的潜在方式影响这个学生,强化其某一特定行为或某一具体方面。

2. 教材及课外读物的内容。教材及课外读物的编写隐含着作者和课程设计者们的价值观、爱好,甚至偏见,这些背景因素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正式课程,正由于这一因素是“潜在的”“隐蔽的”,使得人们很

少关注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对小学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

(1)我国小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兴起过一系列研究,审查教材中的性别偏见。通过教科书内容的检视,发现我国的小学教科书,特别是语文和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有研究者对课改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小学全日制六年制语文课本(1995年版)和课改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小学全日制六年制语文课本(2000年版)做了分析研究,故事中男主角的数量明显多于女主角,其中人教版达93.6%,苏教版占92.1%,而女主角所占比例分别只有6.4%和7.9%。^[7]其性别偏见通常以性别刻板印象、忽略缺失女性、违反事实等方式出现于课文、插图、照片、活动设计之中。无论是在课文还是在插图中女性的出场次数都比男性少得多。

(2)有研究结果显示,许多国家的小学教材都隐含着“重男轻女”的性别倾向,对男女性别角色的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课本中的男孩是活跃的、敢作敢为的,他们或搞些恶作剧,或勤奋地干一些往往是成年人才干的事情,女孩则性情温和恬静,多被描绘成善良胆小、胸无大志和缺乏创造性的孩子。丹玛克曾对法国、西班牙、苏联、罗马尼亚、瑞典5国的小学课本中的故事进行分析,他发现除瑞典教材之外,其他国家教材中故事主角都是男性多于女性,在教材中具有传统男性角色特征的男性所占比例是100%,而具有传统女性角色特征的女性所占比例,苏联教材中有80%,罗马尼亚教材中为90%。^[5]这种情况在我国也有同样的表现,自古以来形成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观念在教材中反映得更为明显,无论哪个年级的小学语文教材,也无论是图画还是故事,男性主角都多于女性主角,男性主角从事的职业比女性从事的职业不仅范围广而且知识含量高。对教材中涉及的职业进行统计反映出从业人数居于前5位的男性主角依次为军人、领袖、农民、工人、科技工作者,女性主角依次为小学教师、农民、护士、服务人员、工人,对其他教材的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3. 校园的精神环境。精神环境主要指的是不指向学科内容的非实体性精神文化,如学校藏书、报纸、期刊以及校园里和教室里张贴的名人名言等。^[8]购买书籍、报纸和期刊的目的是扩充小学儿童的知识面,加强儿童与社会的联系。张贴名人名言的目的是用具有榜样作用的名人的著名言论来激励儿童。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性别歧视,因为书籍刊物和名人名言是给所有学生看的,并非只给男生看,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儿童所沉浸其中的精神环境并不平等。首先是报纸。据一项对内地8家发行量较大、较有权威的报纸的研究,在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9%,女性占16.1%;在有言论被引述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91%,女性占9%;在正面事件中显示出主动作用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为82.28%,女性占17.72%。^{[9] P.62}由此可见,儿童在报纸上读到的性别信息显

示:世界是由男性主宰的,男性的言论和工作是重要的,女性不过是配角。报纸不足以成为女孩提供性别认同的榜样。

另外,女孩从校园里和教室里的名人名言中得到的性别榜样更是少之又少。校园名言牌上的名言大部分出自著名男性。这些名言本身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激励小学儿童奋发上进的精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儿童潜意识中可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只有男性的言论才可能名垂青史,才值得学生牢记在心。

三、有效改善小学教育中隐性课程的对策

隐性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渗透出来的文化气息对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潜移默化的,所以我们将隐性课程中所潜伏的这种性别角色偏见上升到意识层面,教育部门首先要完善自身体制,广大教育者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以身作则,为儿童提供良好的榜样示范作用,营造健康、积极的性别角色发展氛围,让新一代小学生彻底摒弃传统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建立新型性别角色发展观。

1. 优化小学教师队伍,改善教师观念。教师对小学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优化教师队伍是我们当前极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教育部门要积极鼓励并吸收高素质的男性加入小学教师的队伍,以扭转小学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的状态,同时男性也应该改变当小学教师是没有发展前途、没出息这一不科学的想法,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教师队伍的优化有助于小学儿童在与教师互动的过程中找到模仿的榜样,找准自己的性别定位,使儿童的性别角色健康发展。

此外,加强对小学教师素质的培养,使教师摆脱传统性别角色思想的束缚,打破固有的“不公平”的师生互动模式,在学习上倡导积极的、无性别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创造良好的交流气氛,让男女学生,尤其是女生都成为主动的学习者,而非形成“女生不如男”的错误思想,这样才能让儿童的性别角色在科学合理的生活和学习情境下健康发展。

2. 改革教材内容,淡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小学教材的多次改革都存在明显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刻板化印象,主要是重男轻女现象,而教材对小学儿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学龄初期正是儿童发展和完善性别角色的关键时期,这种不完善的教材内容不利于社会新生代形成正确、平等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行为,很容易把这种陈旧的性别角色观念不断地再生产下去。因此在新课程的教材改革中必须强调性别平等,具体来说可以通过版本竞争的方式,选取更科学的教材;也可以开放民间编撰,汲取更贴近现实的内容,博采众长,完善教材内容,教育部门也要定期进行教科书审查,不断更新教材内容,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也是一

个很好的途径,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现象,逐渐淡化传统性别角色的观念。

3. 重视校园的精神文化建设,给儿童提供高效优质的生活环境。学校和班级中长期形成的精神文化氛围的作用巨大的,它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并自觉地接受熏陶,谴责和抵制破坏和污染这种精神环境的人或事。因此,学校教育者要重视提高小学儿童课外读物的质量,最大程度地为儿童提供能够体现性别平等的信息;另外,校园里和教室里的名人名言,也应该尽量多地采用一些成功女性的典范,照顾到女孩的性别认知,为她们提供性别认同的榜样。此外,良好的校风、班风,融洽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也会感染学生,引起情感共鸣,产生积极的体验,^[10]儿童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学习,会养成良好的习惯,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真诚交往,不会出现刻板的男、女生分派活动和交流的现象,使儿童形成健康、积极的性别观念。

隐性课程中的性别角色偏见与社会文化中的传统性别角色刻板效应是紧密相连的,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偏见有很长的路要走。隐性课程是无所不在的,它渗透在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而且教师和学生也很难察觉或意识到,人又是一种很容易沉溺于习惯的动物,因此在这种习焉不察的情形下,要有效改善小学教育中隐性课程的质量,可能需要我们做出长久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王慧敏. 高等职业教育隐性课程现实意义及路径探析[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6).
- [2] 李幼穗. 儿童社会性发展及其培养[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3] 陈红. 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理论述评[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3(4).
- [4] 汪元松. 潜在课程中的性别角色探究[J]. 科学教育, 2007(5).
- [5] 刘燕. 学校生活对小学生性别角色形成的影响[J]. 教学与管理, 2001(2).
- [6] 甘开鹏. 从学校教育看儿童性别社会化[J]. 课程改革, 2007(2).
- [7] 程福蒙. 我国课程中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J]. 课程改革, 2006(3).
- [8] 陈雨亭. 我国隐蔽课程中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J]. 教育科学, 2004(1).
- [9] 冯媛. 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A]. 王金玲. 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和经验[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0] 庄可. 隐性课程理论研究及其对教育改革的启示[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1).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从永恒主义课程观看我国儿童的读经教育

顾月琴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永恒主义课程观具有一些合理成分,也有明显的不足。它对当前我国的人文主义精神建设尤其是儿童读经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提倡儿童读经并非主张“经典唯上”,不能忽略儿童的身心特点,只有将人文素养与科学素质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永恒主义; 课程观; 名著; 儿童读经

[中图分类号] G40-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31-03

永恒主义教育是20世纪30年代自美国兴起并波及西欧各国的新传统教育流派,在西方代表了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潮。它以实在论为哲学基础,提倡古典主义的教育传统,猛烈抨击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试图以古典文明、传统文化构筑资产阶级的人文精神,以求扶正资产阶级的物质膨胀与精神颓废的社会失衡,影响深刻且久远。永恒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赫钦斯、艾德勒,英国的利文斯通和法国的阿兰等。它属于“新传统教育”的一支,又被称为“古典主义”“新经院主义”“古典人文主义”等。

永恒主义强调人文学科的教育,注重一般智力水平的提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派系,世俗派和宗教派。永恒主义者认为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其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等古典哲学。本文从该派教育思想对重塑传统文明,构建新时代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出发,阐释其课程理论,以期探寻在新世纪人文精神建设尤其是当前儿童读经教育的有益启示,具有现实意义。

一、永恒主义的课程观

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永恒主义教育家认为,那些具有理智训练价值的传统的“永恒学科”是首选的内容,因为它们高于实用学科的价值。理查德·帕雷特认为“那些职业训练方面的‘如何做’的学程是列在黑名单中的,其根据是它们强调技术,而不是理解;它们强调具体的技能,而不是理论。”^{〔1〕}(P.189)永恒主义者从“永恒真理”中引申出“永恒的学科”是训练学生理智的最好办法,因此他们强调学校课程的确是教育家和教师考虑的问题,不能听凭学生的兴趣自由选择,教育家和教师应以“永恒学科”为核心为

学生设计和确定课程。

那么什么是永恒学科呢?赫钦斯在《高等教育》一书中说:“我们提倡永恒学科,因为这些学科抽绎出了我们人性的共同因素,因为它们使人与人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使我们和人们曾经想过的最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对于如何进一步的研究和对于世界的任何理解是首要的。”^{〔2〕}(P.206)因此,永恒学科首选那些经历了许多世纪而达到古典著作水平的书籍。

在永恒主义者看来,所谓“永恒的学科”主要是历代伟大哲学家、思想家的伟大著作,尤其是古代伟人的著作,因为“一种良好的教育包括对真理的探求和理解……真理能在文明的伟大作品中找到。”^{〔2〕}(P.101)。因此永恒主义者特别强调学习古人伟大作品的重要性,如斯东提倡学生尤其要重视学习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阿兰则公开强调学生要回到古代伟人那里去,和古代思想直接接触,赫钦斯更是读古代伟人作品的鼓吹者和实施者。

永恒主义者主张在初等教育阶段应开设语文、算术、写字等课程。对儿童进行读、写、算的基本训练,有的还主张使儿童熟记伟人古典著作中最精彩的段落和名言。他们主张中学阶段在初等教育基础上进行自由教育,为以后学习“名著”打好基础。此时的课程主要是人文学科,如哲学、语言、历史、数学、自然学科等,特别强调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永恒主义者也知道在现代社会中不让学生接触自然科学是行不通的,但他们强调要以经典学科为中心设计课程体系,自然科学的学习不能冲击经典学科的学习,使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基础科目经典,认识世界的永恒性,并有效发展

*[收稿日期] 2008-09-07

[作者简介] 顾月琴(1975-),女,江苏苏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

他们的理性。

至于大学教育,永恒主义者提出以“名著”作为课程和教材。20世纪30年代,在赫钦斯直接组织和鼓动下,美国圣约翰学院全面推行了所谓“名著百种计划”,选择了百余本古典原著作为大学4年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人文学科方面的著作,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只占很少的部分;而这些著作中有四分之三是19世纪以前的著作,三分之二是18世纪以前的著作,20世纪的书只有两种。^{[1] P. 269)}

永恒主义者认为,名著课程和教材具有如下优越性。

(1)它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最好途径。经典著作中包含了关于宇宙的见解和观念、正确的思维方法,论述了人类永恒的道德问题,因而体现了人类应该考虑的永恒原则和内容。学生通过阅读名著可以掌握永恒的原则,理解前人的喜、怒、哀、乐,掌握给他们以力量和方向的价值。

(2)名著的定向都是概念的、理论的,从任何意义上说,它都不是技术的、应用的。名著虽然难懂,但也因此更有挑战性。只要通过刻苦学习,就能使智慧得到发展。

(3)阅读名著是一项很好的理智训练。阅读名著就是与伟人对话。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同时,细微的观察、良好的记忆、丰富的想象本身就是智慧训练的重要途径。

(4)阅读名著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永恒主义者认为,现代的伟大成就的端倪在名著中早已存在。阅读名著可使我们理解当前各个学术领域的发展过程,还可帮助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各种病态的、混乱的现象。^{[1] P. 193)}

总之,永恒主义者热衷于让学生阅读古代伟人的经典著作,并不是要让学生学到某种知识和技能,也不是让他们背诵古典著作的名言或精彩段落,而是希望对他们进行理智训练和宗教教育,让他们形成“理性的人生观”“永恒的人性”,确立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道德价值观,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的永恒秩序。因此,永恒主义者强调课程设计标准主要看其有无理智训练和个性陶冶的价值,极力反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所倡导的实用性、功利性课程,认为正是这种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课程体系导致了美国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和学生道德水准的急剧滑坡。

二、永恒主义课程观简评

(一)永恒主义课程观的合理成分

首先,抨击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弊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到处充满了颓废、萧条和绝望。永恒主义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科学主义难辞其咎。在教育上他们指出实用主义抛弃了西方传统的自由教育,学校成了各种职业教育的拼盘,忽视让学生学习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忽视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强调让学生“从做中学”,这样学生学到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既不能适应现代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因而应当抛弃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学习名著,学习古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获得对永恒原则的掌握,这样才能

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认识人生的价值,才可以在变化的世界中承受各方面的压力而安然处之。

其次,弘扬名著教材的人文精神。在教育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永恒主义教育理论第一个掀起了20世纪人本主义教育的大旗,呼吁教育由适应社会需要复归到塑造人的精神和道德中去。赫钦斯引用一百年前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的话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从教育中删去古典文学或数学推理,无论怎样使一个人熟悉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术语,也一定会使他对了解文学和哲学的真正意义缺乏准备,因为他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和哲学家所具有的文化素养。”^{[1] P. 194)}因此,通过学习名著可以从先贤哲人那里学到认识世界和认识社会的方法。

再次,确立了终极关怀的价值观。永恒主义把发展人的本性、把人塑造成人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以古典著作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力图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试图让人们掌握世间的真理,成为不仅能适应世界,还能创造世界的人。虽然他们所谓“人们共同的本性”“永恒的人性”有抽象、荒谬之嫌,所强调的古典人文教育也有疏远社会的倾向,但他们试图在科技、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找出超越时代而永恒的东西,弘扬了亘古不变的人类崇高价值的坚定信仰和精神支柱,在为物欲所迷惑的世界中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永恒主义课程观的不足之处

首先,课程观的理论基础欠科学。永恒主义者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世界是由永恒不变的“实在”组成,这种“实在”实际上就是“观念”和“理念”。它的理论前提是世界的永恒性和人性的不变性,认为教育目的就是认识世界的永恒原则。这显然是从静态的观点考察世界和教育的使命,无疑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忽视了事物的运动、变化,造成了对教育理解的片面性。

其次,片面强调人文主义的价值。永恒主义者强调学习古典的“永恒的学科”,对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品德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它夸大了古典学科特别是古典名著的作用,贬低了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自然科学的作用。在永恒主义课程和教材中,自然科学课程是被排斥在外的,而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却已证明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如果把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归结于自然科学,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社会的产物,它们各有千秋。如果真要让大学生学习他们倡导的“永恒课程”,那么大学生所学的知识则永远难以超越古人,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要求,因此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实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

此外,永恒主义课程观也是一种宣扬双轨制的课程理论,其目标在于培养少数精英人物,而劳动人民子弟则是不需要学习这些永恒的学科的,只需接受一些职业技术培训。

教育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是受社会发展制约的,当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时,它就必然制约教育发展的方向,这是不以教育改革者的主观意愿

为转移的。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在注重培养青年道德情操和价值观的同时,也要考虑发展的需要,即不能忽视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从永恒主义课程观看我国儿童的读经教育

永恒主义者主张读名著杰作以完善人格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浩如烟海的史册中,“名著”往往是民族文化精华的沉淀,代表了当时进步的心声。读名著对完善人格、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它在使人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也使人们世俗的情感得以升华,蒙尘的心灵得到净化,使人从更高的精神境界去观察和思考人生。目前在我国开展的少年儿童诵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简称读经教育),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应与永恒主义教育主张名著学习的特征相吻合。

我们生活在21世纪,尽管高度发达的科技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人们在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却丢失了人文精神,我们普遍感到一种精神的迷茫和无所适从,社会信仰混乱、物欲燃烧、道德滑坡,许多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太多的困惑、迷茫、苦闷和百无聊赖。钢筋水泥铸造的高楼大厦让我们的心灵倍感孤独冷漠,而一些文化快餐也让我们的孩童沉浸在一些迷乱的动画之中。今天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如何解决好继承传统文化和创建新型精神文明的时代课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转型带来的动荡和困惑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冲击和震颤。我们亟待树立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来构建新的伦理道德框架,以防止人们受不良思想的误导而致使其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的嬗变,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这样的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去敦厚崇礼、中正刚毅的古代传统文化经典中去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

所谓经典,就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俗等中国传统文化。永恒主义者认为,在儿童很小的时候甚至没有入学前就应接触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品。儿童读经,就是让处于心灵最纯净、记忆力最好年龄阶段的儿童读诵中国文化及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典籍。有些专家认为,13岁之前是少年儿童记忆发展的黄金时期,进行名篇名句的阅读和背诵训练,可使儿童增强记忆力、集中注意力,更好地掌握民族语言。

永恒主义代表人物英国教育家利文斯通指出,20世纪英国人和美国人所缺乏的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对于伟大事业的憧憬”,因此形成了“精神的真空”。他们认为,古希腊及传统的名著杰作作为儿童描绘了理想的、接近完善的生活榜样。这些榜样集真、善、美于一体,学生在读这些著作时,无形中会受到一定的动机、情感、意志、性格等思想的引导,幼稚的心灵会受到伟大心灵的熏陶。中华民族以

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博大浩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如公而忘私、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尊老爱幼、勤劳俭朴、诚实守信的人伦规范和做人准则;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的进取精神和浩然正气;先义后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和高风亮节等。儿童通过诵读以儒家四书五经及道家的老庄等为代表的经典,接受优良文化熏陶和传统伦理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根植文化修养,拓展心胸见识,启迪智慧,教养崇高的人格,充实生命,成长为德智兼备的贤才,使整个社会风气向上向善,从而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素养。

当然,我们提倡儿童读经并不是主张“经典唯上”,不能忽略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中国古代经书大多内容深奥语言晦涩,而儿童毕竟识字不多理解有限,若以“填鸭”式的强制灌输方法,让儿童死记硬背、囫圇吞枣,则会产生因噎废食的后果。因为这不仅增加少儿的学习负担,而且会扼杀儿童探索的天性,窒息儿童的创造思维。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经典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评价,应摒弃那些封建糟粕,力戒生吞活剥机械的背诵方法,使读经的内容、数量和方法都适合儿童。另外,我们的儿童毕竟与古人不同,他们生活在科技高速发展瞬息万变的21世纪。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学生除了掌握必要的人文素质外,还需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在现代生活国际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科学素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有机地结合,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他们具有广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创造的精神,使之既能恪守做人的准则又能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外界的挑战。

不管怎样,历史是不能忘却的,而作为历史和文化载体的一些古代优秀文化典籍,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能够成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哲学指导。让我们从永恒主义课程观中吸取有益的经验,采取恰当的方式,通过儿童的读经教育重新去认识我们的文化,去根植文化之基,以重塑世道人心,让儿童受过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同时接受科学知识训练,具备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将来担负起中华民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 [1] 陆有铨. 现代西方教育哲学[M].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3.
- [2] 华东师大教育系, 杭州大学教育系.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C].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 [3]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 教育发展史资料[Z].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 1973.

(责任编辑 刘敏慧)

由英国“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带来的思考*

李克军

(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江苏徐州 221009)

[摘要] 英国非常重视将商企业管理经验应用到学校管理工作中,其中“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是商企业领导者们创立的,其目的是通过校长资格证书的培训,让教育领导者学习商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方法。英国的做法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借鉴,要加强对商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提高教育管理的水平,要进一步探讨教育的精细化管理;在教育管理中实施高效、有个性风格的学校管理模式。

[关键词] 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 学校管理; 校(园)长培训

[中图分类号] G4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34-03

一、“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基本背景介绍

2007年11月26日至12月17日,江苏省教育厅组织部分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赴英国进行的学习考察活动,重点考察英国的学前、中小学和教师教育情况,从拜访英国教育部到赴考文垂考察“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从伦敦到爱丁堡、利物浦、约克;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从英国师范教育大学委员会的专题讲座到赴华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的学习参观访问,在这些和教育有关的活动中,可以从细微处感知体会到英国教育的特点。

因为英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所到之处,每所学校都有其个性风格,当然,校(园)长们所采取的管理方式以及他们的管理特点都各不相同,无论是从学校领导机构的设置,还是从课程设置、制度建立、教育教学评价等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管理方式的差异不等于教育目标的差异,只能说学校管理有差异,而教育目标却是一致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工作中,有些校长人云亦云,工作方式呆板,机械模仿,管理上失去自主的风格与特点。在英国,多元化的学校文化需要多元化的管理,在中国,不同背景的学校也需要多元化的领导与管理思路。只有这样,我们的校长才能彰显出自己的个性。英国基础教育段(包括幼儿园)选拔校(园)长基本上与中国一样,都是从优秀的教师群体中选拔出来的。但不同之处是在英国,校(园)长必须先取得证书再上岗,没有国家颁发的校(园)长任职资格证书不能干校长。而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是先提拔校长职务之后,再进行相应的校长培训,然后根据培训的情况再发证书。在英国,通过职前培训取得

证书,而且实践工作干得好,群众感信度高,这样的校长一旦确立,基本上是可以干好的,何况英国的校长是由董事会选举而成。

为了解校长培训方面的情况,考察组特地前往考文垂的一个培训机构参观。考文垂是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在这里考察组参观了“校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的培训模式(幼儿园园长的培训也包含在其中)。这个机构是于1986年成立的一个民间机构,是商企业领导者们最先创立,其目的是通过培训,让教育工作者学习商企业管理者是如何管理的,借鉴商企业管理者的经验。这个机构得到了英国教育部和华威大学等高校的支持,他们和教育部开展合作,并和大学商学院合作,针对英国基础教育情况,创立了一整套专业培训指标,其中包括确立校长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英国确立了基础教育校长资格证书制度,没有校长资格证书不能做校长,英国政府教育管理机构也认为校长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核工作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因此,培训方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新校长的培训课程以及不同校长的培训途径完全独立,根据政府的年度计划,培训机构先向政府投标,项目合同3年有效,培训校长只是培训方6-7个培训项目中的一个方面,在培训中,同样包括幼儿园园长培训。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参观期间又了解到,该校也开展了面向全国教育领导者的培训。从全英国来说,该培训项目是这个学院的强项,他们和考文垂的“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不同的是,“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面向的是在职教师的培训,而该校主要开展的是学位教育,学校商业管理学位课程由曼彻斯特

*[收稿日期] 2008-08-11

[作者简介] 李克军(1966-),男,江苏徐州人,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副校长,副教授,徐州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生导师,江苏省特级教师。

城市大学在英国第一个提出,2001年开始实施学士学位的教育,计划于2008年招收学校商业管理硕士学位,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博士学位教育。英国国家教育标准局建立于1992年,标准局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评估标准,负责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督导,并对督导人员进行培训。由于学校过多,国家标准局的督导工作一般和当地教育公司合作,例如,剑桥大学设有教育公司,主要负责对英国中部地区的督导。另外,教育标准局负责发布各种教育督导信息。每次的督导情况、每个学校的教育发展状况,在教育标准局的信息库里面都能找到。各培训方主要根据国家教育标准局发布的信息申报和开展各自的培训工作。

二、“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带给我们的思考

在比较教育的思考中,英国的学校管理和学校管理人才培训的做法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在我们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应该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1. 借鉴商企业管理模式,提高教育管理的水平。

学校管理是学校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是学校管理者在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遵循教育规律,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措施,带领和引导师生员工,充分利用校内外的资源和条件,有效实现学校工作目标而进行的一种组织活动。人、财、物、事的管理不能流于形式。英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商企业的管理经验虽然不能生搬硬套,但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思考。我们所知道的海尔集团凭借高效的管理,打开了国内国际市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被誉为“海尔现象”,它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其科学的管理。海尔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至今蜚声海外的跨国公司。有一次,中央电视台记者去采访,当他们进入公司大厅时,看到一位清洁女工在用拖把擦拭地面,当时地面已经是非常洁净了。几个小时后,这些记者采访结束离去时,还看到那位女工在擦拭那明净如镜的地面,记者奇怪地上前问道:“这地面已经非常干净了,为什么你还要不停地擦呢?”那女工反问道:“这是我的工作呀,应该精益求精。”也许这就是海尔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企业,管理体现在了每一个细节的层面上。在我国企业办社会没有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之前,有的政府办学校的水平没有企业办的学校的水平高,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究其原因,和他们借鉴商企业管理,重视质量,重视效益是分不开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人学习商企业管理的经验,培训学校管理者,并且将之用于教育教学的管理,这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2. 探讨教育精细化管理的新模式。

老子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精细化管理源于一种管理理念,它是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以及服务质量的精细化对现代管理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在以制度建设和民主管理为主要常规管理的基础上,并将常规引向深入的关键一步。“学校无小事,事事皆教育”,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引入教育领域,用于学校管理是必然趋势。它

要求每一个步骤都要精心,每一个环节都要精细,每一项工作都是精品。“精心是态度、精细是过程、精品是成果”,要落实管理责任,将管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这就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把本职工作做到位、尽到职,对工作负责,对岗位负责,人人都管理,处处有管理,事事见管理。实施精细化管理有利于培养师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习惯有与坏之分,好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学校实施精细化管理,强调做事要求“精”、“细”上,就是说在做任何事情上都要在“精”和“细”做文章,尤其是师生的行为习惯必须摒弃陋习,要让好的行为内化为潜在的意识,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良好习惯。精细化管理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我们在教育教学的每一步骤、每一环节上都表现出业务素质精、教学手段精,课堂环节细、耐心辅导细,教学必将产生质的飞跃。“玉不琢不成器”,这“琢”就是精雕细刻之意。要具备这种本领除了刻苦学习、锤炼素质、积极工作之外,只有在精细上下功夫。精细化管理是提升学校品位的必由之路。学校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教育、教学、后勤等方位的全面配合,工作才能协调、和谐、提高。在英国的学校和幼儿园,精细化管理的特点无处不在。厕所是学校卫生管理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整个学校管理的水平,在英国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所到之处的厕所洁净、无味、设施完备,更无厕所文化的痕迹。啧啧称赞之余引起了我们深深地思考:论硬件,我们的一些学校丝毫不比他们差,站在世界闻名的伊顿公学门前,望着陈旧的木门,斑驳的红砖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样的外观。但是钱用到了刀刃上,里面的条件和管理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实施精细化管理,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制定切实可行的精细化管理目标。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实行目标管理已是行之有效的,因而在精细化管理过程中,也应该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全方位的精细化管理目标。一般来说,管理目标的内涵有:教师教的管理、学生学的管理、管理部门(校园长室、教导处、总务处)的管理(而这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但却是最重要的一环)等。

(2)完善精细化管理过程。对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控,是精细化管理的前提。如果缺少了对管理过程的有效监控,那精细化管理就回到了粗放型管理的老路,精细化管理必须有监控,在监控中反思,在监控中修正,从而实现在监控中的提高。尤其是在学校(园)精细化管理过程中,面对有鲜明个性、各有特点的广大师生,一定要有效的监控其成长过程,及时沟通与修正,让其少走弯路,顺利成长。

(3)创新性的落实精细化管理措施。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明确精细化管理的内涵,是实施精细化管理的起点,也是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归宿。在实施精细化管理过程的起点时,管理措施是不全面、不完善的,伴随着精细化管理措施的不断深化,到达精细化管理过程的终点时,管理措施一定是全面、完善的,更高层次的,这正是精细化管理的归宿。

(4)注重有反馈的精细化管理结果。(下转第38页)

初中生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 与抑郁的关系研究综述*

贺社新 苗艳敏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从有关初中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可知,抑郁是影响初中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对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研究作了相应的综述,发现目前专门针对初中生抑郁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各个心理因素与抑郁间关系综合探讨的文章。

[关键词] 抑郁; 生活事件; 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 初中生

[中图分类号] B8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36-03

研究者采用SCI-90量表调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情况,发现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强迫、偏执和抑郁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魏俊彪对944名初中生SCL-90做了测定,各因子排前5位的是强迫、人际敏感、敌对、偏执、抑郁。^[1]敖淑清、王杏英、徐济达对南京市中学生SCL-90评定结果分析,南京市6个年级排前5位的因子为强迫、敌对、人际敏感、偏执、抑郁。^[2]刘恒、张建新对我国中学生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结果分析,发现排在前5位的因子是强迫、人际敏感、敌对、偏执、抑郁。^[3]由此可见,抑郁是初中生比较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因此研究初中生抑郁的产生机制及相关因素,对于预防抑郁,提高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初中生的健康成长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抑郁的理论

冯正直认为青少年抑郁是指青少年期出现的以忧郁为主的显著而持久的悲哀、不幸和烦躁的情绪、行为和身心不适症状。^[4]刘凤瑜认为中小学生的抑郁指的是他们对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不良情景或事件的一种反应,是一种无愉快、悲伤或精神痛苦。这种无愉快、悲伤或精神痛苦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持久的、相对稳定的。^[5]

目前大多将青少年抑郁分为3类。第一类,抑郁情绪,指一个人悲哀、不幸福和烦躁的心境,是个体对环境和内在刺激的一种情绪反应。第二类,抑郁行为的症状,指由青少年行为问题而引起的个体悲哀情绪的现象,与青少年退缩、身体不适、社会问题、思维问题、注意问题、攻击行为、过失行为等密切相关。第三类,基于临床诊断的抑郁障碍,指抑

郁的严重状态,即个体由于长时间受到抑郁影响而不能进行正常学习和生活,表现为食欲下降、睡眠障碍、疲倦、低自尊、注意力难以集中、无望感、想自杀等心理和生理症状。(冯正直,2002)

二、生活事件的研究

1. 生活事件的含义和分类。生活事件就是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指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引起应激的事件,需要一定的适应性努力和社会再调节才能有效应对。^[6]生活事件引起的是生活应激。生活应激本身又有长时与短时之分,生活事件也可因此分为两类:日常琐事和主要生活事件。日常琐事引起长时生活应激,而主要生活事件引起短时生活应激。主要生活事件中的创伤性事件是不可控、不可预测的。日常琐事的应激性虽不如创伤性事件那样强烈,却有持久性,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具有累积性。研究表明:日常琐事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大于主要生活事件的影响。^{[7][8]}

2. 生活事件的相关研究。(1)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把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这两个变量放在一起考察的研究比较多。例如Igor Kardum, Nada Krapić(1999)以265名11-14岁的青春期儿童为被试,研究人格特质、压力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李伦、王谦(2000)探讨了大学生心理应激生活事件与应付方式的特点。井世洁、乐国安(2004)以345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不良情绪进行模型设定和验证,结果是生活事件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对焦虑和抑郁情绪起作用等。

*[收稿日期] 2008-09-10

[作者简介] 贺社新(1965-),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教师。

苗艳敏(1978-),女,河南开封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6级基础心理学研究生。

(2)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朱丽萍、龙彬、费明(1998)研究情感性障碍与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的关系。崔义才、董俊玲等(2001)对肺癌患者心理健康状况与个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做了分析等,大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是围绕医学模式展开的,对健康人群的研究极少。

(3)生活事件与抑郁的相关研究。抑郁是中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其发生发展与生活事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俞杰等人在农村中学生抑郁和焦虑状态与应激源的相关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学生抑郁主要与其负性生活事件有关,主要有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等。许碧云等人在研究中发现,青少年生活事件与其行为、情绪问题密切相关,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等负性生活事件能增加抑郁情绪问题;^[9]丁新华、王极盛对558名中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关系的研究表明,除个别生活事件项目外,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多数项目均与中学生抑郁呈显著正相关,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回归分析表明,学习负担重、受人歧视冷遇、不喜欢上学、家庭经济困难、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升学压力、被盗或丢失东西、考试失败或不理想、受批评或处分、生活习惯明显变化、恋爱不顺利或失恋、被罚款等12类生活事件对抑郁的预测作用较大。^[10]

三、应对方式的研究

1. 应对方式的概念及其分类。应对(coping)一词由其动词形式“cope”变化而来;“cope”的原意为有能力或成功地对付环境挑战、处理问题。后来伴随着应激研究的不断深化,心理学家不断地赋予应对新的内涵或变化的外延。20世纪60年代,应对主要被视为一种适应过程;70年代,应对被视为一种行为;80年代,应对被视为人的认知活动和行为的综合体。

应对方式是在应激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关于应对方式的分类有多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如:Antonovokky等(1979)把应对分为“针对问题的应对”和“针对情绪的应对”。Zimbaro(1985)主张根据应对的目的把应对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直接的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活动来改变应激源或个体与应激的关系,如抗争、逃避、妥协等;另一类是通过麻痹自我感觉的活动来改变自我,如使用药物、放松疗法、有意分散注意、幻想等。

国内对应对的研究起步较晚,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如:肖计划等人(1995)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把应对方式归结分为6种: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黄希庭、余华等人(2000)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把应对方式也归结为6种:问题解决、求助、退避、发泄、幻想和忍耐;陈树林、郑全全等(2000)以及Folkman和Lazarus等把应对方式分为7种: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姜乾金等人(1993)根据应对的效果,采用特质法以因素筛选与效标考察相结合的办法将应对项目分成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大类。

2. 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应对方式形成与认知评价、个性、年龄、性别、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这些因素有关。梁军林等人(1999)分析高中生“艾森克个性问卷”(EPQ)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结果发现EPQ量表N分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E分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无显著相关。其中N分高提示情绪多不稳定,易激惹,较易产生焦虑和抑郁,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比较强烈;E分高表现为好交际、朋友多、灵活、随和、乐观、喜动不喜静。^[11]张虹等人(1999)发现,应对策略中问题解决与SCL-90呈正相关,逃避策略与SCL-90得分呈负相关,即应用问题解决策略越多,越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心理卫生状况,使用逃避策略则不利于心理的健康发展。^[8]

四、社会支持的研究

1. 社会支持的含义及分类。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和研究目的对社会支持提出了不同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不同定义虽然表述有些差异,但含义是一样的,即社会支持能使个体获得自信和安全感,感到安慰、快乐和充实,当他遇到心理压力时,能够从众多的社会关系中得到有效帮助。相同的压力情境之所以对不同的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就是由于那些较少发病的个体相对于受压力影响较大的个体有着更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

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理论和研究目的出发,运用多种方法对社会支持进行了划分,常用对于社会支持的分类方法是把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是客观实际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或组织、团体的交际等所获得的程度。主观支持是主观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指个体受到社会的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肖水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这是衡量个体对社会支持利用差异的一个指标。^[12]

2. 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从目前相关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对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采用定量评定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除了医学界之外,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分别从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心理学界对于社会支持的研究和兴趣,是在探求生活压力对身心健康影响的背景下产生的。Herinn和lamothe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抑郁等消极情绪呈明显的负相关,抑郁往往并不是生活中各种压力直接造成的,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应对压力的一种重要资源,其特征与个体特定情境下的抑郁反应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马晓红在大专学生焦虑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与焦虑呈显著负相关;^[13]李惠云对石家庄416名高中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中发现,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6]余欣欣、叶发钦在初中生社会支持状况及其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初二年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最低,其次是初三年级学生,初一年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最高,女生的社会支持水平高于男生,初中生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有显著的影

响作用。^[14]

以上研究无论是从整体角度还是从个体角度来分析,都显示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人们的心理健康,而不良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则有损身心健康。

五、问题的提出及展望

初中阶段是个体成长的重要阶段。现代社会竞争的加剧以及家庭教育的忽视使许多初中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心理困扰和障碍,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从以上文献中不难发现,在青少年中最常见的有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强迫、偏执和抑郁。而目前专门针对初中生抑郁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缺乏对多个心理因素与抑郁间关系综合探讨的文章。以后的研究可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初中生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抑郁的关系,旨在更深入地理解抑郁的发生机制,为初中生抑郁发生的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为初中生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 [1]魏俊彪. 944 名初中学生 SCL-90 测定结果分析 [J].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 2002(1).
- [2]敖淑清, 王杏英, 徐济达. 南京市中学生 SCL-90 评定结果分析 [J]. 中国校医 2001(6).
- [3]刘恒, 张建新. 我国中学生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结果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2).
- [4]冯正直. 中学生抑郁症状的社会信息加工方式研究 [D]. 西南

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 [5]刘凤瑜. 儿童抑制晕表的结构及儿童青少年抑郁发展的特点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7(2).
- [6]李惠云. 高中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 [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7]张月娟, 闫克乐, 王进礼. 生活事件、负性自动思维及应对方式影响大学生抑郁的路径分析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1).
- [8]张虹, 陈树林, 郝全全. 高中学生心理应激及其中介变量的研究 [J]. 心理科学, 1999(22).
- [9]许碧云, 陈炳为, 倪宗瓚, 黄雪竹. 青少年行为、情绪问题与生活事件典型相关分析 [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04(4).
- [10]丁新华, 王极盛. 中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11).
- [11]梁军林, 李东石, 刘珍妮, 全东明. 高中生的防御方式和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3).
- [12]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 [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1(2).
- [13]马晓红. 大学专科生焦虑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D]. 邢台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14]余欣欣, 叶发钦. 初中生社会支持状况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3(6).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上接第 35 页) 及时调整精细化管理过程, 不断有效反馈精细化管理的结果, 是实施精细化管理的至高境界。有了精细化管理目标, 有了切实可行的精细化管理措施, 更有了可监控的精细化管理过程, 那么精细化管理就会实现, 但要使精细化管理不断上台阶, 那就一定要有反馈, 因为有反馈才有提高, 只有反馈, 才能实现管理的转型, 那就是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型, 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的转型, 从而实现从管到理的飞跃, 从管制型的、压抑性的到人文的、开放性的、革命性转变。我们所探讨的这么一个管理模式在有些商企业的管理中已经得到了实现。

3. 探讨高效、有个性风格学校管理模式。

学校管理绩效是指学校功能发挥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是管理有效性的重要标志, 评价一所学校管理绩效的模式有目标模式、需求满足模式、环境适应模式、学校内质优化模式、投入——产出模式等等。管理工作有其共性, 更有其不同而带来的个性差异, 校长是一校之魂, 一个校长就是一所学校,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说过: “做一个学校校长, 谈何容易!” “领导学校, 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 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这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多年从事校长工作实践经验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 也是校长管理学校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学校管理流程是一个“人性化自然”的过程, 校长要通过静态与动态、刚性与柔性、程序与

非程序等关系的有效整合, 去塑造和谐统一的管理世界。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 锐意改革, 他提倡在学术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反对学术专制, 至今仍影响着北大学术民主氛围。南京晓庄师范学院至今的校训“教学做合一”, 就是当年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体现。段力佩校长 60 年代总结“紧扣教材, 边练边教, 新旧联系, 因材施教”的 16 字经验, 当时在教育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今天的泰兴洋思中学、聊城杜朗口中学、上海建平中学的校长们也都是各具特点的校长。可以说, 一所学校优良的校风是历任校长教育思想、治校方略、人格精神的结晶。唐朝魏征说过: “智者尽其谋, 勇者竭其力, 仁者播其慧, 信者敛其中, 文武并用, 垂拱而治”。校长通过努力, 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 学校管理绩效也就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17 世纪的英国教育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提出“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因为教育之故”, 洛克强调培养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 强调绅士教育论。徜徉在英伦三岛, 在欣赏绅士及后工业文明的同时, 我们也在思考着对我们教育的可借鉴之处。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促进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 英国的“校园”长进入产业领导者中心”的模式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

(责任编辑 陈晓姿)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王晓芹 丁 芳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认知行为疗法。由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浅显易懂以及治疗具有短程性,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所以文章在阐述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来探讨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关键词]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ABC理论; 非理性信念

[中图分类号] B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39-03

一、引言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利斯创立的。这是他在多年不断的临床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独特性的、生动的、指导式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方法。^[1]因该方法也采用行为疗法的一些方法,故被称为一种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法。该疗法旨在通过纯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辨的途径,改变来访者的非理性观念,帮助解决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

由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浅显易懂以及治疗的短程性,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所以,不一定在咨询过程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善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中的观点与方法,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从而更快乐健康地生活。本文旨在阐述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主要观点,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二、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理论基础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强调认知重建,它是认知行为疗法中的一种,但此理论涉及情感、行为层面,期盼以实施具体的认知—情绪—行为的方法,帮助个体克服自我贬低的价值体系,引导其建立自我充分发展的人生哲学,从而增进个体有效的适应能力,由此也称之为认知行为疗法。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既是一种人格理论、心理治疗的方法,也是一种生活的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活着、存在着,凡是存在就是有价值的、重要的,人本身并没有好与坏之分,而且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2] (P.71)}

1.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人性观。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理论基础建立在艾利斯对人本性的看法之上^{[2] (P.71)},这种看

法可归结如下:第一,人生而具有理性及非理性的特质;第二,人既可以是有理性的、合理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不合理的。当人们按照理性去思维、行动时,就会是愉快的,富有竞争精神的以及行有成效的人;第三,情绪是伴随着人们的思维而产生的,情绪上或心理上的困扰是由于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思维造成的;第四,人具有一种生物学的和社会学的倾向性,倾向于存在有理性的合理思维和非理性的不合理思维,即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或多或少的不合理的思维与信念;第五,人是有语言的动物,思维借助于语言而进行,不断地用内化语言重复某种不合理的信念就会导致无法排解的情绪困扰;第六,情绪困扰的持续是由于那些内化语言持续的结果,艾利斯曾指出“那些我们持续不断地对自己所说的话,经常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或者就会变成我们的思想和情绪”;第七,人具有改变自己观念、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可重新组织知觉与思考,借此消除或改变自我贬低的想法和情绪。

总而言之,艾利斯对人性的看法是中性的(既是理性也是非理性的)、偏向乐观的(人的思考观念、情绪及行为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他也认为人本身具有自我对话、自我评价以及自我支持的特性。

2. ABC理论。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人类的问题并非来自外部的事件或环境,而是来自人对外部事件的观点、信念,也就是人的情绪来源于他对事件的信念、评价、解释。^{[3] (P.177)}这条基本原则也叫ABC理论。在ABC理论模型中,A是指诱发性事件,B是指个体在遇到诱发事件之后相应而生的信念,即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解释

*[收稿日期] 2008-09-07

[作者简介] 王晓芹(1981-),女,山东威海人,苏州大学发展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丁芳(1971-),女,山东泰安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和评价。C是指在特定情景下,个体的情绪及行为的结果。通常人们会认为人的情绪及行为反应是直接由诱发事件A引起的,即是A引起了C,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则认为诱发事件A只是引起情绪及行为反应的间接原因,而B——人们对诱发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解释,才是引起人的情绪及行为反应的根本直接的起因^{[4] P.92}。因此,艾利斯认为人的情绪在本质上是一种态度、认知的过程,所以一个人的情绪不仅源于个人的哲学信念,而且会因为这些信念的不改变而持续下去,因此我们可通过改变想法来改变、控制情绪,即通过改变我们的非理性的想法、内在自我语言可减少自我贬低的负性情绪,并消除情绪困扰。

3. 非理性信念及其特征。非理性信念是指在对客观事物歪曲理解的基础上凭空想象,或在不合逻辑的推理基础上固执地认为事情应当或必须这样或那样。^{[4] P.91}艾利斯通过临床观察,总结出西方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11种主要的非理性信念,主要表现为对自己、对他人、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及事物的绝对化的要求。70年代之后,美国心理学家威斯勒则进一步把这些主要的非理性信念归并为以下3大类:绝对化要求、过分概括化和糟糕至极。^{[5] P.11}

(1)绝对化要求是非理性信念中最常见的问题。对事物的绝对化要求是指人们以自己的意愿为出发点对某一事物怀有认为其必定会发生或不会发生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通常是与“必须”和“应该”这类字眼联系一起的。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总是在想“我必须获得成功”“周围的人必须对我好”等等。这类信念令人很难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生活中一旦遇到坎坷和不如意便会产生心理障碍,陷入痛苦的情绪之中。

(2)过分概括化是一种以偏概全,以一概十的不合理思维方式的表现。持这种信念的人,当某一件事未获成功,如一次考试失利、一次当众发言不精彩,就会认为自己是个“废物”“一无是处”而产生自卑感,甚至自惭形秽、自暴自弃、焦虑、抑郁,从而产生种种心理障碍。艾利斯认为,以一件事的成败来评价整个人的想法是一种理智上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以他是否聪明,是否取得了成就等来评价的,他指出人的价值就在于他具有人性。他因此主张不要去评价整体的人,而应代之以评价人的行为、行动和表现。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自己或他人可能出现的过失行为。

(3)糟糕至极是一种认为如果一件不好的事发生将非常可怕、非常糟糕,是一种灾难的想法。这种想法会导致个体陷入极端不良的情绪体验如耻辱、自责、自罪、焦虑、悲观、抑郁的恶性循环之中而难以自拔。当一个人讲什么事情糟透了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对他来说这是最坏的事情,是百分之百的坏,或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糟透了,是一种灭顶之灾。艾利斯指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信念,因为对任何一件事情来说,都可能比之更坏的情形发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糟透了。当一个人认为遇到了

百分之百糟糕的事情时,他就是自己把自己引向了极端的负的不良情绪状态之中了。糟糕至极常常与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及对自己周围环境的绝对化要求相联系而出现,即在人们的绝对化要求中认为的“必须”和“应该”的事物并未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发生时,他们就会感到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无法忍受这样的情景,他们的想法就会走向极端,就会认为事情已经糟到极点了。这是强迫症、抑郁症等神经症发生的根源。

在人们的非理性信念中,往往都可以找到上述3种特征。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会具有不合理的思维与信念,而那些具有严重情绪障碍的人,具有这种不合理思维的倾向更为明显。

三、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1. 基本步骤。理性情绪治疗即以理性代替非理性,帮助来访者以合理的思维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维方式,以合理的信念代替不合理的信念,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合理的信念给他们的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以改变认知为主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来访者减少、消除他们已有的情绪障碍。治疗共分4步:第一步可以直接或间接向来访者介绍ABC理论的基本原理,使来访者了解其思维方式、所持信念是不合理的;第二步要使来访者明白其情绪困扰之所以延续至今,不是由于早年生活的影响,而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非理性信念导致,他们应对此负责;第三步是通过以与非理性信念辩论的方法为主的治疗技术,帮助来访者认清其信念的不合理性,进而放弃这些非理性的信念,帮助来访者产生某种认知层次的改变,这是治疗中最重要的一环;第四步不仅要帮助来访者认清并放弃某些特定的非理性信念,而且要从改变他们常见的非理性信念入手,帮助他们学会以合理的思维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维方式。^[6]这4个步骤一旦完成,不合理信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情绪困扰乃至障碍就会消除。来访者将会以较为合理的思维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维方式,从而较少受到非理性信念的困扰。

综上所述,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整体模型即可以成为ABCDE理论,即:A(Activating events)——诱发事件;B(Beliefs)——由诱发事件A所引起的对该事件所持的信念、解释和评价;C(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情绪和行为的后果;D(Disputing irrational beliefs)——与非理性的信念辩论;E(new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通过治疗达到新的情绪及行为的治疗效果。

2. 基本方法。由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是一种认知行为疗法,所以基本方法包括认知改变技术、情绪改变技术、行为矫正技术。^{[7] P.240}认知改变技术主要处理当事人生活中那些完美化和绝对化的“应该”信念。重点放在事件的糟糕程度与当事人想象的糟糕程度之间的精确区分。与非理性信念辩论是认知改变技术的核心,辩论的方法有解说、苏格拉底式辩论、幽默、创造性的说服、自我暴露等。情绪改变技术重点是关注“价值偏好”与“必须”信念之间的区分,

使当事人能够做到心理上的分化。治疗师可以通过想象消极事件、体验预期事件、标签法、角色扮演等方法达到目标。行为矫正技术需要各种操作条件反射,使当事人改变其不恰当行为,强化其适应行为,而且要改变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家庭作业、满灌疗法、惩罚、练习并强化积极的认知等是有效的策略。

四、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简单评价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断定真正干扰来访者的问题并不是客观的事件,而是他们对于事件的信念。该观点导致心理治疗强调人格理论中的认知方面,并利用情感和行为的成分来改变认知。其哲学假设是理性的人本主义和负责的享乐主义,重点强调个人能克服非理性信念并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运用理智指导生活,减少非理性信念的干扰。理性情绪行为疗法不太注重治疗关系,因此当事人是否能够真正接受治疗师的批评、解释和建议,是一个要害的问题。同时是否可以经由单纯的认知说服来完成情感的改变,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误用简单化的模式来处理异常复杂的心理问题,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更大。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强调认知,所以对于认知能力有缺陷的人是没有有效用的。

五、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浅显易懂,适合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尤其对于受过较多逻辑思维训练的人比较适合,比如大学生领悟能力强,正好适合运用此疗法。中国是一个较重现实,重理性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讲理说理的特点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精神基本符合。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在处理诸如爱情、婚姻、家庭、学习、工作、人际关系等方面由现实可辨的现实事件引发的心理困扰上,更显得有用武之地,而这也正是人们的主要心理困扰。下面,我们就具体谈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观点与方法。

1. 从艾利斯对人性的看法中,我们可以得知人既有理性也有非理性的时候,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总是处于理性当中,遇到事要提醒自己理性面对,思维借助于语言而进行,不断用内化语言重复某种非理性的信念就会导致无法排解的情绪困扰。所以尽量不要给自己消极的语言,比如“我很笨”等,这些语言会内化,对人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反,尽量用一些积极的话语鼓励自己,让这些积极的内化语言产生正面影响。再者,就是要相信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观念、情绪和行为。

2. 从ABC理论中,我们应该学会自己分析一个情境中的A、B、C分别是什么,分析出自己的非理性信念B,接着试图改变这种非理性信念,建立理性信念。每当情绪有大的波动时,可以拿出笔来认真写出A、B、C,这样会更好地认识自己的非理性信念,同时养成分析事件原因的习惯,时间久了,不用笔写,就可以在脑中想出自己的非理性信念,从而迅速做出纠正。

3. 非理性信念及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非理性信念,这3类非理性信念——绝对化要求、过分概括化以及糟糕至极都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出现的非理性信念,有意识地注意这些非理性信念,一旦出现,马上利用各种方法予以更正,将有利于情绪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4.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治疗步骤虽然是针对治疗师而言的,但是日常生活中的我们也是自己的治疗师,当陷于一种情境,产生某种反应时,要学着ABCDE的步骤去改变自己的非理性,建立新的适宜的理性情绪。第一步,了解非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基本理论;第二步,明白情绪困扰是由自己的非理性信念造成的;第三步,通过与非理性信念辩论,驳倒自己的非理性信念,或者寻求他人意见,从非理性信念中跳出来;第四步,试着让自己以理性信念思考与看待问题,从而消除不良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使用这4个步骤,就会有驾轻就熟感,从容地处理各种情绪问题。

5. 从理性情绪疗法的基本方法中,我们也可以学会一些与自己的非理性信念辩论的方法,比如解说、创造性地说服等。同时,情绪改变技术中的想象消极事件、体验预期事件、标签法、角色扮演等,以及行为改变技术中的家庭作业、惩罚、满灌疗法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合理恰当地加以使用。

6.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同时,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并非适用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有些情绪问题来源于我们的非理性信念,而有些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所以要先学会加以识别。其次,是否可以经由单纯的认知说服来完成情感的改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经由单纯的认知说服达不到情感的改变,那么我们可以借助其他心理治疗流派中的方法来解决。

[参考文献]

- [1]段兴华,张星杰,侯再芳.理性情绪疗法的理论及应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 [2]Ellis, A.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Today[M]. New York: Lyle Stuart, 1999.
- [3]杨广学.心理治疗体系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4]Elliott, A., Bernard, M. E.. What is Rational - Emotive Therapy (RET)? [A].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ational - Emotive Therapy [C].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 [5]曾延风.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理论分析及其对大学生抑郁情绪调控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 [6]尹秀艳.理性情绪疗法是解决大学生心理困扰的有效方法[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5(1).
- [7]钱铭怡.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刘敏慧)

学生增权: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新路径*

张 杰^{1 2}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6; 2.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与教师相比,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处于相对失权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能力的缺失,还体现在权力感的缺失并由此引发对自我的负向评价和“无力感”。通过增权,可以提高学生对自我的评价和能力的获得,从而增加学习效能。学生增权有12项操作化路径。

[关键词] 学生增权; 失权; 课堂教学情境; 操作化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42-03

课堂教学中主要的关系是师生关系,相对于教师而言,学生是处于缺少权能(power)的群体。笔者认为对于高校课堂教学改革而言,在给教师增权的同时,如何给学生增权,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拟从学生增权的视角,对于高校课堂教学改革作一全新的探讨。

一、增权与学生增权

增权与“权力”“失权”密切相关。权力是增权理论的基础概念,对增权的理解以对权力的界定为前提。从能力的角度来说,权力是其拥有者获取某种社会资源的能力。权力(power)作为个人或群体拥有的能力,是个人或群体对外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强调的是人们对他人、组织或社会的拥有、控制和影响。这种能力可以从个人、社会和政治3个方面来概括,个人权力就是得到某人需要的东西的能力,社会权力是影响其他人如何思考、感受、行动或信任的能力,政治权力是在社会系统如家庭、组织、社区和社会中影响资源分配的能力。^[1]权力作为人们所拥有的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正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福祉感及重要感。^[2]权力包括信息权力、心理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等。

无权是与权力相对的。如果说权力是指上述各种能力,那么无权就是没有或缺乏这些能力。无权同样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会内化为无权感。无权感会导致相对弱势的群体产生结构性依赖,无权的原因是权力被削弱或被剥夺,即失权。失权往往发生在文化层面、制度层面、社区层面和组织层面。对社会弱势群体而言,社会强势群体、社会政策、主流社会文化等都有可能使他们失权。^[3]

增权是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指的是充实或提升个人或群体的权力或权能的过程。通过增权,个人或群体提高了独立应对和处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增权往往涉及增权主体和增权受体两个方面。增权主体往往是握有资源的组织或机构,如国家或社会福利机构。增权受体往往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处于无权或削权状态的个人或群体,如老年人、妇女、残疾人、病人、穷人、失业者以及其他边缘群体。^[4]

从增权理论可以看出,增权的结果是使相对无权的个体和群体获得能力,这同时包括对权力感的增权。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无疑是处于相对无权地位的群体,通过增权可以提升学生群体的自我肯定和自尊感,从而导致其在学习能力上的提高。但是目前对于增权的研究大都处于对增权受体的研究,受社会工作学的影响,大都按照社工介入的路径去思考增权,对于增权主体往往假定为国家或者社工专业人员,而忽略了其他主体的可能性。在教育学内部,也往往把权力视作正式的科层制组织中的权力结构,往往聚焦于学校的行政组织。在这样的视角下,教师当然成为增权的对象而不是增权的主体。

从福柯的视角来看,权力本身是一套微观的运作技术,它无处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规训空间中。学校与教室,从福柯的意义来看,就是一个规训的空间,是一个权力运作的空间。如果把教室空间看作是一种权力空间的话,无疑教师是处于掌握权力的一方,而学生则处于失权和无权的一方。可见,将学生视为增权的对象,在课堂教学的情境下,是可行的。

*[收稿日期] 2008-07-12

[作者简介] 张杰(1975-),男,江苏扬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二、课堂教学情境下学生增权理念的引入

1. 课堂教学情景中学生无权感的形成因素。具体到课堂教学的情境,对于学生而言,权力具体表现为各种能力,一是个人的层次,即获得自己所需要东西的能力;二是人际的层次,即与他人合作和影响他人思考、行动的能力;三是社会环境的层次,即影响资源在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权能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能感,正是这种权能感可以促进人们的自我观念、自尊、尊严感及重要感。无权是和权能相对的。无权首先表现为权能的缺失,即个体缺乏获得自己需要、与他人合作、影响他人思考和行动及影响资源在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其次表现为无权感,即心理上的无力感、无助感、疏离感、失去自控感。

对于课堂教学情境而言,学生无权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个内化过程。当学生感到无权时,他们会把这种感觉内化并因而指责和贬低自己,形成一种无权感。造成无权感的原因有3个方面:一是本人的负向自我评价,是本人对自身能力的不正确认识造成的;二是人与社会环境间互动的负向经验,如受到过羞辱、不公平对待等;三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如资源分配不均、歧视等。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处于无权的状况。教师的单向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对自我的不正确认知: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必须依赖老师的讲授才能学习。由于在单向传播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是频次较低的,往往教师会有意无意地将互动局限在有限的学生中。其他学生就在互动中感受到了老师传递的信息:我们是缺乏能力的,老师不愿意和我们互动。如果把教师和学生的互动看作是课堂教学中教师掌握的资源的话,绝大多数学生都会感到这种资源的分布是严重不均的。所以,目前高校课堂教学的现状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从个人层面会产生对自我的不正确评价,从互动层面会感觉到不公平对待,从环境层面来看会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均,从而使得学生在高校课堂教学中产生无权感。

笔者认为课堂教学目标的实现不仅仅在于教师的讲授,更多在于学生的接受。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无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权力感的获得以及自我肯定。一个处于无权状态的学生对自我的肯定是不够的,从而会影响到他的学习效果。

2. 课堂教学情境中的学生增权方式。在传统课堂情境下,学生普遍处于无权的状况。要想改变学生失权的状况,必须给学生增权。增权是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最终目的是使个人能够采取行动来解决自身问题和改善现状。

通过上述对失权3个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学生增权也应通过3个层面实现:一是学生个人层面的增权,发展一个更加积极的更有影响力的自我意识;二是学生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对他人即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三是学生社会层面的增权,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有

正确的认识,能够适应和利用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权能存在于学生之中,而不是学生之外,教师并不拥有可以“赋予”学生的权能,增权并不是教师“赋予”学生权能,而是挖掘或激发学生的潜能。

从个人层面来看,在课堂教学情境中,学生增权主要体现在通过对其自我认知和评价的改变来达到增权的目的。在课堂教学情景中,学生由于拥有的专业知识可能产生4种基本态度:第一种是自信,就大学教学而言,只有当学生意识到自己拥有充分的知识时,才能表现出相当的“自信”;第二种是意外,表示学生发现自己实际知道的比自以为知道的要多;第三种是焦虑,指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第四种是喜悦,指学生缺乏足够的知识而不自知,盲目乐观。^[5]

学生增权从学生个人层面来看首先要让学生对自己拥有的专业能力有个清醒的评估和认识。学生增权将有助于他们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专业能力、个人潜能及其他个体“人”的因素)有更清晰的认识。这样,如果是目前而言已经拥有充分知识而不自知的学生,就可能经由“学生增权”的过程从“意外”上升为“自信”,这种自信程度的增加过程就是学生增权的过程,而赋权感的增加无疑会对学生发展产生良好的反作用,激励学生利用个人拥有的知识,充满信心地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如果是盲目乐观的学生,则会因对自己的重新认识而产生“焦虑”,而一旦产生这种焦虑意识,也就为这类学生提供了一个“觉悟到必须改变的切入点”,从而促使他们发生改变,赋权感也在这种转向的改变过程中不断增加。具体而言,当学生意识到需要改变以后,便会主动参加各种专业培训或以其他方式寻求和充实知识,进而将新知识在课堂教学中加以应用,促使学生行为、观念等方面发生变化。如此周而复始,产生一个螺旋上升的不断追求变革的循环系统,其结果必然呈现出学生不断向前向上发展的良好态势。

从互动层面来看,具体到课堂教学的情境,让学生增权,可以从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两个层面着手,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在目前的高校课堂教学实践中,参与式教学突出地体现在一些研讨性课程中。然而,目前研讨课程有很多缺陷。研讨课程的目标设定并没有学生的参与,其结果比较单一,一般以得出老师想要的结论为终点。这种有限参与的课堂模式并不是对学生的增权。要想在课堂教学中真正对学生进行增权,就要让学生参与到课堂决策中来。课堂决策首先要让学生参与具体课堂目标的设计,让学生在参与课堂目标设计的过程中感受到自身的权力。

然而参与课堂目标设计的过程并非学生增权的全部内涵。从互动层面来看,外部权力与内部权力均为学生增权之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元素,仅仅让学生拥有参与课堂目标设计这样的外部权力还不够,因为学生可能是在缺乏自我动机、专业责任和判断的情况下参与课堂决策,所以需要发展学生的内部权力,展示其专业责任和判断能力。具体而言,“学生赋权增能”就是指通过先决性地相信和承认学

生具有必要的专业能量,相信他们能通过学习有关技能实现自我发展,同时通过为学生提供参与管理的空间,在制定直接影响他们的政策时,让他们充分发表想法与见解,并尽可能地予以考虑与采纳,以达到减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出现的“无力感”的目的。研究表明,具有赋权感的学生能有效地处理其情绪、技能、知识和资源,从而胜任课堂学习并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加强自尊。而在角色调整方面,学生赋权增能的过程能提高学生社会角色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其对学生身份的理解,从而能有效消除以往出现的学生因对自己的角色模糊不清而对其学习产生的消极影响。

总之,当学生感到他们在课堂教学中拥有或能够创造机会,认识到他们自身拥有的专业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付诸行动、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时,他们就增权了。不难看出,学生增权对于促进学生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课堂教学情景中学生增权的具体操作途径

1. 建立一贯的目标。在教学计划中,所有资源的运用必须以学生的能力发展为目标。每一项教育资源计划必须受到严格的考核,剔除对学生发展没有帮助者。同时对能力发展的计划应该优先配置资源。例如召开研讨会、教学实践等。

2. 接纳新理念。学生增权理论是课堂教学中的一种新思考方向,强调必须让学生自己增权。教师起到的是唤起学生权能感的功能。这就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应该注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推导书上的理论,更多采用 seminar 的形式,注重沟通与交流,而不是教师的信息单向传播。

3. 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教学愿景,让学生参与课堂目标的设计。让学生参与到课堂目标的设定中来,加强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权力合作,而学生也在此过程中获得赋权感。

4. 从学生个人层面唤起学生的权力感。让学生对自身的专业学习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态度的转变和对自我评价的转变。

5. 从互动层面让大多数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多种形式,例如小组竞争、情境模拟等,塑造学生解决问题、建立团队、合作与决策的能力。

6. 教师授权。包括教师应该调整角色和领导方式,授权给学生,多采用参与决定,鼓励成员自我管理。

7. 消除恐惧。教师有责任将恐惧从课堂情境中除去。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不断激励学生向自己发问,甚至可以就某一问题采用头脑风暴法,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提供答案,鼓励他们提供不成熟的意见,让他们知道,能够提出主张本身要比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有意义得多。

8. 营造信任分享的课堂文化。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信任,这种信任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更是一种对增权理念的制度性信任。只有建立

起这种信任分享的课堂文化,才能使得学生产生增权感。

9. 消除数字目标、限额,以及工作标准。如果教师一味地追求学生考试分数,量化考分标准,那么他对于学生是否真正学到知识获得能力,是否增权,将无从得知的。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老北大的做法。

10. 去除伤害学习自尊的障碍。学生若能感受到达成高效能的满足感,课堂中就会全心投入,有效实现增权。为此,教师本身就得避免使学生学习上遭受到不愉快,要注意教学过程中良性、开放、互动气氛的培养。

11. 建立具有活力的教育与自我改善计划。教师必须以身作则,以终身学习和持续不断改善的精神成为学生的典范。在课堂教学中以身作则,通过自身认知结构、价值观的不断持续更新来说服学生提高自身的能力。同时为了有效地对学生增权,可以采用“戴明圈”(或称质量圈)的做法,由8-10位学生定期碰头,讨论他们遇到的学习问题,调查问题出现的原因,推荐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予以评估。^{[6] P. 381}

12. 以结构化的管理完成改造。学生增权其实是一个教师与学生互动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感知到,提高自身权能的主导因素在于自身与他人包括教师的互动,从而明确了自身互动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自身的权能获得提高。在这个团队中,固然有先行者与追随者之分,但重要的在于,必须让追随者知道自身对于团队、对于目标的实现同样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在教学中避免出现少数学生学得好、紧密地与教师互动,绝大多数学生被抛离这个团体,对于学习目标的实现漠不关心的情况。

在将学生增权理念按照上述原则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学生增权的理念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学生自我更新的过程。只有学生对自身的能力与责任有高度的信心,对专业学习有行动的热忱,有持续性的努力,找回专业能力、专业尊严以及自我反思,才能真正实现学生增权。

[参考文献]

- [1] 范斌. 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J]. 学术研究, 2004 (12).
- [2] 陈树强. 增权: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 社会学研究, 2003(5).
- [3] 周林刚. 激发权能理论: 一个文献的综述[J]. 深圳大学学报, 2005(6).
- [4] 汪宁. 消费者增权还是消费者去权: 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型转型的重新审视[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6).
- [5] 操太圣. 院校协作脉络下的教师专业发展: 赋权与规训的争拗[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6).
- [6] 美[Stephen. P. Robbins. 管理学(第四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刘敏慧)

高等教育中创新型人才培养差异的认识与思考*

赵倩 吕林海

(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教师对创新人才的内涵、探索性都有基本的认识与了解,但观念上的差异及认识上的局限性还是客观存在的。教师对高校是否关注创新型人才培养总体持悲观态度。正确理解创新型人才的内涵、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适切方法、培育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环境,是深化、拓展高等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创新型人才培养; 差异; 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45-03

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如何通过课程的设置与教学的实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需要我们首先思考如下现实,即:高校(特别是高校中的教师)如何看待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如何理解创新型人才的基本内涵?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实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对现状的调查、分析与思考有助于我们今后的工作更具针对性与指向,以提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基于此,笔者选择了江苏省3所高校共100多名教师作为样本进行调研。这3所高校分别是:南京大学——研究1型大学、东南大学——研究2型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学型大学。这样的样本选择既满足了类型上的全面性,也体现了层次上的递阶性,从而有助于我们从共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对高等教育中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解读。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的是分层抽样方法,发放问卷共120份,回收113份,有效问卷111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8.23%。各校分别发放问卷4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南京大学34份,东南大学39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38份。从调查的结果看,问卷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10类专业,分散度较大,从而使问卷调查的结果具备较高的信度。

一、差异分析

1. 创新型人才培养认识差异。

表1 创新型人才培养实施的必要性(%)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应当	不应当	无所谓	应当	不应当	无所谓	应当	不应当	无所谓
100	0.00	0.00	98.62	0.17	1.21	70.58	13.16	16.26

在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否具有必要性这一问题上,3所高校教师的回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见表1)。两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普遍持赞同态度,南京大学更是达到了100%的教师认同度,这反映出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与上述两所研究型大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赞成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师只有七成,甚至有一成多的教师反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其中,持反对态度的教师无一例外地把反对的理由归结为“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知识,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才是具备创新能力”。这种认识令人深思。实际上,在大学教育阶段,创新教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大学教育就是为未来创新人才打下坚实根基的教育。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无论处于何种教育阶段,至少都不能忽视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早在20世纪初,弗莱克斯纳就提出大学教育应培养社会的精英,使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探究问题的兴趣、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推进各种具体事务的能力,并使这些人才拥有创新的信心与能力。^[1]事隔一个世纪的今天,在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认识上各个高校竟然还没有达成观念与思想的一致,这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提升整个高等教育质量颇为不利。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资助课题“基于学习创新的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项目编号:JC-a/2008/02/005)。

[收稿日期]2008-10-12

[作者简介]赵倩(1983-),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硕士生。

吕林海(1977-),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讲师。

表 2 创新型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

	博、专结合的知识基础	以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特征的智力 and 能力	以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为中心的自由发展的个性	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崇高的献身精神	国际视野和竞争意识	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	其他
南京大学	88.24	94.12	85.29	70.59	55.88	50.00	8.82
东南大学	43.59	89.74	66.67	61.54	56.41	61.54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78.95	94.74	73.68	63.16	78.95	68.42	0
平均比例	69.37	92.79	74.77	64.86	63.96	60.36	0.08

总体来说,大学教师普遍认为创新型人才应具备复合的、多元的基本素质,但对各项素质的认知存在差异。这些基本素质中,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最被看重,其次是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国际视野、竞争意识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被相对忽视。这反映出教师们更关注能产生直接效果的创新素质,而对影响创新绩效的其他因素没有给予充分的强调。不同高校的教师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南京大学有接近 90% 的教师认为博、专结合的知识基础是创新型人才的必备素质,而东南大学持此观点的教师只有 43.59%;南京大学教师比较重视自由发展的个性,而东南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教师对此的认识则略显不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重视“竞争意识和国际视野”以及“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这两项素质的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两所高校。当然,从总体来说,各个高校对构成创新人才的上述基本素质大都持认同态度,这也说明,教师们对创新人才的内涵复杂性都有基本的认识与了解,但观念上的差异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还是客观存在着。

2. 创新型人才培养现状的差异。

表 3 “当前的大学教学是否是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认识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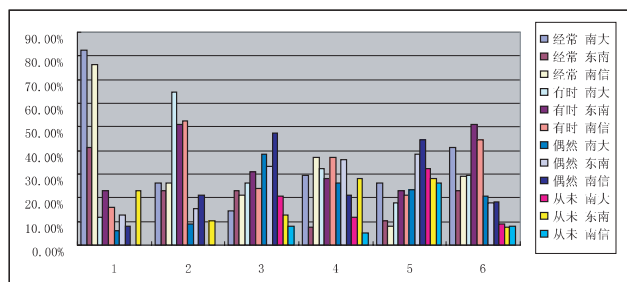
	完全是	基本是	一般	基本不是	根本不是
南大	0.00	2.94	29.41	61.76	5.88
东大	5.13	30.77	35.90	28.21	0.00
南信	0.00	13.16	36.84	50.00	0.00
平均	1.71	15.62	34.05	46.66	1.96

表 3 反映了各个高校对当前创新型人才培养现状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前面的数据分析表明,绝大多数教师对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持支持态度。但现状如何呢?表 3 的数据表明,东南大学对当前情况最为乐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次之,南京大学的态最悲观。总体来看,教师对高校当前是否关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总体态度基本上是偏向悲观的。应当说,这一统计结果值得当前高等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加以认真关注、反思与研究。

调查结果还反映出一个人引人注意的情况,即同为研究型大学的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

差?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南京大学的教师对创新人才培养非常赞同(前文的统计已经表明),并对创新人才培养有着很高的期望值,这无疑会使南京大学的教师对现实的大学教学存在不满之心态;二是南京大学本身是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其基本定位就是培养未来高素质的承担重大创新重任的人才,因此,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在肩无疑也会促使南京大学的教师对现实的教学实践有诸多挑剔的眼光与希望的空间。

综上所述,现实教育情境中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现状并不令人乐观,问题出在哪里?笔者认为应结合各校采取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考虑。



注:1、2、3、4、5、6 分别表示:“教师面对面讲授”、“课堂讨论”、“小组合作学习”、“案例教学”、“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引导学生利用互联网学习与研究”。

图 1 教学方式、方法差异对比

如图 1 反映,教师面对面讲授依然是最常用的教学方式。3 所高校在课堂讨论、小组合作学习方面差异不大,采用的频率都不是很高,这可能和课时量有限、学生掌握的知识面不够宽、理解不够深入有关。南京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采用案例教学法的频率明显多于东南大学。南京大学为学生提供了相对更多的参与课题研究的机会,教师也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但问卷调查显示,尽管学生有更多的课题研究机会,有更多的主动研究性学习机会,但研究活动疏于管理、流于形式、研究效率低下等原因仍然广泛存在。由此可见,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简单、教学过程低效,仍然是困扰大学教学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

此次调查不仅反映了高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

的问题,也为高教管理部门在进行创新型人才培养管理决策方面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开放性问题上的回答显示,课程设置不够灵活、课程设置上理论与实践脱节、对教师的考核办法不够合理是当前阻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今后改进的重点。

二、思考与建议

本次调查的结果促使笔者对如下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思考与展望,当然,笔者在此希望通过本文的调查分析与建议引发高等教育界对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的重视,并通过更多的思考与研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通过本次问卷调查我们首先可以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创新型人才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各个素质是否有重要性上的差异?不同大学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否应在素质类型上有着不同的侧重?事实上,学界普遍认为:“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2](P.2)}由此,无论何种人才,都必须得是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提法,是对人才基本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学术界对创新型人才的素质构成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创新型人才不仅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还得具备创新人格这一素质。具体来说,创新精神即对创新活动有执着追求,对创新行为有满腔热情。创新能力是指能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能动思维活动,产生出满足某种需求的、新颖的有形或无形的产品,达成预定的目的和任务。创新人格即坚持不懈的毅力、平和乐观的心态、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善于创新的品格。^{[3](P.7)}因此,调查问卷中设置的各选项显然都应归属于创新素质。而调查结果明显反映出教师对创新型人才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这势必会影响高校落实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效果。诚然,创新能力是实现创新成果的最直接动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格也极大促进了创新活动,它们是创新实践与创新活动的重要保证。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努力营造丰富的教学环境以支持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格的互动,促进创新型人才快速、健康成长。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对学生的创新素质要求都应该是全面的,都应该在知识、能力、精神、品格等方面铸就创新型人才的完满内涵。

培养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明确目标,但依然有相当比例的教师抱着无所谓甚至反对的态度,而且,创新型教学在高校教育实践中的现状也颇不乐观。这些问题在教学型大学尤为严重。缘何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影响。

教育所应具备的经济价值功能和社会价值功能,在只讲究经济效益、排斥一切非经济衡量评判标准的市场经济环境影响下越发凸显出来,削弱甚至取代了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教育功能、培养功能。由此,功利心态与实用取向造成了学生教育中的“重应用轻基础、重技能轻素质、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遮蔽了对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长远目标的重要性的应有关注。(2)落后的教学模式束缚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目前,由于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师生比少等客观原因,我国高等学校仍然过多采用以传授知识、重视记忆为特征的传统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在传授知识的效率方面颇具优势,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却是明显不够的。当然,教师在传统教学模式中的精力投入相比较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中的精力投入要少很多,这也是教师对教学改革热情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3)专业和课程设置影响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我国当前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且相对独立,彼此缺乏联系,从而造成学生的知识面窄、知识整合度不高,这极大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4对学生转专业的管理不够人性化。一般学校虽然允许学生转专业,但名额非常有限,并且要求欲转专业学生的成绩名列前茅,这无疑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动力。(5)对选修课程重视不够,难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质。目前,高校教学计划上课程一般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程和跨院系选修课程,跨院系选修课所占比重非常小,专业选修课也大都由教师根据专业特点做了安排,基本上无法给予学生完全自由的选课权利。

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要为培养创新型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这不仅要求教育机构硬件保障的支持,如提高师生比、提供学生进行创新活动所需的设施等等,更要协助教师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从被动执行转为主动参与,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改变当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不利状况,将高校教育质量和水平提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 考 文 献]

- [1] 刘宝存. 美国大学的创新人才培养与本科生科研[J]. 外国教育研究, 2005(12).
- [2] 汪通讯. 人才学通论(第二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3] 张玉蓉. 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之研究[D].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1.
- [4] 刘楚佳. 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改革探讨[J]. 高等理科教育, 2007(4).

(责任编辑 师 语)

创新“两课”教师的必然选择*

范冬云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创新是“两课”教师维护生存权的必然选择。“两课”教师必须融合“创新意识、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实践”四位一体,才能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两课”创新,完成“两课”课改任务,最终赢得生存的价值。

[关键词] “两课”教师; 生存危机; 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48-03

一、“两课”教师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我国高校“两课”教师正面临这样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肯定“两课”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赋予了“两课”教师极高的生存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学校及学生对“两课”普遍抱有轻视、忽视的态度,导致“两课”教师价值感极低。当前我国“两课”教师正面临着事实上的危机与挑战。

1. 社会认可的式微与自我认同的弱化。“两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既是培养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教育平台,也是传播主导意识形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政治平台。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中出现种种不利于“两课”教学的思潮;“两课”这一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及注重“价值理性”的课程常常被公众轻视与忽视,被界定为“过时的”意识形态教育课程,由此带来的对“两课”教师的职业歧视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蔓延开来。社会对“两课”教师的价值认可与回报都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两课”教师普遍呈现出自我认同的弱化态势。由孙蚌珠教授主持的“普通高校‘两课’青年教师(45岁以下)队伍状况研究”课题调研表明,高校“两课”青年教师“自我感觉的职业社会评价比较低”;“对职业的社会感觉并不好”,“有7.9%的人在寻找机会,想早点离开”。对“您是否坦率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两课’教师”这一问题,11.2%的人回答不能,26.4%的人视情况而定。^[1]

2. 学校中不受重视与生存压力的加大。由于当前高校大学理念的模糊,在教育思想和人才界定上,“德”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一些高校领导对“两课”的重视很不够。

“两课”经费不到位、课时无保障、大班上课、获得科研项目比较难等已成高校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两课”教学岗位更被一些高校领导视为可有可无、人人能胜任的“打杂工”岗位。一些高校“两课”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其他专业课老师都可以兼上,导致专职“两课”教师的尊严和价值感受到极大挫伤,也带来专业课教师及学生对“两课”教师的轻视。有调查证实了当前高校“两课”青年教师普遍处于“工作量比较大”、“进修提高机会比较少”的状态。“在与学校同行中专业课老师的受尊重程度方面,83.9%的人觉得被轻视,在学生对自己与对专业课老师的尊重程度上,65.5%的人觉得被轻视,在社会对自己与对专业课老师的尊重程度上,89.2%的人认为有些被轻视。”^[1]

“两课”教师同时面临教学问题的近忧和工作前途问题的远虑:一方面,在经费不到位、课时无保障、大班上课、工作量大的情况下,“两课”教师很难开展教学创新来增强“两课”的生动性、实效性;另一方面,“两课”教师被轻视的处境给其带来了生存上的压力。一些高校给予“两课”教师的工资水平、职称晋升机会及科研经费的配备都比专业课教师差。“两课”教师为了生存和工作前途着想,不得不考虑转岗,最终造成高校“两课”教师队伍不稳、专职人员流失严重的现状。

3. 课堂上的独角戏和学生的厌学。如果说来自社会、学校的轻视,只是间接打击了“两课”教师的自我认同的话,那么来自课堂中教育对象对“两课”的轻视与厌倦,则瓦解了教师最宝贵的师道尊严。当前社会中用人单位在人才评价、人才招聘等方面明显有重才轻德倾向。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及就业的功利性考虑,“两课”往往被大学生认为是无用的。加上由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内容大同小异,

*[收稿日期] 2008-08-17

[作者简介] 范冬云(1980-),女,江苏丹阳人,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教师。

对喜欢新鲜事物的“80后”大学生来说,“两课”就显得枯燥乏味、毫无吸引力。此外,“两课”传统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也加剧了学生的反感。“两课”教材内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与现实脱节、语言枯燥、政治色彩过浓等问题,传统的教学方法又往往注重灌输,互动不够,过分强调理论化,严谨有余,生动活泼不足,联系实际不够。教学手段单一,使得“两课”既不实用,又不生动。学生因此更加厌学,形成“‘两课’教学的恶性循环”^[2]。“两课”教师不得不演着独角戏,课堂上逃课现象严重,留在课堂上的学生也大多做着与本课无关的事。“两课”课堂上学生睡觉、聊天、发短信、看杂志报纸或读专业书成司空见惯的现象。长期面对这样的课堂,“两课”教师心情沮丧、身心俱疲。

二、创新是“两课”教师的必然选择

“两课”及“两课”教师如何才能走出困境?积极主动进行创新是关键。

1.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要求,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创新是人类本质的最高表现。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就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未来迫切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两课”作为致力于培养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构筑人的精神支柱,发掘人的创造潜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实现此目的的前提是“两课”教师要进行创新教育,树立起全新的教育理念,创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身体力行地影响学生,培育其创新思想,最终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艰巨任务。

2. 创新是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是应对教育对象变化的需要。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裹挟着思想的多元化而来,市场经济带来公平、竞争意识的同时裹挟着拜金主义、理想失落而来,传统的“两课”教育失去针对性、实效性。面对如此新形势、新情况,“两课”教师必须与时俱进地开展“两课”教育,坚持和发展适应当今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

教育对象的新特点呼唤“两课”教师的创新。当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活跃、喜欢接受新鲜事物、视野开阔、个性突出、独立思考能力强,对“两课”传统呆板的教学内容和强制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普遍反感。“两课”教师只有致力于创新,改变传统“两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才能赢得学生的喜爱和尊重。

3. 创新是新一轮“两课”课改成功的关键因素。1985年以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两课”课程体系设置经历了几次较大调整和改革,分别包括“85方案”“98方案”“06方案”。最新的“06方案”更是改变了“98方案”以来的分学科设立课程的方式,进行了学科合并,将相对分散的内容整合为四门新课程。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整合对教师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教师优化知识结构、冲破原课程的思维模式或思维定势以适

应新课程,而且要求教师坚持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两课”的实效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新时期“两课”教学提出众多要求,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等,这其中无不蕴含着“创新”要求。“两课”教师必须根据“两课”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来更新教育观念,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做“两课”创新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4. 创新是“两课”教师获得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两课”及“两课”教师在社会、学校及学生中面临的生存挑战,也决定了“两课”教师必须要创新。只有创新,“两课”以及“两课”教师才能摆脱固有的、僵硬的、不受欢迎的形象,才可能赢得自身生存的尊严。对“两课”教师而言,创新是一个改变形象的机会。

三、“两课”教师要融“创新意识、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实践”四位一体

“两课”教师要如何创新?近些年学术研究从理念、内容、形式、机制、手段、载体和方法等各个角度进行过探讨,强调如何与时俱进、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的文章也不少,然而教学实践中的“两课”创新效果始终不理想。撇除其它客观因素,一线“两课”教师未能具备“创新意识、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实践”四位一体,是理论成果无法有效转化到教学实践中的关键因素。“两课”创新要突破瓶颈,“两课”教师要摆脱生存困境,关键要从以下4个方面下工夫:

1. 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精神。创新意识是教师开发自身创新能力的前提,是发明创造必须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开拓进取的强烈意识和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任何一种创新,包括“两课”创新,其过程都必然是艰难曲折的,需要创新者具有敢为人先、敢于突破传统、超越权威的勇气,具有坚持真理、敢想敢干的作风,绝不保守被动,落入“传统”的俗套。创新意识的有无除了与个体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有关外,与教师个人的人格因素也有重大关系。创新意识需要教师具有创新人格因素,包括科学精神、开放性思维和开拓型作风等。“两课”教师的创新意识由于其生存困境而呈现出两种极端:一种是为摆脱生存危机而被激发起强烈的创新冲动;另一种是由于生存危机导致“职业倦怠”^[3],工作热情降低,对前途没有任何信心,毫无创新冲动。当前“两课”教师普遍表现为后一种状态。可喜的是,目前在强化“两课”教师的创新意识上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即当前我国高校“两课”教师队伍正在进行新老交替,一大批学历高的青年教师加入到“两课”教师队伍中。这批人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理论功底比较扎实、知识面宽,特别富有朝气,创新意识较强。当前要利用这个重要的契机,带动、强化全体“两课”教师的创新意识和精神。学校也要通过教育管理与评价等手段,培养教师的创新教育意识,激发

教师的创新教育精神,努力形成一种推崇创新教育、追求创新教育的氛围和共识。

2. 加强创新理论知识及技巧知识的学习。创新知识指的是教师应具备的进行教育创新所必需的相关理论及技巧方面的知识及素养,它是教师开发自身创新能力的基础。创新不是拍拍脑袋就有的能力,作为对过往的继承与发展的能力,它只有在肥沃的“知识”土壤上才能生根发芽。“良好的创新知识体系,是创新者的基本特征之一。”^{[4] P.116}目前不少教师的知识结构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有欠缺。

“两课”教师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深厚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教师如果没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无法“吃透”思想政治教育课的精神实质,也就无法达到活学活用的境界,在教学过程中就难免照本宣科、生硬空洞,难以创新。

除专业知识外,“两课”教师创新还需要一些“相关重要素养”^[5],主要包括“人文与艺术素养”和“科研与教研素养”两大部分。“两课”是涉及主体的道德观念、价值伦理等诸多人文因素的课程,需要教师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养积淀,以对学生施以正确而有效的人文教育关怀。广义的艺术素养则在促进“教师审美能力的提高、想象力的形成、创新激情的产生和灵感的闪现”^[5]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教师的科研与教研素养也不可或缺,它是教师自身创新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教师在科研与教研活动中,进行创新探索,开展创新实践,积累创新经验,对其由“传统型”教师转为“创新型”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课”创新还需要必要的现代教育技巧性知识。现代教育的特征是主体性互动教育,是对“两课”传统“填鸭说教型”教学方式的重要革新,确立以师生互动性和学生主动性地位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观和掌握现代教育方式就成为每一位“两课”教师必备的创新素养。此外,“两课”教师还应当掌握教学设计、课堂管理等技能技巧,不仅懂得传授学生书本知识,更懂得教学生探究新知识和学习方法,不仅知道学生需要什么,还知道如何将这些东西以恰当的方式展现给学生。

3. 培育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教师进行教育创新所必需的相关能力。它是教师开展创新实践必须的内在能力要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创新教育之所以能渗透乃至贯穿到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与教师自身较强的创新能力是分不开的。教师创新能力缺乏,是当今我国教育中需要高度重视的一大问题,也是“两课”课改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根据现有理论成果总结,“两课”教师大致应具备以下创新能力:创新教学观念的能力;创新课程内容的能力;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转变教育模式的能力;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育教学氛围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创新考核方式的能力,等等。就目前“两课”仍然处于不受欢迎的状态来看,多数“两课”教师在这些方面的创新能力明

显不足。

“两课”教师创新能力的培育,除了需要学校的相应政策激励和培训外,关键还在于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受传统教育观念的长期影响,我国师范教育一直缺乏对师范学生进行有关创新理论的教学和实施创新教育能力的培养,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就难免缺乏在自身教育工作中进行创新教育的能力。因此,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当前培育包括“两课”在内的所有教师创新能力的关键。

4. 积极开展创新实践。创新实践是教师进行教育创新的创造性行为和活动。创新重在实践。将创新思想、创新观念转化为创新实践是“两课”创新的最后落脚点。停留在纸上的、嘴上的而落实不到行动上的“创新”对现状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反之,将理论上的创新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发展,才能使“两课”建设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摆脱“两课”及“两课”教师当前的生存困境。

然而,从创新理论、创新观念到创新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转化的问题。当前我国“两课”理论成果较多,却多数未能落实到实践。多数“两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表现保守,不能积极进行创新尝试,导致大量创新只能停留在纸上或思想中。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一线”“两课”教师要激发创新意识,加强创新知识的学习,培育创新能力,积极开展创新实践外,社会和学校也要做出相应的努力:一要消除“两课”教师开展教育创新实践的客观障碍。即从管理体制、评价机制、校园氛围、人际认同等多方面,给“两课”教师的创新实践以尝试的时间、机会与空间;二要调动“两课”教师开展创新教育实践的积极性。通过组织动员和制度激发等手段,将“两课”教师已有的生存压力有效地转化为开展创新实践的内驱力,促使教师积极开展创新实践。

总之,教师是“两课”创新的主体,是推动“两课”建设的主导者和实践者。“两课”教师的自身素质,直接关系到新一轮“两课”课改的成功与否。“两课”教师只有融“创新意识、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创新实践”四位一体,才能在教学实践中积极进行“两课”创新,完成“两课”课改的时代任务,最终赢得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孙蚌珠. 普通高校“两课”青年教师队伍状况分析[J]. 高校理论战线, 2002(12).
- [2] 穆晓睦. 高等学校“两课”教学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4(7).
- [3] 单玉. 高校“两课”教师职业倦怠现象分析及其对策[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04(2).
- [4] 肖云龙. 脱颖而出——创新教育论[M]. 湖南: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 [5] 范安平, 吴长庚. 试谈教师的创新教育能力[J]. 教育探索, 2008(2).

(责任编辑 光 翟)

略论大学生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转化*

孙彩霞 张传亮

(中国计量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大学校园中有较为多样的表现形式,对大学生自身、校园管理以及社会的影响巨大。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者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不遗余力地对大学生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予以教育转化。

[关键词] 大学生; 消费主义; 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51-03

当今社会,消费已经开始成为人们建构身份、重构自我和追求享乐的手段,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文化语义。在消费的社会文化语义不断扩大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并非出于生活的需要而是超出自身或家庭的能力承受限度进行无休止的商品购买、占有活动,以满足欲望。人们对消费目的的不断异化及对消费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大肆扭曲,促成了消费主义的滥觞。

一、作为价值观的消费主义

国外学者斯蒂恩斯认为,消费主义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把获取物品当作生活的目标,而这些物品的获取不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必需,也不是为了传统的展示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某种身份认同。^[1]这种观点指出了消费对于身份建构的意义,但没有进一步揭示消费行为的价值取向。国内学者黄平认为:“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2]中山大学的王宁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现代欲望形态。但是,欲望形态不经过系统化和理念化,难以成为一种“主义”,也难以内化并根植于人们价值观念的序列中。有学者是从价值观念与行为实践两个层面的结合来界定消费主义的,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崇尚和追求过度的占有和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实践。^[3]我们知道,行为实践必然要受到价值观念的支配、制约和指导,是在一定价值观念驱动下的产物,是价值观念的显性化。作为价值观的消费主义,相对于作为“行为实践”的消

费主义来说,具有本原的意义。

笔者是从生发机制上来认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消费主义是带有强烈目的性诉求的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基于以下机制:生产力不断发展带来了商品的相对剩余,为了使商品实现其价值,国家必需倡导人们去购买和消费商品,于是人们的消费欲望必然会被不断地刺激起来。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欲望,部分社会较高阶层开始释放他们的消费冲动。在社会模仿机制的作用下,较低阶层开始效法较高阶层的消费行为模式。在“较高阶层领先、示范,较低阶层追逐、效仿”^[4]的社会阶层间的模仿机制不断得到强化的条件下,消费逐步开始演化为身份或阶层认同的重要手段或自身的价值偏好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稳定的观念性的存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是人们欲望升级、对消费活动进行异化的逻辑结果和理念固化。

消费主义价值观产生以来,已经开始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蔓延,很多人开始接受消费主义价值观。有人认为,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中已经不同程度地存在消费主义倾向,其中,青年群组较其他年龄组的消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文化程度较高的群组比文化程度较低群组的消费主义倾向更明显。^[5]大学生作为大城市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群组,很难规避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二、大学生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表现形式

大学生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是通过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实践体现出来的。

1. 大学生的高消费与超前消费相互依存。

据2006年4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及相关监测机构

*[基金项目] 中国计量学院2008年度校级高教研究课题“大学生消费观教育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HEX2009816)。

[收稿日期] 2008-08-21

[作者简介] 孙彩霞(1973-),女,山东荣成人,中国计量学院光学与电子科技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助理研究员。

张传亮(1982-),男,河南固封人,中国计量学院政治学硕士,助教。

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每学期的人均消费支出高达 4819 元,这意味着大学生的年平均消费额已经超出了同期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8472.2 元)。^[6]大学生高消费的现状可见一斑。购买商业广告和媒体大肆宣传的品牌、品牌,成为大学生高消费的重要标识。“花今天的钱,圆明天的梦”是我们这个时代引导超前消费的口号,而表征超前消费行为的银行信用卡在大学生中逐步普及,已成为大学生日常支付的重要手段和超前消费的信用支持。从消费目的上看,大学生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往往不再是为了满足真实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体现其特定的身份或者品味,显现某种价值诉求,甚至仅仅是为了消费某些“符号”,为了消费而消费;“我消费,故我在”。

2. 大学生的炫耀性消费和攀比消费互动升级。

齐美尔认为,社会内部较低阶层不断模仿与追逐较高阶层的行爲模式,而较高阶层则通过不断抛弃旧有的行爲模式而发明更新的行爲模式来与较低阶层拉开距离,因此产生了一种“较高阶层领先、示范,较低阶层追逐、效仿”的社会阶层间的模仿机制。阶层间的模仿机制还会衍生阶层内和群体内的模仿机制。大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容易接受各种新的消费观念、消费行爲方式,为了获得社会领域内的某种认同或同学之间的某种人际认同,容易模仿社会较高阶层和其他同学的高消费行爲。大学生的炫耀性消费、攀比消费在社会模仿机制和群体模仿机制双重作用下不断升级,造成了当前大学校园中的奢侈风和攀比风。

3. 交际消费支出与恋爱消费支出并行增长。

现代大学生交际范围越来越广,请客吃饭成为大学生交际的手段之一,一顿饭少则五六十元,多达两三百元。作为纯消费者,大学生在请客吃饭上的大手大脚容易使自身养成“啃老”等不良习惯。除此之外,为了交际的方便,煲“电话粥”、通宵上网聊天的现象也越来越广泛,这无疑又增加了大学生的支出。“不在大学中恋爱,就在大学中变态”的口号越喊越响,谈恋爱似乎已成为一门必修课。恋爱期间,男女朋友间的吃饭送礼在所难免,加之项目繁多的情侣消费、假日消费,大学生恋爱消费支出也不断攀升。

4. 休闲消费与娱乐消费逐步成风。

就当前而言,大学生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必要的休闲娱乐项目开始进入大学生的消费视野。当前,手机、数码、电脑等演变成为大学生休闲娱乐的必需品,部分学生还经常光顾 KTV、电影院、休闲茶社、咖啡店等场所进行不必要的享乐消费。此外,旅游度假在学生中间开始盛行。2006 年,中国青年报联合新浪进行“大学生旅游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 72.72% 的大学生曾经旅游,近 45% 的学生每次的旅游费用在 1000 元以上;有 12.91% 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用在旅游上的花费已超过 1 万元。^[7]休闲娱乐消费及享乐消费是以高额支出为特征的,与大学生“纯消费者”的身份不相符,折射出部分大学生消费目的肤浅化、人生追求享乐化的不良倾向,与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和期

望是格格不入的。

三、大学生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内在本质及其弊端

从本质上看,消费主义价值观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而这种价值观一旦被付诸行动,就演化为一种行爲实践和生活方式。首先,大学生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倡导的消费方式是校园内高消费或超前消费,其内在的生活方式有享乐主义的倾向。其次,大学生消费主义价值观内在的价值取向是个人至上主义。不顾及家庭承受能力的时尚消费、无休止的欲望消费、翻新复制的个性化消费、通过消费确认的所谓的“自我”,都表征了大学生价值观念内在的个人至上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原则过分强调个人的感受、个性、自我,容易走向自私自利的边缘。再次,大学生消费主义价值观包藏着虚无主义的危险。消费主义价值观遵循着“欲望——满足——幻灭——新欲望”的循环逻辑,因此,在被构造出来的各种欲望获得满足后,个体非但不能获得充实感,反而容易空虚失落,甚至坠入虚无主义的深渊。

大学生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弊端是多层次的。

首先,消费主义价值观妨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顺利成才。

消费主义价值观内在的享乐主义倾向,容易导致肤浅的现世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处世态度。大学生通过消费商品或者“符号”来获取的充实感越来越不稳固,物质的丰裕难以替代精神的充实感。因此,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导向下,大学生将越来越难以获取精神上的充实感。此外,大学生个人的理想信念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下容易扭曲甚至消逝,导致意志不坚、信念脆弱、理想虚无。

其次,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大学校园的和谐。

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作用下,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常常带有功利化的倾向。因此,校园内纯洁、亲密的同学关系,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难以形成。大学生消费主义价值观也给校园管理带来了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过度的物质消费导致校园内的浪费现象严重,崇尚享乐的取向致使一些大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漠不关心,对个性化的过分追求变成了堕落的理由和对自身的放任自流,无形中又增加了高校管理与服务的成本。

再次,大学生消费主义价值观危害社会良性发展的智力基础。

大学生不停地翻新复制消费欲望,不仅会给家庭增添额外的经济负担,而且容易带来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很多大学生难以形成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优秀品质。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消费主义价值观妨碍的不仅仅是大学生个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侵蚀和瓦解的还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智力基础。

四、大学生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教育转化

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者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体系,把消费观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之中,开展系统的教育活动,不遗余力地对大学生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予以转化,使其树立健康的消费观。

首先,明确根本——深入开展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生观、价值观与消费观有着密切的关联: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消费观,特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造就特定的消费观,消费观折射出人生观和价值观,健康的消费观有助于积极人生态度和科学价值观的塑造,而不健康的消费观容易导致消极颓废的人生态度,甚至退变为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决定着个体对人生意义、人生追求、存在价值的认知,决定着个体对理想、幸福、荣辱、苦乐的态度。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为先导,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教育,使大学生认清消费的原初目的及功用,明确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追求和存在的价值,形成对理想、幸福、荣辱及苦乐的正确态度,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

其次,抓住核心——引导大学生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和生活方式。

衡量人们消费观是否健康的标准在于:人们在消费观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消费实践活动能否促进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因此,在教育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倡导量入为出的适度消费,反对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倡导健康环保型的绿色消费,反对挥霍浪费型的奢侈消费,倡导适度的红色消费,坚决反对“灰色”“黑色”“黄色”的消费,倡导发展型消费,反对一味的娱乐型、消遣型、享受型消费,倡导符合自身实际的适度个性消费,反对炫耀性消费和攀比消费,真正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顺利成才。同时,要引导大学生积极向上,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再次,利用资源——培养大学生的节俭意识和感恩意识,培育大学生的吃苦精神和进取精神,塑造大学生的消费理性。

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赋予传统的消费观以积极的当代价值,对传统文化中的“勤俭”“孝悌”理念予以科学转化,进行勤俭教育和感恩教育,使大学生养成节俭美德和科学的“孝悌”观念。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激励学生,开展吃苦教育、励志教育、创新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吃苦精神和进取意识,使其树立远大志向。利用校园文化的熏陶和引领功能,形成健康消费的文化氛围,引导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消费观教育。此外,利用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家长按月份配给学生一定数额的生活用钱,并加强对子女消费活动的控制和

监管。

第四,突出主体——彰显学生组织在消费观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大学生组织的作用,依托学生党支部、共青团、学生会以及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消费观教育活动。学生党支部、共青团、学生会以及各学生社团起到连接教育管理者和广大同学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能够发起一些为广大同学喜闻乐见的消费观教育活动,从而提高活动的参与率、教育面、认可度,有助于形成健康消费的校园文化环境,使大学生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接受消费观的教育。

第五,创新载体——创新大学生消费观教育的载体。

利用课堂、网络、校园广播台、宣传橱窗、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对大学生的消费观进行教育,避免单纯的说教。第一,将消费观教育纳入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中,把理财教育纳入大学生消费观教育的框架中,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第二,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使消费观教育进入网络。建设好相关的主题教育网页(网站),在网页(网站)上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消费观教育活动。第三,借助校园广播台、宣传橱窗进行舆论引导和氛围渲染,营造健康消费的舆论导向和校园文化氛围。此外,开展以消费观教育为主旨的各类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认知自己的消费观,在活动中反思自身消费观的健康程度,从而使消费观不断理性化、科学化、健康化。

[参考文献]

- [1]王宁.“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 [2]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代序)[A].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3]卢嘉瑞,吕志敏.消费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4] [德]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 [5]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6] http://296.cyol.com/content/2006-04/6/content_1352447.htm.
- [7]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06-07/21/content_202703.htm.

(责任编辑 师语)

浅探大学生上网行为及网络心理健康维护*

包海霞

(江苏工业学院校报编辑部,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 使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使用状况调查问卷”、KS·Yang的网络成瘾诊断问卷,对江苏工业学院120名本科生进行测试,以了解大学生上网行为特点和网络成瘾程度,进而对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维护途径进行探讨。调查发现大学生上网人群中网络成瘾者占8%。网络成瘾的发生与上网时间、上网参与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学生部分个性心理特征如孤独、自尊等与网络行为及网络成瘾现象相关。

[关键词] 上网行为; 网络成瘾; 网络心理健康维护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54-02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群体的主要部分之一,如何合理地使用互联网,维护自身的网络心理健康,预防网络成瘾就显得十分重要。网络成瘾是近年来网络心理学研究的热点,指在无机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表现为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目前国内外就网络成瘾问题研究较多,而研究者对网络成瘾的研究存在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 IAD与非IAD在人格特质上存在差异。^[1]研究者推测网络成瘾者可能具有下列人格特质:喜欢独处、敏感、倾向于抽象思维、警觉、不服从社会规范等。在国外,Young与Rodgers在研究中发现,网络使用者的忧郁倾向越高,网络成瘾情况就越严重;Loysker与Aiello认为有较高无聊倾向、寂寞、高社交焦虑与高自我意识的人较容易网络成瘾。^[2]台湾大学林以正、王澄华教授发现忧郁型的网络使用者网络成瘾倾向性更高,在人际互动中感受焦虑的程度越深,越容易网络成瘾;北京大学钱铭怡教授发现,那些寻求社会赞许需求较高的人,社交焦虑比较严重的人在上网时容易成瘾,从而利用网络作为逃避的手段。^[3]

本研究试图对大学生上网行为特点、成瘾现象做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对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维护的途径进行初步探讨,以便有效地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网络,预防IDA。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江苏工业学院各二级学院(系)本科生中的志愿者参加测试。学校校内及校外都具备较为便利的上网条件。我们告知被试参加网络使用情况调查,并为被试提供网络成

瘾测验结果。共征得被试120名,获得有效问卷100份,其中男生39人,女生61人,被试平均年龄为20.66岁。

2.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为网络成瘾测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大学生网络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网络成瘾测验译自彼兹堡大学KS·Yang编制的临床诊断问卷。该问卷在国外新兴的IAD研究中较为常用,但目前尚未有信度、效度指标报告。该问卷原有10个题目,要求以“是”“否”作答,每个肯定答案计1分,得分大于等于5的被试诊断为成瘾者。国内有关学者在不影响测验信度与效度的基础上对原题进行了剔除,修改后的问卷共8题,仍将得分大于等于5作为分组标准,将被试分为IAD组与非IAD组两组。本研究使用的是国内学者修改后的问卷。

网络使用情况调查问卷取自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问卷主要从个体上网时间、常用的网络服务、上网活动涉及范围、上网前后心理活动的变化等几个方面反映个体上网行为的参与程度和网络对大学生心理过程及个性心理的影响,共51道题,其中49道题是封闭式题型,2道题是开放式题型。封闭式题型的各个选项,我们依其描述问题的性质的不同对其赋予了相应的分数。

3. 数据统计方法。

数据采集方式是将上述两项测验一次性分发给被试,不记名,集体和个别施测相结合进行书面测验。采用SPSS for Window 8.0对所有数据进行输入并统计。

二、研究结果

1. 各量表基本情况。

*[收稿日期] 2008-09-24

[作者简介] 包海霞(1980-),女,江苏丹阳人,江苏工业学院校报编辑部编辑,教育管理实习研究员,硕士。

(1) 网络成瘾诊断鉴别量表得分情况。本研究 100 名被试中,得分大于等于 5 的 IAD 者有 8 名,占总数的 8%,非 IAD 者为 92 名。

表 1 大学生上网行为部分情况比较 ($\bar{X} \pm SD$)

	非 IAD 组 (n=92)	IAD 组 (n=8)	t
上网时间(小时)	10.52 ± 10.85	12.82 ± 12.09	-0.967
参与程度	12.87 ± 1.77	12.75 ± 1.97	0.303

(2) 大学生网络使用情况调查问卷部分结果比较(见表 2)。

表 2 大学生部分个性心理与网络成瘾状况的相关分析

变量	时间管理问题	耐受性	人际健康问题
自尊	-.142*	-.086	-.241**
孤独	.098	.107	.160**

注:* $P < 0.05$ ** $P < 0.01$

2. 相关分析。

参照表 1 与表 2 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两组被试在上网时间、参与程度方面的差异无显著性。

其次,大学生网络用户的网络使用及网络成瘾状况存在性别与年龄上的差异。

在性别差异上,男大学生的上网次数、上网时间及对网络服务的使用显著多于女大学生。无论是对网络的主观依赖程度还是网络成瘾的程度,男大学生都显著高于女大学生。男大学生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时间管理问题和人际健康问题。

在年级差异上,从上网时间看,大学生的周网络使用次数和使用时间在一、二、三年级均呈现出递增趋势,但到四年级又有所下降,原因在于四年级的大学生忙于就业与考研,分配给上网的时间较之于三年级有所减少。本研究显示,大学生对网络的需要程度随着年级的增长而明显增加,但对不同服务的使用却显示出不同的趋势,其中对聊天室的使用伴随着年级的上升显著减少。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总体状况无显著的年级差异。

第三,大学生部分个性心理特征与其上网行为与网络成瘾状况存在多处显著相关。如花费很多时间在网络上的人多缄默、冷淡、好强固执并有冒险精神,常使用信息查询服务的人具有抽象思维能力较强、自信敢为、自律严谨且为人平和等特点。孤独与网络行为及网络成瘾状况显著相关。自尊与网络行为及网络成瘾状况相关。社会支持与网络行为及网络成瘾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

三、讨论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的维护

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要坚持不懈地对大学生进行网络使用方面的引导与教育,注重培养学生正确使用网络的良好习惯。

大学生刚入校时,学校往往很重视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教育和指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在校学生的引导尤其是思想方面的教育和熏陶常常只是流于形式,很难收到实效。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学校要对大学生进行细致深入并与其成长相适应的网络使用方面的正确指导,引导他们更好地将网络生活与现实的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使学生能真正养成科学健康地使用网络的良好习惯。

2. 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普及有关网络的心理学知识,促进其心理素质的全面提高。

首先,大学校园要营造良好的心理成长氛围,使学生的心理有适合发展的土壤。如开展形式多样的有意义的学习竞赛或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其有更多的机会展现自我、评价自我、完善自我。其次,要完善校园心理咨询体系,使学生在心理上遭遇困惑或难题时能有适当的渠道得到解决,避免学生通过沉迷于网络来逃避现实,从而引导大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

3. 加强校园网络的建设与管理,一方面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另一方面抢占网上阵地,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网络氛围。

大学校园内可广泛开设内部局域网,积极创建各种主题网站,同时,还可以与其他一些优秀网站开展合作交流,在满足大学生上网需求的同时,为他们营造一个美好的网络精神家园,使网络真正成为促进大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工具。

4. 鼓励和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熟悉、了解和认识社会,自主营造良好的人际互动氛围,促进其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形成与提高。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在网上与陌生人互动的频率和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可见,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平时就要注意从大学生的认知着手,适当增加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以预防大学生网络成瘾,积极维护大学生的网络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 [1] Robert Draut. Internet Paradox[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1).
- [2] 林绚辉. 网络成瘾现象研究概述[J]. 中国临床心理学, 2002 (1).
- [3] 高亚兵. 网络成瘾的研究进展[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6 (4).

(责任编辑 师 语)

以科研激励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创新能力探索*

唐习华 李 骏

(南京财经大学人事处,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一支高素质的基层管理队伍对高校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关键所在。通过分析目前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以科研为切入点,试图探索培养其创新能力的可能性与举措。

[关键词] 高校基层管理人员; 科研; 激励; 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56-03

“龙舟赛”是管理学惯用的例子。在比赛中,舵手、鼓手和划桨人是如何协调工作、齐心协力确保龙舟快速平稳前行的呢?这里便涉及到管理的问题。管理的一个宽泛的概念就是由一个或多个人对他人施加影响,促使人们积极协调地工作,强调内部的公平和谐和外部的竞争与效率,以实现预定的目标或使命。^{[1](P.8)}同样,在一个组织中,如何充分调动各类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关乎该组织的效益和效率。生产性质的企业关注生产力的提高和利润的增加,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也是如此。高校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管理的主体和对象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此,单纯的科学化并不等于人性化。高校的管理层级主要分为:高层管理者(党委领导下的校领导团队)、中层管理者、基层管理者。高层管理者侧重于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以提高机关服务效能;中层管理者主要抓制度和规范建设,以期任何事情都有既定的规范和流程;基层管理者是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实施者。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因此,政策是否执行有力以及执行效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基层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机关服务效能,还与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力有必然的联系,制度再完善,如执行不力,同样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德鲁克对人总是以正面(用人之长)评价,对事则是以负面(高标准要求)评价,这是各类组织惟一最高的指导原则。^{[2](I序言)}高校在开展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高机关服务效能建设过程中,旨在通过规范的服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对事高标准严要求,但对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基层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量与质的评价标准,导致基层管理人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一、目前高校基层管理人员的特点

通过调研江苏省属十几所高校,基本了解了这些高校基层管理人员的职务晋升、在职进修、科研要求以及与之相关的校内津贴方案。根据调研情况,分析与总结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基层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创新能力不够的现状成因,并试图阐述以科研为激励因素提升高校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创新能力的办法。经过调研,发现目前高校基层管理人员普遍存在如下特点:

1. 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大部分属于非专业人员。目前高校基层管理人员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的专业匹配程度低,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的思路 and 眼界。基层管理人员除了原有人员之外,新补充的人员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1)全国重点本科院校的本科毕业生或硕士生。他们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专业学习,但从目前各校的人员状况来看,专业化匹配程度较低,即他们所学的专业与所从事的专业之间仍有较大差别,这些人员的引进更多的只是改善了管理人员的学历结构。(2)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家属或配偶。许多学校为了学校的发展,大力加强引进力度,在引进符合专业学科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人才时,一般都将“能够安排家属工作”作为吸引人才的条件。(3)从教学岗位转岗的部分教师。这些教师一般都是不符合教学考核的要求,暂时转岗到行政岗位上,工作周期不会太长。因此,从目前基层管理岗位人员的整体构成来看,专业化匹配程度低是主要问题所在。

2. 总体学历层次偏低。以下是江苏省教育厅下属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年报统计数据,见表1。

*[收稿日期] 2008-10-30

[作者简介] 唐习华(1973-),女,江苏泰兴人,南京财经大学人事处副科长,经济师。
李 骏(1977-),女,江苏张家港人,南京财经大学人事处助理研究员。

表1 2006-2007 江苏省教育厅下属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年统统计数据表

年度	管理人员 总 数 (人)	正科级及 以下人数 (人)	占管理人员 总 数 比 例 (%)	研究生及 以上人数 (人)	占科级及以 下人数比例 (%)	35岁及 以下人数 (人)	占科级及以 下人数比例 (%)	40岁以 下 人 数 (人)	占科级及以 下人数比例 (%)
2006	12500	8280	66.24	893	10.78	3611	43.61	4963	59.94
2007	13428	9190	68.43	1310	14.25	3967	43.17	5484	59.67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6年基层管理人员数为8280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数为893人,只占10.78%。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至14.25%,但随之增长的是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大幅增加,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下,存在统招、自费、委培、同等学力、自主单招、高校教师硕士等各种形式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招生与毕业人数每年都在大幅增长,与这个增长幅度相比,高校基层人员高学历的增长幅度并不算高。

3. 各管理岗位人员工作责任心差异较大。由于各管理岗位职责不同,岗位工作的繁简程度、工作压力、工作成果显现度都有很大差别,易形成不平衡的工作局面。

4. 收入差异大。高校收入分配体制向一线倾斜,首先在校内津贴的实施上,同样是中级职称,教师和教师外职工标准差异比较大。另外,由于二级学院利用教师和学校公共教学资源,通过各种培训班的方式,创造了预算外收入,学校通常提成的比例较少,院系自主分配的比例较大,导致同类级别的人员由于部门和岗位的差异,收入差别较大。

5. 成就感的缺失。基层管理人员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组织的管理基层从事基础性操作性管理工作的人员,头绪多、事情杂,有一定的专业要求但又不是很强,需要沟通、协调的事情比较多,天天忙忙碌碌,到年终总结时却又无多少话可说,无多少事可写。由于学校的特殊性,管理处于从属地位,服务的观念也造成了管理人员的主人翁精神下降。

高校的特点是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教师作为一线人员,肩负着培养创新型学生的光荣任务,各种政策向一线倾斜,体现了尊师重教的人文精神。但是,要使学校正常高效运行,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何充分调动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在日常工作中培养创新能力,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以科研为激励因素的具体实施方式

美国犹他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赫茨伯格根据对工作看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将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分为两大类: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其中,激励因素是指与工作本身的性质内容成就等有关的因素,如成就感、挑战性、赞赏、提升、责任心、上进心等,改善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生产力;保健因素,是指工作的环境因素,如方针、政策、工资水平、人际关系等,收入属于保健因素,如得不到实现,会造成不满意,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3] P.57)}根据双因素理论,以下提出以科研为激励因素,调动高校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创新能力的具体实施方式。

1. 加强基层学习型团队建设,提高整体工作效率。学习型组织应不断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维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愿望,并持续学习如何共同学习。^{[4] P.2)}基层管理岗位的问题主要是专业人员和高学历高水平的人员缺乏,因此,应加大管理岗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提高引进人员专业与岗位适配的比例,充分发挥和利用新引进人员的新鲜血液来带动和影响现有在职人员的学习和提高,努力创造并形成学习型工作团队,提高部门的整体工作和服务水平。同时鼓励基层管理人员在职学习提高,根据表1数据显示,40岁及以下人数占基层管理人员的比例接近60%,其中35岁以下占的比例高达43%以上,是进一步学习提高的生力军。高校一般都鼓励教师学习深造,有减免教学工作量、报销全额或部分学费的优惠。据调查,目前大部分高校,行政人员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在职进修的方式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并且在学费上给予1/3、1/2或2/3等不等的报销优惠,也有部分学校没有学费报销优惠,通过教育管理类进修课程的学习和提高,基层管理人员巩固了专业理论基础,加强了组织成员间的交流,培养了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维方式,提高了执政能力和服务效率。实践表明,具有教育管理专业知识和理论水平的高校管理者,在工作实践中更容易掌握高校管理规律,更容易提高工作的专业水平。

2. 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差距。学校应正确评价院系收入与机关基层管理人员之间收入的差别,除去正常的按劳取酬的收入补偿外,其余收入应提高上交比例,用于补贴没有创收收入的岗位和部门。据调查,大部分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入差异的问题,大多采取院系自行承担一定比例的校内津贴,用创收部分自我补足的形式,来缓解收入差距的矛盾。另外,院系赖以创收的基础设施——校舍,属于学校的共有财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办学和合作办学形式的多样化,过去房地产只为办学服务的单一用途被彻底打破,经营性的房地产逐渐增多,出现了不少经济实体及大量的合作办学机构,学校一般没有将房地产纳入成本核算,而这些都是学校的公共资源,办学所得却归部门所有,导致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在降低国有资产价值的同时,也严重挫伤了无盈利部门的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新的矛盾和苦乐不均现象的出现。因此,校方应积极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采取合理有效的办法,合理化解这些矛盾和差距,促进学校和谐协调的发展。

3. 适当增加科研要求,激发管理人员创新思维。根据对江苏省部分高校调研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接受调研的十

几所高校中,南京审计学院对教师外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一个考核期内需公开发表一篇文章的要求,南京人口学院采取给予奖励的形式鼓励教师外人员从事科研工作并发表文章,其它多所高校对自身职称评审外的科研要求几乎为零。本身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做支撑,又缺乏基于工作的思考,即科研工作量的要求,使得基层管理人员丧失动力,工作创新能力弱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行政效能低下的恶性循环。有效改变这一现象可以从3方面着手:

(1)适当增加科研要求,明确基层管理人员科研工作量的内容。考虑到高校基层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条件,那就是它既指公开发表的论文、申报的课题,同时也应该包括基于实际工作的行政报告、日常工作效益提升的创新举措等。明确管理人员科研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基于实际工作的行政报告、日常工作效益提升的创新举措等)和教学科研人员区分开,确立相应的考核标准,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再拿出具体可行的措施,肩负起管理人员的科研考核任务。

(2)做好基层人员的职业生涯管理,激发创新能力。职业生涯管理的目的就是帮助员工提高在各个需要层次的满足度,既使员工的低层次物质需要的满足逐步提高,又使他们的自我实现等精神方面的高级需要的满足度逐步提高,真正了解员工在个人发展上想要什么,激起员工为学校服务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而形成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推动力。^{[5] P.45)}

职业生涯规划,主要有专业技术系列和管理系列。专业技术系列指助理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等,由于工作繁琐,专业限制,以及评审条件的严格,与教师相比,真正能按时晋升副高以上职称的基层管理人员微乎其微。职员系列主要是科员级、科级、处级等,一般高校都制定了科级及以下非领导职务职级确定和晋升的实施意见,从目前存在的普遍情况来看,本科生在同一高校工作大约满6年就可以确定为主任科员,而硕士研究生需要的时间更短,但是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升职为领导职务相对艰难。因此,如何在非领导职务职级的领域内拓展职级,拓宽上升空间,就成为提高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可以适当参照目前江苏省内机关的相关做法,适当打开管理生涯上升的通道,增加副处级甚至正处级非领导职务职级。据了解,目前苏州大学和扬州大学不定期地根据需要确定部分处级非领导职务,兑现相关待遇,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拓展非领导职务职级可以通过设定相关的科研成果级别,科研成果达到某个级别,就可以晋升高级职员职级,但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个科研成果级别的设定一定要严格根据岗位的要求,与本岗位工作有高度的匹配程度。这样,才能使每一位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真正做到从实践中产生理论,并将创新成果充分应用于实践中,形成良性循环。

(3)完善校内津贴实施方案,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从目前江苏省大部分高校实行的校内津贴实施方案角度出

发,增加管理人员科研工作量考核因素,进行修正与完善。尽可能寻找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量化,建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于工作表现良好的基层管理人员,给予更高的刺激或奖励。

另外,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对收入的关注程度很高,在校内津贴的实施方案中,参照教师的分档标准,适当增加科研要求,根据工龄、任职年限和科研的多重要求,将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甚至更高的职员系列制定不同的津贴标准,划分不同的津贴档次,虽然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对有志于钻研业务和很强的上进心的基层管理人员来说,不失为前进的动力和努力的方向,有效地调动了基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既缓解了现实的生活压力,又满足了更高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久而久之,管理人员的整体管理水平,执行政策的能力和效率肯定会有长足的提高,学校的整体管理水平也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根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高等学校职员制度改革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必然要求,在对高校基层管理人员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时,高校领导层应该更加充分利用科研这个激励因素,最大程度地调动和发挥基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一支专业化、水平高和素质好的基层管理队伍,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更好的为教师和广大的师生员工服务。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2] (序言)}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学校要综合考虑现实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按照能让个人充分发挥特长,凝聚共同的愿景和一致的努力方向,建立团队合作,调和个人目标和共同福祉的原则,^{[2] P.102)}提高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创新能力,培养具有现代高等教育管理理念以及良好的服务意识的专业基层管理队伍,一起齐心协力地为学校美好的明天努力,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校管理工作必将迎来新的局面。

[参 考 文 献]

- [1] 何似龙,施祖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1.
- [2] 美]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 [3] 姜杰.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4] 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5] 杜林致.职业生涯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陈晓姿)

20世纪后50年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陈颖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20世纪后5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期,高等教育的政府干预日趋增强,结构多样化趋向日益明显,高等教育加快变革,市场化趋向逐渐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90年代的大发展之后,也面临着诸多结构、规模、效益等方面的困惑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柔性化宏观调控,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结构改革,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快高等教育市场化,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美国高等教育; 发展与改革;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59-04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90年代的大发展之后,逐步显现出诸多结构、规模、效益等方面的困惑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深入认识和思考这些问题,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良性、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汲取高等教育先发国家的经验,笔者认为,20世纪后50年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尤其值得关注与借鉴。

一、20世纪后50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特征

20世纪后50年,美国在经历了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战后,再次迎来了经济发展的辉煌时期,在美国历史上,高等教育头一次与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发展高等教育开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独特,并逐步走向成熟。

1. 加强国家干预,高等教育的战略地位逐步增强。

美国联邦政府干预高等教育,始于1862年的《土地赠与法》的颁布,二次大战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逐步连续化、普遍化和制度化。

一方面,联邦政府及时地把教育与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通过立法对高等教育实施干预。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一夜间打碎了美国人的优越感,第二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授权联邦政府向州立学校拨款2.8亿美元,向禀赋高的毕业后愿意从事中小学教师职业的学生提供学习贷金,每年向1500名研究生提供“国防奖学金”等^{[1] (P.330)},试图使加强教育成为国人的共识。继《国防教育法》后,美国国会又乘势通过了包括《高等教育法》在内的一系列专门的教育法案,大力促进高等

教育的优先发展。“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不但被看作是对于美国国防及社会的‘繁荣和幸福’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而且被作为扩大公民权和‘向贫穷作战’的基本手段。”^{[1] (P.330-331)}进入80年代后,联邦政府更提出“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进一步强化公众的危机感,统一认识,重视教育。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通过加强对学校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的立法干预,实现联邦政府在适当的时机以合理的方式进行干预。由于大学的科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府战后对大学科研的投入猛增,大学从联邦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由1957年的2.71亿美元猛增到1968年的15.09亿美元,大学获得的科研经费在全国研究费中所占的比例由1957年的15%上升到了1968年的28%。60年代,美国的大学承担了全国大约60%的基础研究和10%至15%的应用研究任务。^{[1] (P.335)}美国出现了一批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博士生教育为重点的研究型大学,美国著名教育家克拉克·科尔把这些大学称为“联邦拨款大学”^{[1] (P.335)}。可以看出,政府对高等教育干预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但干预手段却具有间接性和柔性化的特征,几乎不直接干预高等学校的自治。

2. 加强结构性规模扩张,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体系基本形成。

美国高等学校历来以四年制的本科生教育为主。因189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伯提出让“那些天生不适合的学生在二年级结束时,可以自然地、不失体面地停止学习”^{[2] (P.23)}而使两年制的初级学院最早在芝加哥大学建立;

*[收稿日期] 2008-11-20

[作者简介] 陈颖(1967-),女,江苏邳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 1876 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了发展的历程。但美国高等教育的纵向结构多样化要等到 50 年代中后期和 60 年代才开始真正出现。1960 年,美国颁布了《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首次把高等教育进行了层次划分。两年制学院教育除了继续提供转学教育外,开始日益重视社会急需的职业教育、补习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到 70 年代中期,两年制学院的学生已达到全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2]总统中等教育委员会成立,也使大学研究生院得到迅速扩张和加强。1975 年在校研究生达到 126 万人,比 1950 年增加 4 倍以上。^[2]随着两年制学院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急剧发展,美国三级高等教育结构、四级学位制度开始逐步形成。

高等教育的横向结构多样化开始于美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时代。正规的高等学校系统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广泛需求,远程教育、虚拟大学、公司大学、成人继续教育等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向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横向结构主要包括四大系统。第一系统是非营利性的正规公立学院和大学,这是美国中学后教育的主体,第二系统是业主所有的营利性专科院校,20 世纪 90 年代是其发展黄金时期,第三系统包括由产业界、工会和军队等主要职能并非从事教育的组织提供的教育和培训项目,每年注册的学生超过 800 万人;第四系统是电子教育系统,包括卫星电视教育、广播、视频教育、网络教育等,目前教育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异军突起,第五系统,即非正规的在职培训。^{[1] P.454)}

自此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各类高校每年招生人数由 1960 年的 323.6 万,增加到 1977 年的 1118.5 万。^[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 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55.6%。^[4]同时,1950 年美国各种高等院校共有 1851 所,1976 年已发展到 3026 所。^[3]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体系基本形成。

3. 危机中寻求变革,保持高等教育持续稳定的发展。

经历了五六十年代大发展后,美国高等教育学生增长速度出现了连年递减的现象。进入 70 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步实现,大学校园里也出现了很多诸如吸毒、性混乱、频发的令人失望的暴力事件,特别是随着大学生行动主义(学潮)的兴起,人们开始怀疑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扶持政策,不再对高等教育抱有幻想。多数高校先后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危机,高等学校不得不控制各项支出,及时调整发展规划,不少学校不得不被迫关门。再加上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市场化,教师影响下降,学生市场至上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出现较大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信用危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空前恶化。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危机时代”^{[1] P.341)}。

面对危机,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持续稳定的发展。

(1) 高等教育更加开放。进入 70 年代,美国大学为应

对危机采取灵活开放的招生制度,使贫穷家庭子女、超龄、已婚甚至已就业的学生、妇女、少数民族青年均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人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大大增强。这也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在校大学生数量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却连年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2) 高等教育方向性转化。1998 年马丁·特罗教授撰文《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对原来自己提出的“大众高等教育”与“普及高等教育”的区别进行了修正,认为普及高等教育的核心在于与全体社会成员密切相关的“继续教育”。^{[1] P.335)}实际上在 70 年代美国高等学校的自主变革中,高等教育的方向已经如特罗教授所言发生了方向性转化,传统的高等教育正在向“非传统”过渡,高等教育对社会成员更加开放,继续教育和终生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职能。

(3) 扩大学生学习的选择性。“学生消费者至上”观影响了美国 70 年代以后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开始赋予学生较大的选择权,包括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的教学计划以及分季节、分周末、分长短期、分昼夜的学习时间安排等。高等学校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学生学习的选择性增强。

4. 重视市场化趋向,保证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良性互动。

美国作为大学高度自治的国家,其市场化表现尤为明显和突出,正如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所说:“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美国的系统是最缺乏组织的,几乎完全是一种相互之间自由竞争的市場。”^{[5] P.117-118)}经过 20 世纪后 50 年的高等教育发展与变革,市场特性几乎已经渗透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每一个细胞。

充足的经费是保证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高等学校顺利运转的关键。美国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分别来源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学生、校友和企业等。70 年代,联邦政府制定专门的税收法律,为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资助高等教育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非政府机构和个人资助高等教育的热情。同时,高等学校也积极通过竞争争取生源来改善学校的财政状况,“学生消费者至上”的教育观念,引发了美国高等教育适应市场的一系列变革。此外,积极开拓留学生市场也成为高等学校创造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据统计,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每年为美国带来超过 120 亿美元的收入。^[6]

美国大学的课程本质上就具有商品的特性。60 年代,在美国选课有时即被称为“购物”。学生对课程选择如同消费者挑选商品,不合适的商品可以退换。美国大学的课程不仅应学生消费者的需求而开设,还受到市场对不同人才的需求所制约,就业情况左右着高等学校专业课程的调整,美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时刻注意适应社会需要。

科学研究的市场化是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重要标志。1993 年的统计表明,全美计算机科学方面 28% 的新技术、药品制造方面 37% 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方法以及化

学药品和新型材料方面高达 44% 的新品是由大学提供和发明的。^[7]科研成果之所以能走出“象牙塔”,迅速被转化为生产力,得益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市场化政策。二战以后,美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从国外“汲取才智运动”,迅速扩充科技队伍,强化高等学校与企业的人才合作和研究合作,突出研究成果的开发等等。几十年来,随着“硅谷”、“洛杉矶—圣地亚哥”等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众多的以理工科大学为中心的高新技术孕育中心的建立,美国逐步形成了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商品化有机结合,形成高等教育与市场相结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运行,加快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良性互动,保证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20 世纪后 50 年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对我们的启示

国家干预、多元化、危机论和市场化直接刺激了美国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后 50 年的迅猛发展,这些发展与改革的特征对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我国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可以继续从以下方面予以重视和改革。

1. 加强柔性化政府宏观控制,强化我国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以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高等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高等教育的总体运行机制仍沿用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集权管理模式。这种政府集权的直接调控模式客观上限制了高等学校三大功能的有效发挥,限制了高等学校的办学活力,阻碍了高等学校办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成为制约高等教育运行和发展的瓶颈。

借鉴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我们可逐步改变直接的宏观调控模式,加强间接的柔性化的宏观调控,进一步调整、收缩和规范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比如,过去由政府行使的投资、审议、评估和咨询职能,可交由各种社会中介组织间接行使。政府则可通过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环境,打造平等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环境,制定高等教育市场新的准入条件和竞争规则,加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设计,同时以投资主体的身份利用经济手段调节市场变量,强化对教育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这样,既可以引导高等学校根据国家利益办学,确保社会发展对重点人才的需求,又可以在制度上鼓励高等学校面向市场独立自主办学,实现由过去单纯依赖政府办学转变为依靠多方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高等教育投资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等学校的办学能动性和积极性。

当然,从美国高等教育 20 世纪 60 年代大众化体系的形成,亦或从 20 世纪末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我们都能非常明显地看出高等教育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高等学校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机构、轴

心机构,高等教育的发展拥有绝对的优势和优越的内外部环境。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地位依然不够突出和明确,《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完成了明确高等教育的职责、权利与义务、高校与学生关系等任务,并没有改变传统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并明确提出必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十七大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发展的春天,科学发展观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却并不能保证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得到优先发展,国家和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投入比例,甚至是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变革。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也基本到来,此时的高等教育确实需要一支“强心针”,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显得十分必要。

2. 打破传统,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结构性变革。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宏观问题主要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许多高校负债经营,以及高等教育结构呈现出失调状态。前一个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但对于高等教育结构失调问题,则并没有引起政府及社会充分的重视,高等教育的层次、科类、形式、分布、投资等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调。以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为例,2004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 1731 所,其中本科院校 682 所,占 39%,专科、高职院校 1049 所,占 61%。从学校数量所占的比例来看,结构基本合理。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全国 682 所本科院校的校均规模 13735 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学就有 411 所,占 60.26%,128 所高校在校生规模超过 2 万人。而 168 所专科院校的校均规模仅 4028 人,857 所高职院校的校均规模为 3130 人。^[8]这种倒“金字塔”型的人才培养结构显然与美国 20 世纪后 50 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总体设计的落脚点有所不同。实践证明,我国高等教育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人才培养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的突出,一方面是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在院校设置与布局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方面缺乏中长期规划,另一方面,政府缺乏对各类高等学校分级管理、分类管理的政策措施,也直接导致高等学校普遍存在盲目追求办学规模扩张,追求“大而全”,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争设新学科、新专业,争设硕士点、博士点,争合并,争改名,争办综合性大学,有的甚至因此丧失了几十年的办学特色和优势等等。此外,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高等学校学生的来源单一化的传统并没有改变。我们注意到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发展迅速,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和每一个家庭和青年都联系起来,其生源来源是打破传统的,新生来源大多为“新型的”和“非传统的”,并不仅仅局限于适龄青年。大力发展技能培训,开展继续教育成为当时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笔者认为,高等学校发挥作用必须打破传统,传统的教育对象不应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或唯一。大力发

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甚至技能培训,使高等学校成为社会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并不会削弱高等教育的传统职能、影响教育质量。相反却是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赢得社会、服务经济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重要举措。因此,统筹考虑多种因素,制定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中长期规划,发挥高等教育宏观规划的调控作用,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竞争的基本“游戏规则”,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尽快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势在必行。

3. 充分利用市场杠杆作用,推动高等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

20世纪下半叶,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和迅速发展,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规定:教育经费的支出应占当年GDP的4%。但实际上1996年至1998年的比率分别只有2.46%、2.50%、2.55%,1999年才上升到2.79%。而同期美国是5.8%,以色列是7%,巴西是5%,泰国是3.6%。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投入不但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9]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足,已经开始制约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政府和高校自身已经在探索多种途径予以解决,但办学资源的短缺问题依然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高等教育质量下滑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世界高等教育日益凸显的服务性、产业性特点来看,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引入市场机制,让市场机制引导高等教育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的效益、效率和效能。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确立产业观念、市场观念和竞争观念,把高等教育真正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进一步开放高等教育市场,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投入的社会化和多元化,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发展计划甚至具体到招生政策、方式的确定等方面推行按市场需求方式运行,使高等教育产出类型多样化,逐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在推进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经过规模的扩张和高校的调整与整合,我国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已经形成,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成为首要话题。发展性、适应性、多样性、整体性和特色性的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应该成为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评估的基本标准。^[10]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进高等学校内涵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要求。

当然,高等教育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衰减。从20世纪后50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分权化、增强了的竞争性和引入经营机制并没有显示出国家权力的软弱,相反,政府仍然在教育融资、管理、服务等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高等教育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黄福涛. 外国高等教育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2] 王英杰.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百年回眸[J]. 高等教育研究, 2000(1).
- [3] 高嵩. 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的形成[J]. 外国教育研究, 2006(5).
- [4] 霍梦兰, 邓鹏图. 9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探讨及对我国的启示[J]. 理工高教研究, 2004(5).
- [5] [加] 约翰·范德格拉夫.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 [6] 李新华. 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4).
- [7] 石鸥. 唤醒蕴藏在大学中的巨大能量——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对我们的启示[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0(5).
- [8] 戴井冈.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分析与思考[J]. 教育发展研究, 2005(5).
- [9] 刘改会.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改革与超越[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6(2).
- [10] 李子彦. 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6(4).

(责任编辑 师 语)

美国高校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及启示*

徐振龙 罗小林

(南京审计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9)

[摘要] 美国是世界上高校成人高等教育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并经历了制度化、专业化、普及化的发展阶段。美国高校的成人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社会贡献度,经历了由“开放”到“扩展”的创新发展过程,形成了普通教育与继续教育相融合的教育模式和产学研密切结合的教学模式。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走成人教育法制化道路,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成人教育发展道路,加强校企合作,建立社会师资队伍。

[关键词] 美国; 成人高等教育; 创新; 借鉴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 G7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63-03

美国是成人高等教育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据1995年的相关统计,美国成年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是1.17亿人,占美国总人口的45.2%;而在这1.17亿人口中,接受成人高等教育的就占了0.52亿人,占1.17亿的44.44%^[1]。成人高等教育在美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道路中,高校成人教育具有高度的社会贡献度,终生教育观的社会广泛认同推动了美国高校成人教育自身的创新发展,也使之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连接每一个家庭,联系每一个青年的重要节点,大学毕业乃至硕士、博士毕业后重新回到高校接受继续教育已成为美国社会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一、美国高校成人教育的发展阶段

美国高等学校开展成人教育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制度化阶段、专业化阶段、普及化阶段。

1. 制度化阶段。

美国高校开展成人教育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时是美国大学和学院开展成人教育的萌芽时期。但直到1926年美国成人教育协会成立,才标志着美国成人教育制度化的形成。美国高等学校开展成人教育逐步系统化、规范化,很多大学开始成立继续教育的专门部门,开设继续教育课程并对社会开放,甚至设立成人教育学位。1935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了世界上最早的两个成人教育博士学位。

2. 专业化阶段。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成人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美国成人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美国大学开展成人

高等教育开始走向了专业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人教育协会的分会之一美国成人教育教授委员会(CPAE)成立,更是成为推动美国成人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专业建设的核心组织。美国高校成人教育的办学管理逐步法制化,教学形式日益多样化,办学层次不断高级化,学科及专业建设达到标准化,社会服务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3. 普及化阶段。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末由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高等学校开展成人高等教育开始实现“双普及”,几乎所有大学和社区学院均开展成人高等教育;“推广教育”同教学和科研并列成为美国一般大学3大基本职能。美国成人回到高等学校或其他成人教育机构接受再教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终身教育观念深入人心,美国高校在建设以终生教育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二、美国高校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

美国高等学校开展成人高等教育历史长、层次高、效果明显、社会贡献度高。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和社会矛盾的时候,成人高等教育积极拓展,改革创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危机时代”,当时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很多诸如吸毒、性混乱、频发的令人失望的暴力事件,特别是随着大学生行动主义(学潮)的兴起,人们开始怀疑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扶持政策,不再对高等教育抱有幻想,多数高校先后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危机。同时美国出现较大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信用危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

*[收稿日期] 2008-10-08

[作者简介] 徐振龙(1967-),男,江苏赣榆人,南京审计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总支书记,副教授。
罗小林(1960-),男,安徽肥东人,南京审计学院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副教授。

境空前恶化。面对危机,美国高等教育更加开放,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贫穷家庭子女、超龄、已婚甚至已就业的学生、妇女、少数民族青年均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人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大大增强。这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校大学生数量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却连年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1998年马丁·特罗教授撰文《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对原来自己提出的“大众高等教育”与“普及高等教育”的区别进行了修正,认为普及高等教育的核心在于与全体社会成员密切相关的“继续教育”^{[2] P.341}。继续教育和终生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项基本职能。

1. 由“开放”到“扩展”的创新发展过程。

美国高校成人教育经过了从开放校园到教学向社会扩展的发展过程。美国高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成人教育制度,诸多高校开始陆续把校园的学习资源向社会开放。19世纪末夜间成人班级开始纷纷在美国公立学校开设,到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包括一些著名大学纷纷开始成立成人教育系,开设成人教育学课程,设置成人教育专业学位(从学士学位直至博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最早开设了成人教育专业课程。在校园向社会开放过程中,美国高校成人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较为稳定的教育模式,成人高等教育体系也在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下逐步形成。更多需要学习的成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找到了各种学习的机会。

大学校园在开放过程中同时向社会积极推广教育。^{[2] P.187}1887年的新法案就规定,大学要把教学功能扩展到校外去。在英国大学推广教育影响下,1891年威斯康星和堪萨斯大学成立推广部,1892年芝加哥大学也成立了推广部,大学推广教育逐渐普及并形成制度。1915年,美国全国大学推广部联合会正式成立。在教学扩展过程中,教育活动非常广泛,如系统讲演、夜间班级讲座、函授课程、讨论会,后又扩展到短期课程、活动图书馆、咨询服务、巡回教学等。直到今天,美国的大学和学院还相当重视推广教育工作,把从事成人推广教育视为大学和学院的重要功能之一。美国现有3600多所普通高校,其中有3/4兼办成人教育,成人教育中有44%的学员是由普通高校系统培养的。许多大学设立继续教育部、继续教育学院或者继续教育中心。美国大学把教育推广作为其重要的3大任务之一。特别是在终身教育观的影响下,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渐成为国家的基本教育策略。美国成人教育发展到终身教育阶段,不仅从法令制度上保证了成人教育的终身化,而且从机构设施上创造条件,努力开展终身教育实践。为了人们终身学习的需要,美国逐步建立起一个人人终生学习的社会,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社会,一个无学习障碍的社会,一个适应各年龄阶段社会成员的社会,一个以终身教育体系为基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成人处在教育、劳动、再教育、再劳动的过程中,知识信息得到不断传递、补充、更新、再传递、再

补充、再更新。

2. 通过大学教育实现继续教育的创新发展模式。

美国高等学校普遍实行普通教育和继续教育相融合的教育模式。美国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布拉德马斯曾说过“成人高等教育不是用来填充学校金库的下钱的奶牛”,成人高等教育正逐步成为美国大学所关注的中心。大学和学院作为美国实施成人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机构,几乎所有的全日制高等院校都设立了继续教育部、继续教育中心等成人教育机构。

开展成人高等教育是美国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体现。据美国大学委员会统计,1988年在全美4年制大学中攻读各种学位的成人学生共计600余万人,占注册攻读学位总数的45%,加上非攻读学位的成年学生,总数高达1200万人,其中在职人员占70%,妇女占40%。美国成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于1989年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说,在他们调查的1000户家庭中,每户在过去两年内至少有一名年龄在25岁以上的成年人在大学里攻读某种学位。现在,约有1/4的美国人是通过成人高等教育重新获取了学位。有人认为,在今后数十年的时间内,这种趋势将有增无减。^[1]

大力发展两年制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特色。社区学院或职业技术学院的全日制学生中约有40%属于就业后的继续教育学生。学生来源有些是企业委托学校培训的在职人员,更多的是当地居民自己来校学习。具有多种选择性、综合性、实用性、开放性等特点的社区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越来越受美国政府的重视和鼓励。美国社区学院作为独创的形式,逐渐成为美国成人高等教育中最有活力的一个办学机构,培养了大批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

3. 产学研密切结合的教学模式。

美国大学和学院开展的成人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就是实行产学研密切结合的教学模式。很多高校都得到了来自政府、企业、个人的大量资金投入,为继续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多物质保障。

为适应继续教育层次高级化的趋势,美国大学通过与企业联网,为企业科研人员的继续教育提供便利。“硅谷”的大部分企业都是斯坦福大学电视教育网的成员,旧金山海湾区35英里以内的企业科研人员还可以接收到斯坦福大学利用微波传输系统播放的课堂现场,企业员工在企业内就可以如同教室里的学生一样向老师提问和参加讨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科研人员还可以从高速网上点播大学的教育课件。

在师资安排上,继续教育课程主要由校内各专业教师兼职和志愿服务承担,企业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根据继续教育的对象组织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法。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继续教育学生中藏龙卧虎者很多。95%的学生有学士学位,约1/3的人拥有硕士学位,甚至还有博士。^[3]这些人来学习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期待在现有职位中干得更出色,他们只想学技术、接受培训,而

并不在乎拿学位。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学相当不易。为此,学校从各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请来不少“重量级”人物担任授课教师,而且不少课程是进行一对一教学。

三、借鉴与启示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多形式、多层次的成人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据统计,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561.78万人,毕业生306.8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436.07万人,毕业生166.79万人。但是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却远远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人高等教育和社会的界限比较明显,成人高等教育的巨大社会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借鉴美国成人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提出以下设想:

1. 走成人教育法制化道路。

美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国家运用立法的方式对成人教育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是确保成人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美国对成人教育立法工作高度重视的程度可居世界之冠。自19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有关成人教育的立法已有十余种,尤其是1966年由联邦政府出台并颁布的《成人教育法》,对美国成人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师资培训、管理、经营等问题都做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并不断修改补充加以完善,对美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我国当前的成人教育立法工作则显得比较薄弱,多年来,我国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为了加快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也颁布了许多政策、法令,但这些政策法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的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是一种原则性的法令,没有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对各级成人教育的投入力度,没有解决各地发展成人教育所急需的经费和师资等重大问题,因而这些法令在实际工作中很难贯彻执行,对我国成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成人高等教育在普通高校甚至在社会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没有得到有效地确立,有时政府部门的随意性的政府指令和不切实际管理决策就势必严重影响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借鉴美国颁布成人教育法令的经验,加大我国成人教育立法的可操作性,在我国的成人教育立法中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明确各级政府对成人教育的投入力度,明确成人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明确成人高等教育在创建终身社会、学习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继续教育在国家法令的指导下健康快速发展。

2. 探求适应国情的成人教育发展道路。

纵观美国高校开展成人高等教育的过程,成人教育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时代性,既有力地补充了普通高等教育,又适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以及终身教育观的全面落实。在美国普通高校开设职业证书课程是最常见的一种课程类型,也是吸引学生人数最多的课程。这类课程与职业关系密切,是针对职业要求设置的专门化课程,用以拓展和加深学习者现有的知识与技能,是已有学位教育的补充。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成人高等教育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怪圈,国家与政府强调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却又因国情及高等教育的现状,面临“抢夺”普通高等教育资源、限制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我国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应该勇于创新,在现有的条件下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学习美国经验,在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上闯出新路,积极开展“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让学生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基本的理论,在现有制度下开展学历教育;另一方面结合学历教育,主要是函授、业余学历教育,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开展社会急需的职业技能证书的培训和教学,适当地让他们到企业、工厂实习,增强实践能力。培养既具有学历层次又具有技能证书,还具有实际的实践动手能力,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必须的技术人才。

3. 加强校企合作,建立社会师资队伍。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成人教育往往以共同享有高校资源和师资队伍作为重要的推广要素,成人高等教育没有充分发挥其教育形式多样化、层次化、开放性的特点,高等教育和社会、和企业的界限过于明确。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经验,加强校企合作,开展企业需要的课程,积极探索企业员工培训、学历教育甚至是学位教育,同时结合高校学科及专业特点,聘请高学位、高学历的企业人士走进校园,建立较为稳定又相对灵活的社会师资队伍,模糊高校和社会、企业的界限,使成人高等教育不仅仅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更应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黄日强,刘芳.美国的成人高等教育综述[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
- [2] 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3] 赵玉林.美国大学继续教育的基本经验[J].继续教育,2003(4).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国立清华大学的现代化、独立化改革*

——罗家伦与清华大学

李 涛 陈 玉 玲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清华大学始于“留美预备学校”,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高校。1928年,罗家伦长清华大学后,推行“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政策,真正造就了一个现代化、独立化的清华大学。罗家伦长清华时期;“改隶废董”、教授治校、延聘名师、改组学科、重视学术研究,是清华大学发展的转折期。

[关键词] 罗家伦; 清华大学; 改隶废董; 现代化; 学术化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66-04

清华大学起源于美国“退款办学”的“庚款学校”^{〔1〕},先后经过了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复原后的清华大学、新中国建立后的清华大学等阶段。清华大学始于“留美预备学校”,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高校。1925年清华大学部和研究院的建立为清华进一步的“独立化”、“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8年,罗家伦长清华大学后,推行“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政策,真正造就了一个现代化、独立化的清华大学。罗家伦长清华时期;“改隶废董”、教授治校、延聘名师、改组学科、重视学术研究,是清华大学发展的转折期。学者苏云峰认为:“历史是不能切断的,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时开启了日后新的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2〕}

罗家伦,字志希,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他早年接受家塾式传统教育,17岁入上海震旦公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在北大期间,他深受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的爱重和影响,与傅斯年创办新潮社,并负责《新潮》杂志编辑工作。1919年他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并首先提出“五四运动”的概念。1920年北大毕业,受爱国实业家穆藕初和出版家张元济的资助,罗家伦先游学于美、德、法、英四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克伯屈等名师专研教育哲学和思想史,这为他回国后在大学成就一番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游学期间,罗家伦废寝忘食,苦心钻研历

史和哲学,翻译了《思想自由史》,著成《科学与玄学》。他在写给恋人的信中说:“我闻‘君子爱人以德’,很相信这句话,所以事事都从学问事业等大处着想。成败系另一问题,但力之所及,必尽其力而为之。”^{〔3〕}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罗家伦毕生做学问、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近7年美国 and 欧洲现代文化教育的浸润,造就了“现代化的”罗家伦,使其不但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精神和专业体系,同时也建立起了自己清晰的教育观念和办学之道。1926年罗家伦留学归来,随后以战地政务委员的身份协助蒋介石北伐,成为北伐统一有功人员之一,深受蒋氏器重。在北伐途中发生济南惨案,“罗氏奉命与熊式辉到济南与日军司令福田彦助谈判失败,深受刺激,爱国思想更为坚定。”^{〔4〕}罗家伦先后任清华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代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台湾考试院院长等职。

一、现代化、独立化改革初露端倪:罗家伦长校前的清华学校

1911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民国后改为清华学校。清华学校从建立就表现出“不独立、落后”,清华的经费是由美国退还的战争赔款,校政和学生活动操纵在外交部和美国使馆手中,教务则为美国教员把持。从一诞生清华就是不独立的,“清华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4〕}美国使馆、清华董事会、美国教员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清华学校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阻碍了清华学校的现代化和独立化。没有美国人提供的现代学校理念和制度,清华学校

*[收稿日期] 2008-09-07

[作者简介] 李涛(1983-),男,河北保定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玉玲(1983-),女,四川广安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难以完成现代化。董事会、基金会、美国公使对清华早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清华的多数美国教员,也是“余多不干涉校政,或从事与教学无关的政治性活动,对清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 I P.136]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虽然外国势力和本国保守势力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客观上他们逐渐成为逆流。清华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缩影,清华的外国势力和本国保守势力终为历史的车轮碾碎。清华学校董事会和美国公使馆不应该再成为清华发展的障碍,清华学校必须改革,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的历史任务是清华现代化、独立化发展的动力源。

罗氏长校前周诒春校长和曹云祥校长已初步推动了清华的现代化、独立化改革。

1. 清华学校大学部的建立。

早在1916年,清华校长周诒春就有拟建大学的建议。他提出添办大学的理由:“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期,以节学费”;“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可谋善后以图久远”^[6 I P.45]。周诒春校长出于经费、学程方面的考虑,开始着手在课程、教员和校舍、设备等方面,按照大学的标准筹划、办理。张煜全继任校长后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停办并取消中等科,以其资源和经费改办大学,高等科的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但其宗旨不外乎选派高级毕业生,赴美研究高深之学识^[7 I P.69]。1922年,曹云祥到任后,清华学校的改办大学计划,才由酝酿阶段正式进入关键的实施阶段。曹云祥任用了清华第二批留美学生张彭春为教务长,并支持“少壮派”对清华的改革。曹云祥敏锐地觉察到清华学校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1911-1916预备留美学校时期(相当于美国高小和中学教育程度);1916-1921美国式基础大学时期(相当于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教育程度)。”^[8 I P.70]不满于此,曹云祥提出了一个“十八年(一九二一—一九四零)计划”,^[9 I P.46]建设中国自己的大学,达到本科水平,留学生直接到美国大学院研习研究生,既可以缩短留学时间、节约留学费用,又可以得到更高的学位,一举多得。自此,清华大学的初步基础,开始形成。^[9 I P.49]清华迈出了现代化、独立化改革的第一步。

2. 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建立。

曹云祥并不满足于大学,还有更高层次的理想,要“注重独立而有系统之思想”,按照“书院制或学徒式”办法培养学生,这就是高深的学术机关,即研究院。曹云祥认为“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10 I P.376]由于经费所限,并且曹云祥认为当前紧要的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11 I P.71]清华汇集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学校迈出了现代化、独立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3. 清华学校民主治校的初步形成。

清华学校模仿美国的大学体制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源于美国民主治校的体制,它对于克服积弊已久的官本位体制和习气曾起到积极作用。后来董事会成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校长权力削弱,实际上成了董事会专权。曹云祥上书外交部:“董事会问题不能解决,则校务一日不能发展,纵有种种计划,亦属空言无补。”^[9 I P.16]北京政府受制于美国,曹云祥受制于外交部和董事会,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后虽经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改组了董事会,但董事会职权仍未改变,校政受制于董事会的局面仍未改变。清华“少壮派”极力反对官僚政客操控学校,主张教授治校,成为清华民主治校改革的主力军。1926年,学校成立“改组委员会”,制定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成立教授会,设评议会。“教授治校”自此开始。

二、现代化、独立化改革 罗家伦长清华大学

1928-1931年北方处在频繁的战争中,是清华动荡不安,同时也充满希望的时代。^[2 I P.1]1928年8月,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随后任命31岁的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他出长清华,因蒋氏“对罗先生异常器重”^[2 I PP.187-188]及蔡元培推荐。罗氏上任伊始,就申明“谋造成国立清华大学学术独立发展之一主要基础,以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13 I P.350]留学德国期间,置身于柏林大学这所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大学,罗家伦看到和体悟到了德国人在战败后的选择与境界。德国人不是拿钱去发展经济、发展国防,而是集中全国资源,开拓一块最自由的天地,建起柏林大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精神上的强大,只有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这种见识和眼界,无疑给罗家伦巨大的触动和启发,也为他后来的教育之路明确了航向。罗氏怀着国民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学术思想来改革清华,实现“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罗氏长校是国民革命寻求民族独立的反映,学术化与其说是罗氏个人的理想,不如说是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理想。

1. 改隶废董。

“改隶废董”是“要求将清华改归教育部管辖,并废除董事会制度。”^[2 I P.24]北伐胜利后,外交部“深知清华是外交部部长的一个财源,也是外交部的一个禁脔,哪里肯放松,仍旧要清华归外交部主管。”^[14 I P.128]外交部同大学院争夺清华管理权,罗氏认为清华归外交部控制,“改革是困难的,发展也是畸形的”,最后外交部提出“由大学院和外交部共同管理,就应该设一个董事会,代表两部行使职权。”^[14 I PP.128-129]罗氏长清华后处处受到“两部一董”制管辖的制肘,感叹“所以我到校以后,第一年的许多障碍就从此而生。”^[14 I P.129]1928年国民革命军收复北京,罗氏因担任战地政务委员,在接收外交部的时候,发现一个英国会计事务所审核清华基金帐目的报告。罗氏翻阅后发现“清华基金总额已达五百多万国币,但是实数只有二百三、四十万,一半以上都损失了。”^[14 I P.136]损失部分大都被人以股

票、公债、存款等“暗箱操作”方式入了私人腰包，诸如此类，令人发指。罗氏发现基金的秘密，就带了一个副本到大学院报告，决心彻查清华的基金和争取清华脱离外交部的控制，纳入大学系统。1928年9月，清华成立了由外交部和大学院共管的新董事会，函聘蔡元培、杨铨、张歆海、唐悦良、任鸿隽、李书华、余同甲、凌冰、朱胡彬夏等9人为董事。新董事会拥有很大的权力；新的董事会几乎取代清华评议会原有功能。^[2 I P. 20]在新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期间，罗氏提出了一个积极大胆的学校扩张计划，即动用清华基金85万元，兴建男女生宿舍、自然历史馆、化学实验室、扩充图书馆、办公室和扩充图书设备。董事会对此激进的计划难以接受，罗氏则批评基金会管理不当，双方不欢而散。1929年罗氏南下参加董事会第二次会议，董事会仍不同意罗氏的计划，罗氏和同去的冯友兰均感不快，亦十分失望。清华师生得知消息后均十分愤慨，董事会“暗箱操作”；不为向往民主的师生所满，趁政局转变之际，要求改革，正于罗家伦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2 I P. 24]现代化、独立化的时代要求使清华师生和罗校长并肩奋斗。清华全体评议员向教授会集体辞职，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大会，师生分别提出类似的要求——废除董事会、改归教育部、整顿基金，取消董事会第一、二次会议之有关决议。罗氏携带教授会的决议亲往南京交涉，学生代表曹盛德等三人则带学生意见径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清华全体学生电告南京蒋主席，指陈董事会和外交部对清华的危害，要求以革命之精神革除弊政。罗氏先到美国大使馆，顺说美国公使马慕瑞将赔款基金完全交中国管理，“马慕瑞究竟是与学术有关系的人，居然答应我了。”^[14 I P. 137]董事会召开，Price代表美国使馆参加，因罗氏在北伐时与其有故交，Price完全同意了罗氏的主张，马慕瑞的态度也因此更加坚定。罗氏得到美国公使的支持，外交部再也找不到外交的借口。罗氏在基金会开会的前夕通过《申报》等四大报纸，向上海新闻界披露并“把清华基金的内幕完全揭布。”^[14 I P. 138]罗氏面陈蒋主席获其首肯，并游说陈果夫、蔡廷闿、孙科等国民党上层人物。1929年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罗氏草拟、陈果夫提出的提案。至此，罗家伦已从制度上将所有阻碍清华大学发展的束缚和羁绊全部去除。^[15 I P. 308]之后，罗氏请行政院院长蔡廷闿写了“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立即制成长牌，悬挂于校门，正式成立清华大学。^[16 I P. 309]

2. 学术化——“学术独立，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础”。

名教授是学术发达首要的条件。罗氏非常重视教授的选择和提高学术的标准，认为“一个大学要办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授得人。”^[14 I P. 131]对于成绩优良的外籍教员，罗氏不仅续聘，而且加薪。对于那些“不学无术而且借外力干涉校政的洋教员，更觉得有彻底甄别的必要。”^[14 I P. 13]聘请新教授，罗氏有一坚定的原则：“以请有实学求进益而热心任事的专门家为宜，不必定聘名震一时的名士。”^[13 I P. 451]基于这一思路，罗氏对清华原有55名教授筛选甄别，结果只有18名成绩优良者续聘。罗氏还专门组织成立聘任委员

会，由名教授组成，专事进一步延揽内外专家学者，使得教授聘任制度化。罗氏遵循其原则行事，得罪了許多人，为以后的离职埋下了祸根，但确实为清华聘请到了一批实力派教授。罗家伦时期聘请到的国内著名学者有：萨本栋、萨本铁、周培源、杨武之、李继侗、杨树达、朱自清、俞平伯、冯友兰、叶公超、浦薛风、陈总、萧迈。罗氏既去掉了若干不学无术的外籍教员，同时聘请了几位第一流的外国学者，包括：剑桥大学的教授I·A·Richards、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司法教授Quincy Wright、哥伦比亚大学史学系教授James T·Shotwell。“他们不但是外国正式的教授，而且是国际间著名的第一流学者。”^[14 I P. 133]罗氏长校前，虽说已预备改大学，可是留美预备制的中等和高等科，仍然照常办理。学校的程度尚待提高，院系、课程需要调整。罗氏将清华有名无实的系如工程、农学、体育、音乐等一律取消，成立文、理、法3个学院，预备以文、理学院为基础和中心向其他部门和学科滋长和延伸。罗氏这一构想“多少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而柏林大学的浸润，更使他相信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他还重新订立各系的教育方针，改变课程杂乱无章编排的情况，安排军事训练课。在招生方面，“入学考试一定要严格而公平”，罗氏绝不拿学生的学籍做人情。然而破格录取钱钟书，显示了清华的新风气。罗氏认为“男女教育是要平等的”，实施招收女生政策，为清华的一项突破。罗氏为促进学生学习和研究，同时照顾贫困学生，专门设立了特别学绩奖金和普通学绩奖金。^[13 I P. 456]前者供成绩优良者申请，后者供家庭贫困者申请。

罗氏初到清华考察后认为：“校舍和环境都很好，学风也好，可是图书仪器等等，至多不过普通美国小型大学一年级的设备。”^[14 I P. 127]罗氏认为要搞好学术，除了教员要有研究兴趣和固定的生活之外，就是“学校必须有相当的设备”。罗氏对此十分看重，以致引发与董事会的矛盾。罗氏到校前，清华只有大礼堂、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四座建筑，不仅规模小，而且毫无整体的安排。罗氏把整个校址另划蓝图，主持兴建图书馆、生物馆、男生宿舍、化学馆、气象台、水利工程实验室等。罗氏最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和图书的添置，图书馆“应当留最大的余地，做书库的扩充”。规模宏大的新图书馆为清华的师生学习研究服务，庄严伟大的阅览室令学生生好学之心；几十间教授所用的小房间，便利其看书研究，养成以图书馆为家的习惯。罗氏在《国立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中，规定自1929年起，图书仪器费至少应占20%，建筑费占10%。^[17 I PP. 28-29]罗氏在杭州省亲时，偶遇一位故交，得知某江浙藏书家欲出售其藏书，罗家伦为清华着想，电促图书馆主任洪有丰来议价购书，最终购得四万册的元明清古籍善本和江浙地方志。

3. 廉洁化、民主化、纪律化。

罗氏到校之初即提出“廉洁化，财政公开，大家监督”^[13 I P. 451]，尤重视消除浪费，提高行政效率。罗氏认为“只有尽量节省行政费用，来从事学术建设，才是办学的正轨。”^[14 I P. 135]罗氏大力改良行政组织，裁去多余的招考处、职

业指导部与会务室,合并中、英文文案处;“大举裁去冗员23人使职员由1927年度之95人,减为1928年度之72人。”^[13 I P. 455-471]罗氏任职期间,裁减职员薪俸节约16000元,煤电开销18000元,此外,还裁减留美监督处职员名额和经费,首次公布清华账目,使校内外人士得知真相。^[13 I P. 478]

罗氏到校前,清华初步建立起了以教授治校为核心的民主治校体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政权不统一,各自为政,地方超过中央的力量,教育上表现为“地方化”。清华师生民主意识较强,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自由主义泛滥。然而,1928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地方势力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国民政府以高度的革命精神,整顿过去自由散漫的教育,即“教育的中央化”。罗氏削减“评议会”和“教授会”的权力,加强中央教育主管机关和校长的权力。^[2 I P. 5]实施校长集权治校,削减清华教授治校权力,是历史的必然,这并非罗氏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清华教授当然不满,罗氏为办好清华,为减少改革阻力,赋予了教授较多的权力,基本上维持了清华教授治校的特色。

上任伊始,罗氏就提出“纪律化,要推行军事化管理,养成有秩序,有组织,能令受急,急公好义的精神。”^[13 I P. 469]纪律化具体体现为举办“总理纪念周”,进行党化教育的“精神训练”,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军事训练。“纪律化”是清华“中央化”的主要措施和表现之一,它的效果一般,不为师生所欢迎。

三、罗家伦的去职

1930年,汪精卫和阎锡山与南京决裂,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控制北方。罗氏作为国民党人,且甚为蒋所器重,几乎是中央在清华的代理人,此时“非走不可”。^[18 I P. 72-77]中央失去对北方的控制,是中央化的代表——罗家伦离职的重要原因。此外,阎锡山企图插手清华,他利用清华师生的“小团体主义”和亲信鲍明铃阴谋煽动学生驱逐罗氏。

战争只是罗氏离职的重要原因和导火索。清华师生同罗氏的矛盾,激进改革触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才是罗氏离职的深层次原因。罗氏削减“评议会”和“教授会”的权力,令清华教授不满。罗氏在延聘教授时一味坚持“学术化”的原则,多次拒绝聘任权势人物举荐的教员,这对罗氏主持清华是十分不利的。罗氏依从中央旨意推行纪律化,客观上不为大多数民主师生所欢迎,成为“钳制言论,束缚同学”的借口。除此之外,罗氏激进式改革中的某些做法,势必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比如要求全体学生缴纳学费,为学生所不悦,裁撤冗员,厉行节俭,以及废除董事会,改归教育部等,均为一些人所不快。清华师生历来有“小团体主义”的传统,主张“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和“校友治校”^[19 I P. 101]。罗氏为北京大学毕业,到任时带来校友冯友兰、杨振声为秘书长和教务长,为清华派看不起。

1930年,罗氏接受冯友兰和杨振声的建议,以“校风凌悌”为由辞职。虽然罗氏在改革过程中与师生产生诸多矛盾,但其改革的做法、过程及成效还是基本为师生所认同的,罗氏第二次辞职时,教授、学生和教育部曾四度挽留。

长期以来,学术界未对罗家伦作客观的评价。其实罗氏继承前任周诒春、曹云祥的历史使命,对清华进行现代化、独立化改革,实在是功不可没。罗氏力主清华废除董事会,隶属教育部,健全清华基金管理,延聘海内外实力派学者,大力购置图书仪器,调整院系、提高水平等等,功勋卓著。其现代化、独立化的改革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 中华教育改进社丛刊之二 [A].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 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 - 1937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3] 罗久芳. 罗家伦和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4]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5] 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11 - 1929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6] 周诒春. 详外交部文. 为逐渐扩充学程, 预备设立大学事. 1916 - 07 - 27 清华大学档案: 全宗号 1 目录号 1 案卷号 3 [A].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7] 曹云祥. 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 [J]. 清华周刊十周年纪念增刊, 1924.
- [8] 许康, 劳汉生.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泰罗——曹云祥的生平与事业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9(6).
- [9]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0]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 [Z].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 [11] 吴宓. 清华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 [J]. 清华周刊, 1926(351).
- [12] 郭廷以. 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 [M]. 南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7.
- [13] 罗家伦. 罗家伦先生文存(一) [C]. 台北: 台湾国使馆, 1976.
- [14] 罗家伦. 我和清华大学 [A]. 罗久芳. 罗家伦和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 [C].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15] 周川, 黄旭. 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4.
- [16] 冯友兰. 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
- [17] 罗家伦. 国立清华大学校务进行计划大纲(单行本) [A]. 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 1928 - 1937 [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8]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 [19] 张德昌. 我们对于校事的态度 [A].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责任编辑 光 翟)

朱智贤儿童自治思想探微*

——纪念朱智贤教授诞辰100周年

王芳 端木凡义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朱智贤先生的儿童自治思想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注意儿童心理特征的发展、正确处理师生关系,不但对于当时各中小学校儿童自治组织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还对当今中小学在思想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中的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朱智贤; 儿童自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70-02

朱智贤1908年12月31日生于江苏赣榆,1991年3月5日在北京逝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他将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和心理学研究,据统计,他共有二百余种论著。由朱智贤先生主持编纂的《心理学大词典》获得国家级第四届优秀图书评比一等奖。^[1]朱智贤先生在心理学方面的贡献可谓是巨大的,这也是受人们关注比较多的方面,然而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在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受到关注的并不多。朱智贤先生20岁时从师范学校毕业就走上了教师岗位,在工作中积极从事研究。在1928年出版的《儿童自治概论》就是朱智贤先生总结工作经验,并结合理论知识的杰作,全面介绍了他的儿童自治教育思想。

一、朱智贤儿童自治思想主要内容

1. 对儿童自治的定义。朱智贤主要是从“自治”的含义来对“儿童自治”这个概念进行定义的。与同时代的其他提倡儿童自治的教育家的定义不同,朱智贤认为“自治”包括4种意义:自信、自立、自强、自制。

自信是一个人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和定位,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能力,这是做一切事情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有了自信之后,还要有自立,就是要本着自信去处理自己的事务,不依赖于别人;自强便是具有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也是一种不断进步的追求;在积极的方面要自信、自立、自强,在面对消极的方面时还要做到自制,能够管住自己,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都能合理地进行,这就是“自治”。

“儿童自治”是关于儿童的,是依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经验、程度,以培植其自信力,在积极方面,能自立自强,努力进取,在消极方面,能管束自己,制止坏的冲动,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团体生活都合理的进行。^{[2] P.6}在关于儿童自治的定义中,朱智贤较早提出了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等来进行活动,这是在当时同类问题探讨中提出的比较超前的理论。

2. 儿童自治的意义及价值。“儿童自治”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小学校教育中兴起并广泛实行的一种教育方式。朱智贤认为,实行儿童自治意义重大。它是时代思潮进步的产物。他认为,时代进步,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在那样一个“民主”的时代里,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也应该是“民主”的,儿童自治教育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是“这新时代新思潮的产儿”。^{[2] P.3}

朱智贤先生从其学校教育价值、社会价值、对儿童发展价值等几个方面来说明“儿童自治”的价值。他认为:在学校教育价值方面,“社会训育”是训育方法上的最高方式,也是最有价值最有效的方式,而儿童自治是实现社会训育的最佳方法,所以是合乎训育的最高方式;在社会价值方面,学校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学校的一切活动都是要与同时代的社会趋势相呼应的。在民权时代,儿童自治是在学校中练习民权的最好方式;在儿童自身发展价值方面,能够教会儿童做人做事的方法,使学生不但能顺应社会环境,而且将来能改造社会环境,儿童自治在学校的实施即能够在活动中让儿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学会做人做事。^{[2] PP.7-9}

3. 儿童自治的目标。儿童自治的最高目标是将儿童培

*[收稿日期] 2008-09-10

[作者简介] 王芳(1983-),女,云南昆明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端木凡义(1985-),女,河南濮阳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

养成“社会上健全的干员和民族利益的拥护者”，为实现这个最高目标，朱智贤又提出了两条具体的目标。第一，儿童自治要有助学校事业的进行，在学校进行儿童自治的时候，让儿童有组织有系统地做一些例如维持秩序、商店管理、儿童刊物编辑之类的事情，既能培养儿童动手能力，也可对学校事业有所帮助。第二，儿童自治应该有助于融洽师生关系，在以往的学校中教师和学生没有太多的机会沟通、交流，而在儿童自治的过程中，学生协助教师管理学校事务，在共同完成事务的过程中就有较多交流的机会，以此融洽师生精神与情感。^{[2] P. 10-13}

二、朱智贤儿童自治思想特点

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儿童自治概论》一书完成于1928年，那时朱先生从师范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留在母校附属小学任级任教师兼儿童自治指导主任。^{[3] P. 4-5}他对儿童自治教育的研究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并重，对于当时各地施行的儿童自治教育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书中在介绍儿童自治的组织方式和指导方式的时候，列举了作者工作过的海中西小和海中实验小学的儿童自治组织和实施情况，以此分析儿童自治的组织原则、实施步骤和注意事项。在介绍儿童“公安队”的组织和管理方法时，作者仔细讲述了成立的全过程，讲述了刚刚成立之初儿童不会遵守秩序，只会乱动，在这个时候教师不能直接制止和罚打学生，应该积极引导他们，让他们慢慢懂得自我管理的必要性和自我管理的方法。该书的分析和介绍做到了通俗易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2. 注意儿童心理发展特征。在论述如何在学校进行儿童自治以及儿童自治应注意的问题时，朱智贤提出注意儿童心理发展的特征，这一点是在当时很多论述儿童自治的教育家没有注意到的方面。在《儿童自治概论》一书中，多次提到了儿童自治组织要合于儿童心理，这是儿童自治组织的重要原则。朱智贤指出一般的儿童自治组织的缺点就是过多重视组织的完备，忽略了儿童的心理。在介绍儿童自治组织前的准备时，朱智贤先生首先提出要“调查儿童的程度与能力”，他认为这是开办儿童自治组织之前最为重要的环节，不了解儿童的实际状况就很难建立正确、合理的儿童自治组织，容易将儿童当作“试验品、牺牲品，这是最不道德的事”^{[4] P. 17}。这一点也是当时实施儿童自治组织实践中被忽略的一点，并且在当时关于儿童自治指导的同类著作中也很少提及的一点。

3. 强调正确处理师生关系。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受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师生关系的问题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热门话题，究竟是教师为主体还是学生为主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的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认为应该将儿童放在教育和教学的中心位置，有的甚至完全否定了教师在教学和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儿童自治这样一种学校管理方式也是在儿童主导的思想指导之下形成的，在实施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的学校只是将“儿童自治”作为招牌，实际上还是采

取传统的管理方式。而有的学校则主张儿童完全自己管理自己，教师采取放任态度。针对这些情况，朱智贤先生提出在提倡儿童本位的同时不否定教师的管理作用。

他认为儿童自治不是对儿童行为的放任自流，而是儿童在教师的指导之下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所谓老师，是指导者，不是命令者”，但是也不能对学生不顾不管。^{[2] P. 38-39}儿童的一举一动不可能是合理无误的，在儿童自治能力完全形成之前，需要教师随时随地加以指导，发现不合理的行为就立即指正。朱智贤将这种指导方法形象地称为“相机指导”，认为在实施儿童自治时教师应该给学生足够的自主学习机会，但是也不能让学生放任自流，正确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健康成长。

三、对朱智贤儿童自治思想的评价

朱智贤先生通过自身实践、反思，再与理论结合，提出了儿童自治理论，对当时儿童自治的实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儿童自治的实施要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原则，以及教师的“相机指导”理论等都为当时儿童自治在各个学校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今教育中强调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能一味地灌输知识，要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注重在教育教学中启发、诱导学生，让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机会，进行知识建构，这一点与儿童自治思想不谋而合。儿童自治思想要求学生成立自我管理委员会，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教师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让学生充分地发挥自主性，这样的思想可以用于现在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特别是朱智贤先生提出的“相机指导”理论，对于现在中小学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朱智贤先生所提出的儿童自治指导是在杜威等西方教育家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之下产生的。由儿童自己管理自己、让儿童在实践中获取知识，这些都是对于儿童学习自主性的充分尊重，但是对于儿童基础知识的获得却是时效性比较低的。基础知识的教授需要教师将知识进行整合，并在课堂上集中讲解才能保证知识的系统传授和学生的高效率接受，特别是对于自主学习能力较低的中、小学生来说更是难以完全在实践活动中完成基础知识的自主获得。这一点也是儿童中心论以及儿童自治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单纯地依靠儿童自主学习来获取知识，使得当时中小学教育水平严重下滑，不得不恢复以教师讲授和考试为主要手段的教育方式。

[参考文献]

- [1]《心理发展与教育》编辑部. 沉痛悼念朱智贤教授[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1(3).
- [2]朱智贤. 儿童自治概论[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2.
- [3]庄永龄. 现代教育家、心理学家朱智贤[A]. 朱智贤全集(第一卷)[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4]朱智贤. 儿童教育概论[A]. 朱智贤全集(第一卷)[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滥觞*

——《周易·蒙卦》教育思想发微

陈柏华

(江苏省如皋中学, 江苏如皋 226500)

[摘要] 《蒙卦》是《周易》里集中而系统地表述其教育思想的专卦。其在阐明教育的地位、教育的意义、教育的内容与目标的意义, 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严师重教, 诚其心意, 创造条件, 求其志应, 关爱童蒙, 有教无类, 教训有度, 言止有方, 见几而作, 因时而动”等基本教育教学原则。

[关键词] 周易; 蒙卦; 教育思想; 教学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72-04

《周易》(此指“古经”)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部形式特殊、表意别致的著作。它对商周时期的世风人情、伦理道德、政治教化以及当时的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有反映, 因而《易传》说它“广大悉备”, 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1] P. 283上};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遗^{[1] P. 246上}”。这部商周时期的百科全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现当代学人运用新观点、新方法, 从多方面对《周易》进行发掘、整理和总结, 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蕴含于《周易》之中的教育思想却少有人作专题系统的扒梳整理, 以致在我国的教育思想史上忽略了《周易》应有的地位。

《蒙卦》是《周易》里集中而系统地表述其教育思想的专卦, 历来学人对《蒙卦》卦爻辞的具体理解虽有小异, 但均认同其为论教专卦。《彖传》、《象传》、《序卦传》、郑笺、王注、孔疏、程传等均主此义。人们通常把《大学·学记》看作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教育理论文献, 其实《蒙卦》的成文比《学记》还要早七八百年, 应该说《蒙卦》所表述的教育思想才是我国教育思想发生的源头, 只是其表述方式不似《学记》那么直接罢了。正如《系辞传》所说: “其《易》言曲而中, 其事肆而隐^{[1] P. 278下}”, 即《周易》的语言虽然婉约委曲, 论事看上去不着边际, 却处处隐藏着深刻的道理, 并且中心明确。《蒙卦》正是以其在六十四卦中的位置和“曲而中”、“肆而隐”的卦爻辞, 集中而形象地表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地位

《周易》给教育以很高的地位, 它把教育放在人们吃饭

穿衣之上, 这主要反映在卦序的安排上。在《周易》六十四卦中《蒙卦》居第四位, 前《屯》后《需》。《屯》讲的是如何建邦立国, 使混乱无序、四处流荡的人们得以安定, 《需卦》讲的则是饮食之道, 即如何帮助民众获得生活资料, 使之安居乐业, 而《蒙卦》讲的是“君子以果行育德^{[1] P. 56上}”, 如何使人民百姓趋正向善的教化问题。《序卦》云: “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 蒙也, 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 故受之以需。需者, 饮食之道也。^{[1] P. 296下}”这里“物稚不可不养”的“养”就是《蒙卦·彖传》说的“蒙以养正^{[1] P. 56上}”的“养”。《周易》的这种卦序安排很显然是重“道养”轻“物需”的思想反映。它把教育看成是开国兴邦之后的第一要着, 在它看来对民众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对民众生活资料的供给更为急切。对于一个刚刚取代了旧政权的新政权来说, 这种认识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一个新政权是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们是否对它认可, 因此教育也就成了巩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礼记·学记》中“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1] P. 545}”的观点, 则是对《周易》以来教育思想的总结。

二、教育的意义

《周易》之所以给教育如此高的地位, 与其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分不开, 而其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又是以它对个人及人与整个社会间关系的认识为前提。在《周易》看来, 人性本恶, 但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秉性可以通过教育加以转化。如果放弃教育, 听其自然, 势必给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这一

*[收稿日期] 2008-10-19

[作者简介] 陈柏华(1961-), 男, 江苏如皋人, 江苏省如皋中学语文教师, 江苏省特级教师。

思想主要寓寄在《蒙卦》的卦象之中。

“蒙”之为卦：坎下艮上，据《说卦》而论，坎为水有险义，艮为山有止义。古人以“水”喻“险”是十分自然的。对水若听其自专，任其发展，势必广为泛滥，为害无穷。因此《彖传》在“山下有险”之后，紧接着提出了“险而止蒙”^{【1】P.55下}的主张。“蒙者，蒙也，物之稚也”^{【1】P.296下}，就水而言，山中之水为水流之源，正可谓水之“稚”。“险而止蒙”就是主张治水治源，即让水在其源头即受到应有的制约，不使自专，而使之遵山涧而出，化为涓涓流泉，润泽万物，如此“山下出泉”^{【1】P.56上}，则利莫大焉。《蒙卦》显然是以自然界的“山中之水”喻人事，表明它对人的秉性及对教育意义的认识：人之初如同山中之水，虽未涉世，但已存有某些日后足以危及社会的因素，不过《周易》认为人的这种危险性是可以转化的，其转化的主要手段就是教育——“止蒙”、“育德”，且教须及早。及时经过教育并转化成功了的人，将会有益于整个社会，否则，听之任之，其必如失治之水，将会危害到整个社会。这便是“险而止蒙”的真正含义。《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2】P.545}的认识与《周易》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可谓同源之水。

不难看出《周易》已认识到教育是一种改造人性、维护社会安定、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造人性，使人摆脱蒙昧，走向开明，并使其功及社会的教育理想与后来儒家所衍绎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如出一辙。

三、教育的内容与目标

《蒙卦》所论的教育内容与目标，可用《易传》中“止蒙”、“育德”、“养正”^{【1】PP.55下-56上}6个字来概括。先说“止蒙”。《说文》云：“蒙，童蒙也，一曰不明也。”孔颖达疏：“蒙者，微昧暗弱之名”^{【1】P.55下}。“止蒙”即启蒙去蔽，使人有知而聪明。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教育使孩童长知识，多见闻，它包括当时的生产实践与社会实践的种种知识。“（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穡树艺……”^{【3】P.151下-152上}“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稂莠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3】P.252下}“遂人掌邦之野……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穡……”^{【3】P.231上}如此等等都应是属于“止蒙”的内容。再说“育德”。“育德”就是对道德品行的培养。《礼记·大学》开宗明义的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亲，新也）民，在止于至善。”^{【2】P.866}《礼记》中的这一观念也与《周易》“蒙卦”的“育德”观一脉相承。当然这里所讲的“德”并不是空泛的、抽象的，它的具体内容受当时社会制约，与维护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周礼·地官·大司徒》所载：“教敬使民不苟，教让使民不爭，教亲使民不怨，教和使民不乖，教恤使民不怠，教节使民知足等的“十有二教”，^{【3】P.150上}还有所谓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3】P.159下}等等，都是当时“育德”的具体内容。无论是“止蒙”还是“育德”其最

终就在于要使民“止于至善”，达到“养正”的目的。正者，止于一者也。这个“一”就是统治阶级要求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准则。那时的教育就是要把人们培养成为心守于一，行止于一的人，只有这种人才算是合格的“正”产品。总之这些教育内容都是为“化民成俗”、“安抚邦国”这个总体目标服务的。

四、对受教育者的认识

《周易》以为人有差等，不同的人对待教育的态度和受教育的表现不同。《蒙卦》六三、六四、六五三爻列举评议了3种不同类型的受教育者。

第一类心不正，意不诚，求学用心不专。六三爻辞运用比喻的手法对这类受教育者进行了形容：“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1】P.57上}（“勿用娶女”：即勿用行婚娶之礼的女子。金夫，俊美的男士。不有躬：即迷醉忘形之情状。）这种女子见到俊美的男人就不能自持自禁，也无需对方行婚娶之礼，即可轻易地跟着人家私奔。《蒙卦》以这种女子喻缺少自控意志，易受他事他物诱惑的受教育者，这类受教育者其学必不能精专，与受业于弈然心息鸿鹄者同类。所以爻辞结论说：“无攸利”^{【1】P.57上}（攸者，所也）。

第二类既孤陋寡闻，又固步自封。对这类受教育者六四爻辞称之为“困蒙”^{【1】P.57下}，即困于蒙昧而不得开明之谓也。这类受教育者的结果必然是“吝”而不吉的。其何至于此呢？《象传》云：“困蒙之吝，独远实也。”^{【1】P.57下}“独，孤陋少闻也，远，不亲近治蒙者也；实，固步自封，顽而不化也。如此不“吝”而何？”

第三类恭逊承教，心乐于学，六五爻称这类受教育者为“童蒙”^{【1】P.57下}。《说文》：“男有罪曰奴，奴曰童。”“童蒙”即指承受师教心怀如奴一般恭谦顺从之意的蒙者，这类受教育者心正意诚，是极善接纳师之所授的。《象传》云：“童蒙之吉，顺以巽也。”^{【1】P.57下}《说卦》：“巽，入也……为风。”^{【1】P.293上-294下}这是说心诚如童之蒙以恭谨柔顺的态度对待教育，那么师之所传必如风透穴一般入其心窍。如此不“吝”而何？由此可见，早在数千年前的《周易》就已具有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好、中、差的客观认识。同时从一个侧面还表明了教育、教学的成功应该是施教与受教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甚至于《周易》在一定程度上更为看重受教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作用，这与当今教学中强调“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论颇为相通。

五、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1. 严师重教，诚其心意。

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周易》已深深认识到：教育、教学的成败与受教者的学习态度有很大关系。那种“勿用娶女”式和“独远实”的童蒙都是很难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些童蒙的从学态度极不端正。因此《周易》主张教育当从端正童蒙的学习态度入手，提出了“纳妇吉，子克家”^{【1】P.56下}的具体方法。童蒙从师问学，须先行拜师礼、礼成然后教行，譬如男子娶妻，当先行“六礼”，再三以求，尔

后方能迎娶合室,这便是《蒙卦》六二爻辞“纳妇吉,子克家”的含义。所以行礼者,一以验其诚,二以收其威。一句话就是以此严师重教,端正童蒙的学习态度,去其可能有的轻慢懈怠之心。孔子诲人不倦,主张有教无类,可无论是谁,欲成为其门下弟子都得行以束修,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4 I P. 72]孔子如此大家为何斤斤计较于几条干肉呢?就其实质看,这是一种严师重教的手段,以此达到诚其意,正其心的目的。《学记》云:“凡学之道,严(严,尊也)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2 I P. 553]在学生心里师尊则教重,教重则其学必固,孔子深知其道,因此他说:“不重,不威,学则不固。”^[4 I P. 6]孔子之所言所行,与《周易》“纳妇吉,子克家”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后来《礼记·大学》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2 I P. 866]把诚意正心当作做人、为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不也是《周易》从正心诚意入手进行教育这一思想方法的延伸与扩展吗?

2. 创造条件,求其志应。

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还要积极创造条件,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1 I P. 55上],《蒙卦》的这则卦辞就强调了这个问题。“我”指的是施教者,“童蒙求我”并不是说“我”故作姿态,以显师尊,而是说教者当设法让受教育者有主动求教问学的欲望。孔子讲“不愤不启,不悱不发”^[4 I P. 73],也说的是这个道理。“愤”、“悱”都是指学生积极求通求解的心理状态,也即“求我”之态。还有后来《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2 I P. 5]也强调的是这一点。对于“不往教”这类做法《彖传》从心理学的角度做了根本性的解释:“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1 I P. 56上]所谓“志应”,就是在教学活动中受教育者与施教者在思想感情上形成的交感应与的心理态势。《周易》十分看重“交感应与”的作用,认为凡事有感有应则吉,反之则凶。“咸,感也。……二气感应以相与……是以亨。……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1 I P. 140上]反之“天地不交则万物不兴。”^[1 I P. 206上]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具体问题上,《周易》也同样贯彻了这一精神,试想一方欲有所传,一方求有所受,教育、教学何患不成?不过学子的那种“求我”的应与心态决不是自发产生的,它应是教育者积极引导,合理启发的结果。如果说“志应”是学生能精其所学的前提,那么教者的善于创造条件,积极有效地诱导则是学生产生“志应”的前提。《周易》这一原则在我们今天的教学实践中依然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3. 关爱童蒙,有教无类。

《蒙卦》九二爻辞云:“包蒙,吉。”^[1 I P. 56下]“包”于此有两层含义:一是“包容”,对凡有志于学而“求我”者,不论其出生、身份、职业、地位,都一律予以教诲,此正王弼所谓的

“童蒙所归,包而不拒,则远近咸至”。^[1 I P. 56下]这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有教无类”这一思想的最早体现。二是“包养”,即对所有“求我”来学者,都要关心、爱怜、保护。即使对那些困于蒙昧,顽固不化者,以“击蒙”^[1 I P. 57下]治之;对那些懒于思考,再三问询的“读学”者以“不告”^[1 I P. 55上]治之,貌似冷峻,实则都源自一颗仁爱之心。“击蒙”只在“当头棒喝”,促其顿悟,王弼云:“击去童蒙以发其昧者也。”^[1 I P. 57下]这应该是“以果行育德”的体现吧。“不告”只在“读(开导、疏浚)蒙”^[1 I P. 56上],以激其多思,学会自觉迁移而已;“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4 I P. 73]也言此理。

4. 教训有度,言止有方。

《蒙卦》卦辞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之后,系有“利贞”二字^[1 I P. 55上]。利,宜也。贞,正也。“利贞”也有两层含义:(1)是教法的施用须恰到好处,当行则行,该止就止,要努力做到无过无不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施用有度,行使到位。再好的教育、教学法施用没有分寸,都不可能取得理想效果。因此《蒙卦》在说“包蒙吉”之后,又以“纳妇吉”矫正之。就教学中的“待问”而论,如果“不问而告”或“问一告二”,甚或不厌其烦,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不仅会使学子懒于动脑,不善通变迁移其所学,有时还会因为枝繁叶茂,致使学子迷失主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学记》中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2 I P. 554]荀子也说:“不问而告谓之傲(傲:急躁),问一告二谓之囋(囋:唠叨)。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向:响也)矣。”^[5 I P. 6]所以《蒙卦》卦辞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之后紧系以“利贞”二字以戒。《周易》于此也只不过是举此一隅而已,其他则由读者自反。总之如若施教不当,必致学者“隐(痛恨)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2 I P. 550]厌学,抵触情绪难免产生。(2)教者为人必须正派。常言说身教胜于言教,尤其在那种以“育德”、“养正”为教育目的的社会里,教者更须谨其言,慎其行,处处起表率作用。《扬子法言》云:“师者,人之模范也。”《周易·蒙卦》“利贞”的提出恐怕也是与这种认识分不开的。《尚书·舜典》载舜命夔教育青少年时说:“教胥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6 I P. 33]试想教者若不能以此正己,又怎能以此正人?无论从哪方面讲“利贞”的原则都有其积极意义。

5. 见几而作,因时而动。

《周易》言“几”重“时”,主张见几而作,与时偕行。《周易》主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以为果真如此则“其道光明。”^[1 I P. 201下]而“几者,动之微也,吉之先见者也。”^[1 I P. 267下]是“时”的特殊形态。《周易》认为欲“成天下之务”者就必须“研几”、“知几”,并行动果断“见几而作不俟终日”^[1 I P. 276下]。就教育而言,孩童之时便是教之“几”,治蒙就必须自童稚时抓起,因此《蒙卦》开宗便言:“蒙,亨,”即治蒙自幼时起,必前景光明,易成“圣功”。《彖传》也说:“险而止蒙”。《周易》这一启蒙自幼、教育及

早的思想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学记》有“禁之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2〕}（P.551）之语，颜之推有“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言”^{〔7〕}（P.25）的慨叹；民间也有“少年易学老难成”、“桑树枝条趁早粥”之类的俗谚。

教育的年龄有个时机问题，在教育教学的方法施用上也有个时机问题。《蒙卦》初六爻提出了启蒙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发蒙”，指对学子的初始教育，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启蒙”；“利用刑人，用说（说，通‘脱’）桎梏”^{〔1〕}（P.56下）是个比喻，指对幼稚无知而散漫的学子，从一开始就得示之以规矩，以必要的强制手段，对他们加以约束，来知德说：“刑罚立而后教化行。治蒙之初，故利用刑人，以正其法。”^{〔8〕}（P.150）让他们由一开始的不习惯逐渐养成习惯，进而成为自然。就象对待犯人一样，起初收之以牢囚，加之以桎梏，经过一段时间的约束改造之后，再释放他们，他们也能自觉地循规蹈矩了。但这一方法只适用于“发蒙”，在以后的教育中仍然使用这种方法，就会碰壁，因此爻辞紧跟着以“以往吝”^{〔1〕}（P.56下）为戒。

再说“击蒙”，这是《蒙卦》上九爻提出的又一治蒙法则。那时的教育虽说以明德感化为主，但也常常辅之于一定的刑罚，“入学鼓篋，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2〕}（P.548）《象》《尚书》就有“扑作教刑”^{〔6〕}（P.27），“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无刑……”^{〔6〕}（P.40）之类的话。这种教育方法，自其消极方面看，是野蛮的不人道的。但自其积极方面看，表明《周易》作者认识到晓之以理，导之以礼的感化教育不是万能的，这是一；那些顽劣之童虽难以喻于义，却设法采用强制惩戒的手段使之弃邪归正，遏其恶，扬其善，不轻易放任，这应该说既是对受教育者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这是二；同时其中也隐约地显露出几许“因材施教”的天机，这是三。尽管如此，《周易》以为施用“击蒙”的方法，还必须十分慎重，把握准时机。“不利为寇，利御寇”^{〔1〕}（P.57下）讲的就是这一点。即对那些顽劣之蒙在其未有恶作表现时不可“击”，否则便会因出师无名而被人误以为随意侵人，这对治蒙者还是对被治者来说都是无益的。须在他们有了恶作之实，再予猛击，那么这时的击蒙行为在人们心目中便是“御寇”的正义之举了，从而获得人们的理解与支持。这就是《象传》评说的：“利用御寇，上下顺

也”^{〔1〕}（P.58上）。《蒙卦》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这条爻辞的设立，实质上也就讲的一个“因时而化”的问题。《周易》认为只有因时施教才是遵循客观规律的教育。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最有成效的。《观卦·彖传》言：“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1〕}（P.103下）。所谓“神道”就是阴阳随时而化，无过无不及的规律。“以神道设教”就是依据这种大自然的法则，并把它引申应用到教化中来，这样做了就会取得“天下服”的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周易·蒙卦》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发，它涉及到了教育的地位、意义、目标、内容、教育的原则与方法，以及教者与学者的诸多问题，不失为一篇具有相当历史价值和相对完整体系的教育科学论著。就其影响而言，《周易》素有居“群经之首”的特殊地位，其教育思想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可谓是功在当世惠及后代的经典，尽管其所论未可称尽善尽美，但又必须承认其对教育某些问题的认识还是相当深刻的，有些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依然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当然《周易》里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以及对教育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的内容决不仅限于一个《蒙卦》，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对其进行挖掘、整理，更希望能有人把《周易》里更深更广的合理成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加以研究，为教育改革开辟一条独具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 [1] 王弼. 孔颖达. 周易注疏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9.
- [2] 朱彬. 礼记义疏 [M]. 北京 : 中华书局出版社 , 1996.
- [3] 郑玄. 孔颖达. 周礼注疏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0.
- [4]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 中华书局出版社 , 1958.
- [5] 章诗同. 荀子简注 [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74.
- [6] 江濠. 钱宗武. 今古文尚书全译 [M].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1990.
- [7]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0.
- [8] 来知德. 易经来注图解 [M]. 成都 : 巴蜀书社出版 , 1989.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冷战后联合国裁军活动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黄光耀

(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裁军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联合国在国际裁军领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并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也应看到,冷战后新的国际军备形势使联合国的裁军活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联合国; 裁军; 冷战

[中图分类号] D8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76-04

一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自成立伊始就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视为自己追求的首要目标,而进行裁军及军备控制则是联合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但是在冷战时期,由于国际裁军完全被美苏两家操纵和控制,加上美苏长期对抗和争夺,它们把裁军谈判视为发展自己、限制对方、争夺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致使联合国难以采取切实行动实现初衷。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裁军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摆脱冷战体制束缚的联合国在国际裁军领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并取得重要进展,联合国的裁军活动已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

首先,联合国通过动员国际舆论,伸张正义,对军事大国施加道义和政治上的压力,从而形成制止军备竞赛、实现裁军的国际氛围。冷战之后,联合国根据新的世界形势,继续把制止军备竞赛、实现裁军尤其是核裁军,作为其重要议题列入历届大会的议程。通过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及其授权成立的日内瓦40国裁军谈判会议(1996年增加到61个)、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联合国裁军事务部、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联合国秘书处裁军办公室、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等各种机构,联合国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裁军攻势,在联合国内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际裁军讲坛。1989年,第44届联大通过决议,责成裁军审议委员会拟订第三个裁军十年的决议草案。1990年12月4日,第45届联大通过决议,宣布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决议将裁军审议委员会通过的“宣布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的宣言”作为文件向

全球公布,并重申联合国对裁军负有重要责任,所有国家应支持联合国推动裁军进程。联合国呼吁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国家承担特别责任,并在实现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方面实现多边合作同双边和区域努力的相辅相成,充分发挥公众、非政府组织在裁军过程中的作用。此外,联合国还通过向世界提供军备竞赛的信息,通过教科文组织广泛开展裁军宣传与教育,激起全世界人民更加强烈的裁军意识。经过联合国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裁军实现真正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成为全球的共同心声,成为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乃至非政府组织等优先关注的重要问题,真正实现了“有史以来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裁军活动”^{[1] (P.133)}。

其次,联合国推动核裁军与核军控取得重要进展。冷战结束后,核战争的威胁仍是世界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因此实现核裁军和核军备控制仍是联合国关注的焦点。在联合国的推动下,核裁军和核军备控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核裁军方面,1991年7月,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I),双方承诺将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削减到不超过1600件,战略核弹头各6000枚,削减核弹头的数量达到30%;1993年1月,美俄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I),规定在2003年前将各自核弹头削减约三分之二。1997年3月,美俄就第三阶段削减核武器条约达成一致意见,并承诺在2007年之前将各自储存的核弹头削减到2000-2500个。^{[2] (P.112)}由于美俄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拥有国,因此美俄进行实质性的核裁军对于世界核裁军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经过联合国的努力,加入

*[收稿日期] 2008-10-10

[作者简介] 黄光耀(1963-),男,安徽寿县人,江苏教育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

《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不断增加,使《核不扩散条约》在获得普遍性方面取得了关键性发展。1995年4月,在该条约生效后的25年,缔约国召开《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及延长大会。与会国一致决定无限期延长该条约,并通过了《关于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的决定》和《关于〈关于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进程的决定》等决议,以加强对防止核扩散和裁军活动的监督。^{[3] P.236}到2001年为止,除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古巴4个国家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已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从而为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奠定了基础。作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步骤,1993年8月,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通过决议,规定各成员国于1994年1月开始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并决定设立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特别委员会。经过近3年的艰苦谈判,1996年9月,第50届联大终于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条约禁止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进行核爆炸,并为此建立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和国家方式兼用的严密的核查制度,大大弥补了《核不扩散条约》不具备执行条款的重大缺陷。1999年12月,第54届联大通过了“维护和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有关规定,呼吁缔约国全面和严格遵守这一条约,不部署和不转让保护全境的反导系统及其组成部分。

第三,联合国在推动常规军备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裁减和控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冷战后联合国对于常规军备的裁减比冷战时期更为重视。特别是1990年常规武器及军队裁减在欧洲达成重大协议并签订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FE),为联合国的多边裁军审议和谈判提供了动力。1990年,联合国裁审委完成了对常规裁军议题的审议并作出多项建议,呼吁国际社会执行。在常规裁军领域,联合国关注的重点是国际军备转让和军事技术出口问题。为此,联合国建立了常规武器登记制度,以增加军备透明度,建立各国间的信任。1991年12月,第46届联大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对彼此间常规武器贸易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包括作战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系统、作战飞机、攻击直升飞机、军舰、导弹及导弹发射系统等7种常规武器的转让数量、种类、供应国和接受国的情况。联大还要求成员国从1993年起,每年定期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上一年常规武器进出口的数据资料。1993年参加第一次登记的就有关80个国家,其中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此后,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专门设立特设委员会,对军备透明度的一些基本原则及范围进行全面的讨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还通过多轮中东军控会议,明确表示支持建立在联合国秘书长支持下的武器转让制度,原则承诺不向中东地区出口破坏稳定的常规武器。1995年2月,安理会发表声明支持加利秘书长提出的“微裁军”即裁减轻武器问题,并强调应严格执行现有的武器禁运制度,控制常规武器包括小型武器的非法贩运。199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项关于禁止小型和轻武器的非法买卖、扩散的决议,试图建立

相应的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控制机制。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方面,联合国继续作出了努力。1991年,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召开第三次公约审查大会,决定成立政府专家组以研究核查措施。1994年9月,缔约国召开特别大会审议专家组提出的核查措施,缔约国同意设立特别小组就信任措施、核查机制、促进国际合作、定义与标准等领域进行审议和谈判,最终起草一项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作为加强公约执行的附件。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在90年代取得了重要成果。1992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经过长达10年的谈判最终获得通过,并于次年1月正式签署。公约规定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发展、储存、保存、获取、转让和使用,并确定在公约生效的10-15年内消除一切化学武器。这表明人类向着彻底消除毁灭性实战武器方向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化学武器公约的签订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以来唯一的谈判成就,公约制定的严密的核查制度和机制,为将来生物武器的核查机制提供了某些参考。1995年1月公约生效时,共有165个国家签字。1997年4月29日,该公约正式生效。

二

冷战后联合国在裁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联合国“以《反弹道导弹条约》、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制度、以及数十个限制和削减各种武器的协定为基础。”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裁军与军控机制,同时“发展出了一个适应于推进裁军进程的框架:以联合国大会为主要的协商机构,以裁军谈判会议为单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论坛),以经过改革后的裁军委员会作为裁军建议的形成和贯彻机构”^[4]从而奠定了联合国在国际裁军与军控合作领域的中心地位。

然而,联合国在国际裁军进程中作用加强的同时,也应看到,冷战后新的国际军备形势使联合国的裁军活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首先,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严重失衡。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战略的重大调整标志着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世界军事格局的最终完结。在向新世界军事格局的过渡时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美国在进行有限的战略收缩和军事战略调整,但其战略意图已十分明确。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时,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尽管国际战略形势的演变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但总体上安全环境对美国有利,到2015年前是美国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个“机遇期”,美国必须保持扩展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防止出现任何与其对抗的敌对大国,从而确保“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巩固“既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为此,美国制定了全球扩张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增强安全、促进繁荣和推进民主”的战略目标,并据此制定了自己的军事战略。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仍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常规部队和战略核力量,但是应看到,俄罗斯在根本上已经不具备昔日与美国相抗衡的实力和意图。地缘安全上的重大

变化及成堆的国内问题使俄罗斯在战争威胁的估计和战略企图的选择上,已不再把美国作为直接的对手,而把可能与邻国的交战视为战争的基点,强调在本土实施机动防御。俄对外政治和军事战略已大大收缩。美俄军事战略的变化使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是西方第一军事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军备水平最高的国家,其军费开支占世界总数的1/3左右。1998年,美国国防预算为2676亿美元,1999年增到2706亿,2001年更达3099亿。^{[6] (P.205)}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在总体上已大大超过俄罗斯。很显然,美国已成为当前世界唯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使用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已从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军事大国,下降为二、三流的国家。2003年3月美英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使全球的军事平衡进一步被打破。这次战争强化了美国的军事主导权,其“一超独霸”的地位得到巩固。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启动冷战后动作最大的新一轮全球军事部署调整,增强了无可匹敌的全球机动作战能力,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世界军备竞赛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冷战时期,多数国家都保持了一支比较庞大的武装部队,核军备竞赛成为美苏争夺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后,随着各国更加重视以经济和科技实力发展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军事战略和建军方针均进行了重大调整。为适应冷战后新形势的需要,世界各主要国家将军队建设的重点转到质量建军上,力图建立一支精干有力的、用高技术武器装备起来的、具有快速机动能力的军事力量,由此引发高技术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国为了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将武器装备发展着眼点放在提高质量、注重技术、增强性能上,其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是信息化、智能化、隐型化和远程化。美国还加速发展计算机模拟核试验技术,加紧发展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成功地进行了激光反卫星试验,把军备扩展到外层空间。据透露,美国正在为开发杀伤力相对较小、“可以使用”的小型核武器做准备,以提高核武器的实效性。^{[5] (P.142)}俄罗斯尽管国内经济困难,但仍有选择地保留了一些高技术武器的研制项目,并优先发展精确制导武器、新型空军装备和机动部队运输工具。英国和法国已将计算机、激光、新材料、新工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用于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以提高其高技术程度。日本利用其在高技术方面的优势,努力推进军事力量现代化和高技术化,把武器装备的发展重点放在中程弹道导弹系统、攻击航母及电子战设备与空中预警系统等高技术武器装备,并积极研制核武器,进行核试验。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总是成为推动军事革命的动力。冷战后高度发展的信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预示着军队建设和战争形态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衡量一支军队的实力越来越将取决于质量标准,而不是数量标准。所以有人认为,未来战争与以往相比有许多不同点:从技术角度看,主要有3大特点,即战争的透明化、自动化

和智能化。^[6]

第三,在裁军已成主流的情况下,地区军备竞赛成为新热点。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全球进入一个相对平静时期,发生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因此在主要国家间率先出现了一个裁减军员、削减军费的浪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热点地区的国家不仅未裁军,反而在扩军备战,甚至搞核军备竞赛。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安全形势相当严峻。因民族纷争、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等事由引发的地区冲突和国内战争在冷战结束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为复杂。中东问题久拖未决,俄罗斯的车臣、东南欧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南亚的印巴和阿富汗、东南亚的印尼,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的战事此起彼伏,这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面临发展军备的压力,客观上为军备发展培植了土壤。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大国不断插手,使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美英对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增添了人们的疑惧,中小国家不得不加大军备发展的投入。尤为严重的是,地区性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加剧将会使更多的民族独立国家希望拥有核武器以防不测。核武器向中小国家扩散的趋势不仅会引发新的更大范围的核军备竞赛,而且使国际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现实威胁。

三

联合国裁军活动所面临的挑战还源于其自身存在的明显不足和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由于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因此联合国所通过的一系列有关裁军问题的决议不具有强制约束力。裁军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联合国不能随意干涉更无法强行改变之;各国对本身安全的自卫力量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因此联合国很难确保通过的决议成员国必须执行。由于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机构,一些《日内瓦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签字国仍然生产化学和生物武器,甚至使用这些武器。在核扩散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有效监督有关国家制造核武器,无法强制有关国家销毁自己的核装置,从而使已通过的国际条约受到破坏。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了核试验,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有效性和权威性的严峻挑战,动摇着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虽然通过了一个否认印巴成为核国家的联合声明及要求两国停止核试验并遵守相关国际条约的决议,但是联合国根本无力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阻止南亚核军备竞赛。此后,印巴依然我行我素,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的反应仍“主要局限于口头之谴责和很快消失的遗憾。”^{[7] (P.668)}对于军事大国而言,联合国的绝大多数决议更成一纸空文。美国等军事大国率先和大规模进行裁军是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共同厚望。但是美国等国则从自身利益出发,置联合国的决议于不顾,继续进行军备竞赛。1999年3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国会通过决议,要求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企图打破由《反导条约》所奠定的美俄之间的战略核平衡,夺取决定性战略优势。美国的行动是对核不扩散机制

的根本挑战。1999年11月,美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成为第一个拒绝该条约的国家。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宣布要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大大加快了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2003年9月1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同意政府恢复核试验;11月24日,小布什在五角大楼签署了总额高达4013亿美元的《200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正式解除了对低当量核武器进行研究的禁令,并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对能摧毁深层地下掩体的小型战术核武器即钷地原子弹的研究。美国的行为和政策是对全球争取核禁试和防止核武器扩散努力的一次沉重打击,将破坏整个裁军进程的基础。对此联合国一筹莫展。其二,联合国取得的裁军成果与国际社会的愿望相距甚远。就核裁军而言,冷战后美俄的核对抗水平大大下降了,而且双方达成了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器的相关条约,美俄还承诺不再以核武器相互瞄准对方。但是美、俄核裁军协议即使完全实现,协议削减的部分也仅仅涉及双方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中的很少一部分。如果算上美俄各自库存而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战术核弹头以及足以能制造上万枚核弹头的武器级核材料,那么美俄两国实际所拥有的核弹头足以摧毁世界多次。因此,单美俄拥有的核武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继续对人类的生存构成直接和潜在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美俄等核大国仍然坚持“威慑战略”,坚持核武器在新世纪仍然是它们军事力量中一根不可替代的“支柱”立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核大国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甚至愿意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愿意承担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美俄等国的态度和作法使核军备或常规军备都难以进一步深入裁减。另外,冷战后联合国通过的不少决议,大部分是关于削减或限制武器数量的,而对武器质量不断提高的问题,则没有涉及。特别是美俄等国不但继续改进核武器和发展反导弹系统,而且大力发展高技术常规装备,把隐形、激光、智能、定向能、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应用于新武器系统,因此以提高质量为重点的军备竞赛并未终止。由于军备数量不再是军队实力的主要标志,以往传统的计算兵力方法以及主要偏重于谋求数量平衡的裁军和军备控制模式,已滞后于时代形势的发展。因此,未来在军控中怎样把技术和质量考虑进去,从而使得协议更加公平、合理和有效,将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其三,由于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力不同、军备水平不同、国家利益不同,因而在裁军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从而牵制了联合国在国际裁军斗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裁军和军控进程中,各国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在裁军和军控领域很难形成公正合理的谈判机制和达成一致性的决议。实际上,联合国的核军控与核裁军体制始终是个歧视性的体制或称为两级体制。^{[8] P. 337}冷战时期,军控领域里呈现一种以两极体制为主导的格局。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大国之间互相制衡的因素在增加,中小国家联合自强,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发言权的呼声不断增高。所有这

些在多边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在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发达国家认为化学武器的扩散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威胁。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认为大国手中拥有核武器和高技术常规武器,发展中国家就有权拥有化学武器这种“穷人的原子弹”,实行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无异于剥夺他们的自卫能力。又比如在核扩散问题上,核大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核大国,实际上只对把军备控制的矛头引向无核国家以限制它们获得核能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防止核扩散是对它们的限制和束缚,因而是公平的。销毁核武器、获得核武器与核大国巩固核优势地位的各种不同策略、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国际核不扩散问题成为一个既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9] P. 131}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同,使联合国裁军进程充满曲折和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当今世界裁军和军控领域里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正因如此,多边裁军领域中,近年来达成的许多协议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维护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在裁军和军控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现象,很多做法缺乏公平和民主。正如有学者所尖锐指出的,当今世界的和平与裁军只是一种“霸权式和平”与强制性裁军,是现有国际秩序中强国大国从既得利益出发作出的安排;从防止核扩散、禁止使用地雷,到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中程导弹技术,直至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名义下进行的限制小型武器的活动,大多与欧美国家的利益与首先倡导直接联系在一起。^{[10] P. 198}强权和缺乏公正极大地牵制了联合国在国际裁军事务中作用的有效发挥。如何按照公平、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备限制,将是联合国必须面对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郭隆隆. 联合国新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2] 联合国新闻部. 关于联合国的基本事实[M]. 纽约,1998.
- [3] 李铁城. 联合国的历程[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 [4] 胡九龙. 冷战后联合国在防核扩问题上的作用[J]. 现代国际关系,2000(7).
- [5] 郑俊杰. 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第一辑)[C].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 [6] 张金瑞. 未来国际军事技术发展趋势[J]. 国际展望,1990(15).
- [7]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年鉴1999: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 [8] 美]W·亨德森. 国际关系:进入21世纪的冲突与合作[M]. 波士顿,1998.
- [9] 潘振强. 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
- [10] 王逸舟. 环球视点[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光 翟)

国际格局的演变与纳粹德国的崛起*

宋晨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96)

[摘要] 一战的爆发使维也纳体系建立以来欧洲百年权力平衡被打破,战后欧洲新的力量对比失衡与秩序的不稳定性造成各国之间缺乏必要的互信机制,以维持和平目的而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因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建立伊始就极不稳定。《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近乎掠夺性的惩罚促使一战后的德国在内外困境中寻求生存空间,国际与国内局势的变化促使纳粹党于20世纪30年代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并进而掌权,从而使德国再次崛起,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关键词] 国际格局; 凡尔赛体系; 体系缺失; 纳粹德国

[中图分类号] K51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80-0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自维也纳体系建立以来欧洲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战后依据新的力量对比精心设计的凡尔赛体系成为战胜的协约国集团用以维持所谓“和平”的工具。然而,战后动荡的国际关系格局使凡尔赛体系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种种危机,战后欧洲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造成体系内部存在着危险的结构性缺失。^[1]同时《凡尔赛和约》的掠夺性和屈辱性激起了德国人强烈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情绪,纳粹党充分利用德国民众的复仇心理和政府的软弱无力窃取了德国的统治权。此外,凡尔赛体系的种种弊端也间接增强了德国在欧洲的地缘战略优势。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再次勃兴,德国一步步打破了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争取到减免赔款、解散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及盟军撤出莱茵区等一系列有违凡尔赛条约本意的条件。^[2]而以称霸世界为目标的德国纳粹上台后,更为公开地向凡尔赛体系发起了一系列挑战:1933年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第二年宣布重新武装;1936年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派兵进驻莱茵非军事区;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次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至1939年9月,纳粹德国已彻底打破了凡尔赛体系,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进行了充分的军事和外交准备。

一、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凡尔赛体系的内在缺陷

一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欧洲国家主导国际政治格局的局面也面临着瓦解。此时建立的凡尔赛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旧时代的产物,它没有依据变化了的国际关系适时提出维持欧洲和平的新战略,而是尽其所

能维护旧有的欧洲均势,排斥苏俄参与新的国际秩序,榨取德国的一切资源。其所作所为注定其只能是一个短命的、有缺陷的失败体系。其内在的缺陷性与变化了的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

首先,苏俄作为欧洲传统的大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一战之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协约国集团拒绝苏俄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剥夺了苏俄参与战后欧洲秩序重建的权利。并且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集团还讨论了以外交孤立、经济封锁、武装干涉等手段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各种计划。显然,凡尔赛体系从其建立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反苏性,苏俄从一开始就被排斥在欧洲的国际体系之外。与此相反,20世纪30年代实力日益增强的苏联无疑是维护欧洲稳定与和平、遏制法西斯侵略扩张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面对法西斯的威胁,苏联提出了“集体安全”的主张,这是保持欧洲和平与现状、维护凡尔赛体系的有效途径。但苏联的主张并未得到英法应有的支持和响应,英法反而推行绥靖政策,企图将法西斯的“洪水”引向苏联。1938年慕尼黑阴谋后,苏联被迫修正30年代以来一直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寻求本国安全保障,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欧洲传统大国和欧洲均势一支重要力量的苏俄,由于英法等的排斥,在凡尔赛体系存在的20年里,未能在欧洲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凡尔赛体系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之一。^[2]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欧洲已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恢复稳定与均势,强大的美国已成为欧洲稳定与和平的力

*[收稿日期] 2008-09-17

[作者简介] 宋晨(1981-),男,安徽淮北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量支柱 欧洲未来的和平与安全需要美国的积极参与。在凡尔赛体系中,应当扮演并且唯一有能力扮演平衡国角色的是美国。美国的煤、生铁、钢的产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世界金融中心在“一战”后由伦敦转移到纽约,这充分表明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而美国的政治领袖地位和军事霸主地位,更是在凡尔赛和华盛顿会议之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中表露无疑。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热那亚会议、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胡佛延债宣言、洛桑会议,以及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洛加诺公约、非战公约、裁军会议等,美国均积极参与,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五国海军协定》中,美国取得了与前军事霸主英国同样的军事地位,甚至作为凡尔赛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联盟约》也是按照美国的意志制定的。然而强大的美国因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自我孤立于凡尔赛体系之外。美国是凡尔赛体系的主要缔造者和战后欧洲均势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它的拒绝使凡尔赛体系失去了一支重要支柱,从而导致凡尔赛体系建立伊始就出现了严重的结构缺陷。^{[3] P. 228)}

再次,一战后英、法两国实力大为削弱。英国为了维护其日益衰落的霸权,从传统“均势”外交出发,执行“扶德抑法”的欧洲政策;法国由于一战的胜利一跃成为欧陆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但是其所奉行的“严厉处罚德国并进而企图肢解德国”的政策不但使德国极端仇视法兰西,同时也面临着美英等国的反对。在得到短暂的欧陆优势之后,其对德强硬政策由于得不到美英等国的支持而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对待德国问题上,英法矛盾尖锐。因此,在德国重新崛起之后,英法很难协调一致达成合作共同遏制德国的崛起。另一个欧洲国家意大利依靠一战中的投机,挤进了战胜国的行列,在凡尔赛体系中充当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它一方面主张维持现状,保持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主张修改凡尔赛体系,得到它未获得的领土。30年代中期由于意大利在对外扩张中受到英法遏制,因而走上了公开挑战、武力破坏凡尔赛体系道路。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要求用武力改变现状,重新瓜分世界。意大利从凡尔赛体系的维护者演变为破坏者,加剧了欧洲局势的动荡和体系的瓦解。

最后,尽管《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掠夺使德国受到很大削弱,但德国重新崛起的基础依然强大,并且战后德国成功利用了欧洲大国间的矛盾,为自己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凡尔赛体系使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受到压抑,激发了德国人民的爱国复仇情绪,这客观上起到了统一聚合德国民众的精神作用,增强了德国潜在的战略优势,为纳粹在德国的崛起准备了主观条件。1926年,德国加入了英法操纵的国联,从法律上和事实上重新跻身于西方大国的行列。到1929年,德国更是重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3] P. 115)}但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战败国”却长期被凡尔赛体系所抛弃,游离于欧洲国际格局之外,成为最不安定的一颗定时炸弹。

二、纳粹德国的崛起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战败的德国解除了武装并

向协约国集团赔偿巨额战债。民族屈辱、经济萧条、社会混乱此时交织在一起,让骄傲的德意志民族更加渴望重新“崛起”。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十分好战的民族,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此时在德国陡然激增。希特勒的纳粹党,敏感地把握住这种国民心态,提出了“修改《凡尔赛和约》,收回失去的领土,把相信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联合起来,团结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要求,并许诺要尽快改善战后大量工人失业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状况。这在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使德国迅速摆脱困境的良方。纳粹党纲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宣传民族复仇主义,宣称德国的一切灾难根源于凡尔赛体系,德国的出路在于废除《凡尔赛和约》,取消军备限制,收回战后失去的领土,把日耳曼人统一在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之内。1928年后的几次选举结果表明,越来越多德国人把纳粹党视为解决德国社会主要问题、实现德意志民族强盛的希望。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上台,意味着战争的爆发。通过全面了解国内外形势,利用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英、法对纳粹德国的妥协,希特勒在外交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同时,纳粹德国秘密重整军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1935年德意志更是在军事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希特勒开始对外收复失地和武力扩张。根据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战败的德国丧失萨尔区,莱茵河地区则被《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为“非军事地带”。希特勒上台后,经过一番努力,不仅收回了萨尔地区,派兵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而且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又把有350万人口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入了德国版图。在纳粹狂热的煽动下,整个德国为胜利而欢呼,德国在纳粹的领导下再次“崛起”。

三、德国崛起与国际格局变化的关系

国际格局的变化体现在体系下实力的变化。凡尔赛体系建立伊始,美国的退出使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维护战后秩序的主要责任落在了英法肩上。英、法在一战以后联手建立了国联,使其充当维持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国际性机构,但是英法的政策却逐渐由维持欧洲协调转向对德、意等国的绥靖。英、法本身在战争中损失巨大,并且英、法对德的态度也存在矛盾性:法国主张“严厉处罚德国并进而企图肢解德国”,英国出于其一贯关心的欧洲平衡的考虑希望用德国来抑制法国,不使法国独霸欧洲大陆。因此,在德国重新勃兴之后,英法很难协调一致达成合作共同遏制德国的崛起。^{[3] P. 76)}

凡尔赛体系建立在报复和掠夺德国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德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德国不可能接受被奴役的地位。一个内部有生命力的民族除了反对这个条约外别无出路。修订条约有关领土、经济和军事条款,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被定为德国一战后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下转第84页)

转型期服务型责任政府构建之原因与对策研究*

祝 簪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 中国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造成社会盲目崇拜权力,而往往忽视责任。因此,中国欲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尚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很早就提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并不缺乏建立责任政府的理论基础。我国宪法明确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原则以及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完全可以容纳责任政府制度,而且与其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本文拟通过对西方有关学说的引用和借鉴,探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期中国政府如何向责任政府迈进的问题。

[关键词] 责任政府; 问责制; 法律责任; 行政监督

[中图分类号] 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82-03

在我国,真正的责任政府制度还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原则以及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全可以容纳责任政府制度,而且与其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个前提说明,在中国建立责任政府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更高目标的服务型政府,与我们的党和国家根本性质和目的是一致的。但是这一根本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行却差强人意。在我国政府由经济导向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过程中,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效能政府。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切实履行职责,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的责任控制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权力。

一、构建完善的责任政府之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并且在构建责任政府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目前应该承认,我国的责任政府构建还处在起步阶段,官员责任缺失现象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第一,重、特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居高不下,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第二,某些政府部门失信造成的群体事件和信任危机突出。第三,有法不依、违法越权现象屡禁不止。某些政府官员容易自我膨胀,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第四,行政监督不力,人民参与不足。第五,行政体制陈旧,官员效率低下。第六,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体系薄弱,公民意愿经常被忽

视。第七,行政道德缺失,官员寻租腐败扩大。第八,各政府部门权利交叉,权责不明。

因此,我国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非常迫切,也十分重要。

1. 建立责任政府是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十七大报告为我们今后的政府建设和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现行的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整合,来适应日益成熟的公民和经济体制,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建立责任政府以至于建立服务型政府正是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顺应形势、顺应民心的事情。

2. 建立责任政府可以树立国家权威并克服合法性危机。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性问题。在我国由于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各种改革一定会带来社会的阵痛。由于国家性质决定我们国家的改革的推进,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从而使得政策

*[收稿日期] 2008-10-21

[作者简介] 祝 簪(1985-),男,安徽寿县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顺利实施。但是其必要前提就是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细看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计划经济和政治导向引领,一度使国家权威上升到了一个顶峰。但是日益下降的生活水平、不安定的生活环境,引发了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核心,把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当做首要任务,重新树立了国家权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各种弊端一一出现。主要表现在:在市场经济导向的影响下,忽视了社会发展,导致社会不公现象的产生,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化现象日趋严重,地方在对中央政府政策、路线、方针的执行过程中发生重大的偏差,严重背离人民群众的意愿。政府权威合法化的流失,对政策的执行和社会改革,产生了巨大的阻力。

3. 责任政府的建立是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觉醒的必然逻辑。简单地说,公民社会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责任社会。要权利和义务对等,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让市场、社会和个人发挥作用,并在各自的权限内承担起责任,做自己的“主人”。因此,中国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力量与公民社会,提高它们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提高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鼓励他们参与公共活动,树立公共责任精神。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组织的发育和壮大以及利益的独立和分化,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逐渐在中国形成。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飞跃,国家基本满足了公民低层次的需要,公民需要尊重以及自我实现。公民社会的成长要求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负责任的政府。

4. 风险社会理论也提示我们要建立责任政府。风险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的,这种风险的演变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也在变化。人类社会已经慢慢步入了风险社会。贝克认为,西方国家在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后,“财富一分配”和“风险一分配”将会被结合起来,社会的风险将会凸显。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风险远远大于自然风险,往往社会风险无法预知,破坏也更加剧烈。当今中国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这正是社会风险频繁爆发的时期。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系统却出现了诸多阻碍发展的绊脚石。加快社会配套系统的建立迫在眉睫,而政府在这个转变中必将成为一个突破口。风险社会理论我们,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体系将带来的风险和危机是巨大的。而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引导者,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在一个多元化、复杂化的局势下,政府向服务型、责任型政府转变就是稳定发展之道。

二、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期我国责任政府构建之路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和重要环节。因此,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专门的问责机构。我们国家的问责主体和基础是人大制度,如何完善和健全人大关系到责任政府根本。一方面,我国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理论上具有责任政府之构架。在实践中,行政官员的任命、行政部门的施政要向人大“负责”。人大对行政官员的失职与违法行为要真正追究其责任。这样,我们的官员问责制,在本质上是向宪政目标靠拢,恪守宪法的程序。只有当具备了这些程序时,问责制才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官员问责,不仅仅是一种政治逻辑和执政理念,还必须在政治生活中通过制度化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要实现党政分开,要弄清楚作为执政党领导权和执政权范围不同。领导权的范围覆盖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还包括领导全国人民监督政府。而执政权限于人大和政府工作。当前执政党过分强调了领导权,使得党政很难分开,权力过于集中。作为执政党应该把领导权限于掌握意识形态、正确引导政治走向。而相应的执政权应该重视人大的作用,将宪法赋予人大的地位突显出来。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健全权力之间的内部制约机制,当务之急是从法律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人大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确保人大切实履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对由它产生的政府的监督权。

2. 确立责任前提,界定公务员责任。问责需要有前提,这就是要明确两个责任。责任政府的建立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问谁的责;其次,如何问责。我们把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责任划分为3类,即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又具体分为刑事责任、赔偿责任和纪律责任。政治责任主要是指民选官员应该对其政党及选民负责,政府官员应该对人大负责。道德责任是指官员必须具备优秀的职业道德,严格自律,树立良好的形象。目前我国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依然模糊。西方最近一次政府改革的开端是英国政府发起的“公民宪章”运动,中国建立责任政府的进程可以吸取它们经验。“公民宪章”运动的核心是政府向公民承诺服务项目和标准,以及未完成该项服务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的做法让公民对于政府的作为一目了然,政府自觉地把自已放在显微镜下。

3. 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决策质量。首先,要树立现代化决策观念,营造良好的决策环境。特别要重视民众参与的民主决策观念、专家咨询观念、集体决策观念、决策权力分散等观念的树立,营造一种社会组织、政府机关、利益团体和政党、人民团体进行广泛沟通、共同交换信息和决策的互助互动的和谐决策环境。其次,要加强政策研究的组织建设,完善公共决策体制,积极建构完善的公共决策系统,使之成为相互分立又相互整合的有机系统。第三,大胆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决策理论、方法和技术,提高决策

研究人员素质。第四,用法律手段规范、约束决策行为,将公共决策纳入法制化轨道。

4. 从制度和法律上建立健全问责体制。行政法对行政行为、行政组织、治安、公共事业、责任和行政诉讼等都有具体的规范,既规定了行政权力机关的权能、行政活动的方式,也规定了对行政活动的损害后果应该承担的责任。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往往成为行政法的惩戒对象。如果发生重大事故,造成很大影响,则有关人员会被迫或自动辞职。法律系统的健全和责任政府的建设可以说是相互依托的。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准则,如何问责,问责后如何进行处罚,这些必须依靠法律,没有法律的依托,责任政府就是一纸空文。中国政府很显然已经注意到体系建设这个问题,早已提出建设法制社会,并且在许多发面做出了成绩。但是我们还应该更科学、更及时地健全法律体系以弥补法律的漏洞。

5. 改革公务员体制,建立新的绩效评估标准。构建责任政府,必须改革公务员制度,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改变政府行为考核办法,根除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弊端,改革任务指标式的行政执行评估机制,改变主要考核经济指标和其他单项指标的评估办法,建立科学的行政绩效评估体系,对上对下都要负责,重点落实群众满意度和回应性。在法治方面,应当实现从法律仅仅治民、治事向法律首先治官、治权的转变。要严格依法行政,而不是依照长官的意志办事。另外在评估标准方面也要相

应改变,政府责任评估主体不应当是政治行为者本身,而应当是相对独立的第三者,特别应交由公众来评判。增设一些新内容,如公民自由、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新闻自由、法治、廉政、公民回应性等。

6. 健全公民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机制。健全公民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机制,扩大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民主监督的关键是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公开性,即确保政府的透明度和人民对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知情权。包括公开机关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人员管理和经费开支等情况。如果政府缺乏透明度,公民就缺乏必要的相关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民和社会就很难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中国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实施“公示制”,即政府行政机关通过向社会公开明示自己的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违示惩戒办法的方式,增强政府公共行政过程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政府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总之,建立责任政府浓缩了依法治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等等国家政策的精华。建立一个负责的政府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迫切的。只有建立责任政府才能让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 81 页)在这种政策指引下,纳粹上台后的德国频频向被排斥在凡尔赛体系之外的苏联伸出“和平的橄榄枝”。而苏联由于被凡尔赛体系排除在外,也要求改变凡尔赛体系。苏俄在退出战争后,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推行“新经济政策”,使得 1927 年的经济已经迅速恢复到战前 1913 年的水平。德苏两国出于不同目的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加速了凡尔赛体系的崩溃并解除了德国在未来东线战场的威胁。同时,德国自普鲁士勃兴以来,其周围一直是强邻环伺,恰恰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均衡才保证欧洲的总体和平。一战后这一切已荡然无存。在德国的东部,对维持欧洲均势有着重要作用的俄国因为革命而被列强错误地排斥在新秩序之外,再加上防疫地带的阻隔,它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日后重新返回新秩序的机会,昔日的奥匈帝国土崩瓦解成几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因此,在东欧已不存在制衡德国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改变体系的德、苏、意的力量越来越大,于维持体系的英、法的力量,再加上美国的退出,凡尔赛体系内在的缺失性使德国拥有了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优势。这种内在性的缺失是造成纳粹

上台后德国公然挑战凡尔赛体系并最终打破它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一战后,国际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凡尔赛体系的内在缺失性所造成的一战后欧洲新的力量对比失衡与秩序的不稳定,客观上为纳粹在德国的上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加上内部的因素,终促使纳粹德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再次崛起,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参 考 文 献]

- [1] 时殷弘. 旧欧洲的衰退——论两战之间的英法外交与国际政治[J].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 2000(2).
- [2] 方连庆. 国际关系史(现代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 美[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光 翟)

网络媒体时代的利益表达与协商民主的实现*

——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个案分析

陈清¹ 宋好修²

(1. 三江学院思政理论教研室, 江苏南京 210012; 2. 山东省商河市委党校, 山东商河 251600)

[摘要] 在“互联网政治”时代, 如何通过网络这个平台促进社会的公共表达,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实现民主,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 “民意”的表达和综合均是通过网络实现的, 其中, 网络论坛是民意表达和形成的发声器, 网络精英是民意凝聚和重塑的助推器, 在民意向政策转化的过程中, 相关利益主体的干预和不作为成为网络民意转化为决策的障碍, 但是网络民意通过扩大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最终使政府给以政策反馈。网络民主发展的关键是有有效引导网络舆论、限制网络非理性和构建政府决策与网络民意之间的制度性通道。

[关键词] 网络媒体; 协商民主; 利益表达和综合; 政策反馈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85-03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 在许多事关重大公共决策的事件中, 网民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进行公开的讨论, 并最终获得了政府某种程度上的回应。也就是说在这些事件解决的过程中, 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

社会公众就某个公共事件在网络中展开讨论并最终实现民主的方式, 与协商民主的目标不谋而合。协商民主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新型民主, 由毕赛特首先提出, 随后曼宁和科恩给以阐述, 再经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详解, 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主思潮。它认为政府决策应该建立在社会成员公共协商的基础上, 主张“民主的本质是协商, 而不是投票”^{[1](P.1)}, 强调“发声(voice)而不是选票”, 成为新的赋权方式^{[2](P.1)}; 它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公开讨论的、理性的“公共民意”影响政策反馈实现民主的目标。

就我国现实来看, 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利用网络来掌握“民情民意”,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 也有助于民主的实现。那么, 在“互联网政治”时代, 如何通过网络这个平台,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促进社会的公共表达,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实现民主, 就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因此, 本文采取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 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例, 分析该案例中“民意”是如何通过网络得以表达、凝聚和重塑的? 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过程? 面对网络媒体

中的“公众舆论”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这对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什么样的影响?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讨论网络政治参与与协商民主的实现, 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持续存在的可能性。

二、网络媒体与民意的表达、形成和重塑

协商民主理论认为, 公共协商是协商民主实现其决策合法性的依据, 其实质上就是“民意”形成和凝聚的过程。民意(Public opinion), 又称公共意见或公共舆论, 即社会大众就某一社会问题或公共事务所做出的公开倾向性大体一致的言论。民意的构成至少需要4个因素: 其一, 存在某个社会问题; 其二, 多数人就此表达意见; 其三, 这些意见存在某种一致性; 其四, 这种一致性的意见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 “民意”或“公众舆论”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成, 存在一个基本的动力机制, 即是众多网民就华南虎照片事件所达成的“公众舆论”或“民意”是一个表达、凝聚和重塑的动态运动过程, 而这个运动过程是以网络作为实践的基础和平台的。

1. 网络论坛是民意表达和形成的发声器。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 网民依托网络论坛、BBS、博客、QQ群等渠道来发表原初的观点和信息。网络作为网民在网上交流信息的场所, 提供了一个超越时空限制的虚拟平台, 存在多人参加、多向交流的特点。在这里, 每个网民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网民的意见通过发“帖子”的形式出现, 每条“帖子”以标题的形式排列, 通过点击标题, 其他人

*[收稿日期] 2008-11-07

[作者简介] 陈清(1982-), 女, 山东泗水人, 三江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师。

宋好修(1982-), 男, 山东烟台人, 山东省商河市委党校教师。

就能看到其具体内容,并且能够在同一主题下“跟帖”,发表自己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展开讨论。在华南虎照事件中,从华南虎照片在网络上的公布、网友对华南虎照片真假的质疑到“挺虎派”的“辩护”再到陕西省林业厅的信息公布,大都是通过网络论坛、BBS、博客这一平台对外进行交流和互动的。

也就是说,事关华南虎照片真伪的信息主要是通过网络论坛直接向社会公众予以表达的。众网友包括图片处理专业人员(第一印象)、摄影人员、科学院的植物学家(傅德志)、动物学家等,或从老虎的体态、从老虎周围的植被、或从图片本身出发,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做出详细的技术论证,通过“技术论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论证的作用在于,通过抽象的分析和判断让他人更容易理解和明了事情的经过,激发他人的理性认知,通过理性分析来传达意见,进一步影响社会大众对此事的认知和看法。还需要指出的是,在该事件中的“挺虎派”以及作为国家管理部门和该事件利益相关部门的陕西省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官员也纷纷在网上发出声音,如陕西省林业厅宣传处长等甚至专门开设博客回答问题、与网民展开辩论。

“华南虎照片事件”是由网络开始传出声音的,也是借网络得以扩散的。“帖子”首先在某一论坛或博客发表,并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随后被国内各大知名门户网站、论坛纷纷以专题设置和网站头条的形式来刊登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各大论坛、专业网站如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新浪网等专业性网站对各个论坛的“帖子”进行“采编”,进而通过专题、评论等形式予以跟踪报道,传统媒体同样也会对网络中的“帖子”进行“采编”,并进行相关的调查采访,然后依托网络平台发表新闻、调查结果和相关意见。换言之,网络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发声器”,同时也是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进行交换意见的平台。各种社会力量通过网络这个平台针对“华南虎照片事件”表达和阐释自己的观点,使得该事件日益成为网络中的“公共舆论”事件,逐渐形成了群体性的共同认知。

2. 网络精英是民意凝聚和重塑的助推器。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各大专业网站和传统媒体(包括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在重塑“公共舆论”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该事件中的“意见领袖”^①。虽然网络为网民提供了表达其感受和意见的平台,网民们也都热情高涨,并且很多关键性的意见和观点也都是由网民发出的,不过,更重要的方式并非这种直接表达,而是通过专业的新闻叙事来实现的一种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理性分析。

由于大部分网民都缺乏新闻调查的专业训练,所以新闻专业人士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对华南虎照片的调查中,最终获取的大量未发表的全部照片、对当事人的大量采访,都还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报纸、电视、网站职业记者前去实地采访得来的。在此过程中《南方日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扬子晚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等媒体通过深入的调查和报道,不仅向人们提供了更为详

细的描述和解释,将事件的经过全程展现在网民以外的其他人群,同时也利用全面的解释和权威的评价影响公共舆论的凝聚和重塑。网络提出的疑点和证据,在经传统媒体记者的参考、鉴别后,针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再把当事人的回答公布于众,同时,传统媒体记者也会在调查中不断发现疑点,发表新闻评论,进而在网络中掀起新一轮的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众多媒体的加入,最初被表达、塑造和澄清的批评意见进一步凝聚,并且通过网站头条的形式再次得到强调。初期较为零散的批评性意见在报道后期被凝聚和集中起来,构成了一个批评性意见的集合;由单纯针对“华南虎照片真伪”之辩转为针对地方政府处理公共事件能力和政府公信力之辩。这一网络舆论的形成和集合可以说是直接促使政府部门作出相关决策的原动力。

由此可以看出,针对华南虎照片事件的意见被表达和重塑的过程也是一个公共协商的过程。只不过这是一个以网络作为媒介的协商过程,不同观点发表在网络这个平台上,进而展开间接的讨论和辩论。

三、网络民意的国家力量转换:抗衡利益主体干预与政府的政策反馈

2008年6月29日上午10点,陕西省政府新闻办通报“华南虎照片事件”调查处理情况,指出,所谓“华南虎照片”系假照片,“拍照人”周正龙因涉嫌诈骗罪被逮捕,13名涉“虎”官员被处分,陕西省林业厅两位副厅长被免职。至此,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华南虎照片事件”尘埃落定。这也意味着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通过网络形成的有效政治需求——“公共舆论”最终给政府施加了压力,促成了政府对此事作出了公平、公正的“处理意见”。但是这一历经8个多月才得以解决的社会公共事件,通过公共协商使民主实现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网络中形成的“民意”面临着转换为国家力量的问题。

1. 利益主体的干预:网络民意与权力机关决策的障碍。我们都知道,民主不仅仅需要协商,更需要决策,否则的话,只能成为无意义的“独白”。因为“决策是政治过程的关键性阶段,是把有效的政治要求转换成权威性决策的阶段”。只有当“政策通过公共商讨和辩论的途径制定出来,且参与其中的公民和公民代表超越了单纯的自利和有局限的观点,反映的是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时候,政治决策才是合法的”^[4]。也就是说,协商过程只有与政府政策衔接起来才能使民主得以实现。在我国,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客观存在,即使社会公众就某个社会公共事件形成了一个群体性的共同认知,但这种“共同认知”或“民意”远远不能对相应的政府决策构成硬性的约束。也就是说,即使民意“取得正式议程的地位,也并不意味着权威机构的最后决定或实际的政策实施也就是那个表示不满的群体所最初追求的东西”^[5]。经过“理性沟通行为”形成的“网络民意”与权力机关决策过程之间还存在很多障碍,两者之间缺乏一种制度性的、正规的交流渠

① 又称“舆论领袖”或“社会精英”。

道,以使网络民意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成为政府决策的来源。有评论指出:舆论胜利之后,公众在追究责任的环节中,丧失了主动权和主导权,几乎只能依靠政府的道德自觉。”这表明在“网络民意”和“权力机关决策之间”,最重要的障碍是被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可能会在民意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的干预和不作为。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与该事件相关的利益主体——镇坪县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县政府、市林业局、省林业厅及其相关的政府官员均表现出明显的行政不作为和干预。

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面对网友的质疑和要求,面对诸多专家学者对照片的鉴定,甚至直到“华南虎”原型“年画虎”的出现,与此事相关的地方政府如陕西省林业厅和国家林业局或是保持沉默,或是闪烁其辞,或是顾左右言其它,提出诸如“照片上的华南虎真伪不重要,关键是保护华南虎”、“保护胜于辩论”、“诈骗案一般要由受害人来报案警方才会受理,而作为受害者的林业厅并未报案”等论调,对网友提出的公布调查结果也是一推再推,不肯正面回应“华南虎真伪”的问题。因此,如何克服这一障碍,实现“网络民意——国家权力——政策输出”的过程,是“经过理性沟通行为”形成的“网络民意”必须解决的问题。

2. 网络民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应对。在华南虎照片中基本上实现了“网络民意——国家权力——政策输出”这一过程,其原因是它成功了克服了“利益主体干预”这一障碍。“网络民意”构成的“公共可见度”解决了其合理性问题;“公益诉讼”的介入解决了其合法性的问题,所以最终政府采取了积极回应,使得本个案中的民主得以实现。

首先,地方政府回应乏力无疑将地方政府与“华南虎照片”绑在一起,将“华南虎照片事件”的矛头引向了有关政府诚信和公信力,引发更多对“事件当事人”对地方政府工作方式和行政效率的批评,进而加速全国舆论对“虎照事件”热议,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府处理公共事件的能力和公信力”。这种“批评性民意”发展的过程使得与此事相关的所有事件都公共化了,这一方面加大了华南虎照片事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加大了政府行政成本,政府必须恰当应对社会公众的“质疑”和“关注”。

其次,在本案例中,法律学者“郝劲松”锲而不舍地追求“公众知情权”的精神和诉诸司法途径的做法对此次事件的解决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这种通过“司法介入”解决“网络民意”进入决策议程合法性的做法被称为“公益诉讼”。如有学者指出:“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公民权利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争取。”^[6]2008年5月,法律学者郝劲松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郝劲松向陕西省林业厅提交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政府就“华南虎照片”调查的相关信息。6月,郝劲松收到陕西省林业厅寄来的答复函,函中称“华南虎照问题已进入调查处理阶段,待工作完后,将向社会公布。6月29日陕西省政

府就“华南虎照片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处理结果。

四、两点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华南虎照片事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公共协商”实现“民主”的案例。在该案例中,社会公众意见在网络平台上得以表达、形成和凝聚,促使了公共协商的实现,进而促使政府部门对其负责和政策反馈。这是否意味着,网络政治时代已经来临?网络政治参与对协商民主的实现有何种意义?在利用网络平台实现民主的实践中,还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应进一步改变的?这些问题将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网络传媒与协商民主之现实与未来的关键。对此,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克服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网络是把双刃剑,网民是一个非常分散、隐蔽、不稳定的群体。通过分析华南虎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方面,网民的激情能让真相浮出水面,能推动社会的公平、自由和开放;另一方面也存在网民利用网络发泄情绪,泄漏他人信息,辱骂、散布虚假信息等种种不良行为。因此,网络需要更加理性的行为准则。那么,如何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克服非理性就成为实现网络协商民主的一个关键所在。

二是网络民意与政府决策沟通的制度化构建。通过网络进行协商达成的“民意”,能够促进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使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的正当性得到提升,既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能提高政治协商的代表性,可以把不同的利益、立场、观点都摆到一起,能够促进决策的公开性和民主化,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训练公民的民主技能,培养公民的民主精神和独立人格。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政府决策和网络民意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网络只是提供了一个类似“公共论坛”的虚拟平台,这里聚集“公众舆论”或“民意”能否实现其功能,成为影响政策反馈的“有效要求”,也是实现网络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 [1] 澳·约翰·S·德雷泽克. 协商民主机器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2] Chambers Simon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s and Democratic Deliberation[A]. 林国明,陈东升. 公民投票与审议民主(公投民主在台湾研讨会)[C]. 台北,2004.
- [3] Young, Iris Marion. Inclusion and Democra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 Joshua Cohen, Procedure and substance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 Jams Bohman and William Reh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 [5] 陈剩勇,杜洁. 互联网公共论坛与协商民主:现状、问题和对策[J]. 学术界,2005(5).
- [6] 苏显龙.“华南虎事件”让谁蒙羞[EB/OL].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70240/6555058.html> 2007-11-21.

(责任编辑 光 翟)

张謇与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比较研究*

章文华¹ 庄安正²

(1. 苏州太平中学, 江苏苏州 215000; 2. 南通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通 226007)

[摘要] 张謇和孙中山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共同思考,使他们走上了实业救国的共同道路。两人在对待农工商的地位以及利用外资方面思想趋于一致,但在农业发展的途径、工业发展的优先顺序和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的认识上又各显特色。两人具有的爱国情感、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同,以及教育经历、对发展经济着眼点的认识和政治地位不同是其实业救国思想存有同异的深刻原因。两人的实业救国思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完全付诸实践,但它们不仅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当今社会仍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张謇; 孙中山; 实业救国;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88-05

张謇和孙中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位杰出人物。张謇被誉为“轻工业之父”,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张謇是旧阵营的改革者,孙中山是新阵营的革命者,两人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共同关注,都提出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主张。深入研究他们的实业救国思想,对指导中国当今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两者思想相同点分析

发展实业、振兴经济乃挽救民族危亡之途,这是民国初年张謇和孙中山的共识。两人不仅是实业救国思想的信奉者和倡导者,而且在实业救国的某些具体主张上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两人都能正确对待实业发展中的农工商地位。

何谓实业?近代实业包括近代农业、工业与商业3个方面,而又以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为中心。既如此,实业救国论者必须正确解决农工商三者的地位问题。

第一,两人都认为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农业文明。然而,近代中国却不断被西方列强所宰割。甲午战争前,很多人都主张“以商立国”,对中国传统立国之本未予以足够重视。张謇和孙中山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张謇明确表示“天下之大本在农”^{[1] P.11};“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2] P.13}。这里,张謇把“农”看作是“殖生货者也”,此种“生货”乃近代工业加工之原料。由此可见,张謇重视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而是近代的大农,其农本思想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孙中山一贯重视农业,认为

发展农业是关键,农业不发展,其他经济建设难于启动和收到成效。因此,他将发展农业视为“今日之急务”^{[2] P.11}。并指出,农业同矿业一样,是发展“其他种种事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3] P.134}。可见,孙中山把农业视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当然,孙中山倡导的农业发展模式,亦并非中国几千年来来的传统农业模式,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发展方式。

第二,两人都认为工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张謇认为“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4] P.37}。而中国要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和西方国家一样,大力发展近代工业。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中国意欲自振,宜讲求工政”^{[4] P.37};“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4] P.38}。认为发展工业是“农商之枢纽”^{[5] P.733},并强调这里的工业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即用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全面取代其他的生产方式。孙中山认为中国目前乃极贫之国,只有以机器生产代替落后的手工业,实现工业化,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他认为中国的手工业“必不能与彼之新机械大规模之工业竞争,如此则我工商之失败必将见于十年之内矣。及今图之,则数年之间,我之机器工业亦可发展”^{[6] P.225}。他对工业的重视在《实业计划》中得以集中体现,在“计划”中,孙中山主张大力发展基础工业,认为矿业是“工业之根”^{[2] P.360},同时特别强调机器制造业的重要作用,指出机器可“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众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

*[收稿日期] 2008-10-09

[作者简介] 章文华(1984-),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市相城区太平中学历史教师。
庄安正(1948-),男,江苏通州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之衣^{〔6〕} P.174)。

第三,两人都认为商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虽然张謇和孙中山都反对“商务立国”,但都强调要注重商业的发展,保护商业。张謇说:“今日之先务在商”;“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1〕} P.11)。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商业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说:“无工商则农困塞^{〔7〕} P.57)”,“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1〕} P.11)。因此,张謇特别强调要“护商”,他说:“西人常论:中国商人最工贸易,惜国不为保护,……以至百业皆衰。至护商之要,不如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4〕} P.57)。孙中山则指出:“英国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是由于‘商力为之也’;美洲‘何以今富而惜贫?是贵有商焉为之经营^{〔8〕} P.14)”。因此,孙中山并不忽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相反,提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8〕} P.6)的经济发展方针,强调要保商;“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8〕} P.14)。

综上所述,两人在对待农工商的地位上有着相似之处。他们主张以农工为本而农工商并举的救国图强思想,对近代中国应如何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工业化之途具有重大价值。

2. 两人都主张利用外资振兴实业。

贫穷与落后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建设资金严重短缺使实业救国实践步履维艰。因此,张謇和孙中山都认为利用外资是振兴实业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有效捷径。细加分析,还可发现两人围绕这一主张存有诸多的共同点。

第一,两人萌发利用外资思想的原因相似。张謇认为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而在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代,一国的经济发展要想离开世界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张謇指出:“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4〕} P.169)。孙中山也认为中国要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必须抛弃孤立之性,变闭关为开放。他指出,我国“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9〕} P.481)。而促使张謇和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内资金的缺乏。张謇分析中国的国情是“物产丰饶,事业繁多,苦于人才短缺,母财滞涩^{〔1〕} P.169)”,针对这一现状,他提出“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1〕} P.169)。孙中山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9〕} P.423)。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建设资金只靠国内积累,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吸引外资,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宏大计划才能顺利推行。

第二,两人所提出的利用外资的方式相仿。张謇在《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一文中提出了利用外资的具体方法(1)合资。“此为利用外资最普通方法”,凡经营“利害参半”的事业,可采用这种方法(2)借款。张謇强调采用这一方式必须“凡事业之确有把握者用之”,否则不可轻准商民借用外款(3)代办,或曰外商独资。“凡先难后易而可以永久获利之事业”,可与外商订立一定期限,交

其承办,期满后由中方收赎。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提出了类似的利用外资的三种形式,分别是(1)中外合营。孙中山认为筑路、办工厂、开设商办银行、建立百货公司系统可采用这一方法,实际上提出了中外合作经营的四类企业形式:工业、商业、银行业和基础产业(2)借款自办。或以个人或私人公司名义,直接与外国资本家交涉(3)外商独资经营。就是让外商在华经营工商业,订立一定的期限,期满后有偿或无偿收回。由此可见,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上,孙中山和张謇的观点是基本趋同的。

第三,两人利用外资的原则相近。总的来说,张謇和孙中山利用外资的见解不仅积极,而且理智。首先,张謇和孙中山都认为利用外资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条件下进行,不能附带任何屈辱的政治条件。张謇指出举借外债“不可丧主权,不可涉国际^{〔5〕} P.664),并强调不遵守中国法律者,均予以取缔。孙中山总结“埃及所以借外债而亡国者,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而美之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9〕} P.268)。因此,他在两国引资经历的对比中深刻认识到:“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10〕} P.682)。其次,两人都特别强调引进外资决不能用于非生产事业,更不能用于奢侈消费,必须用于从事生利的事业。张謇说借外债要“用于生利可,用于分利不可^{〔11〕}”,即借款是为了办事业,而非为了消费。孙中山提出外资用途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以促进生产为目的。所以他强调利用外资必须严格掌握合理投向,一定要用在生产建设上。

第四,两人利用外资的实际结果相同。张謇于1914年为实施导淮工程,向美国红十字会贷款3000万元美金,后因一战爆发而未获任何援助,孙中山于1912年向外国要求财政经济援助而遭到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拒绝。纵观两人向西方国家借用外资的主张,均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原因何在?均在于旧中国并不存在实现这种主张的条件。张謇、孙中山希望通过实业救国,但在西方国家加紧向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情势下,它们绝对不会按照其愿望来援助中国发展经济和实现近代化,恰恰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张謇和孙中山试图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设想,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二、两者思想不同点分析

张謇作为清末状元,弃官从商,他的实业思想更多得益于他经营企业的丰富经验。而孙中山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执着追求者和卓越设计师,他的实业救国思想集中体现在《实业计划》中。比较而言,两人的实业思想各显特色。

1. 两人主张发展农业的途径不同。

张謇和孙中山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但在发展农业的途径上,两人却各具主张。张謇注重农业经营模式的推新,对此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付诸实践。中国的农业是传统农业,即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以封建租佃和小农经营为生产方式,它严重地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张謇感慨道:“我国有小农而无大农,故终岁勤动,往往仅足自给^{〔1〕} P.160)。但又认为,我国农业资源丰富,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改进农业经营方式,就能促使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为此,他提倡集股成立公司,用机器耕种,走规模经济之路,实现农业经营由分散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他

说：“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西人凡公司之业，虽邻敌战争不能夺。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5〕}（P.212）。1901年，他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创立了股份制农业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在中国大地上开创了全新的农业经营方式。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经营，有力地证明了张謇这一经营模式的可行性，对改变江苏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与之相比，孙中山在这一方面论之较少，更缺乏实践。

孙中山认为发展农业仅靠变革经营模式这种温和的改良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想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中。其内容是“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生命者，与众弃之。”^{〔2〕}（P.78）。这里的核心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后来，孙中山又进而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认为“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2〕}（P.850）。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反映了孙中山关于土地问题思想上的飞跃和理论上的突破。但是，从“平均地权”的内容中可知其方针是革命的，但方法却是改良的，如“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始终没有实施过。但不管怎样，这个纲领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具有促使农业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变革的内涵。在这一点上，孙中山要比张謇略胜一筹。

2. 两人主张发展工业的优先顺序和侧重点不同。

张謇认为：“实业不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举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1〕}（P.144），即振兴实业必须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及，犹非计也。的在何？”^{〔4〕}（P.155）张謇认为“在棉铁，而棉为先。”^{〔4〕}（P.155），因此他提出“棉铁主义”，以此为中心来建立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张謇这一思想的提出是根据其经营企业的经验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总结出来的。一方面，棉纺织和钢铁是受西方国家打击最严重的两个产业部门。从对外贸易的情况来分析，中国在外贸中存在大量的逆差，以棉铁的比例最大。张謇在查阅清光宣两朝海关贸易册时发现：“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织物曾达二万万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1〕}（P.166）。为了扭转这种逆差，张謇认为只有以棉铁为中心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才能独立于世界。另一方面，张謇认为棉纺织业有利可图，因为它关系国计民生，是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虽然洋纱在当时严重地冲击中国的棉纺织市场，但尚未能占据垄断地位，所以仍有发展空间，加之投资这一工业的成本较低，具有可行性，因此张謇主张首先从棉纺织业入手创办企业。

而孙中山突出交通在国民经济近代化建设方面的龙头作用，其中又尤其强调铁路运输。他说：“予之计划，首先

注意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也无由发展也。”^{〔3〕}（P.134）。孙中山会有这种认识是有依据的：首先，孙中山深切地意识到发展交通运输业对西方国家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19世纪末，主要西方国家都建立起了完善的铁路交通网络，由此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一世界性的近代化潮流给孙中山的思想以极大的冲击，为此他呼吁“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12〕}其次，为了抵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的控制、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分割势力范围。所以他认为非铁道无以立国，主张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铁路，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近代化的民族工业体系。

综上所述，张謇和孙中山在产业发展的优先顺序上各有侧重。但究其本质，是在发展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张謇认为应优先发展轻工业，孙中山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笔者认为张謇的思想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看，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随着工业化不断推进，资金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才开始发展重工业。可见，这种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而且轻工业的发展，一般投资成本较低，建设周期较短，且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生产技术水平要求并不高。鉴于中国当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张謇的这一模式更适合于中国。当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完善，使中国各地连成一体，且与世界联系起来，会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但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似不宜优先发展。

3. 两人主张发展经济近代化的模式不同。

张謇主张发展民营企业，反对国营企业，他的半生精力都用在民营经济发展上，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所办的基本属于民营企业，而且还表现在他出任农商总长期间提出的一系列经济主张和颁布的经济政策。在任职宣誓时，他说“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人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划经营。”^{〔1〕}（P.165），而且即便是这一、二大宗实业，也只是为了“引起人民之兴趣。”^{〔1〕}（P.165）。“新颁矿业条例，惟食盐、煤油二种，定为国有，其他各矿在国家方力持开放主义，原无与民争利之心。然如铁如铅，不特为轮轨机械之所必需，亦实为枪炮弹药之原料。而采炼费巨，听民自办，动多流弊。”^{〔1〕}（P.259）。张謇之所以反对“官营”，主张“民办”，是因为他对晚清洋务派创办的官营企业内的腐败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认为官营企业“名为提倡，实则沮之。”^{〔1〕}（P.165）。张謇主张“商自经营”，但又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1〕}（P.162），况且中国民营经济尚处于幼稚时期，必须给予提倡、保护、奖励和补助。张謇为之主持制定了诸如《公司章程》、《矿产条例》、《商会法》与《公司注册条例》等20余种经济法规，一方面方便实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又规范了政府在保息、税厘等方面的奖励补助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创办起到扶持作用。

孙中山主张实行大企业国有化，发展国营企业，反对私人资本过度膨胀。这一思想主要反映在他提出的“节制资

本”中。所谓“节制资本”，包括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心内涵是发达国家资本。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他讲道：“凡本国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的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10〕}他在《实业计划》中，又明确地表示“近代经济之趋势，适造成相反的方向，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2〕}可见，孙中山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工业化的骨干和支柱。当然，孙中山反对私人资本，并不等于不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表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10〕}并且还提出“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立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当必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10〕}由此可知，孙中山对待私营企业，不但允许其存在，还主张给予一定的支持，只是不允许私人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因此，他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来防止这一现象，其主要途径就是发展国营企业，发达国家资本，以此来实现国家之富强。

三、两者思想同异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张謇和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显特色，存在很大的区别。两者思想同异背后都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1. 两人实业救国思想部分趋同的原因。

第一，两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是其思想趋同的主观原因之一。张謇和孙中山都有着远大的抱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以“精忠报国”为追求的强烈爱国思想是两人情感的鲜明写照。甲午战争，中国败北，签订《马关条约》，张謇可谓痛心疾首，他对此条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引鸠止渴，毒在脏腑。”^{〔4〕}孙中山面对列强环列、虎视眈眈、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中国，深感焦灼，他愤慨地指出：“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踏，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今举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蛮力，雄视世界。”^{〔8〕}可见，两人炽热的爱国情感溢于言表，双方利用外资的思想与清朝的被迫开放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张謇和孙中山都是以爱国主义为宗旨，以实现中国工业化为目标，把能否维护主权提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利用外资的原则上尤其强调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第二，两人都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是其思想趋同的主观原因之二。张謇和孙中山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为了探求救亡图存之道，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两人对欧美仅用一二百年时间使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几十年内建成资本主义强国的事实极为震惊。双方对

其进行了考察与访问，都认识到，吸取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是落后中国走向富强道路的捷径。张謇总结了日本富民强国的经验，认为它主要采用了西方的先进技术，注意发展近代化工业。他说：“日本之学西法也，自工始。自工始者，学其用机器，并学其造机器。……工业进而后及练兵，所以，日本三、四十年之间，由小国而跻于强大矣。”^{〔13〕}因此，他主张向日本学习，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近代化的农业、工业与商业，并以新式工业作为关键的思想主张。孙中山也认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新）路径而行之。”^{〔2〕}并深信只要中国认真学习西方，那么外国须经一、二百年的艰苦奋斗才有的成就，中国不需要很多时间，就能迎头赶上。由此可见，张謇和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中都主张发展新式工业的一个重要主观原因，就是双方对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文明成果的体认。

第三，两人所处时代背景相同是其思想趋同的客观原因。张謇和孙中山同处于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乱的时代，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腐败，纲纪堕地；军备落后，营务废弛，财政亏空，入不敷出，而其统治阶级仍不思进取，固步自封，腐败愚昧。另一方面，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完成了工业革命。1840年，它们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紧闭着的古老大门，之后列强摩肩接踵，纷至沓来，强迫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张謇和孙中山面对这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两人都认为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挨打，其根源在于经济的落后，而以农为本、抑制工商的传统政策又是使中国孱弱、人民贫穷的根源。为此，两人都认为中国要改变命运，必须摒弃这一传统政策，致力于发展近代化的农业、工业与商业，故不约而同地提出农是立国自强之本，工是富民强国之本，商是当务之急的正确主张。

2. 两人实业救国思想各显特色的原因。

第一，两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是其思想各显特色的主观原因之一。张謇走的是正统的科举之路，接受了完整的封建教育，受传统儒学的熏陶很深。他读过《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思维模式和伦理纲常都集中体现在这些经史子集中，对张謇经济思想的形成起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见，张謇身上传统文化的因袭是非常沉重的。孙中山系统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1879年，其胞兄孙眉将他送往檀香山岛上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就读，所教内容包括了许多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这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9〕}而他伦敦蒙难后，暂留英国的那段经历，为他近代化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两人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求学路，而这决定了其实业救国思想有着很多不同之处。就其宏观来说，张謇在实业救国思想中所建构的经济近代化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我所用，其实质仍逃

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窠臼。而孙中山所勾勒的工业近代化蓝图,其性质是想建设资本主义国家,主张用全新的资本主义模式来发展中国。就其具体思想主张来说,在农业发展的途径上,张謇的主张是改良的,想采用公司制的形式来发展近代化的大农业,而孙中山则主张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第二,两人对发展经济着眼点的认识不同是其思想各显特色的主观原因之二。在发展经济近代化的模式上,如何处理中国“当前”与“未来”发展的需要?张謇的思考角度着眼于“当前”。甲午惨败,中国面临旦夕之危,“当前”难过,何论“未来”!晚清洋务官营企业的腐败至甲午已充分暴露,张謇认为官营企业有着严重的弊端,不足以富国强国。加之20世纪初,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和清政府实施“新政”,鼓励和扶植民营企业,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得以在1905年前后形成一个高潮。张謇亲历上述历史,吸取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而形成主张发展民营企业,反对国营企业的经济思想。而孙中山对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他深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然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社会也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问题:严重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少数资本家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并且认为如果贫富分化问题不解决,“三十年之后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一定是要革命的”(6 P.8)。因此,中国要“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9 P.323)。在两者之间,孙中山着眼于后者,即他认为中国发展经济,“当前”应服从于“未来”。因此,在发展经济近代化的模式上,孙中山主张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反对私人资本过度膨胀,垄断国家经济命脉。

第三,两人所处的地位不同是其思想各显特色的客观原因。一方面,张謇是清末状元,贵为天子门生,对这种崇高的荣誉和清王朝的知遇之恩从未忘怀,心中时刻想着“报先帝拔擢之恩”(14 P.873)。因此,张謇与清朝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思想比较保守。而孙中山与清廷并没有太多的联系,相反,当他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面目后,决意推翻其统治,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两人这种身份地位的不同导致了在实业救国思想中,张謇的某些思想较之孙中山显得比较保守。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农业发展的途径上,孙中山的主张比张謇更为激进,改革的力度更为彻底。另一方面,张謇在民国初年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这为张謇实业救国思想付诸实践提供了平台。在两年任期内,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很多主张都落到实处。而且张謇自身也创办了一系列的企业,有着经营企业的丰富经验。因此,张謇的实业思想理念显得非常

具体、细致和符合实际。而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和革命派的领袖,更多的是从一个宏观的高度在绘制实业救国的蓝图,加之自身又缺乏经营企业的经验,所以与张謇相比,孙中山的经济模式特征是重理论,薄实践,而且其实业思想的理念难免有很多地方大而统之,不够具体。

张謇和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思想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谋求国家富强道路的两种选择。总的来说,孙中山实业救国的经济模式是优先发展现代化的重工业,以此来带动轻工业和资本主义商品农业的发展,并通过利用外资来解决资金问题。张謇实业救国的经济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棉铁主义”,尤其是优先发展以棉纺织业为主的现代化轻工业,并建立资本主义商品农业和重工业,建立健全经济法规和金融体系,并利用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两人的实业救国思想理论最终都陷入了困境。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外没有民族独立,内没有民主自由,根本不存在实现双方宏伟计划的条件。然而,两人关于实业救国思想中的合理内涵,不仅对同时代的人以莫大的启发,对当今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曹丛坡.张謇全集(第2卷)[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曹丛坡.张謇全集(第1卷)[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5]曹丛坡.张謇全集(第3卷)[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曹丛坡.张謇全集(第5卷)(上)[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
- [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0]孟庆鹏.孙中山文集[C].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 [11]黄鹤群.开放先驱者——张謇“利用外资以振兴实业”的思想与实践[J].江南文史,2003(6).
- [12]汤照连.孙中山关于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思想[J].中山大学学报,1979(4).
- [13]崔之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
- [14]曹丛坡.张謇全集(第6卷)[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光 翟)

探微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

李万文^{1 2}

(1.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6)

[摘要] 本文对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来源和研究特点进行了探索,对结构主义所开创的跨学科方法论进行了解读,并对其发展前景的予以展望。

[关键词] 法国; 结构主义; 符号学;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93-04

20世纪西方曾出现了三大人文学术思潮: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其中以结构主义运动最引人注目,它不仅包含着前两种思潮的成果,而且是最广泛地涉及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随着结构主义的不断发展,它成为了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论,人们习惯上称这个时期的符号学为结构主义的符号学。随着结构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被突破、超越,法国乃至整个西方逐步进入了后结构主义时期,而符号学的发展正是突破结构主义主要途径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地位。因此,有人干脆直接将后结构主义称作符号学,结构主义被看作是符号学的同义词。可见法国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它们的起源和特点进行探索,以便完整地把握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

一、索绪尔的影响

1. 结构主义。

“结构”(struere)一词最初在拉丁语中只具有建筑学的意义,它指的是一种建筑式样。在17和18世纪,结构一词的意义被更改和拓宽,渐渐用来描述具体物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方式,因而也能够用来描述形形色色的结构了,包括解剖学、心理学、地质学、数学的结构。此后,结构的方法又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在近代,“结构”一词是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Durkheim E.)在《社会学方法之规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的书中确立的。而结构主义是源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F. de)对语言的符号学式的研究,因此,他被称作结构主义的始祖。这主要体现在以他名义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一书所带来的革命性

的范式转换。他在语言学中倡导共时性的观点,而传统语言学一贯以历时态的角度看待语言的差别。在传统语言学中,语言被看作是一个命名过程及其产物,而在索绪尔看来这是一种误置。他认为,语言是作为能指的语音和作为所指的概念的结合。同时他还指出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同一概念也可以有不同的词表达,而同一词语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此外,他还把语言对象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系统、体制或规范的语言(langue),另一个是受制于前者并使前者具体化的言语(parole)。根据他的这一观点,人们说和听的都是言语,它之所以能形成交流,就是在于它体现了语言的规定性,它是人们都共同认可的规约。索绪尔的这个观念表明,人的言语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有共同的内在结构(语言)。这成为了结构主义者寻求文本的内在结构的出发点,这样,索绪尔在语言学理论方面带来的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就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此后,在人类学、社会学、数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里,人们都在谈论结构主义。当然,各学科所体现出来的结构思维方法都带有本学科的特点。皮亚杰(Piaget J.)认为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第一,在一个研究领域里能找出能够不向外面寻求解释说明的规律,能够自己说明自己的结构,也就是自足性;第二,要实际找出结构的形式化特征,并作为公式而作演绎法来应用。于是他对结构有3个基本概括:即结构有整体性、转换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1](P.2)}所以,结构就是由具体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节性质的图式体系。

说起结构主义,自然会让人想起布拉格学派,这个组织最初的名称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它从1926年开始活

*[基金项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V0746-1204)。

[收稿日期] 2008-08-12

[作者简介] 李万文(1962-),男,江苏南京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语言文学博士生。

动,史称布拉格学派。尽管这个学派在很多方面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接受了索绪尔的理论,并且明确地将这个理论运用到语言学与文学的研究之中。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的语言学研讨会上,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主义”这个词,以代替原来使用的“形式主义”的名称。可以说正是在索绪尔的语言学基础上,布拉格学派发展出了结构主义。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牛津哲学指南”会如此描述结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经极为流行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此运动在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理论诸领域中留下了最持久的印记。使这些不同领域中的各种结构主义统一起来的原则来自索绪尔。”^{[2] P. 115}

2. 符号学。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形成一种符号学研究的国际性热潮。所谓符号学,顾名思义,就是有关符号或符号系统的科学,它研究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规律、符号的意指作用以及符号与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等。“符号”(signe)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 *sêmeion*,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将病人的“症候”看作符号,世人称其为“符号学之父”。其后,虽然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曾论及符号问题,并给符号下过定义。不过,长期以来符号之意一直含混不清。直到20世纪初,索绪尔明确指出,符号不是别的,而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他所说的“能指”(signifiant)是表示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signifié)是它表达的概念。这一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理论后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鉴于索绪尔这种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被学界视作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

由此可见,作为结构主义的始祖和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对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二、跨学科的特色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之后才在美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法国符号学的学术规模之广、影响之大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其研究特点也十分鲜明,主要表现在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方面,也涉及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

1. 语言学。

首先,作为现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创始人的索绪尔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法国的符号学理论基本上是按照语言学家索绪尔、雅格布森(Jakobson, R.)和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 L.)的基本理论建立的。许多法国语言学家的语言学理论也是法国符号学理论的构成部分之一。其中马丁内(Martinet, A.)、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 E.)、格雷马斯(Greimas, A. J.)等在这个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格雷马斯。

格雷马斯是立陶宛裔法国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他与瑞士的索绪尔、美国的皮尔斯以及意大利的艾柯(Eco, U.)被世人称作当代符号学四大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在

埃及和法国的一些大学任教,并先后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的有关部门担任负责人。在他周围集积了一大批国内外的学者,并形成了所谓的巴黎学派,或称巴黎符号学派,这个学派在法国符号学界,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的影响。

格雷马斯早期从事语义学研究,是法国结构语义学创始人之一。他在1966年发表了代表作《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e),这是第一部系统的具有明显结构主义倾向的符号学著作,可以说是符号学的宣言书。此后,他又发表了多部有关符号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论意义》(Du sens)两部,分别出版于1970年与1983年。这两部论文集成为了符号学的指南,并代表了法国符号学理论的成熟。另外,他与库尔泰(Courtès, J.)合作完成了《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推理性辞典》(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分为两部,分别于1979年和1986年问世。这部辞典的问世是法国符号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它给符号学的学习和研究者提供了一本既有系统性理论,又有实用性的参考书。作为研究结构语义学方向的代表人物,他第一个将语言研究单位扩大到文本和话语层面,这也是他与传统语言学界的差别。

格雷马斯文学符号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符号矩阵”,它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并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在人文科学领域内,也许是第一次具体地提出并使人看到了一种真正的结构。他的符号学分析方法的影响可能是当下任何其他符号学家都无法相比的,无论是在符号学界,还是一般人文学科界都引起了认识论和方法论观的变革。

2. 人类学。

布拉格学派尽管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主义”这个词,但是布拉格学派的影响并不大,而且主要是在语言学界。在50年代末之前,语言学界之外的人几乎没有听说过结构主义。而真正把结构主义变成总方法论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 C.),他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应用到人类学的研究,终于把西方思想界推入了结构主义时代。

在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学的素材。他认识到,应当把初民的风俗神话等看做像语言一样的结构,其组分相互关系比内容更重要,具有更多的意义。这样,他就创造性地将语言学模式引进到人类学中。在此之前的法国,人类学总是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而他却要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语言学中,寻找科学性的模式,并成功地将人类学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类具有文化。人类文化使人从自然界脱离开来,并形成与之相对立的优越地位。“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依赖于语言的使用,所以,语言规定了人的本质,同时也划清了文化与自然的界限。”^{[3] P. 607}语言的本质同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

揭示了语言的结构,即揭示了文化的结构,也就掌握了人的本质。人类之所以能构成一个整体,就因为有沟通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而动物却没有这种符号系统,所以就不能形成本族类的整体性。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符号学思想促成了人类学理论的革命。在他看来,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只是表层结构不同,深层结构是相似的。神话、习俗、姻亲关系等都是被共同的深层结构所控制,而遵守这些习俗的民族自己往往不会感受到这种深层结构。他于1949年发表了《亲族关系基本结构》(La Structure élémentaire de la parenté),已经展示了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集《结构人类学》(L'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让学术界大开眼界。他的多卷本著作《神话学》(Mythologie)给了正在进入高潮的结构主义以进一步的推动。

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在五六十年来震动了法国思想界。因而从50年代末起,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几乎任何一门学科都卷入了结构主义,在60年代初,结构主义甚至取代了存在主义而成为知识界的主宰。

3. 文学。

这里的“文学”是指围绕着文学的各种精神探索和理论实践,而并不是指传统的文学活动形式,也就是诗歌和小写的写作。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活动遍及文、史、哲、艺等各个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影响最突出的是在文学理论方面。李幼蒸在翻译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这本书时,写了一篇回顾结构主义的短文,他说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涉及全体人文社会科学,但“法国结构主义”一词的第一所指不是哲学现象,而是文学现象;不是一般文学现象,而是文学的理论活动。的确,在当时的法国出现了文学分析取代文学创作的情形。在这个方面,巴特(R. Barthes)尤为出众。他以小品文式的分析和符号学理论代替了诗歌和小说创作,并以此为自己文学实践的方式。

虽然在专业上给巴特界定比较很难,可以说他是一位符号学家,也能说他是一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巴特是以文学批评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并以此闻名于世,其文《作者的死亡》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他认为,传统的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是把文学当作作家自我及其生活的写照,而写作实际上是非个人的,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活动。当代作家应力求打乱作家与其人物的关系,不把自己的生活融入作品之中。他说:“普鲁斯特赋予了现代写作以辉煌的业绩:他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入小说之中,而是彻底颠倒。”^{[4] P. 271}这一观点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大相径庭。当然,他本人并不满足于做一名批评家,他毕生的追求就是使文学批评成为文学的一部分。

巴特的文论不仅在法国受到关注,而且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与他一生的追求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他的一生是个不断质疑、不断否定、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和研究领域的过程,他的研究涉

及到语言、文学、哲学、音乐、摄影、绘画、服装等方面,领域之广、思想之丰富,后人恐难所及,这大概是人们如此关注的主要缘由。

4. 其他领域。

当代符号学意识形态分析研究与一个人的名字密不可分,那就是在1965年圣诞节前从保加利亚冒着风雪来到巴黎的克里斯特娃(Kristeva, J.)。来到法国后,通过参加各种学术研讨活动,她很快成为法国思想界中极富活力和颇具影响的人物。不到30岁就成为首届国际符号学会议和协会的组织者,而且后来还曾长期担任国际符号学会会长。她的符号学意识形态批评观具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她甚至认为马克思本人正是实行符号学批评功能的第一人,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思想的断绝是通过大量政治与经济的意指实践进行的。在其符号学话语中,她使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作为左翼文化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她的文化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这在思想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

通过对当代法国思想的系统研究,她试图超越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她广泛吸收了巴特和格雷马斯等人的新符号学成果,此外,德里达(Derrida, J.)的解构主义观点也给了她深刻启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她在文学评论和符号学领域里,成功地创建了新的理论。她认为,在符号学的研究中要超越结构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就必须将结构主义对符号的静态把握动态化,在结构的生成、变化以及与外部的关系中把握符号。她的解析符号学不仅克服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局限性,而且还推动了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发展。

在文学评论领域中,她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以巴赫金(Bakhtin, M.)的文学理论为基础而提出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é)的独特观点,文本间性又叫互文性。她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过去的文本和现在正在创作的文本相联系。她反对结构主义将文本符号系统理解成封闭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该视作处于文化环境并向外部历史开放的东西。“巴特对这个观点高度重视,并认为这不仅是对符号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而且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本理论。”^{[3] P. 696}

法国的结构主义运动造就了整整一代思想界大师,其中包括心理分析学家拉康(Lacau, J.)、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社会学家戈德曼(Goldman, L.)、历史文化学家福柯(Foucault, M.)、马克思主义研究家阿尔都塞(Arthusser, L.)、哲学家德里达、电影符号学分析家麦茨(Metz, C.)、文学理论家除巴特外,还有托多洛夫(Todorov, T.)、勃瑞蒙(Bremond, C.)、热奈特(Genette, G.)等。符号学的方法和人文科学话语的结合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特征,符号学的本质就是跨学科方法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符号学在世界上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的原因。

三、前景展望

结构主义之所以能如此辉煌,法国结构主义历史学家多斯(Dosse, F.)在《从结构到解构》一书中认为:“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原因有二。第一,结构主义承诺提供严密、精确的方法,并希望寻求科学性的征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第二,它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批判意识发展的关键性的时刻”。^{[5] P.4)}结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一个特定时刻的抗争,它反映了对传统西方文化的质疑,表达了在寻求新模式的过程中对现代主义的渴望。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开始走向衰退。尤其是80年代以来,随着法国符号学界多位英才的相继离世,给了这门学科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法国的符号学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此外,面对当今认知科学的新发展,当下从事符号学的研究者必须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情况,进行思考、探索,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和答案。

1. 当代叙事学的出现。

当代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后来扩展到了其他国家,并成为一股独领风骚的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普林斯(Prince, G.)在《叙事学辞典》(Univ. of Nebraska Press, 1997)里将叙事学定义为:“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有关叙事作品的理论。这个定义向我们表明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叙事学是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它已成为符号学世界内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6] P.392)}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69年托多洛夫在他的《十日谈的语法》(Grammaire du Décaméron)著作中首次提出了叙事学(Narratologie)这一术语,从此,对于叙事作品的研究有了一个学科名称。他认为叙事学研究的对象是叙事的本质、表现、功能等叙事文本的普遍特征,而非叙事的媒介。稍后,热奈特有感于当代大众传媒的多样性,并各有其不同秉性,于是将叙事学划定为只对叙事文学的研究,不涉及影视等部门。总之,叙事学属于以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的理论,主要针对作品中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事语式等方面进行研究。除了托多洛夫、热奈特、巴特、格雷马斯、布雷蒙等学者对叙事学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他们对叙事学的建设,乃至文学理论的科学化无疑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

他们往往把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归结为若干语言现象,简单化的弊端显而易见,但是,法国文学叙事理论仍然是今日世界上最发达的。

2. 跨文化符号学的兴起。

近二三十年来,符号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广泛运用于各个文化领域。2004年7月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符号学会的主题就是《世界的符号:跨文化性与全球化》,国际符号学学会构想这个主题主要是出于促进符号学学术地域性扩展的目的。“跨文化性”其实就是指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对话。“跨文化符号学”不仅是西方理论向非西方世界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西方理论借以自我更新的过程。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学术思想的全球化将会不可避免。而在这个发展趋势中,符号学作为普遍语文学肯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学术的全球化不仅是西方知识对非西方地区的扩展,而且是一种全球范围内文化和学术的互动、互融过程。符号学全球化就是指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人文科学传统的互动及其结果。现在很多学者甚至认为跨文化性可能是符号学乃至整个世界人文科学走出困境的途径之一。

随着人类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科学的科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以促进人文科学研究的精确化和科学化为目的的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正好顺应了这一趋势。由此可见,在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发展道路上虽然充满挑战,但是,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 考 文 献]

- [1] [瑞 士] 皮 亚 杰. 结 构 主 义 [M]. 北 京 : 商 务 印 书 馆 , 1984.
- [2] [美] 布 洛 克 曼. 结 构 主 义 [M]. 李 幼 蒸, 译. 北 京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 2004.
- [3] 高 宣 扬. 当 代 法 国 哲 学 导 论 [M]. 上 海 : 同 济 大 学 出 版 社 , 2004.
- [4] 汪 正 龙. 文 学 理 论 研 究 导 引 [M]. 南 京 :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2006.
- [5] [法] 弗 朗 索 瓦 · 多 斯. 从 结 构 到 解 构 [M]. 季 广 茂, 译. 北 京 :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 2005.
- [6] 李 幼 蒸. 理 论 符 号 学 导 论 [M]. 北 京 :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1999.

(责 任 编 辑 南 山)

模式与诗歌 :对邵洵美诗歌的文学定位*

李 欣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借用弗莱的3种正统的文学语言模式剖析邵洵美诗歌,把邵洵美的诗歌创作分为描述性模式、概念性模式、修辞性模式。在这3类模式中,可以看到邵洵美诗歌与西方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关系,从而对以往把邵洵美以及其诗歌定位于唯美—颓废主义提出质疑,并认为邵洵美以及其诗歌是唯美—享乐主义。

[关键词] 描述性模式; 概念性模式; 修辞性模式; 唯美主义; 颓废主义; 享乐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097-04

弗莱认为在阅读一种文学结构时,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心的,即极力去理解我们所阅读的文字,一个方向则是离心的,即在所读作品之外,通过回忆去概括语言世界中使用这些词语的传统意义。^{[1] P.3)}他根据文学语言结构的不同,列出了3种正统的文学模式:描述性模式、概念性模式、修辞性模式。除了这3种正统的文学模式之外,弗莱认为还有第四种文学模式,那就是诗歌模式。所谓诗歌模式,介乎辩证模式(概念性模式)与修辞性模式之间,它与两种模式具有许多类似之处,但诗歌模式依赖于意志与精神中其他一些因素,仿佛自愿又仿佛不自愿地整合,这些因素关联到幻想、梦幻、佯装等等,它表现为神话和隐喻。^{[1] P.109)}当这3种文学模式纳入诗歌模式时,又因诗歌语言所用的是心灵语言,一旦这种语言进入人类心灵领域,描述、概念还是修辞性的语言不再独立存在,仅作为诗歌结构的成分才出现。依循上述理论,我们通过这3个不同的模式对邵洵美诗歌进行分析,从而对邵洵美及其诗歌作文学史的定位。

一、描述性模式与邵洵美诗歌

描述性模式的文字是为了获得关于书本以外的世界某个方面的信息。弗莱认为,这方面存在两种结构:一种是人们所描述的事物的结构,另一种是用以描述该事物的词语结构。在描述性模式文体中,读者不必去关注文章中的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可去注意字面所专有的东西,即一个词语表面上所表达的意思。因此阅读此类诗歌只要抓住其中的几个词语,就能看到诗人的内心世界。弗莱采纳了洛克的程序,即感知导致思考。“思考”这个词就包含了“镜子”的隐喻,因为反映于思想中的东西乃是感官感知尚未获得词形的资料。^{[1] P.4-5)}因此,作家一般都希望自己思考中的

事实是“不说自明”的,读者不需要去注意他本人如何安排词序。于是,描述性模式就变成通过描写自然环境中的事物来表现作者的情感和思考,而且这种描述语言是直接与情感思考相联结的,不需要读者去关注词语之间的关系。拿描述性模式反观邵洵美的诗歌,我们发现这种模式主要表现在他创作的前期。

邵说:“第一次写诗便一定是一种厚颜的摹仿,再进一步是词藻的诱惑,再进一步是声调的沉醉……当时只求美丽的字眼,新奇的词句,铿锵的音节。”^{[2] P.7-8)}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邵洵美前期诗歌正符合弗氏所说的描述式诗歌,只注重通过感知来进行内在的创造性描写,如美丽的字眼、新奇的词句、铿锵的音节。“从淡红绿的荷花里开出了热温温的梦/她偎紧我的灵魂。”^{*}那里的花都能把他们的色彩芬芳编成歌曲/做成诗/去唱软那春天的早晨——/就算是剩下了一根弦/我相信她还是要弹出她屑碎的迷间/任你能锁住了你的耳朵不听/怎奈这一根弦里有火/她竟会煎你/熬你/烧烂你铁石的坚硬。”(《洵美的梦》)诗人运用厚颜的描述,反复出现“她”,这个“她”贯穿这首诗,弗氏所说的“她”就是用以描述该事物的词语结构。只要对“她”这个字所表达的意思有所了解,就可以看到诗人把对爱情的追求当作自己的梦,爱情的抒写成为他诗歌的主题。对爱抒写正是那个时代留欧诗人的主要题材。因此,新月派前期的诗正如“在莎士比亚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诗人便是情人。……他创作灵感的主要源泉之一,与其‘情妇’的结合,构成与另一人等同的新形体的经验,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生殖力”,爱情是诗人灵感的主要来源。同时邵认为“诗人的肉里没有污浊的秧苗/胚胎当然是块纯粹的水

*[收稿日期] 2008-10-22

[作者简介] 李欣(1984-),女,浙江温岭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晶 / 将来爱上了绿叶便变成翡翠 / 爱上了红花便像珊瑚般妍明”。从邵洵美前期的描述性诗歌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子。唯美主义主张对美的事物的描写,一切无用的就是美。唯美主义的倡导者戈蒂耶指出赋诗旨在求美,那些自然事物、爱情等才是美。而邵洵美最先接触到的是一位希腊女诗人莎弗。莎弗的诗“处处见到她的火的爱,对于自然,对于衣饰,对于花草,对于婴孩”(3 I P. 44)。正是对莎弗诗的迷恋,邵洵美认识了唯美主义者史文明,然后由史文明让他认识了英国先拉斐尔派的诗人。但从邵洵美前期的创作来看,他的诗更多是偏向于莎弗式的诗歌,或者说是偏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也就是弗莱所说的描述性模式,从诗歌厚颜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直接体会到诗人的情感。正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到“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只是那缠绵的十分可爱的。《洵美的梦》是他对于那香艳的梦在滑稽的庄严下发出一个疑惑的笑,如某一块翡翠真能说出话赞美另一块翡翠,好就正比是洵美对于女人的赞美。”(4 I P. 152)

从邵诗前期描述性诗歌中,我们完全可以把他及他的诗歌定位于新月派诗歌中,他那重彩的词语与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如出一辙。但事实却不然,陈梦家已经发现邵洵美诗歌的异点——“香艳的梦在滑稽的压乎下发出一个疑惑的笑”。

弗莱说,爱情诗,也许一切诗歌,都是诗人本性遭到挫折后产生的东西,其存在反映或取代了一种无奈的失落。在邵洵美的爱情诗背后隐藏着如何的无奈?或许在邵洵美另一类诗歌模式——概念性模式中可以找到答案。

二、概念性模式与邵洵美诗歌

邵洵美在《诗二十五首·序言》中提到,他的诗最主要的不足是“忽略了更重要的诗的意象”。在他的《花一般的罪恶》出版后,徐志摩曾在一个朋友面前评价他说:“中国有个新诗人,是一百分的凡尔仑。”(2 I P. 7)邵洵美却批评徐志摩:“如果他亲口对我说了,我绝不会到了五年前才明白我自己的错误。”所以他说:“我五年前的诗,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除了给人眼睛及其耳朵的满足以外,便只有字面上所露示的意义。”由此,邵洵美一改前期的创作方法,注重意象的建设。这一转变正与弗莱所说的第二种正统文学语言模式相对应——概念性模式。弗氏解释说,“词序一旦构成注意的焦点时,这种概念性模式中原先称作‘真实性’的成分就应从内部寻找了,也即从词语本身所包含的信息而不从它们对环境的反映中去发现。也就是说,比较描述性模式,它是从外部自然事物中去体现诗人的情感,而概念性模式却是从内部词语运用本身去体会。因此就需要读者去关注词语本身所隐喻的意思。诗人在他自己构建的文字秩序的范围里追求真理,这就需要协调其中的言语成分,这类成分体现为时间、性质、本体、存在等条件,它们必定是抽象的,这直接关系到文字结构本身,而与外在世界保

持着某种距离。”(1 I PP. 8-9)弗莱认为这种模式是思辩性,所要展开思辩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这种模式在诗歌中所用的语言是指“潜在思维”。邵洵美正是采用这种模式来表达他诗中所隐藏着的情绪。这种无奈和疑惑最初表现在《出门人的眼中》这首诗歌中。

出门人的眼中是数不尽的渺茫,
每一双陌生的面孔是一种恐慌;
不知名的鸟儿便是对我歌唱,
我也当是在嘲笑我来自东方。

“渺茫”“恐慌”“嘲笑”精确地反映出诗人真实的情感。邵洵美在异国遭到歧视,在诗中把这种歧视转变为对纯洁爱情的亵渎:原本是“我敬重你正像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但后来转变为“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女人》)。如果这段对女人的描写与前期邵洵美赞美女人的诗歌比较(如《To soapph》),我们就会发现,诗人开始对女人有了辨证的思考,如果我们把“女人”不仅仅理解为性别上的女性,甚至把它扩大到全人类,那么,诗中表现的就是诗人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开始疑惑,只不过全人类缩小到女人的范畴,这也正证实了陈梦家在《序言》所说的邵洵美这类概念性诗歌已偏离了他早期的描述性诗歌,更偏离唯美主义的诗歌创作,开始跟随与唯美的同质异构的颓废的思潮,这在他的概念性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颓废主义所批判的就是在现代文明中人性道德的堕落,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变得冷漠和虚假。邵洵美这时期创作的主题基本是把女人与丑陋联系,总有一个男性注视或幻想的假定视角,诗人沉溺纵情于女性身体色情的爱的畅想,这种畅想已不是纯洁的爱情,而是对丑恶的人性和欲望进行书写。

牡丹也是会死的,
但是她那童贞般的红,
淫妇般的摇动,

……

我总忘不了那湿潮的肉,
那透红的皮,
那紧挤出来的醉。

——《牡丹》

面对充满欲望的社会,邵洵美思考自己的存在:
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
这些摧残的命运,污浊的堕落的灵魂;
像是遗弃的尸骸乱铺在凄凉的地心;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花一般的罪恶·序》

邵洵美认为纵然人生是冰冷的,他也不愿让自己的尸骸无声地铺在地心,他选择让堕落的灵魂去享受罪恶世界所带来的快乐。

邵洵美概念性诗歌中所表现出的享乐更多是一种辩证的思考,这份思考模仿了波德莱尔式的用自身的罪恶拯救世人,寻找洗清罪恶的方法,这样一种创作思维完全与徐志摩代表的新月派产生了分歧。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罪恶的忠实信徒”。但我们又看到波德莱尔式的反抗在邵洵美引进中国上海时发生了变异。因为邵洵美对上海繁华生活产生了眷恋,他承认:“我爱上海,便是因为它和我的关系太密切了……它是一部我的历史……没有它,我对我自己的过去会没有查考”^{[5] P. 25}。邵洵美用这种变异的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创作诗歌,也就意味着他的后期诗歌不存在任何思辨的思维,如关于人的存在。正如弗氏所说当个人因素进入核心,变成其文字表述的新焦点后,逻辑论证便转变为修辞性模式,这时取代概念性模式的则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这是一种要求非理性的文字结构,因此,邵洵美后期诗歌偏向修辞性模式。

三、修辞性模式与邵洵美诗歌

弗莱认为修辞性模式是最精密的模式。它有两个层次,其一是预示,即你应相信什么,其二是道德的,即你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这种模式涉及一种道德问题。而第二层是诗歌中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占主要成分,不在于你信仰什么,而在于你在你所谓的信仰中的行动。在诗歌中,这种模式不存在面对面的说话,作家转过脸,不理睬听众,然后就另外一些事运用直接讲话的手法。这种模式就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说人们并未听见而是无意中偷听到诗人的话。也就是说这种模式的诗歌不存在交流和直接的表达情感,而是诗人的自述。在《花一般的罪恶》中,诗人通过不同的性别视角来讲述自己享乐主义的思想。一开始用女性视角来写,她是上帝的女儿,她“去将颜色骗人们的爱护”,“人们爱护我又因我昏醉,将泪儿当水日夜地灌溉;又卖弄风骚对我献媚”。但是在死神面前,一个个都对她说“说我是蛇蝎心肠的狐狸”,诗人马上为她辩护,这就变为一个男性视角:“这里有诗/这里又有画,这里又有一刹那的永久/这里有不死的快乐/这里没有冬夏也没有秋。”因为“你一生有几次春光/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荡漾”。在这首诗中,诗人明确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享乐主义。同时,我们在谈这首诗时,感觉不到诗人矛盾挣扎的思想和辩证的思维,诗人只是一味地在他所谓的信仰中生存着。另外弗莱认为每种意识形态一开始就用其传统神话体系意义的重大部分提出自己的认识,于是意识形态便借用神话体系,“只要我们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结构中,它怎么样为自身需要去改变神话,我们都必须想念或表白我们想念的。”^{[1] P. 25}用神话去体现自己的意识形态,邵洵美也提过这样的说法:“传统”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资本,忽略了传统,我们便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目的地,没有了出发点。”在《颓加废的爱》中,邵洵美就利用“巫山云雨”神话来体现自己的享乐主义思想。“巫山云雨”讲的是楚怀王游历巫山高唐时,与一神女的爱情故事。于是在这首诗中,邵洵美这样描写:

睡在天床上的白云,
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恋人;
许是快乐的怂恿吧,
他们竟也拥抱了紧紧亲吻。
啊,和这一朵交合了,
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

——《颓加废的爱》

在神话原形之下,作者把那种神秘的可爱的爱情丑恶化。

对于邵洵美思想中的享乐主义,李欧梵先生曾讲到,邵洵美在《狮吼》杂志中翻译了大量关于英国享乐主义者乔治·莫尔的书,而乔治·莫尔又最崇拜佩特。邵洵美在介绍莫尔时,引用了一行法文原文,也即莫尔所引用的华特·佩特所引用的戈蒂耶的句子。^{[6] P. 262}从而我们可以梳理出邵洵美的文学系谱:从乔治·莫尔到佩特,到戈蒂耶。而戈蒂耶的颓废是“一种风格,一种色泽,一种态度”;“不那么精神性,更物质更罗曼蒂克”,表现在“倾向于多彩的奇异的一面,带着波西米亚,艺术上自以为是”。因此笔者认为邵洵美走的完全是一条波西米亚式的享乐主义的路线,而这条路线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月派路线越来越远。

四、总结

通过以上3种诗歌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邵洵美诗歌有着前中后3个时期的变迁,这3个时期的诗歌变化也可以勾勒出邵洵美诗歌思想变化路线,即唯美的思想—颓废主义—享乐主义。从这条路线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邵洵美如何与新月诗派发生分歧,甚至如何偏离了中国正统现代文学史,乃至被人遗忘。

唯美主义流行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唯美主义”一词源于希腊文“可感觉到的东西”。唯美主义否认艺术的社会和功利性,认为艺术本身就是目的,反对艺术含有理性或受道德规范约束,认为文艺是纯粹的个人消遣和享乐。正如邵洵美一开始也是受苏乐美影响。^{[7] P. 71}但唯美主义中一些作家后来拓宽了审美范围,把生活中怪诞、颓废、丑恶及人的变态心理都视为审美对象,这使得唯美主义又与颓废派相联接。一些评论家认为邵洵美是一个颓废派诗人,这也是有道理的。颓废派作家艺术手法不一,共同点在于其在思想情绪方面均以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强调人的主观体验,宣扬悲观、颓废的情绪,特别是从病态的或变态的人类情感以及与死亡恐怖有关的主题中去寻求创作实感,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7] P. 71}在邵洵美诗中,他写到社会堕落——“花香总带着肉气”“雨丝也含着淫意”;他写到人肉欲横流——“当你开闭你石榴色的嘴唇,多少有灵魂的,便失去了灵魂”;他写到道德沦丧——“和这一朵交合了,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这些都是邵洵美诗歌对这个社会的关照。从而我们可以把邵洵美以及他的诗歌定位于颓废派。但唯美主义是颓废主义思潮的一支。即颓废的思潮是吸收了唯美的感官感知的手法和象征主义的象征手法而形成的一股思潮。如果我们画个图来表示就是:

(下转第110页)

巴斯特的悲剧探析*

张春英 孙玉琦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 从勒内·吉拉尔关于迫害文本的4种范式来确定E·M·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庄园》人物巴斯特的替罪羊形象,并通过分析他成为沟通人际关系的牺牲品的原因和他的牺牲对文章主题显现的作用来揭示作者福斯特狭隘的社会阶级观。

[关键词] 替罪羊; 牺牲; 巴斯特; 联结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100-02

一、引言

E·M·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庄园》深入地探至英国中产阶级不同层次的内部,围绕英国中产阶级不同层次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人与人之间应建立真诚关系的主题。亨利·威尔科克斯一家处于中产阶级的顶端,巴斯特处于中产阶级的底层,施莱格尔姐妹居中。三家人的对立象征了中产阶级内部物质主义与理想主义、保守传统与自由倾向之间的对立。最后巴斯特被查理·威尔科克斯的剑所伤,死在象征英国传统文化的“霍华德庄园”,从而使威尔科克斯一家和施莱格尔姐妹由于海伦的怀孕而引发的危机得到解决,实现了中产阶级中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的“联结”目的。本文从勒内·吉拉尔关于迫害文本的4种范式来确定巴斯特的替罪羊形象,并通过分析他成为沟通人际关系的牺牲品的原因和他的牺牲对文章主题显现的作用来揭示作者福斯特狭隘的社会阶级观。

二、悲剧产生的原因

勒内·吉拉尔在《替罪羊》一书中总结了迫害文本的四种范式:1、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写,一种普遍的混乱;2、“混乱者”的罪行;3、这些被指控犯罪的嫌疑者是否有被选定的特殊的标记和“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标志;4、暴力本身。^{[1] (P.29)}根据这4种范式,我们来解读巴斯特的悲剧。玛格利特打算和妹妹海伦离开英国去德国,这就产生了实现“联结”的危机。这是迫害的第一种范式;“混乱者”巴斯特的罪行在于与还是少女的海伦发生关系,并导致海伦怀孕,这在当时保守的英国社会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第三类范式:受害标记。巴斯特处于小说所关注的中产阶级的最低层;“他的头脑就像他的躯体一样从来就

没有喂饱过,因为他很穷。^{[2] (P.34)}第四种范式:暴力。巴斯特怀着愧疚的心情来霍华德庄园向海伦道歉,却被查理误会而伤,当即因心脏病发作倒地而死,书架上玛格利特家祖传的书藉纷纷坠落在他身上。

小说一开头,巴斯特在波菲里恩火险保险公司的收入微薄的工作使他能与妻子杰姬一起享受安稳的生活,偶尔可以欣赏一下音乐会上演奏的高雅音乐,晚上可以阅读一些严肃的文学作品。他曾自豪地对杰姬说:“我花力气通过文学和艺术来提升自己,开拓视野。例如,你刚才进来时,我正在拜读罗斯金的《威尼斯的石头》,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炫耀,只不过让你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人。^{[2] (P.109)}巴斯特以为他借助于属于上层阶级的音乐、书藉和野外散步沉思就可以和杰姬所属的下层人们划清界限,但其实他是处于城市中产阶级的边缘地带,他的社会地位极不稳定。他“位于上流社会的最边缘。他还没有坠入深渊,但是他能看见它。他认识的人中间不时有人掉下去,然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2] (P.118)}当他听信施莱格尔姐妹的建议,相信亨利·威尔科克斯信口说的“保险公司要倒闭”的预言,轻率地离开原来的公司,最后失去赖以生存的微薄的工资,而他在伦敦安身立命的资本也就丧失了。失去了工作,交不起房租,巴斯特被从栖身的半地下室中驱赶出来,成为伦敦都市社会的流放者和中产阶级的弃儿。此时,他对生活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他对海伦说:“钱才是真实的,其他一切只是梦幻。^{[2] (P.188)}书藉、音乐和野外散步都只是有钱阶级们才享受的,对朝不保夕的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开始明白只有固定的工作才能使他在生活中重新定位。

*[收稿日期] 2008-11-16

[作者简介] 张春英(1979-),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讲师。
孙玉琦(1979-),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讲师。

惟有工作才能使他安顿下来,逃避内心的苦痛。他对海伦说:“只要我能找到工作—只要是稳定的工作就行。那么就再不会这么糟了。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沉溺于书中。我能想象得到,稳定的工作能使我们再安顿下来。它使人不再胡思乱想。”^{[2] P.190}失去工作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使巴斯特了解到自己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的精英文化、高雅品位不是他这个地位的人所可以拥有的,他看到自己和以施莱格尔姐妹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差距,也意识到了自己对以威尔科克斯为代表的有产者的依赖关系。“对工作的渴求显示了他的幻想,重新获得在波菲里恩火险保险公司这类商业机构中的职位,重新进入以前的社会等级秩序并恢复原来的中产阶级文化身份。”^{[3] P.183}但是他的哀求和梦想却遭遇了亨利冰冷、断然的拒绝。他否认自己应该为巴斯特的失业负责,他相信“适者生存,减少其雇员的工资,削弱所有可能会对其养尊处优生活构成威胁的人的独立性。”就连原本同情他的玛格利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拒绝给他提供帮助,并力劝海伦与他划清界限。巴斯特死亡的一幕在小说中极富有讽刺和象征意味:“这个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小职员,在经济界实业家的打击之下死去,而埋葬他的则是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书本。”^{[4] P.166}

三、悲剧产生的作用

巴斯特犯下了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错误:与未婚的海伦发生关系,并致使其怀孕。这一事件把威尔科克斯家和施莱格尔家不同的价值取向、生活原则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潮,使原本似乎安静的玛格利特一直追求的“联结”遮盖下的不可调和性暴露了出来。由于亨利的双重处世标准,不原谅、不承认海伦的所为,激怒了玛格利特,促使玛格利特放弃“联结”的想法,不顾亨利的最终反对仍然让海伦住进了霍华德庄园,并决定放弃丈夫与海伦一起前往德国。知识分子和有产者的冲突达到了高潮,似乎“联结”走到了走投无路,只能宣告失败了。这时只有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才可以借此得到缓解,而巴斯特的死挽救了这一联结:“未婚先孕的海伦破坏了社会既定道德规范,绝难容于狭隘的英国世俗社会。巴斯特的死是她能见容于社会的前提条件。”^{[5] P.14}巴斯特的死亡解除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使矛盾得到了转移,因为“受难者承担灾难的责任,替罪羊由此肃清人际间关系恶化的后遗症,从而结束了危机。”^{[1] P.55}并且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沟通平台上,因为他的死导致了查理被捕入狱,亨利因此受到强烈的震撼,相比女儿结婚独立生活,查理入狱更让他深深感到玛格利特存在的重要性,感到了情感联结与精神支撑的重要性,所以他彻底的转向玛格利特寻求精神慰藉。这就把作者的意图真正的显露在读者面前,达到了中产阶级中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联结。亨利这颗“发育不良的心”受到了玛格利特一直宣扬的“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的感化,达到了商业和文化的融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福斯特曾经为这部小说设计了多种结局:“接着我想

查理受其父派遣去鞭打巴斯特并被其所杀,巴斯特自己跳出窗外,或者可以是海伦和巴斯特死亡,或者也许是巴斯特活下去。”^{[6] P.48}最后的成稿选择了巴斯特的死来成全“联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斯特狭隘的社会阶级观。根据吉拉尔的观点,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为了缓解矛盾,解决问题,人们往往会选择建立一种“基本暴力”,以一人之死来换得大家的性命。而这个牺牲者往往是社会阶层中的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因为“事物的极端时时会遭到集体霹雳的打击,不仅是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而且是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极端恶习和极端德行,极能诱惑人和极令人讨厌,女人、儿童和老人等若者的弱小和强者的强大同样成为中矢之的。”^{[1] P.23}。巴斯特在小说中是一个弱势群体,虽然属于中产阶级,却挣扎在边缘地带,一份工作的丢失就能让他陷入深渊。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第六章一开始,就以叙述者的声音郑重地声称,这部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上流人士或那些伪装成上流人士的人,而那些穷困潦倒的人只不过是关注事实和数据的统计人员或多情善感的诗人才感兴趣的对象。他的注意力只放在亨利一家和玛格利特姐妹们的身上,所以他选择牺牲巴斯特为他的小说主题“联结”服务。

四、结论

福斯特在小说《霍华德庄园》试图为英国指出一条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即通过不同阶层和持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接触和了解来达到沟通,来改变殷实富有的英国中产阶级的性格上的缺陷,用高层次的文化来弥补他们精神上的空虚。^{[7] P.53}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完美融合。基于这一创作目的,小说中能实现联结的只是有经济实力的有产者和有遗产继承的知识分子,而处于下层的巴斯特们是充当促使他们联结的工具,是牺牲品,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思想下下层人们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以他们的牺牲来换得上层人们的和谐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勒内·吉拉尔. 替罪羊[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 [2]Forster, E. M. *Howards End*[M]. New York: Penguin Book USA Inc., 1992.
- [3]陶家俊. 文化身份的嬗变: 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4]候维瑞. 现代英国小说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 [5]陈丽. 《霍华德别业》本土的殖民救赎[J]. 山东外语教学, 2006(2).
- [6]Freedman, Ariela. *Death, Men and Modernism: Trauma and Narrative in British Fiction from Hardy to Woolf*[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3.
- [7]纪康丽. 主题与人物、情节的距离——评福斯特《霍华德庄园》[J]. 国外文学, 1996(1).

(责任编辑 南山)

后殖民语境中民族主义困境的反思*

——《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文化融合思想

韩嫣薇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采用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分析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反映的作者亨利·詹姆斯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实质和局限性,重新阐释了作品中女主人公伊莎贝尔欧洲寻梦之旅的象征意义,挖掘作品人物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背后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 民族主义; 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102-03

亨利·詹姆斯是19世纪晚期当之无愧的“国际题材”小说的杰出大师。国内众多研究詹姆斯的学者都试图采用跨文化交际理论理解和诠释大师作品中的文化融合思想。他们肯定这种理想的积极意义,同时将理想实践的失败归结于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并对此深表遗憾。然而笔者认为,詹姆斯作品中大多数人物在文化冲突中的悲剧命运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跨文化交际失败,而是由于孕育这种文化融合理想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本文将从探讨詹姆斯的代表作《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人物的象征意义入手(以下简称《画像》),通过分析隐藏于小说文化融合主题背后的微妙的性别与殖民意识,从而揭示作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小说主题构思和人物塑造产生的必然影响。

一、詹姆斯的民族主义思想

作为詹姆斯创作第二阶段的代表作《画像》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充分反映了作家的写作特色,同时在思想上也体现了当时詹姆斯最为关注的问题:即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如何帮助美国摆脱文化上的边缘地位,向欧洲宣扬和展示美国鲜明的民族性格和独特文化。作者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显然深受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1] P. 10-13}在这场也被后世称为“美国文学复兴”的运动中,为了对抗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殖民话语的文化偏见,以爱默生为精神领袖的美国知识精英们将美国文明定义为建立在思想独立和道德纯洁基础之上的新兴文化,因而完全有别于腐败堕落的欧洲文明

并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詹姆斯认同爱默生等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早在1867年给好友T. S. 佩里的信中就不再肯定美国的自由精神与道德力量便是美国站立于其他民族前列、借鉴和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分的前提。^{[2] P. 54-61}

但是随着美国文化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深入,欧洲文化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凭借昔日宗主国优势文化的影响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和同时期的美国文化精英一样,詹姆斯对欧洲悠久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怀有一种既崇拜又痛恨的复杂的情绪。由于文化自卑感,富有的美国人往往远渡重洋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欧洲受教育。亨利·詹姆斯的童年就是在欧洲各地旅居中度过的,素有“欧洲旅馆儿童”之称,^{[3] P. 231}因此深受欧洲文化的熏陶,在潜意识里默认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詹姆斯总是认为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除了天赋的善良和美德,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差甚远。^{[4] P. 75}在他1879年出版的《霍桑传》中,詹姆斯开列了一份美国缺少文化的清单,详细描述了美国文化的种种匮乏:没有君主,没有宫廷,……没有文学,没有小说,没有博物馆,……^{[5] P. 43}而且詹姆斯认为对于小说家来说,美国在文化和艺术传统上的这种匮乏不利于文学创作,因此于1875年决定长期移居欧洲。在他的创作中,詹姆斯不可避免地欧洲文化采取了大量的引述和改写。^{[6] P. 60}正如Lawrence Buell指出的,对欧洲文化的抵制和遵从相辅相成地造就了这一时期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其中帝国的经典文学模式既是创作的指导权威也是批评抵制的对

*[基金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校级课题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70KL00804)。

[收稿日期] 2008-09-03

[作者简介] 韩嫣薇(1979-),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象^{[7] P.598}。像詹姆斯一样从美国文艺复兴中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们无法彻底摆脱昔日统治者所设定的心理模式，却妄图凭借它来挑战昔日的权威。^{[8] P.33}他们在竭力消除残留的殖民地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也再次复述和巩固了欧洲文化。这实质上仍是欧洲优势文化霸权在发挥作用。

二、文化融合理想的初现

小说《画像》的题目就颇具深意，巧妙地暗示了在欧洲背景中描绘的美国青年女子伊莎贝尔的画像将作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象征欧美文化的融合。正如詹姆斯在小说前言中反复重申的，读懂这部小说的关键就在于理解女主人公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而存在的^{[9] P.12}。通过伊莎贝尔，詹姆斯不但表现了美国女孩从天真少女成长为成熟少妇所经历的道德困境，以及她在欧洲游历寻梦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挫折，而且也反映了美国文化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两难境地。

伊莎贝尔是一个性格独立，道德高尚和充满活力的美国青年女子。她既为自己身为美国人感到自豪，同时又希望通过学习欧洲的悠久文化实现自我完善，这促使她迈出了走向欧洲的第一步。詹姆斯的文化融合的思想也在此初露端倪。伊莎贝尔对待欧洲社会既满怀向往又充满疑虑。这种矛盾的态度又呼应了美国文化在确立民族身份的过程中对欧洲文化既反抗挑战又继承认同的矛盾。

三、文化融合理想的困惑

初入欧洲，伊莎贝尔并没有盲目地接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凡事依然坚持运用自己的独立思想作出判断，并且十分重视自主选择的权利。到达欧洲后不久，她就先后遇上了英国贵族沃伯顿勋爵和美国青年企业家戈德伍德的求婚。但是伊莎贝尔既不想被贵族社会的种种规范束缚，也无法接受美国式的粗鲁呆板和商业文化培养的男性气质。她清醒地认识到这两个人所提议的幸福与她的理想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和他们的结合无法满足她自由地选择命运的愿望。于是她拒绝了两人的求婚。

然而伊莎贝尔的性格也不可避免地兼有美国社会文化特有的狭隘和不谙世事的特点。在她与梅尔夫人关于外表是否能够展示自我的辩论中，伊莎贝尔反驳了对方提出的环境与自我密切相关的主张，坚信外在的附属物不但不能反映衡量真实的自我，反而是限制和障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现我自己，但我知道，其他的一切都不足以表现我。”但是伊莎贝尔很快就发现如果否定一切外在的传统习俗和社会制度，她也将无法清楚地阐释什么是真正的自我。她的这种反对一切外在形式的美国超验主义自由观随着她在欧洲生活的深入，逐渐暴露出抽象、幼稚和不切实际等缺点。

伊莎贝尔这种找不到与内在精神自由相对应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困惑真实地反映了美国文化在当时的发展困境。随着政权的日益巩固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迫切需要寻求恰当的文化的载体。整个美利坚民族呼唤着一种彻底摆脱欧洲传统文明，能够体现美国自由独立的文化体系的诞

生。但是由于美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它的文化也随着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推陈出新，难以像历史悠久社会稳定的欧洲各国那样沉淀下来形成一种持久稳固的文化形式。通过探讨欧美文化融合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詹姆斯希望美国能够成功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对成熟的文化形式的精华，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寻求切实可行的出路。

四、文化融合理想的挫折

随着她在欧洲经历的逐步深入，伊莎贝尔逐渐摆脱了当初对自由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认识到一个人不可能为了抽象的自由观而放弃现实的生活。她“只能选择世界的一角，在那里进行耕作”，不然理想中的无限的可能性终将化为泡影^{[9] P.410}。尤其是当她继承了姨夫杜歇先生的大笔遗产之后，她感到自己终于有能力将理想化为行动，创造一种有别于任何世俗社会体系的崭新生活。

不幸的是从姨夫杜歇先生那里继承的大笔钱财的财富不但没有帮助她走向自由独立的新生活，反而使她变成了好友梅尔夫人和夫人的旧情人奥斯蒙德垂涎利用的对象。单纯的伊莎贝尔以为奥斯蒙德就是社会传统与个人自由、文化繁荣与道德高洁、欧洲文明和美国精神和谐并存的象征。她接受了奥斯蒙德的求婚，天真地以为他俩的结合能把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美国式的自由理想与古老的欧洲文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伊莎贝尔的这种理想，反映了詹姆斯所期待的欧美文化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能够互相补充与完善。然而现实的婚姻粉碎了她的幻想。奥斯蒙德的清高脱俗的面具下隐藏着自私专横的真实个性。他们的婚姻非但没有创造出伊莎贝尔理想中的新世界，反而在奥斯蒙德的独裁专制下，沦为虚伪世俗的欧洲贵族生活的粗劣仿制品。

这场悲剧的婚姻本身充满了象征的意味。伊莎贝尔从她的姨夫——美国银行家杜歇先生那里继承的大笔遗产象征着新兴美国的巨大财富，是这个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的基石。但是由于缺乏传统和文化积累，美国的财富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利用呢？通过伊莎贝尔的婚姻，詹姆斯表达了他对于美国文明发展前景的担忧。他既盼望新增的财富能够孕育一种全新的、更加优越的文明，又担忧美国会重蹈昔日统治者和如今的对手——欧洲各国列强文明日益没落的覆辙。借助伊莎贝尔的失败的婚姻，詹姆斯指出盲目自大的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不足以帮助缺乏文化历史背景的美人抵制和避免旧世界的腐败和堕落。美国迫切需要抛开偏狭的民族意识，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从而发展出一种更为理想成熟的文化。

五、文化融合理想的矛盾

在詹姆斯的笔下，历经3年痛苦婚姻磨练的伊莎贝尔终于成熟起来。她收敛起年少时张扬的个性，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隐藏在欧化的贵妇形象中，娴熟地扮演着优雅的奥斯蒙德夫人这一角色。詹姆斯也第一次将伊莎贝尔的形象作为完成的艺术品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在这种优雅和

谐的表象之下。伊莎贝尔的内心压抑着巨大的痛苦。她与丈夫之间的矛盾就像暗涌般潜伏着的。最终由于帕西的婚事,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伊莎贝尔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拒绝和奥斯蒙德一起说服潘西违背心意嫁给沃伯顿勋爵。她的这种态度把奥斯蒙德彻底激怒了。为了报复,他拒绝了妻子要求前往伦敦探望病危的表哥拉尔夫的请求。但是伊莎贝尔的道德观限制了她与奥斯蒙德的专制进行坚决的斗争。虽然她和丈夫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她认为只要他们之间的婚姻依然延续,作为妻子她就不应该挑战丈夫的权威。伊莎贝尔虽然厌恶奥斯蒙德强调婚姻神圣时的虚伪,但是她也觉得必须为自己的当初的决定和这个决定的后果负责,于是很不情愿的收回了请求。

在这场婚姻较量中,伊莎贝尔的困境反映了美国妇女普遍面临的两难境地:社会既要求她们发展独立自由的个性,培养高尚纯洁的道德观,同时又指望她们对婚姻和丈夫绝对服从和忠诚。事实上这种体现在美国妇女身上的道德典范并不是美国本土文化的产物,而是源于欧洲父权话语体系加诸在美国妇女身上的关于特定的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19世纪的美国虽然崇尚个人的自由独立和政治的公平民主,在道德上,却遵循甚至更加强调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意识形态,认为妇女理应是居家主内,谨守妇道并且服从丈夫的。她们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必须服从体现为社会、法律和经济体系的男性权威。^{[10] P.4)}这种自相矛盾的观念极大的限制了美国女性的自由和平等。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如果说美国的未婚妇女比其他地区的女性享有更多的自由的话,那么在这里(美国)一个妻子必须遵循更加严格的约束^{[11] P.198)}”。因此美国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塑造的美国女性角色并没有摆脱作为男性眼光中的女性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功能,依然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既自由独立又传统局限的矛盾性格,并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悲剧的命运。詹姆斯将这种具有双重象征功能的年轻女性形象视作美国文明的象征,以此来区别和对抗欧洲文明的堕落,其实是一种误用。伊莎贝尔身上的双重属性恰恰反映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依然局限于欧洲殖民主义的框架之中。从广义上讲,伊莎贝尔的困境也象征了美国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彻底摆脱和消除欧洲文化影响的矛盾属性。

六、文化融合理想和实现还是失败?

伊莎贝尔最终获悉了当初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阴谋,彻底认清了丈夫的真面目。但是最令读者百思不得其解是,她前往伦敦送别病危的拉尔夫之后,依旧选择了回归罗马。很多评论家也为猜测分析伊莎贝尔这个决定背后的意图而争论不休。但是依据作者特意为伊莎贝尔塑造的既崇尚自由,也重视责任和承诺的性格特点,选择回归罗马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她的回归,作者终于在古老悠久的欧洲文明背景之中完成了他心目中完美的贵妇画像,实现了象征意义上的欧美文化的融合。欧洲这个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旧世界便为这幅“画像”的提供了优美的文化背景。“女士”一词暗示了一种优雅和成熟。而这

种成熟正是欧洲的深厚文化熏陶的结果。虽然伊莎贝尔为了责任和承诺放弃了形式上的独立和自由,但是她依旧顽强地保留了美国精神中的正义感和道德感。凭着内在的精神财富,伊莎贝尔没有被欧洲文明腐化,反而为欧洲文化注入新的生机,成为优秀的继承者和复兴者。通过描绘伊莎贝尔的画像,詹姆斯设想和探求了发展融和美国独立精神和欧洲文化为一体的新兴美国文化的理想。

但是这种融合终究只能局限于伊莎贝尔思想上的成熟和完善,难免令人感叹她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悲剧命运。这样的文化融合是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抑或是“终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遐思^{[12] P.54-61)}”,大多数的读者也难免为此感到疑惑。这种似是而非的欧美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对于现实中文化发展实践似乎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詹姆斯的美国民族主义思想孕育了他作品中以美国青年女性为具体化身的欧美文化融合主题。在美国社会文化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詹姆斯试图通过融和美国精神和欧洲文明构筑一个比陈旧的帝国主义欧洲文明更优越的美国文化的形象。这使他成为了19世纪晚期反映美国后殖民困境题材的最杰出的艺术家。但是他的思想不可能真正脱离殖民话语的影响。看似新生的欧美文化的融合理念本质上依然延续着以白人、男性、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为主导的文明形式,是欧洲文明的变体,折射了美国文化在构建过程中对欧洲文化的继承和妥协。也因此注定了詹姆斯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和他的文化融合理念不可避免的失败。

[参考文献]

- [1] 田俊武,刘永杰.“文艺复兴”与美国文学的中兴[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
- [2] 代显梅.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J].外国文学评论,2000(1).
- [3] Van Wyck Brooks. *New England: Indian Summer* [M]. New York:1965.
- [4] Henry C. Weed.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s* [M]. Boston:1894.
- [5] Henry James. *Hawthorne*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9.
- [6] Lawrence Buell. “American Literary Emergence as a Postcolonial Phenomenon”. *American Literature, American Cul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7] Lawrence Buell. “American Literary Emergence as a Postcolonial Phenomenon”. *American Literature, American Cul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8] Ashis Nandy.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9] 英·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0] B. Welter. *Dimity Convictions* [M]. Ohio: Athens, 1976.
- [11] Tocqueville, A.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M]. H. Reeve. New York, 1945.

马丁·哈里森——鸭嘴兽式的魔力诗人*

张仁兰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 江苏南京 210003)

[摘要] 马丁·哈里森是一位着迷于感知的瞬间,注重这种瞬间被捕捉和被感受的方式的诗人。他的诗是对瞬间的操纵,是对眼中所见、心里所知、耳中所闻、心生顿悟以及触景生情、亲身体悟之间的空间努力挺进和精妙的把握。每一瞬间都捕捉到了观察体悟的本质内容,复杂但却可以触及。

[关键词] 诗人; 感知; 记忆; 鸭嘴兽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105-03

马丁·哈里森,一位澳洲优秀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生活在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在悉尼技术大学教授诗歌和诗学。早在7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在伦敦出版诗歌,获得了无数澳大利亚理事会基金,诗集《夏季》入选2002年新南威尔士州首相诗歌奖并获得2002-2003年度韦斯利·米歇尔·赖特奖。其他诗集包括《声音的散布》(The Distribution of Voice)(昆士兰大学出版社,1993年)、《袋鼠农场》(The Kangaroo Farm)(Paper Back出版社,1997年)和《乐曲》(Music)(Vagabound出版社,2005年)。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写作、当代批评以及澳大利亚诗歌目前关注的问题的论文集——《谁想创造澳大利亚?》(Who Wants To Create Australia?)(Halstead出版社,2004年)。此书被选为《时代文学副刊》2004年的“国际图书”。

马丁·哈里森的诗是对瞬间的操纵,是对眼中所见、心里所知、耳中所闻、心生顿悟以及触景生情、亲身体悟之间的空间努力挺进和精妙的把握。每一瞬间都捕捉到了观察体悟的本质内容,复杂但却可以触及,每一瞬间都体现了及语言之能事的错综复杂的现象以及大小不一的间隙。《袋鼠农场》以强烈的自我本能反应揭示了一种在空间中他确切的位置的敏锐意识,他的语言经过反复深究、推敲而成,游刃有余,发人深思。

正是这种自我本能反应成就了哈里森某种抒情奔放的散文体诗,这种诗直接涉及空间的描写,进而显现现存的物理空间中的现世的空间。这是一种“诗中诗”(meta-poetry),因为它不仅谈论这个世界,而且关注我们如何论及这个世界。哈里森所致力的是诗歌出现的空间,即诗歌的片断、游移、诗化的独白的空间,这便是基本空间的表达,所有诗意的话语描述必须首先在其中出现。诗集中的一首诗

“Double Movement”(《双重运动》)显然是一首地道的意识诗。一段浓烈的描写嘎然而止,接着这首诗似乎越过随意的片段组合——其中一些被直接点明而另一些似乎要你深思:

期望建筑在高空漂流的云端,一根孤零的苹果树枝垂下,曲折如闪电的光线。它似乎在移动。于是平风静浪的海滩,如某种巨物不易察觉,无所作为——来自黎明前的寂静,翻转、拱立、积聚它那银色光线。被带走的是复杂、生命力形式的茎和光的作用“朦胧的薄雾化作虚无,向东而去。”(I I P. 215)

这便是诗集中意识的运作:弯路(迂回路)实现,叙述偏离而追随新的小道,诗成了梦中的轨道,记忆和感受生动地交织在一起。作者认为你的所见正是你所追寻的,这种感官上及主观上对所见所闻的领悟使他能够探索或挖掘在空间里的体验,并带有一种试探性和引发激情的力量,而这一点几乎是其他诗歌所无法企及的。

马丁·哈里森凝练的诗歌需要专注的赏读:曲折延伸的半叙述如河流的顺流而下般的波及澳洲这片大地。调子的变化及方法混合的使用是这本诗集中等诗歌的主基调。但并非只有这些是构成一部好诗的全部,时常你会发现奇特的词汇构建组合,不落俗套,而且伴随着明喻和暗喻的大胆、自如的使用:

脑中,声音的追忆好似荡起涟漪的鱼儿。(《铜盘上的阳光》)(I I P. 7)

接近正午,我的思绪

是红土地的影子...(《春尘》)(I I P. 19)

这时,一只乌鸦在路上振翅飞离,

好像风中一片黑布漫无目的的飘荡...(《周

*[收稿日期] 2008-10-12

[作者简介] 张仁兰(1964-),女,江苏金湖人,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讲师。

围》) ^[1 P. 23]

那片汹涌的水涛 这块闪光的薄纱《周围》) ^[1 P. 23]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哈里森诗中的景大多是令人神往的怡人之地,但并非因为出自于澳大利亚的本土风情地貌。这种赏心悦目部分得益于他勇于进行丰富的刻画描写。澳大利亚不是一方贫瘠之地,而是可以随意或确切地说是适度激发大量暗喻的地方。他心中的澳大利亚包括沙漠,但他的诗更多的是以秀美的水景为背景衬托,其中不乏复杂多变的云朵、色彩、鸟类。

读到此书自然会想起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因为他们对“诗的奢华”有着相似的兴趣:“海边,一帆摇摇欲坠,一团红色/郁金香的火焰在风中飘舞。海光/灿烂,人们在其中漂浮、沉没/好像干扰波是屏幕布满雪花...”(《红色的海景画》) ^[1 P. 33];“灌木丛中的唯一之虎,利齿、跳跃/以一种崇高的形象,完美的镜头/让碧绿如镜的水面更加透明,让黑色小心翼翼地沉淀在轮廓上/让过去的瞬间,恰如其分的呈现/博物馆的一件展品,灭绝、生动、象征。”(《塔斯马尼亚之虎》) ^[1 P. 185]而且诗中随处可见有关人类的各种暗喻,而这些暗语却出自于非人类世界的东西。如:

这里有条小虫坚持不懈,
建筑他那天空与木头的世界:
有些日子绽放光彩,有些日子隐现微光,
而阵阵和风闪现在树皮上。(《歌与诗》) ^[1 P. 41]

此处诗人用一条小虫的坚持不懈的劳作来暗示人的生存之道,即生活的道路有坦途,也有难以预测的逆境,无论怎样都要走下去。这些暗喻富含生活的哲理,而且自然贴切不着痕迹,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细察和深悟。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对真实与想象之间关系——自我与这个世界——的专注。

在其诗中,哈里森用了“maya”(玛亚)这个词。在印度哲学中,玛亚既指魔力,又指可感知世界的幻觉或表象(the illusion or appearance of the phenomenal world)(SOED2)。他在“鸭嘴兽”中(The Platypus)将其表达为“那梦,其中的幻想既真实/又虚假”(that dream, where illusion's both true/and false)。就他的诗歌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对立或反向的字眼,虽说他对此未能细究,但他注重的是所见所闻诗化后的“魔力”(magic),关注的是将我们日常观察认识延伸扩展至几乎无法认知的程度。(华莱士·史蒂文斯曾说过诗歌“必须抵制理性/几乎可以成功”)此外,哈里森总是不断地追寻自己诗歌创作的轨迹,即于主观之中见客观——事物的本质:自我里的世界以及世界里的自我。这一点从本诗选的中两首可见一斑:《意象2》和。前一首中,作者首先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海边山林漫步,沿着小径攀山途中的所见所闻,接着笔锋一转,景色的描写为触景生悟所替代:

但树木并非流水,除非极目远视,

它们从来不能将大海和陆地凝固为一体,
这一天,脚步迈出的一整天。感受
乌云镶边的太阳,空气中可以尝到
大海的苦涩,瞬间的细节,
有所感觉又抛之脑后,正如难以言明之事,
即被称之为视域中的条条小路,
我们每个人将其诠释为折磨或空间,
行动或前行的动力。..... ^[1 P. 25]

在《论传统的绘画方式》中,作者似乎是以传统的绘画方式影射传统的生活方式,如最后一段:

我注意到岩石的隙缝竟然斜射进阳光。
每个人生活、打猎、捕鱼,
每个人活着且安康。 ^[1 P. 35]

此诗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不起眼的“一叶海草”(a sea-leaf)和“光”的作用揭示画作的表现形式和对象以及它的第一要义便是反映现实而又高于现实。这首诗的后两段由前三段的写画、论画转向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了画中有生活和生活中有画,故而意境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升华。

由于他的诗根植于景物之中,因而常通过叙述或对诗或政治直率的评论铺陈开来,进而对诗中的话语者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或确切地说,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并非他如何体验这片土地、诗歌和政治而是他的体察认识如何改变这些体验进行了深入的审视和解剖。可见他的诗使一种意义深远、恰到好处的意识作用其本身,即诗本身的作用机制,让话语者的感悟随着周围世界的不断变动和流动而演变。正是通过这种流动意识,话语者对生存和世界、这两者的融合和反向的统一以及其决定作用并有一定界限的不同空间获取了更深层次的体验。如:

直到后来,你才会将这一切看清。
(你得考虑你自己的样子、步调)
鸽子、骏马、蟋蟀、沼泽地胶树就在汇聚。

几乎无踪可寻,
隐秘地在四处交流呼应

好像数条蜿蜒小道最终汇拢。(《傍晚西式思绪》) ^[1 P. 171]

哈里森诗句似乎常常沿着这最后一行诗的蜿蜒曲折的路径,要打断他诗中的话语者或划去一句简单的诗句非常困难,因为每一行诗句构成了道路交叉点上的一条小道。他的诗突出之处还体现在思维和表达的整体统一上,好像每一行代表了思维系统里的一条神经通道,均衡而有突出,自然贴切,时常和周围世界建立起了丰富多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结果摆脱了世界和语言的阴影,几乎还世界之本来面目。

在哈里森的诗作中,为了适应于现世和观察的流畅性,记忆一直是关注的焦点,给在发展变化和体察中若隐若现的世界植入了坚实的脊骨。来自于负有使命的旅行者或源于家族史的叙述使经常涉足现象化和观察这种困难领域的

诗散发出人性光辉。他对叙述敏锐专注的运用使他免于游移到过于抽象或概念化的巢臼,免于过分关注语言而忽略了体验。比如,由叙述变成了对叙述的看法,由恋旧到对其的一种解剖,由记忆演变成了认识,其中每一次背离都会被顺利地完全地阐释而又被它的回归所阐释。如:

你可叙述,或是赠送。
最好赠送。来来
往往、祝愿、别离。

小径交错在稀疏的灌木中,
机场大厅里的道别。
一支铅笔划过天穹。

每个人的动作都得快捷,
宛如动词。拥抱、触摸,
将人的性格特点显露无疑——

与她车里的人交谈,与其说
是说话还不如说是手势动作。
开着的窗户像熔炉轰鸣。

我想到两根树枝间的空当
空无地夹在中间,背景的
衬托,令人难以捉摸。

胆小的狮子睡在其中的空隙;
笼中的鸚鵡振翅鸣叫。
每一个场景从不会重现(《离开塔斯马尼亚》)^{[1] I P. 89)}

这种运作的意图贯穿于哈里森整个诗歌创作中。即便是向读者展现一种可羨的半透明的世界或这个充满偶然性和现世的变动的世界,你总会感觉到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难得的成功的感悟瞬间。

哈里森在澳洲被一些学者诗人称之为鸭嘴兽式的诗人。鸭嘴兽是澳大利亚东部,包括塔斯马尼亚的一种半水生哺乳动物,唯一的通过产卵而非出生幼崽的哺乳动物,并拥有独特几乎怪异的外表。这主要源于他诗歌的独特之处,除了以上所阐述的,他诗歌的另一突出之处是他能够巧妙的将各种鸟鸣虫叫融于他的诗景中,起到了烘托对比的作用。如:“外有乌鸦飘飞,讪笑/云朵镶边的田原,……”(《铜盘上的阳光》);^{[1] I P. 3)}“绿鸚鵡穿过薄雾迷蒙的黄昏。/这些声音仍在嗡嗡萦绕”(《周围》);^{[1] I P. 23)}“于是鸟儿在暗哑的绿树林中叽叽喳喳,口型的扭曲变化叫成了护身符,……”(《伊斯法罕》);^{[1] I P. 49)}“这便是为什么暮霭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弥漫;蝉在其中开始它们背景乐似的鸣叫,……”(《伯里尔的转变者》)^{[1] I P. 17)}。将各种奇特的声音植入诗歌的诗人往往使许多评论家感到棘手,因为通常使用它们的缺陷和长处很难甄别。当然笔者认为这正是哈里森的独特之处。新颖的句法、诗歌行文的蜿蜒曲折等等特性会同样出现于具有感染力或震撼力的诗歌和那些不具备的诗歌当中。或许这正是哈里森所意指的鸭嘴兽!他已成为一名鸭嘴兽诗人,无论他去向何方,都值得人们追随。

[参 考 文 献]

[1] [澳] 马丁·哈里森.《袋鼠农场》英汉对照本 [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南 山)

论宋传奇小说命名的史传意识^{*}

刘红旗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 “传奇”小说到唐代时达到了鼎盛,随之而后的宋代也出现了大量的传奇之作,宋传奇小说的命名颇受史传叙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拟史倾向,其间又有虚构色彩。

[关键词] 宋传奇; 拟史; 虚构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108-03

从传奇小说发展史上而言,唐宋传奇应是并峙的两座高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前人多“褒唐贬宋”,自从鲁迅为宋传奇判了案:“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1] (P.71)}少有学者对宋传奇的研究。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唐传奇小说的研究论文可谓蔚为大观,而关于宋传奇小说的研究则较为稀疏。对宋传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张友鹤的《唐宋传奇选》、李剑国的《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唐宋传奇品读辞典》《古稗斗笈录·李剑国自选集》《中国小说通史唐宋元卷》《宋代传奇集》、石麟的《传奇小说通论》、李军均的《传奇小说文体研究》等,这些均是见于专著中的成果。还有一些单篇论文,陈霖的《宋代传奇中的妓女形象分析》、赵亚的《从历史题材看宋代传奇的劝惩特点》、张玄的《宋传奇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从〈霍小玉传〉到〈谭意哥记〉》、李军均《论宋初传奇小说文体发展的文化生态》、王巧玲的《宋代传奇的特点及原因分析》等均是研究宋传奇的成果。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有待进一步拓展。笔者不揣鄙陋,在借鉴和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宋传奇小说命名上的史传意识略作分析。

“中国传统小说中许多作品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2] (P.221)}唐传奇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不再详述。而宋传奇在沿袭唐传奇的基础上仍未摆脱史传文学叙事的影响,在命名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创作,是史传

叙事的代表之作,成为百世不易的典范。《史记》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汉书》体例基本沿袭《史记》则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四部分组成。这两部史书的编著大都以人物为传记中心,并且篇名中的“本纪”“列传”等表明了史传文学在命名上的特点。宋传奇小说的命名同样多以“传”“记”“录”(录也是记的意思,此采用江守义之说)等命名,明显地传达出史传叙事对宋传奇命名的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统计宋传奇的篇目时,主要以李剑国的《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传奇集》为准。笔者发现在其辑录的宋传奇篇目中有不少是以“传”“记”“录”命名的,现统计如下(包括单篇传奇和传奇集):

以“传”命名的有:《神告传》《绿珠传》《杨太真外传》《齐王张令公外传》《乌衣传》《郎君神传》《书仙传》《王子高芙蓉城传》《女仙传》《张佛子传》《希夷先生传》《王魁传》《淮阴节妇传》《盈盈传》《李妹传》《陈明远再生传》《任社娘传》《赵飞燕别传》《王寂传》《王实传》《卜起传》《梦龙传》《蒋道传》《贤鸡君传》《茹魁传》《燕华仙传》《张文规传》《鸳鸯灯传》《林灵素传》《毛烈传》《林灵龠传》《罗浮仙人传》《海陵三仙传》《飞猴传》《义倡传》《柳胜传》《绯绿衣人传》《义谕传》《曾亨仲传》《李师师外传》《李白外传》《唐滕王外传》《孝猿传》《黄靖国再生传》《猩猩传》《戴花道人传》《虎僧传》《则天外传》《陕西于仙姑传》《蒋子文传》共50种。

以“录”命名的有:《魏大谏见异录》《回仙录》《玄宗遗录》《屠牛阴报录》《大禹治水玄奥录》《李氏还魂录》《海神灵应录》《江淮异人录》《笔奩录》《云斋广录》《贤异录》《褒善录》《投辖录》共13种。

以“记”命名的有:《越娘记》《孙氏记》《流红记》《用城

*[收稿日期] 2008-10-20

[作者简介] 刘红旗(1981-),男,河南项城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2006级研究生。

记》《蔡笋娘记》《金华神记》《王幼玉记》《梦仙记》《骊山记》《温泉记》《谭意哥记》《异鱼记》《仁鹿记》《朱蛇记》《溷狱记》《葬骨记》《彭郎中记》《紫府真人记》《慈云记》《琼奴记》《远烟记》《吕先生续记》《大姆记》《小莲记》《龚球记》《僧卜记》《西池春游记》《异梦记》《天宫院记》《双桃记》《玉尺记》《玉华记》《乱汉道人记》《出神记》《黄法师醮记》《高俊入冥记》《解三娘记》《黄十翁入冥记》《感梦记》《郑超入冥记》《金华神记》《三异记》《灵惠治水记》《何恁入冥记》《李冰治水记》《异僧记》《洛阳搢绅旧闻记》共47种。

可见《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和《宋代传奇集》中,以“传”“记”“录”命名的就有110种,数量虽不多,却反映了宋传奇在小说命名上有一种依附史传叙事的倾向。“中国的小说叙事受史传叙事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3] P.93},只是在宋传奇中这一影响不仅表现在叙事手法上,而且首先体现在小说的命名上。小说在名称上表现出一种拟史倾向,其实唐传奇也有这种特点,江守义在其《唐传奇叙事》一书中已详加论述。文中为论述的需要吸取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不再一一列出。

二

拟史倾向除了在小说名称中带有“传”、“记”、“录”之外,还有其它方面特点。

有的传奇被史书所收录。^{[3] P.94}如乐史的《绿珠传》,其中绿珠事迹主要采自《晋书石崇传》,而其余相关材料,也都取自古书,有《汉书》《后汉书》等,没有一样是乐史自己杜撰的,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处”。《绿珠传》叙述绿珠事迹,完全是史家式的,颇乖小说家笔法,作者只知堆砌史料,不善虚构,读来颇像石崇传。正如程毅中说到:“传奇体的小说,以史官乐史的《绿珠传》为代表,掇拾史料,改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意存劝戒,也崇尚纪实,文学性不强。”^{[4] P.500}因为作者本身就是史官,在小说的创作中还不能摆脱史传的影响。另外他的《李白外传》《唐滕王外传》均被《宋史艺文志》著录。此外,像吴淑《江淮异人录》中的《耿先生》又见郑文宝《南唐近事》卷下、马令《南唐书》卷二四、陆游《南唐书》卷一四,事迹略同。他的《江淮异人录三卷》在《宋史》本传中均作三卷,《崇文总目》传记类、《通志艺文略》道家类、《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同。《四库提要》说:“铉(徐铉)书说鬼,率诞漫不经。淑书所记,则《周礼》所谓怪民、《史记》所谓方士,前史往往见之,尚为事之所有。其中如耿先生之类,马令、陆游二《南唐书》皆采取之,则亦非尽凿空也。”可以看出宋传奇中的一些内容被当作史实,而这些传奇的名称也可以当作史传的名称。由此观之,就传奇名称而言,作者有时候已经不再关注它们是传奇还是历史,这说明了传奇在名称上强烈的拟史倾向。

有些传奇名称虽然没有“传”“记”,但也表现出史传倾向。^{[3] P.94}一些传奇集从名称上看,看不出多少史传叙事的痕迹,如《摭青杂说》《青琐高议前后集》等,但单篇传奇名称又表现出史传叙事的特点,如《秦宗权》《黄遵》《张浩》《苏小卿》等都是以人名作为小说的名称,而单纯以人物命

名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记性命名,因为在这些名称后面加上“传”或“记”字,对小说可以说没有丝毫影响,因此,虽然名称上没有“传”“记”之类的词语,但在实质上,以人物命名与史传叙事主要以人来命名的情况是相同的。如《向中令徙义》:“向中令讳拱,国史有传”,《安中令大度》:“安中令讳彦威,山人《五代史》有传”,《宋太师彦筠奉佛》:“宋彦筠,正史有传”。这些小说从名称上看没有史传的特点,但是内容上都是以史家的笔法来写。这些单篇传奇和传奇集名称的不一致,说明了宋传奇一方面想摆脱史传叙事的旧式,因此在传奇集的命名时与史传叙事有所不同,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宋传奇受史传叙事的影响很深,所以在单篇传奇的命名上又仍为脱离史传叙事的模式,像唐传奇一样,表现出一种对历史叙事的膜拜倾向。^{[3] P.95}

三

中国古代小说似乎都有拟史倾向的特点,而宋传奇在有意识地模仿史笔的同时,又带有一定的虚构成分。就史传叙事的虚构成分来说,钱钟书指出:“《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过也。”^{[5] P.166}司马迁的《史记》中更有一些奇异事件的描述,造成一种神秘的感觉,如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这些均表现了《史记》好奇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虚构的产物。宋传奇正文中有大量的虚构,仅是传奇名称上就显示了很重的虚构色彩,表现出和史传叙事的巨大差异。史传叙事多为纪传体写人,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顺序。所写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而且是帝王将相,大都以人物的名字或皇帝称号来命名,如《苏秦列传》、《秦始皇本纪》等。宋传奇在命名上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就以事命名而言,并不是通过时间来记事,而是就事论事,并且所论之事在名称上就体现出一定的怪异性,有明显的虚构印记。就单篇传奇而言,《梦仙记》之“梦仙”、《异梦记》之“异梦”、《出神记》之“出神”等都暗示了所记故事具有不同寻常的奇特之处,这些事情不是一般人生活中能遇到的,更不是发生在某一年内的历史大事,多是一些奇闻异事,都无法求证于史实,这就为虚构留下了空间。就传奇集而言,《江淮异人录》之“异人”、《海神灵应录》之“灵”或者显示了所记故事的怪异性,或者显示了所记故事的漫说性,史传叙事的那种谨严、庄重的姿态不见了。既然是怪异,就可以捏造,就可以想象,这些都为宋传奇中虚构提供了条件。也就是说从宋传奇的名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虚构的痕迹。

宋传奇也有以历史人物命名的。这些历史人物有些是文人,有些是贵妃,有些是妓女。但在名称上多少体现了传奇叙事和史传叙事的差别,典型的有《李白外传》《杨太真外传》《李师师外传》等“外传”表明了故事虽然依附于历史,但毕竟和正史有所出入,既然有出入,也就可以进行必要的虚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略举一例,如秦醇的《赵飞

燕别传》作者托古叙事,然而却在小说中无意识地加入了他所熟知的宋代的洗儿风俗以及“大庆殿”的名称。又如赵后私通年少,如果不是《别传》有所本的话,那么这应当是秦醇依据《外传》和《西京杂记》提供的事实,自己进行的虚构。同样,昭仪杀宫人子之事,也可能是根据《汉书》虚构的。可见这类传奇的命名和内容大体是一致的。

史传叙事一般在名称上将所传人物的姓名或称号全部标出^{[3] P.98},如《李斯列传》《项羽本纪》等,每个人的传记泾渭分明,因此史传的命名就给人一种真实之感。宋传奇则不然,有些传奇从命名上看,就给人一种强烈的虚构之感。一些宋传奇名称以姓氏或其它命名,即只出姓,而不出现名,如《孙氏记》《沈生》《贾生》《樊生》《彭郎中记》等。由于这些传奇故事都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因而传奇中的姓氏完全可以换成其他的姓氏而丝毫不影响故事发展,充分说明了传奇故事的随意性、虚构性。宋传奇将人物冠之以姓氏,只是为了讲述故事的需要,传奇并不是关注故事中的人物本身,而是借助人物展开故事,故事和人物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宋传奇在以人或事命名之外,还有以物件或地点命名的。以物件命名的如《玉尺记》《双桃记》《八段锦》等,以地点命名的有《天宫院记》《西池春游记》等,不管是以物件命名还是以地点命名,都有虚构的可能。宋传奇中以物件命名的小说,有些物件是生活中不常见到的,或者是生活中能见到但没有小说描写的那般神奇,因此,如何写这些物件,主要靠作者的想象。如《玉尺记》中的“玉尺”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到,即使能看到,一般人注意的也是它的形状、来历等,倘若如此,倒难以看出虚构的痕迹,但是《玉尺记》是记录了奇异的故事,一书生遇一漂亮女子,此女子乃是已亡之人,玉尺是她的陪葬品,故事甚是离奇。无怪乎作者在结尾说到:“盖鬼神幻化,人所不知。夫玉尺与缣之出入,略

无实迹,抑有何理也?岂不异哉!岂不异哉!”^{[6] (P.395)}宋传奇中以地点命名的小说之所以能从名称上说它是虚构,关键在于这些地点不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人们不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作者不管怎么虚构,别人也不能妄加评论,只有存“疑”。如《天宫院记》之“天宫院”显然是虚构的地名,因为历史上从没有一个象“桃花源”这样与世隔绝的地方。由以上简单的分析可知,宋传奇中以物件或地点命名的小说,由于名称中物件的神奇性或地点的怪诞性显示了故事的奇异性,很容易导致虚构,这种虚构正是传奇小说的特点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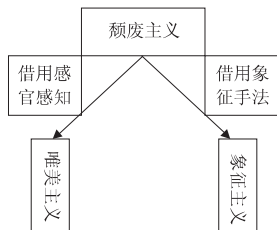
有些宋传奇从名称上很容易看出是传记与虚构的结合,如《郑超入冥记》《回仙录》《梦仙记》《金华神记》等。名称中的“记”“录”是史传叙事的典型特征,但在保留这些史传典型特征的同时,“回仙”“梦仙”“金华神”标明了故事怪异的特点,可以进行大胆的虚构,这显然为史传所不允许的。“冥”本来就是虚构出来的世界,在虚构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当然能够编织很多故事。“梦仙”,既然是“梦”,就可以脱离现实,就可以进行梦境之虚构。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传奇小说的命名具有传记和虚构的特点,总体上并没有摆脱史传文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 章培恒, 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 [3] 江守义. 唐传奇叙事[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 [4] 刘世德.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 [5] 钱钟书. 管锥篇·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 李剑国. 宋代传奇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责任编辑 南山)

(上接第99页)



邵洵美正是借用了这两股思潮(唯美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并吸收了颓废主义思潮的思想,最后形成自己的诗歌,但邵洵美后期诗歌又与西方颓废的思潮发生变异。在邵洵美后期的诗歌中,贯穿其诗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快乐主义,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享乐,没有辩证思考。

徐京安等在《唯美主义》一书中说到:“发源于法国的颓废主义无疑是英国唯美主义发生的酵素,然而诱导出了英国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国内因素,尚有罗斯金的美学思想,称拉斐尔派的灵肉合致思想,佩特的快乐主义和莫里斯的生活美化思想。”^{[8] P.6}这句话恰是对邵洵美及其诗歌最

好的概括。

[参考文献]

- [1] [加]诺思洛普·弗莱. 神力的语言[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2] 邵洵美. 诗二十五首[M]. 上海:上海书店,1927.
- [3] 邵洵美. 古希腊诗人莎菲[A]. 邵洵美文集[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 [4] 陈梦家. 新月诗选·序言[A]. 中国现代诗论(下)[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 [5] 邵洵美. 儒林新史[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 [6] 李欧梵. 上海摩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7] 智量. 外国现代派文学辞典[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 [8] 徐京安. 唯美主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师语)

杜丽娘形象的现代性分析*

刘 钊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太原 030027)

[摘要] 杜丽娘形象的现代性来源于作者超前的意识、深刻的思想和对生命独立的、超越当时社会的思考,这种思考给作者笔下的人物注入了个性,使其血肉丰满,具有独特的情韵内涵,从而使杜丽娘形象长存不衰,还直接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

[关键词] 杜丽娘;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111-02

一个女子应该怎样活着?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早已给出了固定的答案:三从四德、贞静贤淑、恪守妇道,一个女人不允许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不允许有背离正统的个人追求,在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里,必然有一些独特的天才,他们的精神并没有被扼杀在死板沉重的社会意识中,相反,他们思想深刻,见解卓远,是黑云密布的荒原中的簇簇火苗,汤显祖便是其中一个卓越的剧作家,在他笔下,诞生了杜丽娘这样一个独特的女子形象,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显得可贵。而汤显祖透过对杜丽娘的塑造,表达的不仅是对女性生命存在的思考,更是对人生命存在的思考。这种人文主义的生命关怀是进步的、超前的,因此,杜丽娘的身上也体现出了值得探究的现代性。

一、顺其自然的性爱观

杜丽娘虽是大家闺秀,封建礼教管制下的淑女,平时,父母不允许她多走一步路,不允许她做出有违礼教的事情,按照当时社会的要求,她应该整天坐在闺房里绣花,绣累了就读一读适合女子看的书,就连后花园也不应该去。可是,杜丽娘并没有被这样的观念束缚头脑,她没有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变成一个惟命是从、循规蹈矩的封建标准淑女,她的头脑还没有完全被社会规定异化,还保留着自然纯真的人性与人情,这种发自天然的人性人情不受任何社会标准与文化形态的束缚,因此,杜丽娘在性爱观上就超越了同时代的淑女们,她大胆抒发怀春之情,到春光烂漫的花园中寻梦,在现实环境不允许她接触到青年男子的情况下,她的青春之泉流向了现实之外的梦幻世界,在梦里她和陌生的青年男子欢会,在青春的性爱中感受到了“美满幽香不可言”的生命的快乐。梦醒之后,她并不觉得羞愧或不安,这说明她并没有受到封建贞节观的压制,否则她就会在自

然的人性和社会的礼教之间挣扎,很明显,杜丽娘对于性爱完全是自然本真的态度,她的心毫不犹豫地热爱着这种青春激情的结合,她这种由欲到情的过程更像是作者本人从男性角度对恋爱的阐述,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与其说是杜丽娘作为女性的心理,不如说是作者本人的男性心理在杜丽娘身上的投射。按一般人的看法,由欲到情似乎总有些不合道德规范,尤其是对于女性。这种写法在其它古代作品中也较少见,如《西厢记》中的莺莺虽然也和张生私订终身,但终究是经历了一个矜持、试探、交流的阶段,而杜丽娘遇到了素不相识的柳梦梅,竟与其在梦中缠绵,并由此而体验到青春爱恋的幸福与快乐,产生了生死不渝的爱情。这种情感的产生,得益于杜丽娘那种对青春需求的自然接受与肯定,这样的直接单纯,自然而然。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自然性爱的赞美与尊重,这种写法与现实中对自然性爱的消极评价、积极压抑截然相反!本来就是极短暂的,更何况梦中之情!因此,转瞬即逝的梦也由不得她再做多余的顾虑与矫饰,梦的短暂也促成了她做出的是最本真的反应。可以说,牡丹亭里写得最美的不是纯情之情,而是性爱之情,最打动人的恰是这种对性爱的自然接受与赞美。作者在杜丽娘身上要表现的,就是他对人的本真的性爱的思考,在封建思想的大一统下,人的性爱观是被压抑、被扭曲的,它套上了太多礼教世俗的枷锁,显得那么沉重,那么灰暗,还有那么一种罪恶感。可是,人本真的性爱是美好的、欢欣的、生机勃勃的,性爱是生命的动力,是人生存的重要目标和意义,正如杜丽娘身上所体现的,它是两性之间的两情相悦,与时间长短、空间阻隔无关,作者身处那种时代,能对人的生命存在之形式和本质做出如此深刻的思索,具

*[收稿日期] 2008-10-09

[作者简介] 刘钊(1968-),女,山东沂水人,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有极大的超前性与现代性,难能可贵。杜丽娘的情感与青春的情欲更散发生气勃勃的光辉,让我们看到了做一个自然人这样的现代主义思潮。

二、人性化的价值观

杜丽娘有一个腐儒老师,有一对保守正统的父母,他们给杜丽娘灌输的是僵化死板的价值观,在陈最良这样的老学究看来,“钻读经书,苦应科举,企望一朝得中,这就是最大的价值,他的生命散发着泛黄书页的陈旧气息,他读的书是死书,是应科举的书,他一张口,都是些陈词老调,古板酸腐,没有一丝生活的气息,他是被科举异化的书呆子,老腐儒,他给杜丽娘讲解诗经,并无新意,只是依着注解讲解,所以杜丽娘说“依注解书,学生自会”。春香跑到花园里去,回来告诉小姐,陈最良就要拿荆条惩罚她,春香背地里说他“一些趣儿也不知”,可谓形容得非常贴切。杜老夫妇完全是封建社会的卫道者,他们的价值观完全是封建礼教熏陶出来的那一套,中规中矩,对女儿不假思索的使用了符合礼教规范的教育方法,不让她有违反礼教的行为,他们关心的不是女儿的幸福与快乐,而是女儿的行为是否符合大家闺秀的要求,将来出嫁是否会有失教养,令他们脸上无光。杜老夫妇不可能理解杜丽娘那种青春觉醒后对生命本身的热爱。所以,陈最良和杜老夫妇的价值观都不是那么人性化,而是受到了书本和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社会化和规范化的非人性因素。而杜丽娘的价值观完全出自天然,少受世俗成见影响,和她的丫鬟春香一样,保持着少女天真烂漫的情怀,有着浓浓的人情味,都是顺应人性,顺应自然的。她读诗经,读出的不是什么“后妃贤达”,而是“情”,她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读经,而不是死搬硬套老师讲解的那一套。虽然父母不许她游园,但她还是自作主张,大胆的去赏玩后花园的美丽景致,没有被陈俗滥套束缚了手脚,她顺应着自己的天性,同时也顺应着人性,她判断自己行为的标准不是师傅、父母的那一套,而是顺乎人性、发自天然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她看来,亲近自然比读死书更有意义,感受青春的情感比什么“后妃之德”更来得真切。她在梦里和柳梦梅相恋,并未有什么“礼教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价值观在她脑海里作祟,相反,她让自己的情自由地燃烧,淋漓尽致,刻骨铭心,充分释放了人性中爱的激情,她是如此的肯定这种合乎人性的情感,甚至为了这种感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可见,杜丽娘这个形象上寄托了作者人性化的价值观。

三、强烈的自我意识

杜丽娘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她认识自己既是受诗经的启蒙,更是受春光烂漫的美丽景物的触动。春天是一个生机勃勃、万物生长的季节,正如杜丽娘的青春充满着原始的力量。那怒放的花儿正如杜丽娘猛然觉醒的青春,美丽、奔放,不可禁锢。杜丽娘比许多封建闺秀聪慧的地方,在于

她以一颗灵慧敏感的心,通过大自然的触发,认识到了自己,感受到了本体生命的活力与欲望。正是有了自我存在的意识,她才强烈地追求生命中自己渴望的美好爱情,通过爱情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为此不惜付出全部的生命。她那句著名的感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已经明显的透露出了杜丽娘对生命存在、自我存在的思索。从这时候开始,杜丽娘那朦胧的自我意识才清晰起来,她真切感受到了“我”的存在,这个存在是如此美丽,这种美丽又是如此短暂,这个美丽而又脆弱的自我迫切需要一个欣赏者,这种自我意识只有通过爱与被爱才能获得真正的肯定与意义,所以杜丽娘一缕精魂为自己在梦里“创造”出了一个相爱的对象,这是她极力在寻找自我,肯定自我的表现。所以,杜丽娘这一形象身上体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是超越了同时代一般女性的认识水平,具有极大的现代性。

四、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

杜丽娘以情爱战胜“天理”,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杜丽娘她的叛逆精神和个性特征,反映了那个时期女性的觉醒和追求。《牡丹亭》写了杜丽娘执着追求的艰难历程,充满了肯定人欲、张扬个性自由的思想。因为在杜丽娘生活的明代,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讲究“存天理,灭人欲”,极大地抑制了个性的发展。《牡丹亭》在爱情领域内所表现的情与理的冲突,对超越生死的“至情”的追求,是女性自我个性意识的觉醒,是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的复苏,在明代理学思想强化的特定时代,汤显祖认为情指的是生命的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和真实的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汤显祖“以情抗理”的理想,即杜丽娘所追求的“天然之情”,追求人性与人的本能的被认可,这种强烈的反抗在现实中是缺乏可能的,因此,汤显祖就托之于幻想,托之于浪漫的虚构,给了情以神力,能起死回生。于是,一切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得了寄托。情终于战胜了灭绝人性的理,个性解放的潮流终于战胜了程朱理学。对于女性来说,寻找自我,释放其自然天性,冲破社会环境及道德法则的过程常常是痛苦的、反复的。杜丽娘对人的感性情欲、人的自我生命的追求是那样毫无掩饰,那样执着,不惜以生命的代价与环境抗争。她的身上体现出了时代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这是作者的先进思想在她身上的投射,从杜丽娘身上正反映出了汤显祖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深刻智慧。

总之,杜丽娘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单纯歌颂爱情、歌颂女性的形象,她的身上承载了许多作者对社会时代、生命存在的思考,这些思考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杜丽娘形象中的现代性体现出来的,值得我们仔细体味。

(责任编辑 南山)

汉语小说会话中的照应修正现象分析*

——以《红楼梦》为例

熊英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以《红楼梦》前八十回为蓝本, 收集到了符合照应修正标准的56个实例。我们对这些实例逐一进行了特征描述, 根据不同的特征对语料进行了分类和数据统计。在考察语料的基础上, 采用篇章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 对照应修正的定义、引发根源、修正类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并从中总结出了汉语照应修正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关键词] 照应修正; 指称阻碍; 指称表达; 修正类型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113-04

一、会话修正与照应修正

由于照应修正是一种特殊的会话修正现象, 所以在对照应修正进行定义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会话修正的涵义。

1. 会话修正的定义和分类。

会话修正(conversational repair)一词最早出现于1977年社会学家Schegloff等人发表的《会话中修正结构的自我更正优先》一文中。会话修正是指在会话中说话者或聆听者碰到不合规范的话语、无意误用的语言形式或发生误解等阻碍(trouble)时进行的修正。它是会话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排除阻碍、维持、保护会话继续进行的必要方法。

Schegloff(1977)在分析英语语料的基础上, 按照修正的引导和完成的执行者是自己还是他人, 提出了会话修正的四种类型, 即: 自我引导/自我修正(self-initiated/self-repair)、他人引导/自我修正(other-initiated/self-repair)、他人引导/他人修正(other-initiated/other-repair)和自我引导/他人修正(self-initiated/other-repair), 并总结出会话修正中“自我引导优先于他人引导”和“自我修正优先于他人修正”的基本规律。

2. 照应修正的定义和分类。

(1) 照应修正的定义。

当会话中的阻碍来源于指称问题时, 对指称阻碍(referential trouble)的修正便是照应修正, 因此照应修正属于一种特殊的会话修正现象。虽然修正序列中指称词语的选择问题在1970年代已得到话语分析者的关注, 但关于照应修

正的专题研究一直到1990年代才出现。Geluykens(1994)首次使用了“anaphor repair(照应修正)”这一术语来探讨英语会话中名词短语对充当待修正语的代名语的修正, Huang(2000)则使用了“anaphoric repair”的术语考察了汉语会话中指称表达的修正, 但二者都没有能够对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阐述和解释。因此在综合他们对这一语言现象描述的基础上, 学者马文对这一概念加以了明确的界定。马文(2008)认为, 照应修正是指在会话中由于交际者对指称表达不恰当的使用、识别或理解等原因, 而使(或说话人自己意识到可能会使)听话人在语篇或情境中难以找到这一指称词语的对应关系(或产生不恰当的对应关系), 从而由交际一方所执行的修正。

(2) 照应修正的分类。

Schegloff(1977)的分类方法适用于一切的会话修正。但照应修正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话修正, 还需要更细致的分类。本文将根据指称阻碍的引发根源和修正由何人引导和何人完成这两种标准对照应修正进行进一步的分类。第一种分类方法有利于我们探求照应修正产生的根源。在第二种分类方法中, 我们将检验Schegloff(1977)基于英语语料得出的关于会话修正的“自我引导优先于他人引导”和“自我修正优先于他人修正”的结论, 看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照应修正及是否适用于英语以外的语言, 如中文。

二、研究方法

我们以《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八十回中的会话为蓝本, 共搜集到了56个符合照应修正标准的

*[收稿日期] 2008-10-15

[作者简介] 熊英(1977-), 女, 江苏海安人, 南京大学英语系硕士研究生, 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助教。

实例。我们对这 56 个例子逐个进行标注 根据其特征进行详细的描述 这些特征包括 :指称阻碍的引发根源、修正由何人引导和何人完成、待修正语与修正语的指称形式、修正引导手段、修正执行策略等 ,然后根据不同特征对语料进行了归类和统计分析。本文将着重讨论根据前两个特征对照修正进行的分类 通过对语料的详实考察 ,总结出《红楼梦》小说会话中的照应修正的一些基本规律。以下便是具体的分类、统计及初步的探讨。

三、指称阻碍的引发根源

指称阻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它不但包含指称表达的偏误与指称位置或即时语境的错位 ,还包括在整个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对指称表达的认知与理解障碍。据此 ,我们在考察语料的基础上 根据引起会话中照应修正的指称阻碍的根源 将照应修正大致区分为 4 类 :指称不明引起的照应修正、身份偏差引起的身份洽商、词汇生僻引起的词汇理解障碍从而进行的修正及表达错误引起的照应修正。表 1 列出了我们的统计结果。

表 1 指称阻碍引发根源的统计分析

根源分类	指称不明	身份洽商	词汇理解障碍	表达错误	总计
数量	37	8	7	4	56
比例 (%)	66.1	14.3	12.5	7.1	100

表 1 的统计结果表明 ,指称不明是引发照应修正的最主要原因。有时说话人对听话人能力的评估与听话人对指称表达的实际认知能力之间会出现偏差 ,便容易导致听话人的误解或不理解。这种由于指称不明造成的指称阻碍最为典型和常见。身份洽商和词汇理解障碍引起的照应修正居其次 ,而表达错误引起的照应修正则最少。

1. 由于指称不明所引起的修正。

这里充当待修正语的指称词语包括了空语类、代词、指示词(+ 名词短语)及有定描述和全名等多种形式。说话人在选择指称表达时 ,往往优先遵守经济原则 (Geluykens , 1994 ; Chan , 2000) 时常引发指称阻碍的产生。当听话人不能明确指示词语所指实体时 ,说话人往往必须对原来选择和使用的指示词语加以修正 ,向听话人明示所指实体。在以往的研究中 ,此类情况中的待修正语大多数由代词充当。但根据本文搜集的语料 ,待修正语则大多为专名和指示词 + 名词短语 ,有时还可能是零成分即空语。如下面 3 例 :

(1) 姥姥便拉住一个道 : “我问哥儿一声 ,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 ?”

孩子们道 : “那个周大娘 ? 我们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 ,还有两个周奶奶 ,不知是那一行当的 ?”刘姥姥道 : “是太太的陪房周瑞。”(第六回)

在此例中 ,由于专名“周大娘”所指不明确 ,导致了听话人的疑惑 经过孩子们的修正引导 ,刘姥姥在第三话轮中使用了信息量更为丰富的全名 + 修饰语“太太的陪房周瑞”明确所指 ,从而排除了交际障碍。

(2) (宝玉) 便问袭人 “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么 ?”袭人道 : “什么东西 ?”

宝玉道 : “前儿得的麒麟。”(第三十一回)

(3) 紫鹃道 : “在这里吃惯了 ,明年家去 ,哪里有这闲钱吃这个。”

宝玉听了 ,吃了一惊 ,忙问 : “谁 ? 往那个家去 ?”

紫鹃道 : “你妹妹回苏州家去。”(第五十七回)

例 (2) 中 ,宝玉在第一话轮中使用了信息量较小的“那个东西”(远称指示词 + 名词短语) ,使得听话人难以在大脑中激活相关实体。在袭人的引导下 ,他用信息量更大的“前儿得的麒麟”进行了修正 ,帮助袭人达到理解。例 (3) 中 ,紫鹃使用零成分来意指林黛玉 ,宝玉因不明所指对其进行追问 ,紫鹃继而用“你妹妹”来进行修正 ,明确了零成分的所指。

2. 由于身份洽商所引起的修正。

Schwartz (1980) 认为 ,修正过程是一个交际双方通过相互洽商而达到理解的过程。洽商既包括话题洽商也包括身份洽商 (王得杏 1998) 。

Picard (1998) 明确指出社会身份差别是支配礼貌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说话人往往要根据自己的身份和听话人之间的相对社会关系来选择符合自己身份的指称表达。《红楼梦》描写的是一个典型的阶级社会 ,这种由身份差别引起的身份洽商自然是难免的。如例 (1) 中 ,贾政用自谦语“犬子”来修正“令郎” ,用尊称“藩郡”来修正水溶口中的“小王” ,不仅达到自谦和尊敬对方的目的 ,也充分显示出二者身份的差别。根据顾曰国 (1990) 对汉语礼貌策略的研究 ,对称呼的修正是汉语独有的礼貌策略 ,因此这里的修正多是出于礼貌的要求 ,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

(1) (水溶) 一面又向贾政笑道 : “令郎真乃龙驹凤雏 ,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 ,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 ,未可量也。”

贾政忙陪笑道 : “犬子岂敢谬承金奖。赖藩郡余荫 ,果如是言 ,亦荫生辈之幸矣。”(第十五回)

除此之外 ,身份洽商还用于请求的言语行为中。如例 (1) 中 ,丫头用更为尊敬的称呼“姨祖宗”来修正原来的称呼“姨太太” ,以期达到请求被满足的效果。

(2) 丫头道 : “好亲亲的姨太太 ,姨祖宗 ! 我们老太太生气呢 ,你老人家不去 ,没个开交了 ,只当疼我们罢。”(第四十七回)

另外 ,由于小说中充满了戏剧冲突 ,人物之间的矛盾也会通过身份洽商来体现。例 (3) 中邢夫人因不满贾琏和王熙凤所为 ,用“琏二爷凤奶奶”来替代“你那好哥哥好嫂子” ,貌似尊称 ,实为反讽 ,表达了她对二人强烈的不满心理。

(3) 邢夫人见他 (迎春) 这般 ,因冷笑道 : “总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 ,一对儿赫赫扬扬 ,琏二爷凤奶奶 ,两口子遮天盖日 ,百事周到 ,竟通共这一个妹子 ,全不在意。”(第七十三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话人对指称表达进行修正有时不仅是为了排除理解障碍,还是为了更好地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或是为了实现预期的语用效果及充分表达说话人的心理状态。

3. 由于词汇理解障碍所引起的修正。

在会话过程中,有时候说话人会使用一些对于听话人来说生僻的专名或术语,由于此类表达不存在于听话人的认知结构中,听话人无法产生正确的理解。因而说话人会使用概念更为具体清晰、更容易为听话人所理解的表达加以修正。在我们的语料中,此类修正共有7个(12.5%)。如下例:

门子道:“老爷既荣升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

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

门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第四回)

在此例中,“护官符”属于官场中的特定用语。由于贾雨村新官上任,不熟悉官场运作,因此对这一官场术语感到陌生和疑惑,于是门子便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4. 由于表达错误所引起的修正。

以上的三种修正都属于对说话人指称表达的恰切修正(felicitousness repair),然而有时修正是由说话人的不正确表达所引起的,这便属于错误修正(error correction)的范畴。我们共搜集到了4个实例,占总语料的7.1%。如下例中,贾母将“鲍二家”的“错记成了”“赵二家”,鸳鸯对这一错误进行了纠正。

贾母道:“你媳妇和我顽牌呢,还有半日的空儿,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罢。”鸳鸯笑道:“鲍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第四十七回)

我们根据照应修正的引发根源将照应修正分为了4类,其中由指称不明所引起的修正最为普遍和常见。以往的研究(Geluykens 1994 和 Huang 2000)所关注的也大多是这一类型的修正,但这一类型的修正往往只停留在语义的层面。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照应修正的产生不仅是语义,还是语用、社交、心理及认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有必要对照应修正的根源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四、照应修正类型及基本规律

Schegloff(1977)在分析英语语料的基础上,总结出会话修正中“自我引导优先于他人引导”和“自我修正优先于他人修正”的原则。但这一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照应修正,是否适用于其它语言,还是仅局限于英语?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们通过语料对这4种修正类型进行了统计,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出汉语照应修正的规律,并与 Schegloff

的结论进行对比。表2为统计结果。

表2 照应修正类型的统计分析

	SI/SR	OI/SR	OI/OR	SI/OR	总计
数量	10	34	10	2	56
比例	17.9%	60.7%	17.9%	3.5%	100%

(Note: SI = 自我引导, OI = 他人引导, SR = 自我修正, OR = 他人修正)

由表2的统计数据看出,他人引导的修正照应共有44例,占总数的78.6%;自我修正为44例,占总数的78.6%。因此,在此语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暂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汉语照应修正中呈现出他人引导和自我修正占主导地位的趋势。这和 Schegloff 的“自我引导优先于他人引导”的结论相矛盾,但和他的“自我修正优先于他人修正”的结论相符合。

1. 修正类型。

自我引导/自我修正

自我引导/自我修正是照应修正中常见的修正类型。在我们的语料中,共有10例(占17.9%)属于这一类型。如下例中,当周瑞家的意识到刘姥姥对“璉二奶奶”这一称谓感到陌生时,她立即以“你道这璉二奶奶为何人”这一设问进行引导,用“太太的内侄女,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小名凤哥的”等充分信息进行修正。

(对刘姥姥)周瑞家的便笑说道:“...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奶管家了。你道这璉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小名凤哥的。”(第六回)

他人引导/自我修正

他人引导/自我修正是照应修正中最为常见的修正类型,我们共搜集到了34个实例,占总语料的60.7%。虽然 Schegloff(1977)认为“自我引导优先于他人引导”,但这里的数据表明在汉语照应修正中呈现“他人引导优先”的趋势,这一点和马文(2004, 200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下例中,众人因无法明确“两个好朋友”所指,所以使用疑问词“谁”发出了修正引导,使得说话者意识到了自己前一话轮中的指称阻碍的存在,并在第三话轮中进行了自我修正。

内中一个道:“今日这席上短两个好朋友。”

众人齐问是谁,那人道:“还有谁,就是贾府上璉二爷和大爷的盟弟柳二爷。”(第六十七回)

他人引导/他人修正

会话中也会出现他人引导/他人修正的情况,一般体现为说话人对听话人使用的不明晰的指称表达进行猜测或提出置换项、对误用的指称表达加以纠正。下例中探春先是用疑问词“谁”进行引导,然后自己对“你们姊妹们”的所指进行了猜测,从而完成了修正。

尤氏忙笑道:“我今儿是那里来的晦气,偏都碰着你们姊妹们的气头儿上了。”

探春因问:“谁又得罪了你呢?”

因又寻思道:“四丫头不犯罗唆你,却是谁呢。”(第七十五回)

自我引导/他人修正

自我引导/他人修正是最最常见的修正类型,我们总共只收集到两例,占总语料的3.5%。下例中王夫人明确说自己忘了药名,引导听话人对此进行修正。最后薛宝钗想出药名,得到王夫人的肯定,从而成功地完成修正。

王夫人道:“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我也忘了。”

宝钗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补心丹。”

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第二十八回)

2. 照应修正的基本规律。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指称阻碍根源和照应修正类型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照应修正的基本原则。虽然照应修正在总体上呈现出自我修正优先和他人引导优先的趋势,但对于不同根源引发的指称阻碍所采用的修正类型仍存在某些差异,引发根源的多样性为这些差异提供了合理的解释(马文,2005)。表3列出了4种修正类型在4种不同根源的照应修正中的分布情况。

表3 指称阻碍根源与照应修正类型的统计分析

	SI/SR	OI/SR	OI/OR	SI/OR	总计
指称不明	4	27	5	1	37(66.1%)
身份洽商	5	1	2	0	8(14.3%)
词汇理解障碍	1	6	0	0	7(12.5%)
表达错误	0	0	3	1	4(7.1%)
总计	10(17.9%)	34(60.7%)	10(17.9%)	2(3.5%)	56(100%)

从表3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由于指称不明导致的照应修正采用最多的是他人引导/自我修正,此类修正呈现出自我修正优先和他人引导优先的趋势。

(2)由于身份洽商引起的照应修正主要集中于自我引导/自我修正这一类型,这说明出于身份洽商的修正行为多数是说话人在自己的话轮中引导并执行的。

(3)由于词汇难解引起的指称阻碍的修正都属于自我修正,他人引导相对自我引导占有绝对优势,这是因为当听话者对词汇无法理解时一般会提出询问从而引导说话人对难解词汇进行修正。

(4)在我们的语料中,对于表达错误引起的指称阻碍和修正都属于他人修正,他们引导比自我引导占有优势。当说话人意识不到自己话语中指称选择错误时,听话人往往会主动进行修正。

五、结语

本文在考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对照应修正现象中指称阻碍的产生根源及修正类型进行了探讨。分析表明,指称不明是照应修正产生的主要原因,汉语中的照应修正呈现出他人引导和自我修正优先的趋势。这一结论将有助于从全新的角度揭示会话篇章中的指称选择规律,并促进对会话中指称表达认知与理解过程的研究。当然,由于本文的语料仅来源于《红楼梦》一本小说,我们可以运用更大规模的语料来反复对结论进行验证。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修正语出现的话轮、影响指称表达选择的语用原则和认知模式等角度对照应修正进行探讨,还可对不同语言中的照应修正现象进行对比研究。由于指称选择还涉及到社会、心理、文化等因素,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进行拓展研究。

(责任编辑 南山)

《左传》刻画人物的映衬手法*

桂 军¹ 张月炎²

(1.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无锡 214028; 2. 无锡外国语学校, 江苏无锡 214035)

[摘要] 《左传》以叙事享誉, 记人也很生动, 成功运用了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人物本身之间的映衬手法来刻画人物, 为后来的文学作品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关键词] 《左传》; 人物刻画; 映衬手法

[中图分类号] I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117-02

《左传》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例的历史著作, 被誉为先秦史书的“记籍之冠冕”。刘勰曾讲“言经则尚书, 事经则春秋”^{[1] P. 169}。但后人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没有这样的泾渭分明。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 则左氏所记之言, 不啻千万矣。”^[2]“古人事见于言, 言以为事, 未尝分言事为二物也。”^{[1] P. 183}言和事都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 从记人的角度看, 这种争论是可以统一的, 《左传》记录的3000多个人物, 很多性格鲜明, 形象饱满, 可以说在记人上成就很高, 所以有人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人为描写主体的历史文学作品”^[2]。

《左传》注重人物个性以及在矛盾冲突中和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 在后来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而映衬手法在其中屡有体现, 其运用手法值得探讨。

一、用周围的人物来映衬塑造人物

《左传》人物刻画注意到了人物是社会环境中的人物, 这个人物在与周围人物的交往冲突中, 用其与众不同的言行映衬展现出他的个性, 成为特定的“这一个”。

如隐公元年登场的郑庄公, 他的弟弟共叔段在母亲的宠爱支持下, 一心想夺取君位, 哥哥即位后还不死心。郑庄公就顺势纵容设下圈套。当其母武姜“为之请制”时, 他说“制, 岩邑也, 虢叔死焉。佗邑唯命。”用堂皇的理由拒绝了母亲, 避免他的势力过分膨胀, 最后以略次的京邑作了弟弟的封地。当不明内情的大夫祭仲出来反对, 说“君将不堪”时, 假装无奈的说“姜氏欲之, 焉辟害?”祭仲着急了, 他才安慰道“多行不义, 必自毙, 子姑待之。”既而弟弟在京邑蠢蠢欲动时, 另一个不明内情的公子吕也急了“国不堪贰, 君将若之何?”庄公“无庸, 将自及”。最后弟弟终

于动手了“公闻其期, 曰: 可矣!”^[3], 一举将他赶出郑国。

弟弟的轻率与哥哥的精于算计, 祭仲和公子吕的焦虑与郑庄公的不动声色形成鲜明的映衬关系, 特别是“子姑待之”、“无庸, 将自及”两句把郑庄公的阴险深沉的性格刻画地入木三分。

事后, 为了堵住天下的悠悠之口, 郑庄公又演了一场“戏”, 先与母亲闹翻“誓之曰: 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3]再假颖考叔之辞“阙地及泉”, 与之和好, 成功的转移了人们的视线。颖考叔的直率忠直与郑庄公的虚伪也形成了映衬关系。颖考叔是一个大力士式的武将, 能在这儿帮郑庄公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 也令人好奇。10年后他因夸耀武力, 结怨同僚公孙阏, 在许国奋勇登城时死在暗箭之下, 郑庄公竟没有彻查, 而以众人诅咒的方式来了结, 这种对待活着与死去的部下的取舍态度, 也映衬了郑庄公以利益为中心的功利主义的虚伪嘴脸。

也有抓住特定场合下人物间的微言细行来映衬塑造人物的, 定公四年有这样的记载“初, 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 谓申包胥曰: 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 勉之! 子能复之, 我必能兴之。’”两人的复兴之誓, 朋友之情, 家国之义互相映衬, 使人物形象刹那间浮出纸面。

二、用人物与社会环境的冲突来映衬塑造人物

人物与变革中的社会环境的尖锐冲突, 更能张扬其个性, 其人生命运更能彰显其社会意义, 更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左传》中也不乏这样的成功之笔。

那个著名的迂腐人物宋襄公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出场

*[收稿日期] 2008-11-22

[作者简介] 桂 军(1965-), 男, 安徽凤台人,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级教师。

张月炎(1976-), 女, 江苏无锡人, 无锡外国语学校一级教师。

是在僖公八年：“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从之后的情况看，我们可以断言，宋襄公对兄长以国相让，是受“以德配天”的周礼熏陶，至少是受先辈宋穆公还位于其兄宣公之子殇公的影响（事见隐公三年），而不是一种权谋，此举也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利益。可见“礼”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仍有重要的规范作用。但春秋时代毕竟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社会遭受的冲击变化是巨大的。到了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时，他把自己在政治上的成功模式套到社会变革的最前沿军事上时，他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当时：“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在战场上将机会一再让给对手就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了。事后，“国人皆咎公。”他还振振有辞：“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把他迂腐顽固的心态表露无遗。宋襄公由政治的成功到军事的失败，是他的思想性格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保守思潮与社会变革力量的博弈的趋势体现，这样的映衬使他的性格悲剧在春秋史上留下了饱含寓言意味的一笔。

郑国的子产是春秋时期的改革家，他执政时的三大改革虽然最后得到了国民的称颂，但开始时的社会阻力巨大，如昭公四年，郑国的子产作赋税改革（丘赋），就遭到国人的毁谤，甚至攻击到他的亡父，当子宽转告他时，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通过他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时的坚定态度，展现了一个政治家不以个人得失为意，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磊落胸怀。

三、用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来映衬塑造人物

高尔基曾说：“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1]。人物形象是立体的，性格是多重的。《左传》就注重了人物不同性格侧面的描写，避免了历史人物被简单化、脸谱化。

晋文公重耳雄才大略，在外亡命19年，终于回国，三年教化，“一战而霸”。《左传》的记叙就展现了他的多重性格侧面。僖公二十三年他的逃亡之旅记录：在离开狄国时他对当时的妻子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季隗无奈对道：“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这是他的自私狭隘；到了齐国后受到齐桓公的礼遇，渐渐消磨了“四方之志”。不得已其夫人“（齐）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又暴露了他贪求安逸的一面，到秦国时，“怀嬴奉匭沃盥。既而挥之。”引得新娶公主发怒：“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就生出“惧”意，并“降服而囚”。又看出了他性格上的轻浮与自卑多疑；回国之初，对先前几度追杀自己的寺人披和卷款逃奴头须求见，一开始的“让”和“辞”，体现了他的记仇与冲动。正是了解这一点，僖公二十四年，回国时“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縻从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但他虽有缺点，却不任性，一经别人指出得失，便能以宽宏的胸襟度量待人，所以终成霸业。

再如秦穆公是继晋文公之后的春秋霸主，在对晋国内乱等问题的处理，对孟明的信任使用；西向开疆，“遂霸西戎”等决策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眼光与手段，可以说是他奠定了日后秦国一统天下的基业。但他的性格也有另外的侧面：僖公三十二年，在郑国“可得”能插足中原的诱惑面前，完全看不见越境夺国种种不利，面对蹇叔一再苦谏，不但拒不接受，还“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和刚愎自用，终于尝到穀之战的失败苦果。到文公六年去世时，又自毁长城，以“皆秦之良也”的子车氏三子为殉，使“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两相映衬，性格反差之大，判若两人。

这样对一些历史人物多方面的映衬刻画，使其由史书符号跳跃而出成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

[参 考 文 献]

- [1] 刘勰思. 文心雕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 阮爱东.《左传》人物研究的新创获，《左传 人物论稿》评价[J]. 湖北大学学报，2006(3).
- [3] 高尔基. 给马·加·西瓦齐夫的信[A]. 文学书简[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责任编辑 陈晓姿）

中学英语语感能力培养初探^{*}

丁佐希

(江苏省通州西亭初级中学, 江苏通州 226301)

[摘要] 针对中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某些现象, 分析并指出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外语教学中忽视了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 并从5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 语感; 中学英语教学; 语言实践; 语言环境

[中图分类号] G62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09)01-0119-02

在日常英语教学中, 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某位学生学习英语非常刻苦, 单词记了好多, 语法规则背了不少, 但学习成绩却不理想, 特别是语言运用时, 理解力和表达力都较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原因就在于该学生的英语语感差。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英语教师忽视了语感——这一语言能力的培养。

一、语感的内涵及现状分析

语感是当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转化生成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他假设人脑中存在一个来自遗传并为人类所独有的“语言习得机制”, 儿童在此基础上, 在接触具体语言的过程中, 获得一种直觉语言知识, 能自然而然地识别和理解句子。语感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信息交流的质量和效果。

现代神经语言学家华生指出: 所有的学习在于形成习惯。语言学习的关键是语言的生成、发展和提高。因此要想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的, 重要的不只是通过语言知识的传授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进行说话和写作, 还要着重训练学生的语感, 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习惯。因此在英语教学中, 教师一定要注重语感在学生语言交际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遇到难以用语法讲解清楚的问题时, 一定要提醒学生揣摩、感知、理解, 把学到的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技能。语感作为一种外语能力, 与外语思维共同构成外语言语能力的最高表现。言语能力是一种言语实践能力, 是运用语言的能力。语感的产生离不开语言实践, 那么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语感就应该进行大量的语言实践。但目前许多英语课堂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 在长期的英语教学中, 许多老师注意语言知识的传授, 而忽略了对学生语感的培训, 以至于许多学生记会了许多单词, 但是阅读能力较弱,

更不用说听说能力了。这种传统的“灌输式”英语课堂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语感能力培养。

二、培养学生英语语感的几点教学建议

1. 高声朗读, 背诵佳作。

现代著名学者朱光潜说过: “英语学习者与其费那么大劲去死记硬背, 做那些支离破碎的语法练习, 倒不如精选精读几篇经得起推敲的好文章, 把它们读透背熟, 真正消化成为自己的精神食粮。这样就会形成敏锐的感觉。”许国璋先生也说: “寒假在家, 取出书试读, 再读, 在梦中背书, 开始时起立大声背书, 一口气即五页”。因此, 通过朗读背诵文章, 语感脉络、作者的情感趣事, 语言的节奏韵律就会自然而然地浸润到学生的内心深处,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提高对语言的感受能力。

在平时教学中, 教师应该重视朗诵这一环节。上课时应尽量让学生多读多背, 特别要学生注意语音语调、意群停顿, 读出英语的韵味和美感来。一种语言有一种语言的精神, 而传达这种精神的是音调, 语感只能从音调中体现出来。教师还可以经常在教学中穿插一些英语小诗、谚语、绕口令等让学生朗读, 以提高学生朗读英语的兴趣。

2. 加强阅读训练, 扩充阅读量, 积累语感素材。

英语阅读在复习与巩固旧词、学习新词、扩大词汇量、激发学生的兴趣、锻炼思维方式、提高阅读速度与能力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教师应从各种文体的材料中精选出部分内容指导学生反复阅读, 直到把理解了的语言材料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自然、一种感觉。这样, 学生在大量语言信息的刺激和阅读揣摩后, 逐渐理解了英语材料中抽象的情态、语气等语言要素, 从而形成一种语言定式并加以发挥创造, 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感。

*[收稿日期] 2008-10-30

[作者简介] 丁佐希(1976-), 女, 江苏通州人, 江苏省南通市西亭初级中学英语教师, 中学一级教师。

英语阅读形式多种多样,可采用原汁原味的英文出版物,以教材为基础,选取来自实际生活的材料,可以摘录因特网、报纸、杂志、广告、影评等等中的通俗易懂的内容,适当加深难度,使学生在复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又开拓了眼界,从而提高了对英语语言的感受能力。

3. 创设听说环境,增强语感。

语感的培养离不开大量的语言材料和语言环境,中国学生缺少自然的英语环境。因此,要增强语感,必须多创设英语环境,尤其是英语听说环境,使学生时时沉浸在英语的海洋中。

首先,教师上课必须尽量用英语授课。从第一课开始,走进教室尽量少讲母语,兼用手势、眼神、音调、动作等作为辅助手段,让学生专心听,然后学着说。这种方法对创设英语氛围、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大有益处。当然作为英语教师,自己的英语口语必须尽量纯正地道、抑扬顿挫,使学生更好地领会享受。

其次,课堂上开展各种听说活动。充分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展师生双边活动,运用录音机、投影仪、语音室、多媒体等创设英语听说情境。幽默地道的原声录音带、生动有趣的画面,特别是多媒体教室的动态,调动了学生的感官,激发了他们的听说欲望。上课时还可以通过英语值日生汇报、看图说话、复述课文、讨论问题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大胆开口的习惯,提高口语能力。

4. 加强写作训练,发展语感。

创造性的写作是对其它语言技能的反馈,有助于语感的表现和成熟。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坚持用英文记笔记、写信和写作文来纠正口语中常犯的错误,打好语言的基本功。在写作训练中教师应注意循序渐进,恰当把握写作时机,合理利用生活场景,激发学生写作激情,提高他们写作兴趣,充分发挥他们的写作才能。教师可以通过举行作文竞赛的方式,把优秀作文张贴在黑板报上,利用学校的英语广播,定期播放学生的优秀作文,在校报上开设英

语版,鼓励学生积极投稿。这样在培养学生写作兴趣的同时,既增强了学生的语篇认识,又提高了他们对英语的感受能力。

5. 创造良好校园环境,感受异域文化,加强语感。

学习语言离不开特定的语言环境,在学校里营造一个良好的英语大环境,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从而增强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创造全方位的视读环境。校园所有人名言、标语牌、指示牌一律用中英两种文字,面向学生发布通知、公告、决定,一律用中英两种文字,指导学生查字典,把自己的生活用品、自然学科教材中常用的术语标记在物品上。(2)创设全方位的听、说环境。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系统,课余、午间播放英文歌曲、英语笑话,用英文播放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校园新闻和学生英文稿件,提倡师生在校园说英语,用英语问候,进行英语会话,让学生沉浸在英语的文化氛围中,潜移默化的感受异域文化,从而增强语言的感受能力。(3)创设全方位的语言应用环境。利用校园英语廊、英语角、英语晚会,在校园内广泛地开展活动,艺术节、校庆、圣诞节、国庆等重大节日,让学生编排英语节目,努力提高学生口语水平,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在实践中强化学生的文化意识,发展语言的感受能力。

语感的培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语感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成败。语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语言实践中积累产生进而指导和运用于我们的语言实践,使我们能更好地在语言运用中准确把握语言的韵律、节奏、情感、音调和规则。所以,在外语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英语语感将对中学生的英语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责任编辑 晨辰)

2008 年总目录

(作者姓名后的数码是刊期和起始页码)

本刊特稿		浅议网络环境下的高校大学生管理(丁姝娟)	4.16
大学定位与大学特色——美国高等教育考察观感与启示 (方国才)	1.1	从精神压力的实证研究探悉高校教师的组织公平感 (刘越 王彦)	4.18
当代中国教育热点问题研究		虚拟家长社区亲子活动及其对青少年的影响 (张春光 陈勇江)	4.22
试论学校节庆文化的价值(班华)	3.1	农村留守初中生课外自主学习动机激发策略研究 (蔡澄 马兰芳)	4.25
国家教育新媒体学习超市平台建设构想(康宁 王涛)	3.6	农村儿童孤独感现状调查(蒋艳君)	4.29
论环境教育学(李久生 陈小莉)	3.13	孤独症幼儿综合能力辅导的个案研究(余春瑛)	4.31
乡村教育与新农村建设——关于乡村教育的几点思考 (徐志辉 王文岭)	3.19	“发展人”人性假设:一条心理科学的整合之路(徐建成)	5.22
素质教育论坛		论主体间性德育(赵欢春)	5.26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初探(刘国永 马国贤)	1.6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孙少艾)	5.29
我国传统审美教育特点探析(梁励)	1.10	寓创新教育于德育课教学实践之我思(姚建琴)	5.33
新课改背景下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再认识 (张美娟 张琪)	1.13	小学生成就需要发展特点的调查(陈馨)	5.3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新探(华丽)	1.16	大学生职业兴趣研究——以江苏教育学院学生为例 (孙丽华 诸东涛)	5.37
儿童文学专题实践活动开发简论(许洁)	1.18	大学贫困生的不良心理表现及解决对策(吴绍玖)	5.39
教师如何进行管理学案例教学初探(徐青英)	1.20	教师教育研究	
PBL 教学设计与实施的案例研究——以小学自然《噪声的 危害与控制》为例(祝俊风 闻虹 裴新宁)	1.22	江苏中小学教师培训机构的现状及走向(刘明远)	2.17
一个不容忽视的课堂细节——课堂“OK”式评价语(王水丽)	1.26	高等师范院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现状分析与思考——以江 苏教育学院为例(徐群)	2.22
教育模式: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结合的中介(诸燕 赵晶)	2.1	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师教学反思现状的调查研究 (邬春芹 袁锁军)	2.26
认知风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晓文)	2.4	小课题研究: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陆雯 潘东良)	2.29
对教育改革中弱势群体教育权保障的思考(刘岩 姜德刚)	2.8	教育学课程教学——高师生专业成长的推动力量(王华军)	2.31
关于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社会支持体系的设想(乔祖琴)	2.11	论新课改背景下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李星云)	4.1
浅论大学生道德需要与道德教育的关系(王静波)	2.14	试论教师专业发展规划的编制(郭继东)	4.4
略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课程改革中的作用(赵正新)	5.1	“研训一体”教师培训模式的思考与探究(曹树)	4.6
重大利益相关的教育评价中应引入宽容理念(刘五驹)	5.4	立体式教师培训案例刍议(支玫红)	4.9
构建和谐共生的师与生——关于生态型师生关系定位的思考 (余嘉云)	5.7	新课改背景下语文教师的角色转变浅谈(何波)	4.11
都市初中校本课程品质化刍议(黄文武)	5.10	专业精神:班主任专业化的重要内容(顾锐萍 黄正平)	6.1
论教学的道德维度(倪桓)	5.13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刍议(杨正俊)	6.4
《论语》教学方法论的现代价值(张晨晖)	5.16	南京市小学教导主任培训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黄银美)	6.6
浅议体验式学习(酃腊凤 汤金洪)	5.18	南京市幼儿教师队伍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杭梅)	6.8
《外国教育史》课程双语教学实践的几点思考(任红娟)	5.20	幼儿教师的心理成长浅论(谢亦红 许晓豫)	6.10
德育·心育		教育管理研究	
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及其展望(李曼曼)	1.29	学校文化管理的理性诠释与实践思考(王铁军)	3.22
高三学生在正、负框架下风险偏好的研究(黄玮 余嘉元)	1.32	论中小学校长的专业标准及专业化发展(程振响)	3.27
934 例研究生的人格类型研究(施春华 王记彩)	1.36	教师专业发展新教育路径:技术与理念的融合 (许新海 王领琴)	3.31
高职教师职业倦怠的心理分析(尹新 袁顺)	1.40	中美高校学生工作哲学指导思想之比较与思考 (李江 牛光辉)	3.34
客体工作记忆——行为和认知神经心理学的研究 (肖英霞 刘昌)	1.42	高等教育研究	
内隐攻击性的研究综述(康园园)	1.46	高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现存问题举疑与释惑(郭明友)	2.39
网络社会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管窥(朱万钟)	1.49	浅析学习动机对“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教学效果的影响 (蒋美容 谭跃虎)	2.42
网络文化影响儿童道德和心理发展的机制探讨(刘守旗)	3.37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综述(陈蓓)	2.44
回避“价值干预”:人本主义心理咨询理论的价值立场剖析 (刘晓明)	3.44	用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MX)增进高校发展(吴岩 许秀杰)	5.41
“回到事物本身”心理主义与心理教育范式(崔景贵)	3.47	论高等教育后发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基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高校德育工作(盛红)	4.13		

于江苏省泰州市的个案研究(张英花)	5.44	古代中国的倡廉惩贪及其现代启示(魏茂恒)	3.119
基于权变理论的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管(张云)	5.48	论社会和谐(王烈)	4.45
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浅议(石萍)	6.23	从中苏两国改革的不同结果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政治稳定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缺失现状及对策(江涛)	6.25	(鞠健 邵海军)	4.49
文化转型·高职院校技术文化的构建(壮国桢)	6.2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破解世纪难题的科学论断(张琴芬)	4.53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成就述评(张波)	6.3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与中国农业的发展(罗楠)	4.56
中澳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以扬州大学与查理·斯宾大学为例(朱强)	6.33	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杜保丽)	4.59
浅谈高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管理(陈艳)	6.37	简论王栋的反身观(张树俊)	4.62
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刍议(张红)	6.39	清末海军“借才异域”之探索(唐正香)	4.66
公安高教研究		试论我国人格权及其法律保护的若干问题(张玉兰 朱长桂)	4.69
本科教学评估与省属公安本科院校规范化建设(王丰)	4.33	我国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问题、成因与重构思路(吴也牧)	4.73
关于省属公安高校发展定位的思考(徐程)	4.36	论房屋租赁权的性质(郑春林 耿立昂 任蓓蓓)	4.76
以学科建设引领公安本科院校建设发展(张冀弘)	4.39	论规律(孙宝根)	5.51
正规化视野下公安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华道金)	4.42	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李安林)	5.54
高职研究		论司法监督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刘素梅)	5.58
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蒋国良)	2.33	和谐社会视野下基层政府治理的战略思考(陆锋明)	5.62
外赋与内修·高职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徐建明)	2.35	贝克亚政治社会理论论纲(武志丽)	5.65
科学发展视野下的和谐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思考(张亚林 钱涛)	2.37	影响消费选择的消费文化元素——从后现代享乐主义维度看	
教育史研究		(赵欣)	5.68
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及其现代意义(陈媛)	2.47	汶川震后捐赠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段冰)	5.72
金陵女子大学校园考(沈雪梅)	2.50	征地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初探(王慧)	5.75
政史经法研究		基于过程与评价激励的科研创新机制研究(吴蓓蕾)	5.78
战略机遇期内的中国人才安全战略(周建)	1.51	教育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赵宓)	6.42
理性公共空间的建构——试论媒体与公民(宋文)	1.55	以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关于江苏加快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思考(李达)	6.45
试论实现和谐语言的对策(顾平)	1.59	试析国际油价上涨对南京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张圆)	6.48
古代隐逸心态解析及其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启示(赵立利 王希孟)	1.62	电子商务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王建宏)	6.51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部的重大政治举措(马烈)	1.65	对电子商务技术基础课程的几点理解(成谢军)	6.54
美国智库对美俄矛盾的解读及其对策(姚自强)	1.69	语言文学研究	
南唐国术与唐宋之交的道教衍变(何剑明)	1.72	许地山·十字架前柔软的心肠——论许地山作品对基督教思想的阐释(江露露)	1.79
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再思考(朱宏波)	1.77	论元杂剧中的耐迟戏(马叮)	1.82
论国家是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王曦)	2.53	张可久西湖散曲略论(赵玮)	1.85
管制视角下的行政审批改革探微(许超仪)	2.57	百年孤独与秋日情怀——杜甫《登高》赏析(陈建华)	1.89
城市社区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以常熟市社区文化建设调查为例(许钰晨)	2.61	马丁·艾米斯的“新概念”小说——关于小说《伦敦场》的叙事语法分析(吴翔)	1.91
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对处于转型关键期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明朝辉 濮阳云 赵月琴)	2.64	来自记忆的威胁——《房间》里的罗斯心理状态微探(肖婷)	1.95
试析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特点及绩效(陈祝峰)	2.69	卢见曾幕府戏曲活动考述(鲍开恺)	2.72
如何认识非法律手段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兼论法律赢得民众信赖的条件(吴增基)	3.52	心灵扭曲的小人物——简析《金瓶梅》中奴婢妓女与帮闲	
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刘建宁)	3.57	箴片的心理刻画(高飞燕)	2.76
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障碍及其克服(褚添有 阳永煊)	3.61	铁室之窗·激流之源——试论叶绍钧早期文言小说(周淑平)	2.79
文化产业·长三角新一轮起飞的社会载体与经济动力(叶南客)	3.65	不可抗拒的命运——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分析《弗兰肯斯坦》中怪物的悲剧人生(唐雯婉)	2.81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初探(黄光耀)	3.68	从重复性节律原则谈诗歌《安娜贝尔·李》的本文结构(徐薇)	2.84
从政府管理工具到管理政府工具——1978年后现代预算在中国的成长(刘守刚 刘雪梅)	3.73	懂爱的人最美——伊丽莎白·白朗宁与席慕容爱情诗歌比较(冯文捷)	2.86
城市视点·近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构成研究(池子华)	3.107	包养作家·文艺改革的误区(陈辽)	3.79
罗家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就(孟丹青)	3.112	《红楼梦》研究与文学创作论——对“红楼探佚”的思考(何永康)	3.81
江湖信仰漫谈(刘平)	3.116	关于当前中国文学阅读与研究的思考(周成平)	3.83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思考(江锡铨)	3.87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汪成法)	3.91

新发现的四篇朱光潜佚文(周红)	3.95	论高师手风琴教学(金伟)	5.99
白居易与宋诗(王锡九)	3.98	加强高师声乐教育中的通俗唱法教学(张红霞)	5.101
试论庄子的小宇宙理论(姚曼波)	3.104	浅谈和声共同课的教材特点——《和声学教程》与《和声基础教程》的比较(王丞)	5.103
沿波溯流 探微烛隐——关于意象、意境的重新思考(汪德宁)	4.80	浅论歌唱的共鸣(施隽)	5.105
“树人”即鲁迅?——关于两篇疑似鲁迅佚文的考辨(史建国)	4.85	小学歌唱教学的探索与思考(宋丽娟)	5.108
现代伦理话语下的艾米丽——《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新解读(薛瑞东)	4.89	国画素描基础教学之我见(张广才)	5.110
注定的牺牲品——简评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张兰珍)	4.93	从革命的理想主义到大众的流行化——近50年中国书籍插图艺术风格的流变(贾如丽)	5.114
试论托妮·莫里森小说中《圣经》象征运用(马卫华)	4.96	编辑学·图书馆学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奇葩——《美国华裔文学史》评析(陈洁)	4.98	期刊数字化面临的问题和对策初探(金雯)	2.105
《四个四重奏》浅析(邵萍萍)	6.57	高校学报“低迷”的原因商榷(江舟群)	6.104
哈罗德·罗宾斯和他的《爱在何方》(臧天婴)	6.60	试论高校学报网络化发展的瓶颈(刘云)	6.106
《帕克大妈的一生》一文中的意识流手法(方祝根)	6.62	明代人物传记资料的检索(刘枚)	6.95
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王安忆《遍地枭雄》叙事情境的另一种解读(唐东霞)	6.64	高校图书馆非纸质文献资源的典藏与管理(徐万超)	6.98
“句读”标点在中国古籍文本中的演变线索(徐瑞泰)	6.67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探析(张再丽)	6.100
“感怀”“猜违”是否是叹词?(许诺)	6.71	图书馆实施ISO9000族质量管理标准之我见(施雁冰)	6.102
外语研究		中学文科教育教学研究	
非线性科学对外语学习及教学的启示(丁梦扬)	1.99	新课标下语文教学的人本价值取向(王志生)	1.104
英汉委婉语之委婉手段异同比较(宋优)	1.101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情商教育(罗黔平)	1.107
外语教学研究设计中的几点思考(陈乃琳)	2.89	新课程英语教学的预设与生成(王春劲)	1.110
英语写作不成功者的元认知研究(陆红)	2.92	浅谈高一年级英语的教与学(徐传海)	1.113
形式图式与英语阅读材料的选用(王菊芬)	2.95	解读新课标 教好新教材——新课程理念下英语教学初探(明永红)	1.116
错误分析 对外语教学的再思考(郁梅)	2.97	初中牛津英语单词教学应重视的4个阶段(江岚)	1.118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者自主”观念的调查分析(周艳艳)	2.99	寓教于乐是中学英语教学的一种重要手段(王敏)	1.120
小议英汉语义粘连对比中的照应(江颖)	2.102	语文教学 慎用现代教育技术(陈杰)	2.107
语篇中话题的突显性与连贯(张仁兰)	4.101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开设的六大困惑(陈亚)	2.109
间接言语行为的性质衡量(张颖)	4.105	启发式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浅谈(吴伯兰)	2.112
含有人名的英语习语之隐喻探源(邵继荣)	4.108	牛津高中英语“Task”的教学模式及评价策略——以“Looking good feeling good”一节“Task”的教学为例(王红)	2.115
高起点大学英语阅读课程教学之我见(刘世红)	4.111	初中英语教学中阅读能力的培养(丁佐希)	2.117
建立班级电子邮箱与感知网络学习环境(穆静)	4.114	浅谈和谐历史课堂教学的构建(苏琴华)	2.119
英语阅读教学模式——“四读法”(黄小群)	4.116	音乐课堂审美元素初探(沈海波)	2.121
基础英语研究性教学实践初探(周丽敏)	4.119	例谈历史教材的处理艺术(夏峻桥)	4.121
中美高低语境文化的对比研究(吴泽琼)	6.73	还原古典诗歌之美——古典诗歌的教学方法探索(张洁)	4.123
重新评价斯金纳(孙峰 范锋)	6.76	对新课程理念下高中语文教师角色转换的思考(刘玉)	5.118
从形合与意合的角度看英汉互译(叶青)	6.79	分层训练 从议论到议理——谈议论文教学新思路(王德庆)	5.120
试析西方翻译流派对译者地位的研究(陆丽英)	6.81	语言训练要注重实效(过冠红)	5.123
wanna型词汇的句法结构分析(王召军)	6.83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中构建生态文明教育新理念(孟庆雷)	6.109
研讨式教学法在高职商务英语课程中的探微(王国燕)	6.86	新课程 新高考 新教学——从2008年江苏新高考谈政治课教学(张忠坡)	6.111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践的研究与启示(申沁)	6.88	模块化教学 使中职语文课堂鲜活起来(王维英 吴澄波)	6.113
日语敬语发展的差异性研究(蒋庆荣)	6.91	英语课堂任务型教学有效性探究(孙静芳)	6.116
浅谈日语教学的灵活性和变动性(路娴)	6.93	注重理论分析 探索课改热点——评《新视野中的中学历史教育研究》(朱煜)	6.118
音乐·美术		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反思性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冯章葆 严红妹)	6.119
双语播音中的中英文播音比较研究(周隽)	5.81	中学美术课程的目标分析(赵岳峻)	6.122
徐州柳琴戏的生存现状与对策(薛雷)	5.83	其它	
浙派琴曲《潇湘水云》解析(梁伟)	5.86		
交响与声乐的伟大结合——声乐套曲《漂泊艺徒之歌》的创作及意义(王音)	5.90		
论地方艺术院校民族声乐教育特色化建设(夏毅和 马琰)	5.92		
对加强高师学前教育专业民族音乐教育的思考(严雅萍)	5.95	2007年总目录	1.122
试论学生音乐会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许伟欣)	5.98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 about All-round Education

SUN Kong - yi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 Nanjing , Jiangsu , 210013 , China*)

Abstract Society and education connect to each other interactively and positively. To set a goal for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means it will provide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All-round education should take good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itself in a democratic , creative and harmonious way so as to enhance the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Construct harmonious society ; all-round education ; democratic ; creative ; harmonious

Exploring o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Conduct and Ensuring their Mental Health

BAO Hai - xia

(*Jiangsu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Changzhou , Jiangsu , 213164 ,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 questionnaire about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using " , pu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and KS o Yang's diagnosis of Internet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 Jiangsu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urveyed 120 undergraduates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extent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o ensur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urvey found that 8% of these students online are addicted to surfing on internet. The addiction has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to the time and degree of online conduct , but it has some relations with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ity , such as loneliness , self-esteem , and other acts of network-related addiction.

Key words Internet behavior ; Internet addiction ; ensuring mental health

Modernization , Independence Reform of Tsinghua University

——Luo Jialun in Tsinghua University

Li Tao Chen Yu - ling

(*Education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 Chong Qing , 400715 , China*)

Abstract Tsinghua University began from the " Preparatory school for future studying in America " , underwent fast development in 1920s and 30s , and leapt into the domestic famous university quickly. Luo Jialun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1928 , and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 integrity , academic , common people , discipline " , and has accomplished a modernized and independent Tsinghua University , which is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Tsinghua University.

Key words Luo Jialun ; Tsinghua University ; Independent leading ; Modernization ; Academic

The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isarmament after the Cold War

HUANG Guang - yao

(*School of Humanity ,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Nanjing , Jiangsu , 210013 ,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 for the disarmament of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 played an unprecedented role in the field of disarmament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armament is faced with more challenges because of the new situation of armament.

Key words The United Nation ; disarmament ; the Cold War

The Structuralism Semiology of France

LI Wan - wen^{1 2}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 Jiangsu , 210093 , China* ;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 Nanjing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University , Nanjing , Jiangsu , 210016 , China*)

Abstract In the six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 the structuralism flourished intellectually and opened a new era remarkably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Fra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origins and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ench structuralism semiology , and interpret the methodology of the cross-discipline created by the structuralism , and look forward to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author thinks the studies will benefi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modern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and semiology.

Key words France ; structuralism ; semiology ; cross-discipline ; methodology